韓國書院學報



제 11 호

韓國書院學會
2020.12

목차

■ 기획 논문 1 : 한·중 서원 의례의 유형과 특징

中国书院礼仪的类型与特征 ····· **兰甲云** ◦ 7

한국 서원 의례의 종류와 의의: ····· **한재훈** ◦ 27
강학례, 향사례 그리고 향음주례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특징과 의미 ····· **임근실** ◦ 55
- 남인계·서인계 서원을 중심으로 -

■ 기획 논문 2 : 세계문화유산 옥산서원의 인문·자연경관과 위상

朱子书院文化与韩国书院的发展 ····· **张品端** ◦ 91

理学背景下武夷精舍与玉山书院周边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 ····· **彭鸿緒** ◦ 103
- 以中国武夷九曲和韩国玉山九曲为中心

조선시대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위상 변화 ····· **이병훈** ◦ 125

■ 일반 논문

17세기 말-18세기 초 석실서원의 강학 실제와 특징 ····· **김자운** ◦ 185
-농암 김창협의 강학활동을 중심으로-

朝鮮時代 書院 刻板本의 淵源 研究 ····· **裵賢淑** ◦ 219

白鹿洞书院的建立背景与中国书院的变化-宋元明清- ····· **邓洪波·赵伟** ◦ 251

■ 부록

해제: 상주 花巖書院『敦事錄』자료 소개 ····· **채광수** ◦ 299

『花巖祠敦事錄』影印 ····· 303

■ 휘보

■ 연혁·활동 보고 | 341
■ 한국 서원학회 회칙 | 344
■ 편집 규정 | 351
■ 논문투고 규정 | 354
■ 원고작성 규정 | 358
■ 연구윤리 규정 | 362
■ 한국서원학회 임원 및 편집위원 | 364

■ 기획논문 1 : 한·중 서원 의례의 유형과 특징

▣ 中国书院礼仪的类型与特征

▣ 한국 서원 의례의 종류와 의의:
강학례, 향사례 그리고 향음주례

▣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특징과 의미
- 남인계·서인계 서원을 중심으로 -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1 7

中国书院礼仪的类型与特征*

兰 甲 云**

Ⅰ. 中国书院礼仪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
Ⅱ. 中国书院礼仪的主要类型与具体仪节分析
Ⅲ. 中国书院礼仪的基本特征

【국문초록】

중국 고대 서원의 의례는 중국 고대 각급 관학의 학례 제도로부터 기원한 것임을 분석하였다. 서원의 주요 의례로는 석전례(釋奠禮), 석채례(釋菜禮), 서원 강회에서의 의례, 일상 속에서 스승과 학생이 강학하는 의례 등의 유형으로 나누어진다. 각 서원의 향현 제사와 전례 제사 대상은 모두 향리의 선현이며, 지방마다 특색을 가지고 있다. 서원 의례와 관학 학례는 함께 중국 고대 예제·예교·예치의 교육 체계와 학술 계통을 구성한다. 서원 의례 제도는 지방 고을의 산촌 격지에도 고대 예의를 가르쳐 보급하는 것을 보증하는 중요한 교육·교화 제도였다.

주제어 : 서원의례, 석전례, 석채례, 교화, 예치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19S1A5C2A02082813)

** 중국 호남대학 학보(사회과학판) 편집부장/ lanjiayun11@163.com

Ⅰ. 中国书院礼仪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

（一）中国书院礼仪直接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

中国书院礼仪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 借鉴了国子监太学州学府学等官办学校礼仪. 书院礼仪属于中国古代学礼的一部分. 中国最早的学礼萌芽可以追溯到《周易》《蒙》卦, 《蒙》卦是讨论儿童启蒙教育的卦, 涉及到尊师重道的核心思想, 这个核心思想也是学礼的核心思想. 《蒙》卦卦辞说："匪我求童蒙, 童蒙求我. 初筮告, 再三渎. 渎则不告, 利贞."学生必须主动向老师请教, 而不是老师求学生学习. 【1】

《周易》外, 《尚书》也有一些学礼记录. 《论语》中有一些学礼内容, 《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和《学记》, 对于学礼的记录较为完整. 《史记》中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也有不少学礼内容.

《文王世子》记录了学习顺序·学习时间·学习内容以及学习问答规矩礼仪, 重点介绍了古代最为重要的两个学礼, 即释奠礼与释菜礼. 《文王世子》云："凡学世子及学士, 必时：春夏学干戈, 秋冬学羽龠, 皆于东序. 小乐正学干, 大胥赞之；龠师学戈, 龠师丞赞之."

朱熹《仪礼经传通解》和《朱子语类》中也有不少学礼文献资料.

古礼学礼从分类上说属于古礼五礼吉凶宾军嘉礼中的吉礼. 但是, 在《周礼》《春官》《大宗伯》中的五礼, 吉礼三十六目中并没有学礼一项. 作为礼经的《仪礼》中, 也未见学礼内容. 《礼记》中的《文王世子》和《学记》记载了相关学礼内容, 主要是释奠礼与释菜礼这两个古礼. 《曲礼》和《文王世子》记载了不少弟子侍奉父母或者老师的细小礼节, 在上古时代侍奉父母与侍奉老师的古礼或许有相似相同之处, 《周易》《系辞传》说："无有师保, 如临父母", 将师保与父母并举, 间接说明子辈对父母与师保的礼节可能相似. 《史记》中记载孔子弟子为孔子服丧为三年心丧, 三年之丧的丧期与父母相同.

（二）中国古代学礼的主要内容与庙学合一

任何古礼的举行，都涉及到六个方面的内容，第一个是祭祀对象，第二个祭祀者，第三个是祭祀礼品与祭祀礼乐歌舞以及祭祀辞章，第四个是祭祀仪式或者说祭祀礼仪即祭祀程序与祭祀过程．第五个是祭祀时间，第六个是祭祀场所．

就学礼中释奠礼或者释菜礼而言，也有这六个方面的内容．

就第一项祭祀对象而言，释奠礼与释菜礼的祭祀的是先圣先师．先圣是指先代的圣人，即制礼作乐之人，作者谓之圣，譬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历代圣人．先师是指传述先圣礼乐的历代老师，譬如先代乐正·夔师等，《周礼》说："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则以为乐祖，祭于瞽宗．"孙希旦说有先代之先师·有当代之先师，他说："以古之贤臣明于其业者为师，若《礼》有伯夷·《乐》有后夔，《祭礼》所谓'祀先贤于西学'是也．此先代之先师也．其忧道德而为学之大司成者，死则亦祭之，以为先师……此当代之先师也．"可见，先圣先师都是指先代或者当代有道德并且能够以礼乐教育教化子弟或者百姓的圣贤人物，能够以道德礼乐行教化之事，培育人才．

就第二项祭祀者而言，一般来说，有主祭者或主献者，有助祭者或助献者，有参与祭祀的学生．另外还可能有观礼的国民百姓，孔子就曾经观礼，《周易》有个《观》卦，专门谈观礼对于教化百姓的教育意义．释奠礼比较隆重，一般来说，太学是天子亲自视学主祭，在诸侯国是国君亲自主祭，后代州郡县学，则是地方主政者主持祭祀．释菜礼则比较简单，一般是学官主祭，老师们助祭，学生参加典礼，有可能有观礼的社会贤达人士或者国民乡民．唐代贞观年间，据《唐书·礼乐志》记载，皇太子于国学行释奠礼，以皇太子为初献，国子监祭酒为亚献，国子司业为终献．在州学，则以刺史为初献，上佐为亚献，博士为终献．

第三项就祭祀礼品·祭祀歌舞乐章·祭祀辞章而言，释奠礼的祭祀礼品与少牢礼大致相当，即有羊和豕，没有牛．如果有牛的话，就是太牢礼了，刘邦

在曲阜祭祀孔子时，就是以太牢礼祭祀的.

第四项是祭祀礼仪程序. 释奠礼与释菜了略有不同.

第五项是祭祀时间，释奠礼与释菜礼一般是春秋仲月第一个丁日即上丁日举行丁祭，也有四时仲月上丁日举行释奠礼的. 《隋书·礼仪志》云："隋制，国子寺，每岁以四仲月上丁，释奠于先圣先师." 《唐书·礼乐志》云："其中春中秋释奠于文宣王武成王，皆以上丁上戊."

第六项是祭祀场所，学礼一般是在学宫举行，即三代的痒序明堂瞽宗太学等学校教育场所. 历朝历代则在中央太学以及地方各级官学机构举行，宋代以后的书院则在书院文庙里面举行.

由《礼记》《文王世子》看来，夏商周三王时代，中国早已有了学礼，《文王世子》说："凡三王教世子，必以礼乐."

中国古代学礼祭祀的场所历代有所变化. 清代吴省钦《什邡县方亭书院新建圣像楼碑》一文总结说三代时的学礼祭祀场所在学校，而非庙宇. 一直到汉代在太学建立孔子庙，明帝初，以周公孔子并祀郡学，魏文帝修鲁郡学，庙与学始合一.

Ⅱ. 中国书院礼仪的主要类型与具体仪节分析

释奠礼与释菜礼，源远流长，远在周代早期，就已经成熟，春秋时已经非常普遍. 中国书院的学礼制度是中国整个学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释奠礼与释菜礼本来是官学的祭祀礼典，书院介于官方与民间之间，具有半官方半民间性质，因此释奠礼释菜礼与官学祭祀基本相同. 书院非常重视此学礼，明代书院学规将春秋举行释奠释菜二礼列为十一条学规中的第一条，即"春秋释菜，朔望谒祠".

（一官）方教育传统性质祭祀先圣先师的释奠礼具体仪注

1. 古代书院模仿参考官府学宫释奠礼

> 古代学礼对于孔子的祭祀，高度重视．宋代以后，祭祀孔子常常作为国家的一项大礼来对待，元代皇帝多次下旨命令各级官学和书院照办．譬如："中统二年六月，钦奉圣旨昭该：先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恒令洒扫修洁．""中统二年圣旨节文：宣圣庙，国家岁时致祭，诸儒月朔释奠，宜常令洒扫修洁．""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皇帝圣旨谕中外百司吏人等：孔子之道，垂宪万世，有国家者，宜当崇奉……应设庙学·书院……其赡学地土产业……所出钱粮，以供春秋二丁，朔望祭礼．"

可见，中国古代朝廷对于官学与书院的祭祀，皇帝都有圣旨指示，书院祭祀制度属于国家政府的一项制度安排，不得违背．

释奠礼是古代学宫于春秋冬三时设荐馔祭祀先师，不迎尸．陈祥道说："释奠有牲·币，有合乐，有献酬．"当然，书院祭祀也是如此．

2. 少劳释奠礼基本仪节

为了保证祭祀的郑重其事，对神灵表达最高的敬意，古代祭祀一般需要斋戒，有散斋和致斋的祭祀制度．《礼记·祭义》汉代郑玄注："散齐七日不御·不乐·不吊．"《宋书·卷一四·礼志一》："殷祠，皇帝散斋七日，致斋三日．"古礼于祭祀父母前七日不御不乐不吊，谓之"散斋"．齐，后多作"斋．"《礼记·祭义》："致齐於内，散齐於外．"《礼记·祭统》："散齐七日以定之，致齐三日以齐之．"《礼记·祭统》称："齐者，精明之至也，然后可以交于神明也．"《礼记·表记》称孔子说："齐戒以事鬼神，择日月以见君，恐民之不敬也．"《礼记外传》亦曰："凡大小祭祀，必先斋，敬事天神人鬼也．斋者，敬也．"

古代祭祀, 在斋戒之前必须先要沐浴更衣. 《墨子·天志》云：“天子有疾病祸祟, 必斋戒沐浴. 汉代董仲舒《春秋繁露》云：“斋戒沐浴, 洁清致敬, 祀其先祖父母.”

《道南渊源录》所记载的释奠礼仪记载有斋戒的规定, 其仪注云：“先三日斋戒, 前一日宿院中, 午後省牲, 用羊豕各一, 以全牲献圣庙.” 以下所引, 皆出此书.

（该仪注为刘本孺先生志草原文, 见于(清)邹鸣鹤编撰：《道南渊源录》卷之九, 清道光刻本.）

此礼仪祭祀用少劳礼, 即牲用羊豕各一, 一头羊·一头猪. 其余祭品有玄酒·酱盐以及各类粮食与果品等等, 具体数目数量摆设方式如下所引：

“先师前设爵六, 三盛玄酒. 登一, 太羹猪肉汁, 不用盐酱. 铏二, 和羹汁, 用菜料和者. 簠二, 黍稷. 簋二, 稻粱. 笾八, 形盐·藁鱼·枣·栗·榛·菱角·芡实·柿. 豆八, 韭菹切去本末, 取中四寸, 菁菹·菜葅·芹菹·笋菹·醢醓细切, 猪肉熟之, 和盐酒料物, 鱼醓细切, 鱼熟之和盐酒料物, 糗饼用小烧饼, 粉餈用小糕. 俎四, 羊首一, 猪首一, 羊前肩一, 猪前肩二. 帛一, 酒尊一.”

斋戒完毕后, 正式举行释奠礼仪时的具体程序仪节如下所引共七部, 即迎神·初献·亚献·终献·饮福受胙·彻馔·送神等七步.

第一步, 迎神. 主祭者与陪祭者都要隆重地穿上吉礼的祭祀礼服, 所谓“俱吉服”.

第二步, 祭神行初献礼. 各种礼仪秩序井然, 主祭陪祭迎神后行初献礼, 初献动作有鞠躬, 拜, 兴, 拜, 兴, 拜, 兴, 拜, 兴, 平身等礼仪.

第三步, 祭神行亚献礼, 即“引赞唱. 诣盥洗所, 诣酒尊所, 司尊者举冪酌酒, 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 跪, 献爵, 奠帛, 俯伏, 兴, 平身, 跪. 通赞唱. 陪祭者皆跪. 引赞唱. 读祝. 通引同唱. 俯伏, 兴, 平身, 复位, 行亚献礼.”

第四步, 祭神终献礼, “通赞唱. 诣酒尊所, 司尊者举冪酌酒, 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 跪, 献爵, 俯伏, 兴, 平身, 复位, 通赞唱. 行终献礼.” 所谓三献礼也.

第五步，祭祀者饮福收胙. 即参加祭祀的人饮祭祀过的福酒，接受祭祀过的祭肉. “引赞唱. 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冪酌酒，诣至圣先师孔子神位前，跪，献爵，俯伏. 兴，平身，复位，通赞唱. 饮福受胙. 引赞唱. 诣饮福位，跪，饮福酒，受胙. 俯伏，兴，平身，复位. 通赞唱. 鞠躬拜，兴，拜，兴，平身.”

第六步，彻馔.

第七步，送神·读祝文. “送神，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 读祝者捧祝，进帛者捧帛，各诣瘗位，望瘗. 引赞唱. 诣望瘗位焚祝帛讫. 通引同唱[1].

祝文曰：某年岁次甲子某月甲子朔越某日甲子，　末学某等敢昭告於至圣先师孔子，惟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惟春秋谨以牲帛醴齐粢盛庶品，式陈明荐. 尚飨.”

3. 祭祀孔子所用的太老释奠礼仪节以及四配·十二哲·先贤·先儒所用的少劳礼仪节

许多书院举行的释奠礼的用牲制度与《道南渊源录》所记载的不同，《道南渊源录》用少劳礼，而许多书院却用太牢礼，用牛羊豕各一，行祭祀礼的规格高了一级.

我们以曹维精著作《郴侯书院志》卷一(同治二年(1863)刻本)记载的释奠礼仪为例，郴侯书院释奠礼仪直接采用官办学校释奠礼仪.

释奠礼仪非常隆重，正献主祭者为当地政府长官，礼乐交错，乐舞齐备，文献典礼仪注如下，注意祭祀先师孔子的用牲是太牢礼的规格. 参见《丁祭礼乐仪注备考》.

---

1 黄锦君称：“‘通引同唱’下当有‘礼毕’二字，见下文祭祀仪式例.”(黄锦君：『道南渊源录』卷九『校记』，(清)邹鸣鹤编撰，黄锦君校点：『道南渊源录』，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编：『儒藏·史部·学校史志』第56册，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781页.)

“直省府州县庙祀先师孔子, 皆以岁春·秋仲月上丁行释奠礼. 县以长官为正献, 其贰及所属两序分献, 司祝·司香·司帛·司馔, 引赞·通赞·引班以学子弟员娴礼仪者执事, 致斋如期. 祭前一日, 饬庙户洁扫殿庑内外, 藉以棷稷荐, 拂拭神座. 视割牲官公服, 诣神厨, 视割牲以豆, 取毛血瘞于坎(先一日, 宰夫预凿于宰牲所之西). 正献官率执事生入学习仪, 教官率乐舞诸生入学习乐舞. 夜分陈设 :

先师位前 : 牛一·羊一·豕一·登一·鉶二·簠二·簋二·笾十·豆十·炉一·镫二. 按 : 《会典》 帛一·尊一·爵三.”

书院举行祭祀孔子的释奠礼是配祀孔子的四哲则低一等级, 十二哲也是如此, 用少劳礼. “四配位前 : 各羊一·豕一·鉶二·簠二·簋二·笾八·豆八·炉一·镫二. 按 : 《会典》 各帛一·爵三.

十二哲位前 : 鉶一·簠一·簋一·笾四·豆四. 东西各羊一·豕一·炉一·镫二. 按 : 《会典》 各帛一·爵三. 殿中设一案, 少西北向, 供祝版. 其南东设一案, 西向, 陈礼神制 : 帛九(色白)·香盘四·尊三·爵二十有七. 西设一案, 东向, 陈礼神制 : 帛八(色白)·香盘三·尊二·爵二十有四. 凡牲陈于俎凡帛.”

许多书院祭祀先贤也用少劳礼. 先贤人数众多, 于是少劳礼就用羊两只, 用猪两只, “先贤案前 : 羊二·豕二·香案一·炉一·镫二.”

释奠礼仪举行时祭祀先儒, 少劳礼即用羊豕各一, 一头羊一头猪, “先儒案前 : 羊一·豕一·香案一·炉一·镫二. 设一案于南, 北向. 陈礼神制 : 帛二(白色)·香盘二·尊三·虚爵六, 俎·篚·幕·勺具.

4. 释奠太牢礼用乐仪节与乐章制度

释奠礼仪非常隆重的一点是用乐制度. 乐器有这些陈列.

“西庑同陈乐于殿外, 两阶特镈一·编钟十有六. 在东特磬一·编磬十有六. 在西皆悬以虡业, 东升龙麾一·应鼓一·祝一. 西降龙麾一(羣书皆麾一, 《圣门礼乐统》 云 : 后增为二. 详后乐器麾幡注)·鼗鼓一·敔一. 东·西分列琴

六·瑟四·箫六·笛六·篪二·排箫二·埙二·笙六·搏附二·旌二·羽鈅三十有六."

书院释奠礼仪的乐章分迎神乐章昭平之章·初献宣平之章·亚献秩平之章·终献叙平之章·彻馔懿平之章·送神德平之章等六部乐章. 具体乐章如下所示:

迎神, 昭平之章
大哉孔子, 先觉先知, 与天地参, 万世之师,
祥征麟绂, 韵答金丝, 日月既揭, 乾坤清夷.
初献, 宣平之章
予怀明德, 玉振金声, 生民未有, 展也大成,
俎豆千古, 春秋上丁, 清酒既载, 其香始升.
亚献, 秩平之章
式礼莫愆, 升堂再献, 响协鼓鏞, 诚孚罍瓶,
肃肃雍雍, 誉髦斯彦, 礼陶乐淑, 相观而善.
终献, 叙平之章
自古在昔, 先民有作, 皮弁祭菜, 于论思乐,
惟天牖民, 惟圣时若, 彝伦攸叙, 至今木铎.
彻馔, 懿平之章
先民有言, 祭则受福, 四海黉宫, 畴敢不肃,
礼成告彻, 毋疏毋渎, 乐所自生, 中原有菽.
送神, 德平之章
岛绎峩峩, 洙泗洋洋, 景行行止, 流泽无疆.
聿昭祀事, 祀事孔明, 化我蒸民, 育我胶庠.

(二)官方教育传统性质祭祀先圣先师的释菜礼具体仪节

古代书院的释奠礼释菜礼与古代学礼基本一致, 只是某些在祭祀次数与祭祀时间上与官学学礼祭祀有所不同. 释菜礼与释奠礼相比, 相对简单.

譬如《益阳箴言书院志》卷上记载胡林翼的《箴言书院祭祀章程》云："先圣祠祀以春秋二仲上丁，国典也. 书院不敢同，今拟二月初十日·九月初一日为定期."

东林书院的祭祀日期则与官学相同，我们看释菜礼仪注，第一，举行释菜礼前同样需要斋戒三日，以示郑重其事，这点与释奠礼完全一致. 举行释菜礼仪时，仪注相对简略.

释菜仪注

前三日斋戒，前一日宿院中.

先师前设爵三，旁二爵先酌酒，中爵待献官行. 笾豆各二，二豆在中，盛菁菹兔醢. 二笾在两旁，盛枣栗. 无兔则以鱼醢代. 至日夙兴，主祭者与陪祭俱吉服. 通赞唱. 执事者各就位，陪祭者各就位，主祭者就位，瘞毛血. 迎神，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行献礼. 引赞唱. 诣盥洗所，诣酒尊所，司尊者举冪，酌酒. 诣先师孔子神位前，跪，献爵，俯伏，兴，平身，诣读祝位，跪. 通赞唱. 陪祭者俱跪. 引赞唱. 读祝. 通引同唱. 俯伏，兴，平身，复位. 通赞唱. 送神. 鞠躬，拜，兴，拜，兴，拜，兴，拜，兴，平身，礼毕.

祝文曰：惟年月日，末学某等，敢昭告於至圣先师孔子. 惟师祖述尧舜，宪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 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如四时之错行，如日月之代明. 兹当东林书院一岁讲习之初，恭修释菜之礼. 尚飨.

以上系刘本孺先生志草原文.

－(清)邹鸣鹤编撰：《道南渊源录》卷之九，清道光刻本

（三）半官方半地方民间性质的乡贤祭祀礼

祭祀乡贤礼就在同一天祭祀先师孔子的释奠礼后举行. 古代书院的举行释菜礼时，也同样祭祀先贤，譬如《东林书院》举行释菜礼祭祀先圣先师孔子后，接着祭祀先贤杨龟山先生与其他七位乡贤. 仪注云：

同日，杨龟山先生神位前，设爵三，登一，鉶一，簠一，簋一，笾六形盐·藁

鱼鱼·枣栗·榛·芡实. 豆六, 韭菹·菁菹·芹菹·笋菹·醢醢·鱼醢. 帛一, 俎四二俎盛羊肉二方, 二俎盛猪肉二方.

七先生神位前设爵七, 东西酬各一, 簠簋各一, 笾各四盐·枣·栗·芡实. 豆各四, 韭·菁·笋·芹. 俎各二, 羊蹄一, 猪蹄一. 通赞唱. 各就位, 迎神. 鞠躬, 四拜, 兴, 平身. 奠帛, 行初献礼, 引赞唱. 诣盥洗所, 诣酒尊所. 司尊者举冪酌酒, 诣杨先生神位前, 跪, 献爵, 献帛, 俯伏, 兴, 平身. 跪, 陪祭者皆跪. 引赞唱. 读祝. 通引同唱. 俯伏, 兴, 平身, 复位. 引赞唱. 分献者诣七先生神位前, 跪, 献爵. 俯伏, 兴, 平身, 复位. 通赞唱. 行亚献礼, 如前. 通赞唱. 行终献礼, 如亚献礼. 通赞唱. 辞神, 鞠躬, 四拜, 兴, 平身. 读祝者捧祝, 进帛者捧帛, 各诣瘞位望瘗. 引赞唱. 诣望瘗位焚祝帛讫. 通引同唱. 礼毕.

祝文曰：惟年月日, 末学某等, 敢昭告於宋龟山杨先生之神, 曰：惟先生倡道东南, 至止锡邑, 十八年仪刑俨在, 五百岁道化如新. 兹当仲春秋敬举时祭, 谨以仲素罗先生·德辉胡先生·玉泉喻先生·远初尤先生·小山李先生·实斋蒋先生·二泉邵先生配. 尚飨. 自今以後, 读祝文例见前.

（四）会讲之礼以及日常师生礼仪

1. 书院会讲(讲会)之礼

以《虞山书院院规·乡约仪》为例说明. 乡约讲堂仪节分明, 讲堂严肃, 有鸣鼓号令节制, 歌诗声声, 整齐严肃.

凡书院讲《乡约》, 堂上设圣谕牌, 台下设讲案. 发鼓一大通, 各照图式班位, 东西相向而立. 约赞唱："排班." 各就本班中转身向上立. 唱："班齐." 唱："宣圣谕." 铎生出班, 诣讲案前, 南向立. 唱："皆跪." 首铎唱："听着, 太祖高皇帝教你们孝顺父母." 次铎唱："教你们尊敬长上." 三铎唱："教你们和睦乡里." 四铎唱："教你们教训子孙." 五铎唱："教你们各安生理." 六铎唱："教你们勿作非为." 众齐声应曰："诺." 齐叩头. 唱："兴, 平身." 铎生归

班, 拜圣. 唱 : “揖, 拜 ; 兴, 拜 ; 兴, 拜 ; 兴, 拜 ; 兴, 拜 ; 叩头 ; 兴, 平身.” 唱 : “分班.” 各就本班中, 转身东西相向, 交拜. 唱 : “揖, 拜 ; 兴, 拜 ; 兴, 平身.” 唱 : “皆坐.” 各就本班中本位而坐. 官府·乡宦坐椅, 诸生·约正副人等坐凳, 余众坐于地. 各不许喧哗.

唱 : “鸣讲鼓.” 击鼓五声. 唱 : “初进讲.” 讲生二人出班, 诣案前立. 唱 : “皆兴.” 各起身. 唱 : “排班听讲.” 各转身向上, 倾耳肃容听讲《孝顺父母》·《尊敬长上》二条. 讫, 唱 : “揖, 平身.” 大众皆揖·平身, 讲生复班. 唱 : “分班坐.” 各转身东西相向坐. 唱 : “歌诗.” 歌生二人出班, 诣案前, 歌《孝顺父母》·《尊敬长上》诗二章. 会众俱和歌. 钟鼓之节, 俱依阳明先生旧法. 歌讫, 歌生复班坐. 唱 : “进茶.” 茶毕, 静坐片时, 唱 : “亚进讲.” ……唱 : “礼毕.” 撤圣谕牌. 大众一齐跪请本县教训. 本县随宜复说数句, 分付散. 各叉手缓步而散, 不得喧哗笑语. 无礼无仪, 非我民也. 三尺之童, 皆宜遵守.

——明张鼐等 : 《虞山书院志》卷四, 明万历间刻本.

会讲之礼容, 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有规范 : “会讲之容, 端而肃 ; 群居之容, 和而庄(箕踞·跛倚·喧哗·拥并, 谓之不肃 ; 狎侮·戏谑, 谓之不庄)”, 吕氏学规还规定学生对曾经教育过自己的老师应该遵循师生礼仪, “旧所从师, 岁时往来, 道路相遇, 无废旧礼.”

2. 日常师生礼仪

佚名《庙学典礼》卷五《行台坐下宪师讲究学校便宜》记载元代官府规定官学与书院师生日常礼仪规定 : “坐次 : 师席居中, 左右以次设书桌, 以右为上. 诸生序齿, 两两相对. 直日设二师席南, 两端, 钟设于师席右, 名牌设于师席左……诸生逐日仪式, 晨参 : 清晨诸生毕至, 师就坐, 直日鸣钟一声, 诸生以次出门外序立. 第二声, 诸生以次自正门东方入, 北门上重行立. 第三声, 唱揖, 诸生齐揖, 班首自西折旋到师前, 进三步, 拱手问先生安否(师云如常), 复退三步, 揖, 折旋入本位, 直日喝圆揖, 诸生圆揖, 鸣就位, 诸

生各就位(中有兄弟·叔侄同学, 候就位后, 卑幼者就尊揖). 讲书, 直日与侍立各一人……会食, 早食到, 直日鸣钟, 喝揖, 诸生齐揖, 就食, 毋得语言咳唾, 侍食俱毕, 喝揖, 齐揖, 以次退入庭中, 以序行步, 务为舒徐, 毋得跳掷戏笑, 少顷, 直日鸣钟, 各就位, 午食亦如之……暮归, 如清晨仪."

吕祖谦《丽泽讲义》中也提到日常师生教学活动中相互之间互动提问的礼仪. 譬如："长者问, 不辞让而对, 非礼也. 有问固当对, 然而是虚心而受之, 若率尔而对, 自以为能, 便实了此心, 虽有法言精语, 亦不能受, 子路所以被哂也. 如曾子曰：'参不敏, 何足以知之！'此辞让之对也. 学者须以此礼涵养此心, 全熟." 吕祖谦认为, 学生应答必须谦让虚心, 才能够涵养此心, 合乎礼仪.

吕祖谦认为, 学生谦逊的礼仪礼容十分重要. "《典礼》《少仪》皆是逊志道理, 步趋进退, 左右周旋, 若件件要理会, 必有不到. 惟常存此心, 则自然不违乎礼. 心有不存, 则礼有时失. 所谓逊志, 则徐行后长, 如洒扫应对, 如相师. 皆时逊志气象." 在吕祖谦看来, 心中长存礼仪, 比外在的详细仪节更为重要.

Ⅲ. 中国书院礼仪的基本特征

中国上古的最高统治者有高度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 《礼记》有"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的记载, 《周易》的第一卦是乾卦, 第二卦是坤卦, 第三卦是屯卦, 第四卦是蒙卦, 乾坤代表天地, 屯国是建国为王分封诸侯的卦, 第四卦蒙卦是讨论教育的卦, 可见上古时代, 建国君民, 教学为先, 并非虚言. 由《周易》看来, 君王建立国家分封诸侯以后, 教化百姓为首要任务.

学礼制度与书院礼仪祭祀制度与中国古代教育的基本内容相适应, 儒学的基本经典是六经. 其流传至今的五经在先秦时代基本定型, 是当时官学与私学教育的公共文本, 其中礼经所包含的礼制礼治礼仪礼乐教育在六经中

占有重要分量, 先圣先师孔子在《论语》一书中言仁言礼最多, 归根到底, 孔子其学归结为礼学, 孔子以"克己复礼"为己任, 梁朝皇侃认为 : "六经其教虽异, 总以礼为本."

六经文本自然是书院的基本教材, 六经中的礼经《仪礼》包括《周礼》《礼记》等三礼教育自然是书院教育的基本教材与主体内容. 这是我们讨论书院礼仪教育不能忽视的学术视野. 当然, 本文的问题集中探讨书院礼仪, 因此, 有关书院三礼经典教育的内容就没有涉及了.

我们考察认为, 中国书院礼仪的基本特征有六项.

(一) 中国书院礼仪教育与官学礼制教育一起构成中国教育以礼教为主的典型特征.

中国古代的儒学是中国古代文化与文明的主体部分, 中国古代儒学构成中国文化与中国文明的底色·是构成中国人的精神世界的主要支柱.

中国书院礼仪与中国古代官方学礼教育一起构成中国古代礼制教育的重要内容, 形成中国独特的礼义之邦的文化特色,

中国古代的教育从三代时起, 如《文王世子》就主要是礼乐教育. 礼教包含乐教, 是中国古代教育最主要的内容, 最重要的内容.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都高度重视礼教, 历代教育家也高度重视礼教.

吕祖谦的《丽泽讲义》高度重视书院的礼仪教育, 吕祖谦认为中国古人为学功夫十分之九的功夫用在礼仪生活实践上, 只有一份功夫用在诵读知识学习书本知识上. 吕祖谦说 : "古人为学, 十分之中, 九分是动容周旋·洒扫应对, 一份在诵说. 今之学者, 全在诵说, 入耳出口, 了无函蓄, 所谓'道听途说, 德之弃也. '"

"'发育'·'峻极', 而継之以'礼仪'·'威仪', 圣人之道如此." 吕祖谦甚至认为礼仪礼乐之道就是圣人之道.

南宋欧阳守道在《学礼精舍说》一文中认为 : 仁义礼智皆根于心, 而礼

是最重要的. 人学礼, “虽中人可以循至于上达.” 如果不学礼, “虽资禀高明不保于往.”

清代李来章《紫云书院学规》高度重视礼教, “横渠先生平日立教, 必先使人学礼.”

（二）中国书院礼仪的释奠礼释菜礼与官学释奠礼释菜礼基本相同

汉代以后官学的释奠礼释菜礼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 宋代以后书院的释奠礼释菜礼仪注主要来源于中国古代学礼中的释奠礼与释菜礼, 因此, 官府官府官学的释奠礼释菜礼与书院的释奠礼释菜礼的仪注基本相同.

从上文我们分析释奠礼释菜礼的仪注可以看出, 官府文件规定了官学与书院释奠礼与释菜礼的仪注, 元代皇帝多次下圣旨要求官府官学与书院祭祀孔子, 认为孔子之道, 垂宪万世, “至元三十一年七月日, 皇帝圣旨谕中外百司吏人等：孔子之道, 垂宪万世, 有国家者, 宜当崇奉……应设庙学·书院……其赡学地土产业……所出钱粮, 以供春秋二丁, 朔望祭礼.”

可见, 中国古代朝廷对于官学与书院的祭祀, 皇帝都有圣旨指示, 书院祭祀制度属于国家政府的一项制度安排, 不得违背.

（三）书院的释奠礼与释菜礼中所增加的乡贤先儒祭祀礼仪, 每个书院都不相同, 各有特色

书院礼仪祭祀对象的地方乡贤, 对于学生更容易亲近, 更容易激发起自豪感, 更容易模仿学习效法, 从而有效确立书院教育的道统与学统, 有效构建起书院教育为地方为国家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人才价值观认同标准.

书院的祭祀对象与官学相比, 既有共同之处, 也有不同之处. 共同的地方就是释奠礼释菜礼都祭祀先圣先师, 祭祀孔子时以孔门圣徒配享. 不同之处是每个书院因为是各个地方民间主办, 既具有官学性质, 又具有民间性质,

因此, 每个书院的祭祀系统除了官学系统以外, 还有每个书院自己的地方祭祀系统, 修建有乡先贤先师的祠宇, 譬如岳麓书院则修建有三闾大夫祠·朱张祠·道乡祠·六贤祠·崇道祠·四箴祠·船山祠等祠宇. 东林书院则有道南祠·五贤祠等祠宇.

部分书院十分重视书院礼仪的祭祀教育功能, 有的乡贤祭祀对象达到百余人之多. 譬如清代阎兴邦《重建大梁书院厘正祀典记》一文所记载云: "自大贤卜子外得名贤百十五人, 或生于斯, 或仕于斯, 或寄迹于斯, 立功立德, 与崇同峻, 与河同深, 皆与大梁有光, 则进而祀之大梁书院. 后之継起者, 有能与前人比迹, 亦从而配食焉. 是以传之百世."

《东林书院》祭祀杨龟山就具有典型的地方特色, 《东林书院》举行释菜礼祭祀先圣先师孔子后, 接着祭祀先贤杨龟山先生, 礼仪仪注曰: "同日, 杨龟山先生神位前, 设爵三, 登一, 鉶一, 簠一, 簋一, 笾六形盐·藁鱼鱼·枣栗·榛·芡实. 豆六, 韭菹·菁菹·芹菹·笋菹·醢醢·鱼醢. 帛一, 俎四二俎盛羊肉二方, 二俎盛猪肉二方."

(四) 中国书院礼仪教育与官学礼制教育一起构成中国社会治理以礼治为主的典型治理特色

中国书院礼仪的师道尊严, 具有官方权威性, 中国书院礼仪实践是中国古代学礼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古代是礼教国家, 以礼立人立国, 以礼治人治国, 孔子说过"兴于诗, 立于立, 成于乐", 礼仪教育中的礼仪礼容等动容周旋·诗歌乐舞活动, 是广大士子参与典礼活动养成道德规范涵养心性的必要程序和必经环节. 孔门的"诗礼传家"家训也是这个意思.

礼教的核心是卑己尊人, 就是以谦逊谦虚的态度待人接物, 尊敬他人, 尊重他人, 尊重尊敬长者尊者. 书院礼仪毫不例外地具有这个礼教的根本特征, 释奠礼仪严肃, 仪节程序井然有序, 尊师重道的道德要求贯穿于具体的礼仪仪注当中.

（五）中国书院礼仪的生活实践特征：中国书院礼仪是中国古代书院经学教育内容实现的重要保障.

书院礼仪教育活动是书院史是书院保障教学活动的正常秩序·完成教学任务·实现教学目标的主要手段和重要方法.

佚名《庙学典礼》卷五《行台坐下宪师讲究学校便宜》记载元代官府规定官学与书院师生日常礼仪规定以及吕祖谦《丽泽讲义》中也提到日常师生教学活动中相互之间互动提问的礼仪等规定，将书院师生日常起居生活讲学活动师生问答等等言行通通纳入了书院礼仪所规定的程序与范围之内，周密有序，规范严明，师生教育教学活动依据学礼礼仪进行，自然有条不紊，书院师生皆能自觉养成良好的教学习惯以及养成良好的学风，在教书育人的同时，使学生在不知不觉中通过礼仪礼义的熏陶养成以礼待人的习性与德性.

有些书院礼仪要求贯穿于学校以外的日常生活之中，譬如李颙《关中书院学程》云："有事往来亲友之家，或观田畴，或走卜地方公务，行步须安详稳重作揖须舒徐深圆，周中规，旋中矩，坐如尸，立如钉，手与心齐，庄而和，从容闲定，正己以格物."

（六）中国书院礼仪构建亲密的师弟关系是以培养圣贤君子为目的，通过榜样教育来实现道德教育的教育宗旨.

天地君亲师，教师在古代中国人心目中有重要地位，弟子对老师心丧三年，守三年之丧，是中国古礼最隆重的礼节. 中国书院礼仪教育是培养良好师弟(师生)关系的重要保障.《礼记·曲礼》说"宦学事师，非礼不亲."

（七）中国书院礼仪的礼乐歌舞相结合的美学艺术教育，潜移默化地影

响学生，防范于未然，这种融合音乐美术诗歌为一体的行为体验艺术教育比单纯的知识教育更富有感染效果.

高明士在东亚教育圈形成史论》一文中说："儒学所称赞的圣贤，均具象于孔庙，士子们平时透过儒书，以及例行的释奠之礼，由礼乐气氛去瞻仰圣贤·接近圣贤，宛若圣贤就在近旁，耳濡目染，在庄严肃穆的礼乐祭典中，产生催化作用，有朝一日，亦可身列庙庭."

中国书院礼仪来源于中国古礼中的学礼，即太学中的释奠礼·释菜礼，学礼是中国传统五礼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书院礼仪与中国太学·国子监以及州学·府学·县学等各级官方官学机构以及民间的私塾等学礼共同构成了中国古代三大教育机构的学礼. 古代学礼相当于现代的教育法与大学章程之类的教育教学法律条例与根本性的教育教学规章制度.

学礼的根本目的是规定教育宗旨·确立教育目标·保证培养人才目标的实现. 尊师重道·师道尊严·传道授业解惑·效法修养成为圣贤君子，为国家人民服务.

【参考文献】

兰甲云,『周易古礼研究』. 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 2008.
孙诒让,『周礼正义』
朱　熹,『仪礼经传通解』.
孙希旦,『礼记集解』. 北京：中华书局, 1999.
陈谷嘉,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史资料』. 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赵所生, 孙正英,『中国书院志(第七册)』. 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 1995.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 上海：东方出版中心, 2004.
蓝甲云, 张长明, 易永卿,『论中国古代书院的学礼制度』.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肖永明, 唐亚阳,『书院祭祀的教育及社会教化功能』.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5(3)
生云龙,『中国古代书院学礼研究』. 北京: 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3.
刘伯骥,『广东书院制度沿革』.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39.
胡青著,『书院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特色』. 武汉: 湖北教育出版社, 1999.

Abstract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tiquette in Chinese Seowon

Lan, gap-un*

It was analyzed that the rituals of ancient Chinese Seowon originated from the Learning ritual system of Chinese ancient national school. The main rituals of Seowon are divided into types such as Seokjeonrye (釋奠禮), Seokchaerye (釋菜禮), rituals at Seowon lectures, and rituals taught by teachers and students in daily life. Hyang-hyeon(鄕賢) rituals and liturgical rites in each seowon are both the ancestors of Hyang-ri(鄕里), and each region has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together, the Seowon rituals and the learning rituals of national school constitute the educational system and academic system in the ritual systems, ritual of edification and the govern ritual of ancient Chinese school. The Seowon ritual system was an important educational and edification system that guaranteed to teach and spread ancient etiquette even in remote areas of rural villages.

Key word : the rituals of ancient Chinese Seowon(書院儀禮), Seokjeonrye(釋奠禮), Seokchaerye (釋菜禮), edification(敎化), the govern by ritual(禮治)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8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 Hunan University the chief editor, China / anjiayun11@163.com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2 27

한국 서원 의례의 종류와 의의:
강학례, 향사례 그리고 향음주례*

한 재 훈**

Ⅰ. 여는 말
Ⅱ. 한국 서원의 '강학' 의례
Ⅲ.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의례
Ⅳ. 한국 서원의 '향음주례'
Ⅴ. 맺는 말

【국문요약】

'강학(講學)'은 학문적 내용을 강명(講明)하는 것이다. 그것은 혼자 할 수 있는 작업이 아니고, 여럿이 함께 하는 것이 훨씬 유효하다. 율곡은 책을 함께 읽고 의리(義理)를 강명하는 것이 강학을 하는 근본 목적이라고 했고, 퇴계는 의리를 강명하는 것은 결국 삶을 온전히 살아내기 위한 것이라고 했다. 한국 서원은 강학의 이와 같은 의미를 의례화함으로써 여기에 참여하는 사람들로 하여금 그것이 갖는 학문적·실천적 중요성을 개인적 또는 집단적으로 자각하는 계기를 마련하고자 했다. 그것이 이른바 '강학 의례'이다.

당대(唐代)에 장서(藏書) 기능으로 출발한 서원은 이후 강학(講學) 기능이 더해졌고 북송(北宋)시대에 향사(享祀) 기능이 더해졌다. 서원 향사 의례의 독자적 위상은 아무래도 남송(南宋)시대에 주자가 창주정사(滄洲精舍)에서 봉행한 석채의(釋菜儀)를 기점으로 형성되었다. 중국의 서원 향사는 공자(孔子)를 향사 대상으로 하는 데 비해, 한국의 서원 향사는 대체로 공자를 향사 대상으로 하지 않는다. 이러한 차이는 향사에 진설되는 제품(祭品)의 규모의 차이로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NRF-2019S1A5C2A02082813).

** 연세대학교 연구교수/ kjydist@daum.net

도 연결되었다.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는 자신의 좌표를 향교(鄕校)와 향사(鄕祠)의 중간에 설정하려는 의식을 강하게 보여준다.

『주례(周禮)』에 따르면 '향음주례(鄕飮酒禮)'를 제정한 목적은 크게 '흥현(興賢)'과 '상치(尙齒)' 두 가지다. 향음주례에서 또 한 가지 주목해야 할 부분은 이 의례의 시행 장소가 '학교'라는 사실이다.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는 과정에서 역대 국가는 '독약(讀約)' 또는 '독률(讀律)' 조항을 첨가하고, 시행 장소도 관청으로 변경하면서 향촌 지배의 목적으로 이 의례를 이용했다. 조선의 향음주례는 당·송·명으로부터 영향을 받았지만, 그대로 답습하기보다는 새로운 노선을 개척했다. '독약' 또는 '독률'로 상징되는 국가 주도의 향음주례를 지양하였고,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는 장소 역시 관청이 아닌 '학교'로 바로잡았다. 16세기 이후 조선에서는 향교의 현실을 비판하면서 서원이 등장하였고, 자연스럽게 향음주례도 서원에서 시행하게 되었다.

주제어 : 서원, 의례, 강학, 향사, 향음주례

Ⅰ. 여는 말

모든 '의례(儀禮)'는 행사를 주관하는 주체가 있어야 하고, 그 행사는 주체가 설정한 어떤 목적을 가져야 하며, 그 목적을 가장 합리적이고 수월하게 진행하는 체계화된 법식이 있어야 하고, 그 법식을 구성하는 내용들이 하나의 체계 안에서 상호 유기적으로 조응해야 한다. 이런 기준에 비추어 본다면, 이 글에서 다루고자 하는 '한국의 서원 의례'는 구체적으로 조선시대 유학자들(주체)이 어떤 목적의식을 갖고 서원 의례(행사의 법식)를 구성·진행했으며(유형), 그것이 다른 시대, 다른 문화권의 그것과 비교하여 어떤 차별점을 갖는지(특징) 구명하는 것이라 할 수 있다.

중국의 서원 문화가 주자(朱子)로부터 융성해지기 시작했다면, 한국에서는 그것이 퇴계(退溪) 이황(李滉: 1501~1570)으로부터 시작되었다고 할 수 있다.[1] 퇴계는 16세기 중엽 영남지역에 세워진 서원이 다른 지역과

비교했을 때 가장 먼저 시작되었고 그 숫자도 가장 많다고 남 얘기하듯 했지만,[2] 그 중심에 그 자신이 있었다.[3] 그리고 그는 각 지역에 세워진 공립 교육 기구인 향교(鄕校)가 학문의 장으로서 제 역할을 담당하지 못한 상황에서 서원을 통해 진정한 의미의 교육과 학문을 실현해보고자 했다.[4]

서원의 본질적 기능으로 '강도(講道)'와 '존현(尊賢)' 크게 두 가지를 꼽는다.[5] '강도'란 스승과 제자 그리고 동문 학우들 간에 가르침과 배움을 통해 사상적 진리를 함께 익혀나가는 것이고, '존현'이란 선현들의 위패를 모시고 그들의 학문적 업적과 실천적 덕행을 기리며 본받는 것이다. 이때 '강도'는 서원의 강학(講學)을 통해 수행되고, '존현'은 향사(享祀)를 통해 표현된다. 따라서 한국의 서원 의례를 탐구할 때 '강학 의례'와 '향사 의례'에 초점을 맞추는 것은 지극히 당연하다. 그러나 이 글에서는 또 하나의 서원 의례로 '향음주례'에 주목하고자 한다. 그동안 '향음주례'는 그 자체로 연구되거나 넓은 의미의 학교 의례로 다루어지기는 하였으나 서원 의례의 범주로 다루어진 적은 없다. 이 글에서는 서원의 건립 본의에 비추어 '강학례'·'향사례'와 더불어 '향음주례'를 한국의 서원 의례로 함께 다루어보고자 한다.

1『南溪集』卷63,「書院考證」1: "夫中朝書院, 因朱子始盛, 其在我國, 亦創自退溪."

2『退溪全書』卷42,「易東書院記」: "書院之制, 近作於東方, 而嶺南州郡之建置者, 比諸道諸邑, 爲最先而居多焉."

3『조두록(俎豆錄)』의 기록에 따르면 명종(明宗) 말까지 총 17개의 서원이 건립되었는데, 이들 중 퇴계가 관여한 서원은 9개로 절반 이상을 차지한다(조준호,「퇴계 이황의 서원 건립 활동과 서원론의 실현」,『연사문화논총』제2호, 2006, 115쪽).

4『退溪全書』卷9,「上沈方伯」: "滉竊見今之國學, 固爲賢士之所關, 若夫郡縣之學, 則徒設文具, 敎方大壞, 士反以游於鄕校爲恥, 其刓敝之極無道以救之, 可爲寒心. 惟有書院之敎盛興於今日, 則庶可以救學政之缺."

5『退溪全書』卷12,「擬與豐基郡守論書院事」: 夫書院何爲而設也? 其不爲尊賢講道而設乎?

Ⅱ. 한국 서원의 '강학' 의례

'강학(講學)'은 학문적 내용을 강명(講明)하는 것이다.[6] 그렇기 때문에 그것은 혼자 할 수 있는 작업이 아니고, 여럿이 함께 하는 것이 훨씬 유효하다. 강학을 하기 위해 벗을 모은다든가,[7] 제생들과 함께 강학을 한다는[8] 표현은 모두 이런 취지에서 하는 언급들이다. 율곡(栗谷) 이이(李珥: 1536-1584)는 소현서원(紹賢書院)의 전신인 은병정사(隱屛精舍)의 학도들에게 보낸 글에서 학문 공동체의 구성원들 사이에 서로 선한 영향을 주고받는 '이택(麗澤)'[9]의 힘을 이야기하면서 다음과 같이 당부했다.

> "원컨대, 제현(諸賢)들이 비록 항상 모일 수는 없더라도 매월 초하룻날 반드시 5~6일 동안 모여 어떤 책을 함께 읽고[通讀] 의리(義理)를 실제로 강명하면서[實講] 이것이 실학(實學)임을 잊지 말라."[10]

퇴계는 의리를 강명하는 것이 결국 삶을 온전히 살아내기 위한 것이라는 점을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했다.

> "학문에 목말라 하면서 방책(方冊)에서 구하거나 혹은 사우(師友)의 도움을 받아, 의리(義理)가 평소 마음속에 명확해 있다면 처사(處事)에 어떤 의심과 미혹이 있겠는가?"[11]

성리학적 설명에 따르면, '의리'란 천리(天理)가 인사(人事)에 가장 합

---

6 『論語』·「述而」: 子曰: "…… 學之不講, …… 是吾憂也." 『論語集註』: 尹氏曰: "…… 學必講而後明 …… "

7 『雙梅堂篋藏集』 卷23, 「論取契」: "且講學以會友, 則其樂可知也."

8 『梅月堂集』 卷20, 「張載傳」: "敝衣蔬食, 與諸生講學."

9 『易經』·「兌卦」 象曰: "麗澤, 兌. 君子以, 朋友講習."

10 『栗谷全書』, 卷15, 「示精舍學徒」: "願諸賢雖不得恒聚, 每一月朔, 必須齊會五六日, 通讀某書, 實講義理, 毋忘此箇實學."

11 『退溪全書』 卷28, 「答金惇敍」: "汲汲於學問, 或求之方冊, 或資於師友, 義理素明於心, 則其於處事也, 何疑惑之有哉?"

당한 방식으로 구현된 것을 일컫는 개념이며,[12] 따라서 '의리'는 그 내용에 있어서는 본질적으로 천리와 동일하지만, 그 범주에 있어서는 천리가 인사에 구현되는 장에서 사용되는 개념이다.[13] 이 의리를 탐구하는 것이 바로 '궁리(窮理)'이다. 그런데 성리학에서 말하는 궁리는 단순히 외부의 지식정보를 얻는 것과는 본질적으로 그 성격이 다르다. 그것은 어쩌면 내안에 이미 충분했던 것을 확인하는 과정이지 부족한 것을 보완하는 것이 아니며, 망각했던 것을 자각하는 과정이지 결핍된 것을 보충하는 것이 아니다. '강학'을 중요하게 생각하는 이유가 바로 여기에 있다. 그리고 이와 같은 목적의 강학을 온전히 수행하기 위해 서원이 필요했다고 퇴계는 설명한다.

> "은거하며 지조를 지키려는 선비나 도리를 강명하고 학업을 닦으려는 사람들은 대부분 시끄럽고 경쟁하는 세상을 싫어합니다. 그래서 그들은 묵은 서책을 짊어지고 느긋하고 한적한 산속이나 물가로 숨어들어 선왕의 도를 노래하고 읊조리며, 고요히 천하의 의리(義理)를 연구하면서 자신의 덕(德)을 축적하고 자신의 인(仁)을 순숙시키는 것으로 즐거움을 삼으려 합니다. 그래서 서원에 나아가는 것을 즐거워하는 것입니다. 이는 도성 한가운데 위치한데다 갖가지 구속적인 학령(學令)과 마음을 움직이고 관심을 빼앗는 이물(異物)들로 포위된 국학이나 향교와 비교할 때 그 공효에서 현격한 차이를 보입니다."[14]

---

12 伊川은 "在物爲理, 處物爲義."(『二程粹言』 卷1.)라는 말로 '의리'의 개념적 성격을 분석한 바 있고, 이에 대해 朱子는 다음과 같이 부연했다. "'在物爲理, 處物爲義.' 理是在此物上, 便有此理; 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 便是義. 義便有箇區處."(『朱子語類』 卷95.)

13 김낙진은 이와 관련하여 다음과 같이 설명한다. "의리는 주관과 객관이 만나(所遇) 구체적인 행위가 수수(授受)되는 '일'(事)에서 논의된다는 성질을 가진다."(김낙진, 『의리의 윤리와 한국의 유교문화』, 집문당, 2004, 105쪽.)

14 『退溪全書』 卷9, 「上沈方伯」: "隱居求志之士講道肄業之倫率多厭世之囂競, 抱負墳策, 思逃於寬閒之野寂寞之濱, 以歌詠先王之道, 靜而閱天下之義理, 以蓄其德, 以熟其仁, 以是爲樂, 故樂就於書院. 其視國學鄕校在朝市城郭之中, 前有學令之拘礙, 後有異物之遷奪者, 其功效豈可同日而語哉?"

한국 서원은 강학의 이와 같은 의미를 의례화함으로써 여기에 참여하는 사람들로 하여금 그것이 갖는 학문적·실천적 중요성을 개인적 또는 집단적으로 자각하는 계기를 마련하고자 했다. 그것이 이른바 '강학 의례'이다.

일반적으로 서원에서 이루어진 강학 활동은 '자발적 강학으로서 회강(會講)'과 '공식적·의례적 강학으로서 강회(講會)'로 구분된다.[15] 먼저, 회강은 스승과 제자가 자발적으로 참여하여 경전을 토론함으로써 경전에 대한 심층적 이해에 이르는 과정이다. 그리고 그 방식은 경전의 일부분을 통독한 후 여기에 대해 강론하는 순서로 진행되었으며, 별도의 절차나 의례는 포함되어 있지 않다. 따라서 회강의 주된 목적은 회강을 통해 성리학에 대한 체계적인 이해와 더불어 개인의 성정(性情)에 변화가 나타나기를 기대하는 것이다.

이렇게 회강이 임시적이고 임의적인 학술 세미나 형식이었던 데 비하면 강회는 상대적으로 정기적이고 공식적인 행사였다. 일반적으로 강회는 향사(享祀)를 지낸 다음, 「백록동규(白鹿洞規)」나 「여씨향약(呂氏鄕約)」 같은 교화서를 낭독하고, 강생(講生)들이 강장(講長) 앞에서 진강(進講)을 하는 순서로 진행된다. 진강을 하는 방식은 찌[柱: 경전의 한 장의 내용을 적어 놓은 추첨 기구]를 뽑아 거기에 적힌 구절을 강생이 외우고 해석하면, 강장은 그 의미를 묻고 강생이 이에 대해 답하는 형식이다. 강회는 강생들의 학문적 성취를 확인함과 동시에 이를 대중 일반에게 공개함으로써 교화와 장려의 의미도 함께 담았다.

한편, 강학 의례는 홀기(笏記)를 갖춘 공식적 의례와 그렇지 않은 관습적 의례로 나눌 수 있는데, 정읍례(庭揖禮)와 상읍례(相揖禮) 그리고 강습례(講習禮)가 전자에 속하고, 경독(敬讀), 개접례(開接禮, 혹은 入接禮), 파접례(罷接禮, 혹은 後接禮), 귀가례(歸家禮), 수창시(酬唱詩)가 후

15 김대식, 「조선 서원 강학 활동의 성격 – 회강과 강회를 중심으로」, 『교육사학연구』 제11집, 2001 참조.

자에 속한다.[16]

정읍례(庭揖禮)와 상읍례(相揖禮)는 모두 강학을 시작할 때 거행했던 의례로서, 서원의 뜰에 모여 스승이나 원임에게 읍례를 올리고, 또 제생들 상호 간에도 읍례를 하기 때문에 붙여진 명칭이다. 또한 이렇게 강학의 모임을 시작하는 것을 개접(開接)이라고 하기 때문에 개접례(혹은 입접례)는 정읍례나 상읍례의 별칭으로 봐야 할 듯하다. 그리고 이렇게 시작하는 의례를 개접례라고 한다면 이를 마무리하는 의례를 파접례(혹은 후접례)라고 하는 것은 당연하며, 귀가례 역시 마찬가지로 동일한 것이다. 한편, 강습례(講習禮)는 강회를 마치면서 시행했던 의례라는 점에서 수창시와 의례 상 같은 범주로 분류할 수 있을 것이다. 다만, 강습례가 앞서 김대식이 구분했던 '강회'에서 진강했던 것처럼 일정 기간 배운 것을 테스트하는 목적에서 행하는 것이라면,[17] 수창시는 '회강'에 참여한 소회나 깨달은 것을 시로 지어 공유한다는 차이가 있는 것으로 보인다.

개접례와 파접례 중심으로 진행된 '강학 의례'에 관한 기존의 연구에서 보완되어야 할 부분이 있다면, 그것은 '강학 의례'의 대부분을 차지하는 거접(居接)이나 거재(居齋)에 관한 내용이다. 물론 거접이나 거재가 서원에 머무르면서 공부하는 상황을 지칭하는 것이고, 『거재록』 등의 기록이 있다 해도 그 내용이 거의 반복되는 일상일 것이므로 특별히 추출할 만한 의미를 발견하기 쉽지 않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일상의 의례적 요구들을 재구성하고 그것이 '강학'의 근본 취지에 어떻게 부응하는지 그 유기적 연관성을 설명할 필요가 있다.

예를 들면, 순암(順庵) 안정복(安鼎福: 1712-1791)은 「덕곡서재월삭

16 김자운, 「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 『유학연구』 제48집, 2019, 136쪽.

17 『무성서원지』에 수록된 『講習禮節目』과 『笏記』의 내용을 참고할 때 그렇게 유추된다(박종배, 「19세기 후반 무성서원 강습례에 관한 일고찰」, 『한국서원학보』 1권, 2011 참조).

강회약(德谷書齋月朔講會約)」에서 「약규(約規)」를 제시하고, 그 아래 수기치인(修己治人)을 터득할 수 있는 '실용(實用)'적 학문을 위한 '학약(學約)'을 마치 주자(朱子)가 『증손여씨향약(增損呂氏鄕約)』을 제시한 것과 같은 심정으로 만들었다는 이야기를 덧붙였다.[18] 그리고 그 아래 『논어』에 나오는 '삼외(三畏)', '삼계(三戒)', '사물(四勿)', '삼귀(三貴)'와 『예기』에 나오는 '구용(九容)', 『논어』에 나오는 '구사(九思)'의 내용과 그것이 위에서 자신이 언급한 수기치인을 지향하는 '실용적 학문'으로서 어떤 역할들을 하는지에 관한 설명을 제시한다. 그리고 그 아래 다시 주자의 『백록동규』와 서산(西山) 진덕수(眞德秀: 1178~1235)의 「진서산교자재규(眞西山敎子齋規)」, 몽재(蒙齋) 정단몽(程端蒙: 1143~1191)과 동수(董銖: 1152~?)가 제정한 「정동이선생학칙(程董二先生學則)」, 곤재(困齋) 정개청(鄭介淸: 1529~1590)이 지은 「곤재학령(困齋學令)」, 주자가 제시한 「주자독서법(朱子讀書法)」, 정단례(程端禮: 1271~1345)가 지은 「정단례독서분년정법(程端禮讀書分年程法)」 등을 차례로 제시하였다. 그리고 마지막에 매월 강습례(강회)를 진행하는 의례에 관한 「월조약회의(月朝約會儀)」를 '배선성선사도(拜先聖先師圖)' '승당강회도(陞堂講會圖)'와 함께 제시하고 있다.

이 자료를 '강학 의례'라는 부분에 초점을 맞춰 연구를 진행한다면, 당장은 맨앞의 「약규」와 마지막의 「월조약회의」 내용에 주목하게 될 것이다. 하지만 정말 중요한 것은 순암이 '삼외'로부터 「정단례독서분년정법」까지의 자료들을 통해 제안하고자 했던 '사람의 꼴'을 만들어가는[19] 과정

18 『順菴集』 卷14, 「德谷書齋月朔講會約」: "按三代之所以敎人成俗, 皆在於學, 而後世敎學不明. 我朝學政非不修擧, 今則漸致頹廢, 所謂文敎, 不過科學; 朝廷所以勸督, 亦不過於詞賦駢侶之文, 求其實用, 無可言者. 吾儒之學, 不過修己治人, 於此而無得焉, 則雖風雲月露之句, 何所取於實用乎? 國家旣以此取人, 而拔身之資, 亦無過於此, 則只當應俗隨行, 而士君子立心, 豈在於是乎? 今日約憲, 唯當求古聖賢實用之學而已. 朱子『增損鄕約』爲萬世必可行之規, 此當服行, 而今別具學約一條, 條列于下, 吾黨其勉之哉!"

과 방법일 것이다. 예를 들면, 말을 하는 방법이나 몸의 자세를 유지하는 방법에서부터 글을 읽거나 외울 때 또는 글씨를 쓸 때 유념해야 하는 방법에 이르기까지 서원이라는 공간 안에서 일상적이고 개인적인 의례를 재구성하고 그것의 의미를 구명하는 작업이 필요하다는 것이다.

또 한 가지 흥미로운 것은 서원 강학의 개설을 격려하고 지원하는 차원에서, 개접례에는 수령이 음식과 함께 직접 시부를 출제하여 보내고, 파접례에는 수령이 으레 주연을 베풀고 평소와 달리 제술도 성대하게 거행했다는 사실이다.[20] 지방 수령이 이렇게 음식을 제공하는 것은 당연히 학문을 권장하려는 의도도 있었겠지만, 보다 중요한 의미는 서원을 통해 화민성속(化民成俗)의 모델을 창출하여 바람직한 공동체 문화를 만들어 가려는 것이었다. 특히 강습례 등에 참관자 참여를 허용한다든가 강학을 마치는 파접례가 향음주례(鄕飮酒禮)[21]로 연결되었다는 사실은 이를 강력하게 뒷받침해주는 증거이다. 향음주례는 오로지 먹고 마시기 위한 자리가 아니라 지역 주민들이 의례를 통하여 공동체적 삶의 규범을 배우고 익히는 교육의 장이었다.[22] 이는 서원의 강학 의례가 단순히 서원 집단 내부의 폐쇄적인 의식행위가 아니라 '향(鄕)'단위 공동체 문화 형성을 선도하는 개방적 축제의 일환으로 읽을 수 있는 여지를 보여준다.

Ⅲ.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의례

19 '사람의 꼴'을 만들어간다는 표현은 주자가 초학자들에게 『소학』을 공부하라면서 했던 말(『朱子語類』 卷7: "後生初學, 且看小學之書, 那是做人底樣子.")과 서원의 일상적 강학 의례가 동일한 문제의식에서 제안되었다고 보아 차용한 것이다.

20 김자운, 「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 『유학연구』 제48집, 2019, 149쪽.

21 서원 의례로서 '향음주례'에 관해서는 4장에서 자세히 다룰 것이다.

22 박종배, 「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238~239쪽.

일반적으로 서원이 갖는 주요한 세 가지 기능으로 장서(藏書)와 강학(講學) 그리고 향사(享祀)를 꼽는다. 이는 서원의 발전 과정과 그 궤를 같이한다. 기록으로 확인할 수 있는 최초의 서원인 당대(唐代) 여정전서원(麗正殿書院)과 집현전서원(集賢殿書院)은 애초에 장서 기관으로서의 기능만을 수행했을 뿐이다. 서원이 강학의 기능까지 수행하게 된 것은 중당(中唐) 이후였으며, 향사 기능은 북송(北宋)시대에 이르러 출현하게 되었다.[23]

서원은 향사의 기능까지 수행하게 되면서 비로소 서원으로서의 완정한 체제를 갖추게 되었지만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는 독창적으로 만들어진 것이 아니라 관학의 묘학(廟學)제도를 전범으로 삼아 모방과 변용의 과정을 거치면서 정비되어 갔다. 묘학 제도는 동진(東晉)시대에 국자학(國子學) 서쪽에 공자묘(孔子廟)를 건립한 것으로부터 시작되어 지속적으로 발전해갔고, 이는 다시 주학(州學)이나 현학(縣學) 등 지방의 관학에까지 확산되었다. 북송대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는 이러한 묘학제도의 영향을 받았던 것이다.[24]

서원 향사 의례의 독자적 위상은 아무래도 남송(南宋)시대에 주자가 창주정사(滄洲精舍)에서 봉행한 석채의(釋菜儀)를 기점으로 형성되어 갔다고 볼 수 있다. 주자는 이 석채의에서 공자를 선성(先聖)으로 하고, 안자(顔子)·증자(曾子)·자사(子思)·맹자(孟子)를 선사(先師)로 하였을 뿐 아니라, 주돈이(周敦頤)·정호(程顥)·정이(程頤)·소옹(邵雍)·사마광(司馬光)·장재(張載)·이동(李侗)을 선현(先賢)으로 하여 향사를 봉행했다.[25] 그러면서 주자는 공자뿐만 아니라, 안자·증자·자사·맹자를 배향한

23 朱汉民,「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 第2期, 6页.

24 朱汉民,「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 第2期, 6页.

이유와[26] 송대의 칠현을 종사한 이유[27]를 모두 도통(道統)의 관점에서 설명하였다. 이는 남송대 이후 자신의 정체성을 확고히 해나가는 서원의 향사가 이른바 신유학의 도학적 도통 의식을 강력하게 내장하고 있음을 보여주는 증거이다.

'도통'은 성리학적 관점에서 정리한 "유학의 참 정신이 전해 내려온 큰 흐름"[28]으로 이해할 수 있다.[29] 그러나 '도통'을 '도'의 정통·비정통이라는 측면에서 조명해왔던 지금까지의 관점과 달리, 왕통(王統)이나 치통(治統)[30]과 같은 기존의 어떤 '통[統]'에 대한 대안으로 '도통'이라는 새로운 '통'이 제기되었다는 관점에서 바라볼 필요가 있다. 이와 관련하여 피터 볼(Peter K. Bol)의 다음 논의는 매우 의미 있는 시사점을 제공한다.

25『朱子語類』卷90 : "宣聖像居中; 兗國公顔氏·郰侯曾氏·沂水侯孔氏·鄒國公孟氏西向配北上, 並紙牌子; 濂溪周先生東一·明道程先生西一·伊川程先生東二·康節邵先生西二·司馬溫國文正公東三· 橫渠張先生西三·延平李先生東四從祀, 亦紙牌子, 並設於地."

26『朱子語類』卷90 : "配享只當論傳道, 合以顔子·曾子·子思·孟子配."

27『朱子全書』卷86,「滄洲精舍告先聖文」: "千有餘年, 乃曰有繼. 周·程授受, 萬理一原. 曰邵曰張, 爰及司馬. 學雖殊轍, 道則同歸."

28 이승환,「道統－유학의 참 정신을 잇는 계보」,『조선유학의 개념들』, 예문서원, 2002, 461쪽.

29 여기에서 굳이 '성리학 관점'이라는 점을 밝힌 이유는, 程·朱 계열의 '道統論'을 北宋의 이른바 '古文家'들에 의한 '正學'운동에서 이미 진행되었던 '學의 正統性' 문제와 구분하기 위해서이다. 古文家들의 '學의 正統性'과 관련해서는, 이범학,「魏了翁(1178~1237)의 經世理學과 道統論」,『한국학논총』 22, 1999, 129~ 131쪽 참조.

30 피터 볼은 '도통'의 대립개념으로 '정통(正統)'을 사용했다. 그에 따르면 "'정통'이라는 용어는, 고대 이후의 왕조들도 고대 성왕과 마찬가지로 천명(天命)을 받았기 때문에 고대 성왕의 '정당한(legitimate) 계승자'라는 뜻을 담고 있다"(Peter K. Bol, 김영민 옮김,『역사 속의 성리학』, 예문서원, 2010, 215쪽.)는 것이다. 그러나 논자는 세상을 이끌어가는 주체를 성인으로 볼 것인지, 제왕으로 볼 것인지라는 대립구도를 분명히 하기 위해 이를 '왕통'이라는 말로 바꿔 사용하고자 한다. 한편 이범학은 '도통'에 대한 상대개념으로 '치통'을 사용한다(이범학,「魏了翁(1178~1237)의 經世理學과 道統論」,『한국학논총』 22, 1999 참조).

> 주희는 통치권 외부에 '도'에 대한 별도의 권위가 존재함을 주장하였는데, 그와 그의 계승자들은 그러한 별도의 권위를 '도통'(Succession of the Way)이라고 불렀다. … 신유학자는 그러한 이분화를 통해 다음 두 가지 입장을 천명한 셈이었다. 하나의 입장은, 정치적인 것이 더 이상 도덕적 권위를 가진 것으로 간주될 수는 없다고 할지라도, 정치적인 것 또한 계속해서 존재하고 논란거리가 되는 나름의 역사를 가지고 있다는 점을 인정한 것이다. 다른 하나의 입장은, 그러한 이분화를 통해 도덕적 권위가 정치적인 것을 초월해 있음을 주장하는 것이다.[31]

이러한 관점의 전환이 의도하는 바는, 세상을 이끌어가는 주체와 그 주체가 갖는 권위의 근거 문제를 다루고 있다는 방향에서 도통론을 재검토하는 것이다. 즉, 세상을 이끌어가는 진정한 주체는 제왕이 아니라 성인이며, 그 권위의 근거 역시 위(位)가 아닌 도(道)라는 사실을 도통론을 통해 천명하고 있는 것이다.[32] 이런 측면에서 "공자는 '학(學)'에서 제사를 드려야 한다"[33]는 주자의 선언은 시사하는 바가 크다.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는 크게 두 가지 측면에서 접근할 수 있다. 하나는 향사의 대상을 어떻게 선정할 것이냐에 관한 것이고, 다른 하나는 향사의 의식절차를 어떻게 조정할 것이냐에 관한 것이다.

먼저, 향사 대상 선정과 관련해서 논하자면, 남송대 이후 서원 향사에서는 해당 서원과 밀접한 관계가 있는 인물, 예를 들면 해당 서원이 속한 학파의 대표 인물이라거나 서원과 관계가 있는 저명한 학자 또는 서원의 발전을 위해 공헌을 한 관료 그리고 역사적으로 서원이 위치한 해당 지역과 연고가 있는 쟁신(諍臣)이나 선현 등이 서원의 주요한 제사 대상이 되었다.[34]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중국의 서원에서 공자가 향사 대상에서 제외

31 Peter K. Bol, 김영민 옮김, 『역사 속의 성리학』, 예문서원, 2010, 214~215쪽.
32 성리학의 도통론과 관련해서는 한재훈, 「朱子의 '新民' 해석과 '道統論'의 함수관계」, 『공자학』 22호, 2012 참조.
33 『朱子語類』 卷90: "祭孔子必於學."

되는 경우는 없다. 서원에서 공자에게 제사를 드리는 전통은 주자가 백록동서원을 부흥한 데서부터 시작되었다. 주자가 서원에서 공자에게 제사를 드린 까닭은 불교와 도교를 배척하고 유학의 도통을 확장하려는 것이 주요 원인이다. 당시 백록동서원이 위치한 여산(廬山) 일대는 불교와 도교 사원들이 수백 곳에 달했으나 유가의 도장은 백록동서원 한 곳에 불과했다는 사실이 그 이유를 설명해 준다.[35]

이에 비해 한국의 서원에서는 대체로 공자를 향사 대상으로 하지 않는다.[36] 한국의 서원은 불교나 도교에 대해 선명한 유학의 도통을 다시 입증해야 하는 부담으로부터는 자유로웠기 때문에 굳이 서원에 공자를 모셔야 할 필요는 없었다. 뿐만 아니라, 국가 전체가 성리학을 표방했기 때문에 특별한 이유가 없다면 심지어 주자를 모실 필요조차 없었다. 그렇다면 누구를 서원에 모시고 향사할 것인가? 16세기 중엽 서원 문화를 적극 도입하는 시점에는 아직 향사 대상 선정 기준조차 확립되어 있지 않았다. 서원의 향사 대상 선정과 선정된 인물들 간의 위차 문제를 조정할 때 '도통'에 기여한 정도를 기준으로 한다는 원칙을 정립하기까지는 여러 번의 논란을 겪고서야 가능했다.

1560년(명종 15) 성주 영봉서원(迎鳳書院)의 위차 문제를 둘러싼 논란은 향사 대상의 선정 기준이 명확하지 않아서 빚어진 첫 번째 사건이었다.[37] 비슷한 시기에 있었던 경주 서악정사(西岳精舍)의 향사 대상 문제

34 赵新,「古代书院祭祀及其功能」,『煤炭高等教育』, 2007年 第1期.

35 王胜军,「中国古代书院祭祀的符号表征」,『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5年 第3期.

36 柳肃은 "한국 서원은 일반적으로 孔子에게 향사를 지내지 않는다"고 했다(柳肃,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6期, 36쪽). 그러나 임근실에 따르면 五峯書院(江陵)과 文會書院(咸興)에서는 孔子를 향사를 지내는 것으로 조사되었다(임근실,『16세기 영남지역 서원 연구』, 단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9, 25쪽 <표 Ⅱ-7> 참조).

37 영봉서원의 봉안 대상의 位次를 둘러싸고 전개되었던 위차시비와 관련해서는 鄭萬祚,『退溪 李滉의 書院論』(『韓沽劤博士停年紀念史學論叢』, 1981)에 그 전말이 자세하게 소개되어 있고, 이 과정에서 朝鮮의 書院은 中國과 달리 제향

도 큰 틀에서는 같은 이유로 야기된 사건이었다.[38] 한편, 임고서원(臨皐書院)에서 원향(元享)에 대해 추향(追享) 인물을 병향(並享)할 것인지 아니면 배향(配享)할 것인지를 두고 벌어진 위차 시비도 있었다.[39] 이런 과정들을 거치면서 한국 서원은 향사 대상을 선정할 때 분명한 기준을 정립해야 할 필요성을 느끼게 되었다.[40]

서원 향사의 대상을 선정할 때 적용되었던 기준은 당연히 향사의 의식 절차를 결정할 때에도 동일한 양상으로 적용되었다. 즉, 서원의 향사 의절은 국학이나 향교의 석전(釋奠)에 준하되 융쇄의 차등을 두었다.[41] 이 역시 중국 서원의 향사의절과 비교했을 때 제품의 규모가 간소한 형태로 나타나게 된다. 예를 들면 악록서원(嶽麓書院) 석채(釋菜)의 경우 공자를 모신 문창각(文昌閣)에는 이른바 '태뢰(太牢)'인 우(牛)·저(猪)·양(羊) 삼조(三俎)와 계(鷄)·압(鴨)·저두(猪肚)·저간(猪肝)·선어(鮮魚)·해삼(海蔘)·정간(蜓幹)·저요(猪腰) 등 팔완(八腕)을 장만하도록 하였고, 배향을 모신 규광각(奎光閣)에는 웅계(雄鷄) 1척(隻), 생육(生肉) 1방(方), 선어(鮮魚) 2미(尾)를 장만하도록 하였다. 청대 함풍3년(1853)에 창건된 잠언서원(箴言書院)의 경우도 악록서원보다는 간소하지만 양·시를 희생으로 장만하고, 변(籩)·두(豆)·형(鉶)·등(登)·정(鼎)·조(俎) 등

인물을 선정하고 그 위차를 정할 때 반드시 '道學'을 최우선 기준으로 삼아야 한다는 退溪(李滉)와 錦溪(黃俊良)의 생각과 관련해서는 이수환, 『星州 迎鳳書院 硏究』, 『역사교육논집』 54권, 2015에 자세히 기술되어 있다.

38 서악정사 향사 대상에 관한 논란과 관련해서는 조준호, 「퇴계 이황의 서원 건립 활동과 서원론의 실현」, 『연사문화논총』 제2호, 2006 참조.

39 임고서원의 위차 시비와 관련해서는 尹熙勉, 『朝鮮時代 書院의 祭禮와 位次』, 『진단학보』 90호, 2000 참조.

40 이런 점에서 봤을 때, 퇴계가 향사 대상 선정의 기준에 대한 명분적 근거를 마련하기 위해 중국 성리학의 계보를 정리하였고 조선 유현들의 행적을 찬술했다는 가설은 꽤 흥미로운 접근이다(조준호, 「퇴계 이황의 서원 건립 활동과 서원론의 실현」, 『연사문화논총』 제2호, 2006, 135쪽).

41 이와 관련해서는 尹熙勉, 『朝鮮時代 書院의 祭禮와 位次』, 『진단학보』 90호, 2000 참조.

의 제기를 구비하도록 하였다.[42] 이는 그 이름이 비록 석전이 아니라 석채라고는 하였지만 공자에게 향사를 올려야 했기 때문에 그 규모가 대단할 수밖에 없었던 것이다. 이에 비하면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규모는 희생으로 시(豕) 또는 계(鷄)를 사용하든가 아니면 이마저도 올리지 않는 규모로 봉행되었다.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의절 역시 퇴계에 의해 기본 표준이 제안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퇴계는 신재(愼齋) 주세붕(周世鵬: 1495-1554)이 제정한 백운동서원(白雲洞書院)의 향사례에 대폭 수정을 가함으로써 조선시대 서원 향사례의 초석을 다지게 된다.[43] 이후 조선시대 서원 향사례는 이러한 퇴계의 표준안을 기준으로 삼아 계승과 비판 그리고 조정의 과정을 거치면서 발전해갔다.

한국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는 자신의 좌표를 향교(鄕校)와 향사(鄕祠)의 중간에 설정하려는 의식을 강하게 보여준다. 특히 서원의 향사례를 정비하는 과정에서 향교의 석전을 참고하면서도 융쇄의 차등을 견지하려고 긴장했다. 서원에서 춘추(春秋)에 지내는 향사의 기일은 향교의 춘추석전이 중춘과 중추의 상정일(上丁日)에 거행되는 것을 감안해 대체로 중춘과 중추의 중정일(中丁日)에 진행했다. 제품 진설과 관련해서도 제기(祭器)의 개수와 그에 연동하는 제수(祭需)의 품목을 향교보다 간소한 형태로 조정하였고, 특히 생(牲)의 종류를 무엇으로 할 것인지 그리고 폐(幣)를 올릴지 여부에 대해서도 고민을 아끼지 않았다. 그리고 이러한 긴장과 고민의 과정을 통해 조선시대 서원들은 한국적 서원 향사례를 만들어갔다.

---

42 蒋建国, 「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古代书院祭祀的社会空间」, 『现代哲学』, 2006年 第3期.

43 이와 관련해서는 한재훈, 「退溪의 書院享祀禮 定礎에 대한 考察 -白雲洞書院 享祀禮 修正을 중심으로」, 『퇴계학과 유교문화』 제53집, 2013 참조.

Ⅳ. 한국 서원 의례로서 ‘향음주례’

1856년 11월 호계서원(虎溪書院)의 강회에서는 강회를 마친 뒤 지역 인사들이 참여하는 향음주례가 거행됨으로써 모든 일정을 마무리했다는 기록이 남아 있다.[44] 비슷한 시기 소수서원(紹修書院)에서도 파접례 다음 날 향음주례를 시행했으며,[45] 무성서원(武城書院)에서는 강습례가 때때로 향음주례로 대체되었다는 사례가 보고되었다.[46] 한국 서원의 의례로서 ‘향음주례’가 중시된 사례는 19세기만의 특징은 아니다. 그보다 앞선 시기부터 시행되어 오던 전통이 19세기까지 전승된 것으로 보아야 한다.

이른바 ‘향음주례’라는 의례는 『주례(周禮)』에 처음 등장한다. 『주례』에 따르면 향음주례를 제정한 목적은 크게 두 가지다. 하나는 ‘흥현(興賢)’으로, 지방관이 현능(賢能)한 인재를 빈흥(賓興)함으로써 국가의 인재를 확보하려는 것이고, 다른 하나는 ‘상치(尙齒)’로, 지방관이 노인을 존중함으로써 향촌의 질서를 확립하려는 것이다.[47] 향음주례의 시행 주체와 대상을 맹자(孟子)가 말한 삼달존(三達尊)[48]에 비추어 살펴보면 이

---

44 최광만, 「19세기 서원 강학활동 사례 연구– 호계강록을 중심으로」, 『교육사학연구』 22, 2012, 112~114쪽.

45 김자운, 「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 『유학연구』 제48집, 2019, 149쪽.

46 박종배, 「19세기 후반 무성서원 강습례에 관한 일고찰」, 『한국서원학보』, 2011, 144쪽.

47 秦蕙田, 『五禮通考』 卷167, 「嘉禮」40 ‘鄕飮酒禮’: 蕙田案, “鄕飮酒禮見于經傳者有四, 鄕大夫三年大比, 獻賢能於王, 以禮禮賓之, 一也; 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 則以禮屬民, 飮酒以正齒位, 二也; 州長春秋習射于序, 先行鄕飮酒禮, 三也; 鄕大夫士飮其國中賢者, 四也. …… 『周禮』云‘以陽禮教讓, 則民不爭’, 先儒以鄕飮鄕射當之. 『禮記』亦云‘鄕飮酒之禮廢, 則長幼之序失, 而爭鬪之獄繁’. 然則先王制此禮, 或主於興賢, 或主於尙齒, 雖所重不同, 而所以勸民行厚民俗之意, 則一也.

48 『孟子』 「公孫丑下 」: 天下有達尊三, 爵一·齒一·德一. 朝廷莫如爵, 鄕黨莫如齒, 輔世長民莫如德.

의례에 담긴 보다 본질적인 취지를 읽을 수 있다. 향음주례의 시행 주체는 삼달존 중 '작(爵)'에 해당하고, 그 대상은 '덕(德)'과 '치(齒)'에 해당한다. 이와 같은 설정에 담긴 의미는 '작'이 '덕'과 '치'를 존중하는 문화를 정착시키고 권장하려는 것으로 해석할 수 있다.

향음주례에서 또 한 가지 주목해야 할 부분은 이 의례의 시행 장소가 '학교'라는 사실이다. 향음주례는 '향인공식(鄕人共食)' 즉, 원시사회의 사람들이 집단적으로 음식을 나누어 먹던 습속에서 기원했을 것으로 추측된다.[49] 이와 같은 습속에 '흥현'이나 '상치'와 같은 사회윤리를 가미하여 교화적 의례로 승화시킨 것이 향음주례이다.[50] 다시 말하면, 기존의 친숙한 습속(향인공식)에 사회윤리적 내용을 담고 이를 교육적 기재로 활용한 것이 향음주례이다. 이를 향촌공동체를 교화하는 데 활용하기 위해서는 그 시행 장소 역시 관청보다는 학교가 적합했을 것이다. '학교'는 젊은이들을 가르쳐 미래의 인재로 양성하는 기관이자, 전통시대 공통체의 문화적 구심점 역할을 담당했던 곳이기 때문이다.

하지만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는 과정에서 역대 국가는 향촌 지배의 목적으로 이 의례를 이용하는 모습을 보여주었다. 『대당개원례(大唐開元禮)』 가례(嘉禮) 항목에는 「향음주의(鄕飮酒儀)」와 「정치위(正齒位)」라는 두 가지 의주(儀註)가 별도로 수록되어 있다.[51] 그러나 이미 과거제(科擧制)를 시행하고 있는 상황에서 향리의 현능한 인재를 추천하기 위해 고안된 '흥현'의 의미는 퇴색될 수밖에 없었고, 이에 따라 향음주례의 주요한 의례는 자연스럽게 '상치'에 집중되었다.[52] 『대당개원례』의 「정치위」를 검토하면 이전의 향음주례와 구별되는 '독약(讀約)' 또는 '독률(讀律)'이라

49 楊寬,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749~751쪽.
50 박종배, 「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26~28쪽.
51 『大唐開元禮』 卷127, 「嘉禮·鄕飮酒儀」; 卷128, 「嘉禮·正齒位」.
52 김지영, 「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 87, 2018, 172쪽.

는 새로운 조항이 첨가된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 내용은 다음과 같다.

> "조정에서 옛 제도를 따라 예교를 돈독히 행하니, 우리들은 어른 아이 할 것 없이 서로 권하여 나라에 충성하고 부모에게 효도하며 집안에서는 화목하고 향당에서는 친밀해야 할 것이다. 혹시라도 허물 짓거나 게을러서 부모와 조상을 욕되게 하는 일이 없어야 할 것이다."[53]

이와 같은 '독약' 또는 '독률' 조항은 이후 송(宋), 명(明), 청(淸)의 국가전례에도 포함되었는데,[54] 여기에는 행정권력이 향음주례라는 문화전통을 이용하여 백성들을 국가에 순응하도록 순치하려는 의도가 내장되어 있다. 이와 관련하여 당시 향음주례를 진행한 장소가 학교가 아닌 관청이었다는 사실을 주목할 필요가 있으며, 이를 다시 학교로 되돌려 놓으려 했던 주자(朱子)의 노력도 함께 기억할 필요가 있다.[55] 왜냐하면 향음주례를 시행했던 조선의 상황을 이해하는 데 이것이 중요한 대비로 작용하기 때문이다.

'상치'(「정치위」) 위주의 『대당개원례』 향음주례는 조선 사회에도 지속적인 영향을 미쳤다.[56] 조선시대에 향음주례의 시행이 최초로 명문화된 것은 삼봉(三峯) 정도전(鄭道傳)의 『조선경국전(朝鮮經國典)』에서이고,[57] 이렇게 도입된 향음주례가 그 의례적 형식을 완비하게 된 것은 『세

53 『大唐開元禮』 卷128, 「嘉禮·正齒位」. "司正適篚跪, 取觶興, 進立於楹間北面, 乃揚觶而言曰: '朝廷率由舊章, 敦行禮教. 凡我長幼各相勸勗, 忠於國, 孝於親, 內睦於閨門, 外比於鄉黨, 無或愆惰, 以忝所生.'"

54 김지영, 「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 87, 2018, 173쪽.

55 박종배, 「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231~233쪽.

56 김지영, 「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 87, 2018, 181쪽.

57 『三峯集』 卷7, 『朝鮮經國典』 「禮典·鄕飮酒」: "鄕飮酒之禮, 先王所以敎人之意備矣. 賓主揖讓而升, 所以敎尊讓也. 盥洗, 所以敎致潔也. 自始至終, 每事必拜, 所

종실록(世宗實錄)·오례(五禮)』의 「향음주의(鄕飮酒儀)」에서이다. 그리고 이것이 『국조오례의(國朝五禮儀)』에 거의 그대로 수록되어 조선조 내내 향음주례 시행의 준거가 되었다.[58] 『국조오례의』 이후 조선은 국가 예전에 새로운 향례(鄕禮)를 포함시키지 않았다. 그렇지만 지나친 행정권력의 간섭은 배제하면서도 민간의 교속(矯俗)을 달성하기 위한 향례의 실행은 국가와 민간 차원에서 꾸준히 모색되었다. 그러한 모색의 결과 정조(正祖)는 1797년(정조 21) 『향례합편(鄕禮合編)』을 간행하면서, '독약(讀約)' 또는 '독률(讀律)' 규정을 담은 명대(明代)의 향례 대신 주자(朱子)의 향약만을 포함시켜 배포했다. 이는 국가의 강제적 방식이 아니라 민간의 자발성을 독려하는 가운데 예교의 목표에 다가가고자 함을 천명한 것으로 이해할 수 있다.[59]

이처럼 조선의 향음주례는 당·송·명으로부터 영향을 받았지만, 그대로 답습하기 보다는 새로운 노선을 개척했다. '독약' 또는 '독률'로 상징되는 국가 주도의 향음주례를 지양하였고,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는 장소 역시 관청이 아닌 '학교'로 바로잡았다. 특히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면서 중빈(衆賓)의 자리에 서인(庶人)들의 자리를 마련하여 동참하게 하는 참신한 시도를 보여주었다.[60] 물론 사대부와 서인의 자리를 배치할 때 당상(堂上)과 당하(堂下)의 차등을 두기는 하였지만, 연치를 존중하는 향음주례의 대상에 서인을 포함했다는 사실은 조선의 향음주례가 지향했던 방향성을 잘 보여준다.

以敎致敬也. 尊讓潔敬, 然後相接, 暴慢遠, 而禍亂息矣. 主人謀賓介, 所以辨賢愚也. 先賓後介, 所以明貴賤也. 賢愚辨·貴賤明, 人知勸矣. 故其飮酒也, 樂而不至於流, 嚴而不至於離, 臣以爲不肅而敎成者, 惟鄕飮酒爲然也."

58 박종배, 「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233~236쪽.

59 김지영, 「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 87, 2018, 187~188쪽.

60 김지영, 「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 『조선시대사학보』 87, 2018, 182~183쪽.

조선 중기 이전까지 향음주례는 점필재(佔畢齋) 김종직(金宗直: 1431~ 1492)[61]이나 한강(寒岡) 정구(鄭逑: 1543~1620)[62]의 사례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는 것처럼 지방의 수령이 주도하는 경우가 많았던 것으로 파악된다.[63] 그러나 이러한 경우에도 점필재의 경우처럼 '효제(孝悌)'를 표창하거나, 한강의 경우처럼 시행 장소가 '공정(公庭)'일지라도 노인을 존중할 줄 알게 하려는 데 주된 목적이 있었다. 특히 한강은 제생(諸生)들과 함께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함으로써 이를 교육의 차원에서 접근했음을 보여준다. 이처럼 조선에서는 향음주례를 화민성속(化民成俗)의 일환으로 시행했고, 이를 교육의 차원에서 접근했었다는 점이 중요하다. 그럴 경우 향음주례의 시행 장소는 일차적으로 향교가 되어야 마땅하다. 하지만 이미 향교가 그 본연의 역할을 다하지 못하는 상황에서 이를 비판하면서 등장한 서원이 향음주례 역시 자임하게 된 현상은 전혀 이상할 것이 없다.

앞서 살펴본 19세기의 사례 이전에도 조선시대 서원 관련 기록에서 향음주례를 행했던 사례는 매우 많다. 예를 들면, 한수재(寒水齋) 권상하(權尙夏: 1641~1721)는 1710년 만동묘(萬東廟) 향사에 참석한 뒤 제생들과 함께 향음주례를 시행했다.[64] 농암(農巖) 김창협(金昌協: 1651~1708)

61 『再思堂逸集』 卷2, 『事實摭錄·李朝實錄』: 成宗十四年癸卯秋八月日. 上御夕講, 檢討官宋軼請諭諸道, 申明學校之政, 以敦風化. 侍講官金宗直曰: "臣曾爲守令, 設鄕射·鄕飮之禮, 使孝悌者先之, 才藝者次之, 不肖者不與焉. 由是一鄕之人企而化之, 恥而改之, 誠有補於風化也."

62 『畏齋集』 卷3 「寒岡鄭先生言行錄」: 又與諸生, 行鄕飮酒鄕射禮, 讀法如儀. 且選邑中高年者, 咸聚公庭, 盛酒食親自酬酢, 送迎以禮, 使知尊老序齒之道.

63 물론 미산(眉山) 한장석(韓章錫: 1832-1894)이 1891년 함경감사(咸鏡監司)로 있으면서 향교의 명륜당에서 향음주례를 행한 사례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는 것처럼 19세기말까지도 지방의 수령이 향음주례를 주최한 기록이 있기는 하다(『眉山集』 卷14, 「年譜」: 庚寅【先生五十九歲】三月. 除咸鏡監司. 辛卯【先生六十歲】八月. 行鄕飮酒禮于明倫堂).

64 『寒水齋集』 「年譜」: 己丑, 先生六十九歲. ○九月往參萬東祠享事. 【與諸生行鄕飮酒禮】

은 1697년 봄에 제자 10여 명과 함께 도봉서원(道峯書院)에서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하고, 그해 가을에는 봄에 행했던 향음주례에 참관하지 못한 탄촌(灘村) 권구(權絿: 1658~1731)를 위해 석실서원(石室書院)에서 이를 다시 재연했다는 기록이 남아 있다.[65]

일반적으로 서원의 향음주례는 강회와 함께 진행되는데, 강회를 먼저 진행하고 향음주례를 나중에 진행하는 경우도 있고, 향음주례를 먼저 하고 강회를 뒤에 하는 경우도 있다. 예를 들면 성담(性潭) 송환기(宋煥箕: 1728~1807)는 1797년 제생들과 「태극도설(太極圖說)」을 강론한 다음 향음주례를 행했고,[66] 노주(老洲) 오희상(吳熙常: 1763~1833)은 1829년 덕봉서원(德峯書院)에서 강회를 마치고 이튿날 향음주례를 행했다. 그런가 하면, 정재(定齋) 유치명(柳致明: 1777~1861)은 1846년 고산서원(高山書院)에서 향음주례를 행한 다음 제생들과 『옥산강의(玉山講義)』를 강론했고,[67] 금곡(錦谷) 송내희(宋來熙: 1791~1867)는 1847년에 용강서원(龍江書院)에서 향음주례를 행하고 이튿날 『논어(論語)』를 강론했다.[68]

엄격히 말하자면, 향음주례는 고유한 서원 의례라고 할 수는 없다. 하지만 16세기 이후 조선에 서원이 등장하고 서원 문화를 구축해 가는 과정에서 향음주례를 서원 의례로서 중요하게 취급했었던 사실 또한 간과

---

65 『灘村遺稿』 卷6, 「石院日記」: 八月 十三日. 院中獨有農巖金副學令公, 與其子崇謙棲在其中, 幸我相過, 不翅跫音之喜. 農台於春間率門弟趙文命等十餘人, 會于道院, 行鄕飮旅酬禮於舞雩壇. 余之到院, 在於旅酬已行之後, 顧恨不及參行而獲覩其稀罕古禮也. 十九日. 行院中釋菜罷齋後, 農台謂入齋諸生及門下諸人曰: '春間道院鄕飮之禮, 權尊恨其晩到未參, 今以釋菜餕餘, 爲權尊行飮可乎.'遂自分排諸執事曰: '大夫吾當爲之.'余笑曰: '令公未免自稱.'一座大笑. 第一賓李志詢, 第二賓崔守紀, 執禮李偉, 司正余爲之. 終日行禮, 無所失儀, 眞盛事也. 余曰: '古昔吉禮, 賴令公獲觀, 得以周旋於樽俎之間, 誠亦幸矣.'

66 『性潭集』 卷31, 「年譜」: 與諸生講「太極圖說」, 仍行鄕飮酒禮. 門生來會者甚衆, 先生講學之餘,仍行飮禮, 使長孫欽天替行主人之禮.

67 『定齋集』 附錄 卷3 「行狀」: 丙午. 入高山, 行鄕飮酒禮, 因與諸生講『玉山講義』.

68 『錦谷集』 「年譜」: 丁未 【先生五十七歲】 九月 【丁丑】 丙申. 行鄕飮酒禮於龍江 【會者數百人. 翌日講『論語』.】

하거나 무시해서는 안 될 것이다. 특히 서원을 세운 본의가 단순히 고을 한복판의 시끄러운 향교에서 산수 좋고 한적한 서원으로 교육공간을 이전하거나, 과거를 준비하던 공부로부터 성리학을 탐구하는 공부로 커리큘럼을 변경하는 데 있지 않았다는 사실을 상기할 필요가 있다. 성인(聖人)이라는 최고의 경지에 도달하지는 못하더라도 누구나 길인(吉人)과 수사(修士)가 될 수 있는 교육이 바로 조선시대 서원이 꿈꾸었던 교육이었다. 그리고 그것은 한 개인의 인격적 성취에 국한된 목적이 아니라, 관직에 나아가지 않았을 때엔 집안을 반듯하게 하고 풍속의 표상이 될 주체를, 관직에 나아가서는 나라를 바로잡고 시대를 구제할 역할을 염두에 둔 목적이다.[69] 서원을 세운 본의가 여기에 있다면 강도(講道)를 목적으로 하는 강학례와 존현(尊賢)을 목적으로 하는 향사례에 더하여 화민성속(化民成俗)의 실질적 관감(觀感)의 현장교육으로 시행되었던 향음주례를 서원의 의례에 포함해야 할 이유는 충분하다.

Ⅴ. 맺는 말

조선시대 유학자들은 수기치인(修己治人)과 화민성속(化民成俗)의 주체를 양성하는 유학의 근본 정신에 충실한 교육을 수행하기 위해 서원을 확산시켜 나갔다. 이미 과거를 준비하는 기관으로 전락해버린 기존의 향교가 아닌 성리학적 목적에 충실한 교육과 학문을 전개할 수 있는 새로운 공부의 장이라는 점에서 서원은 매력적인 대안이었다. 서원에서 수행한 '강학'과 그 일환으로 정비된 '강학 의례' 역시 이와 같은 문제의식에서 조명되어야 한다. 그렇기 때문에 서원의 '강학 의례'는 일상에서 제생에게 요구된 의례를 재구성하고, 그것이 갖는 의미에 대한 해명이 필요하

69 한재훈, 「'향(鄕)'에 대한 퇴계의 이해와 실천」, 『한국서원학보』 제8호, 2019, 84~85쪽.

다.

동아시아의 교육 전통의 주요한 특징 가운데 하나는 교육시설 안에 강학 공간과 더불어 향사 공간을 함께 마련하고 있다는 점이다. 서구적·근대적 교육시설의 측면에서 보면 이런 구성은 매우 낯선 것이다. 이와 같은 구성은 교육시설이 단순히 지식을 이양하고 습득하는 매개처 내지는 교환소 그 이상의 의미를 갖는다는 실체적 증거이다. 그것을 굳이 '도통'과 연결시키지 않더라도 '계왕개래(繼往開來)'의 지속적인 교육 전통 안에서 교육이 진행되었을 때의 의미에 대한 해명이 필요하다. 서원의 '향사 의례'를 연구할 때 이 부분을 특히 친절하게 설명할 필요가 있다.

'향음주례'는 원래 덕망과 학식이 높은 인재를 등용하고 삶의 경륜이 있는 노인을 존중하는 문화를 사회적으로 진흥하기 위해 마련된 의례이다. 그런 점에서 보면 '향음주례'는 서원의 고유한 의례는 아니다. 하지만 이 의례를 시행한 장소를 애초에 학교로 정한 이유를 생각할 필요가 있다. 여기에는 처음부터 이 의례를 '화민성속'의 교육적 의례로 시행하려는 목적이 담겨 있다. 특히 그것을 학교의 학생들에게 관감(觀感)하도록 함으로써 이 의례 속에 내재한 정신을 체화한 인재로 자라기를 바랐던 본의 역시 읽을 필요가 있다. 향교의 폐해를 극복하고 학문과 교육의 본질을 되살리겠다는 취지로 출현한 서원이라면, 그리고 이 의례를 자임하고 이를 지속적으로 시행해 온 사실이 엄존한다면 이 역시 서원의 의례로 다루어야 마땅하다.

서원 의례를 논함에 있어 구체적인 의식절차나 실제적인 명물도수를 확인하고 그것들이 갖는 의미를 탐구하는 것도 물론 중요하다. 하지만 그 모든 것들이 결국은 서원의 본래 목적에 어떻게 유기적으로 호응하는지 해명할 수 있어야 할 것이다. 그러기 위해서는 서원이 처음 출현했을 때의 문제의식에 항상 초점을 맞추고, 구체적이고 실제적인 사례들을 해석하려는 노력이 필요하다.

【참고문헌】

1. 원전 자료

『易經』『論語』『孟子』『大唐開元禮』程顥·程頤,『二程粹言』朱熹,『朱子語類』
秦蕙田,『五禮通考』權緤,『灘村遺稿』權尙夏,『寒水齋集』金時習,『梅月堂集』
朴世采,『南溪集』宋來熙,『錦谷集』宋煥箕,『性潭集』安鼎福,『順菴集』
柳致明,『定齋集』李龜,『再思堂逸集』李珥,『栗谷全書』李詹,『雙梅堂篋藏集』
李滉,『退溪全書』李厚慶,『畏齋集』鄭道傳,『三峯集』韓章錫,『眉山集』

2. 논저

김낙진,『의리의 윤리와 한국의 유교문화』, 집문당, 2004.
Peter K. Bol, 김영민 옮김,『역사 속의 성리학』, 예문서원, 2010
김대식,「조선 서원 강학 활동의 성격－회강과 강회를 중심으로」,『교육사학연구』제11집, 2001.
김자운,「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유학연구』제48집, 2019.
김지영,「조선시대 국가 鄕禮儀註의 禮敎論 검토」,『조선시대사학보』87, 2018
박종배,「조선시대 학교의례 연구」, 서울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03.
_____,「19세기 후반 무성서원 강습례에 관한 일고찰」,『한국서원학보』1권, 2011.
尹熙勉,『朝鮮時代 書院의 祭禮와 位次』,『진단학보』90호, 2000.
이범학,「魏了翁(1178~1237)의 經世理學과 道統論」,『한국학논총』22, 1999.
이수환,『星州 迎鳳書院 硏究』,『역사교육논집』54권, 2015.
이승환,「道統－유학의 참 정신을 잇는 계보」,『조선유학의 개념들』, 예문서원, 2002.
임근실,『16세기 영남지역 서원 연구』, 단국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9.
鄭萬祚,『退溪 李滉의 書院論』(『韓沽劤博士停年紀念史學論叢』, 1981.
조준호,「퇴계 이황의 서원 건립 활동과 서원론의 실현」,『연사문화논총』제2호, 2006.
최광만,「19세기 서원 강학활동 사례 연구－호계강록을 중심으로」,『교육사학

연구』 22, 2012.
한재훈, 「朱子의 '新民' 해석과 '道統論'의 함수관계」, 『공자학』 22호, 2012.
_____, 「退溪의 書院享祀禮 定礎에 대한 考察－白雲洞書院 享祀禮 修正을 중심으로」, 『퇴계학과 유교문화』 제53집, 2013.
_____, 「'향(鄕)'에 대한 퇴계의 이해와 실천」, 『한국서원학보』 제8호, 2019.
楊寬, 『西周史』,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王胜军, 「中国古代书院祭祀的符号表征」, 『中外文化与文论』, 2015年 第3期.
柳 肃, 「儒家祭祀文化与东亚书院建筑的仪式空间」,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7年 第6期.
蒋建国, 「仪式崇拜与文化传播－古代书院祭祀的社会空间」, 『现代哲学』, 2006年 第3期.
赵 新, 「古代书院祭祀及其功能」, 『煤炭高等教育』, 2007年 第1期.
朱汉民, 「南宋书院的学祠与学统」,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5年 第2期.

Abstract

The Types and Significances of Korean Seowon Rituals

Han, Jae-hoon*

First, Korean Seowon ritualized the lecture at a personal or collective level in order to effectively perform the 'Gungri(窮理: explore the law)' required in the learning process to make human behavior conform to the law of nature. The Ganghak ritual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Hoegang (會講: gather together to study) and the Ganghoe(講會: gather to demonstrate one's study), and they were again composed of rituals that were divided into two parts: a Gaejeop(開接: start a study group), a Geojeop(居接: live in a study group) and a Pajeop(罷接: complete a study group).

Next, the Korean Seowon has improved the ritual of 'Hyangsa' in order to clarify the standard of 'Dotong(道統: Succession of the Way)' raised in the perception that the scholar, the authority of the Way, is the subject leading the world. To this end, the coordinates of Seowon Hyangsa were set in the middle of the Munmyo(文廟: national official shrine) and Hyangsa(鄕祠: a local shrine), and the target was also selected according to the achievement of Taoism. To this end, Seowon first set his coordinates in the middle ofthe Munmyo(文廟: national

* Yonsei University, research professor / kjydist@daum.net

official shrine) and Hyangsa(鄕祠: a local shrine), and set the criteria for selecting the sacrifice objects according to the contribution of the Dotong. And according to these standards, they have improved all kinds of rituals such as the time of sacrifice and the food to be sacrificed.

Finally, according to the *Jurye(周禮)*, there are two main purposes for establishing Hyangeumjurye(鄕飮酒禮), ie a drinking ceremony held in the local village. One is to recommend good talent, and the other is to respect older people. Another thing to pay attention to in this ceremony is the fact that the venue for the ceremony is school. China's previous dynasties used this ceremony with the aim of making its people submissive. In Joseon, however, the state did not lead this ceremony and the place where it was implemented was changed to a school. Seowon, which emerged in the 16th century when it criticized the actual state of the Hyanggyo, naturally implemented this ceremony on its own.

Key word : Seowon, Rituals, Ganghak(discussion learning), Hyangsa(memorial rites), Hyangeumjurye(a drinking ceremony held in the local village)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7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3 55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특징과 의미
-남인계·서인계 서원을 중심으로-*

임 근 실**

Ⅰ. 서론
Ⅱ. 남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그 특징
Ⅲ.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그 특징
Ⅳ. 결론

【국문초록】

조선시대 서원의 享祀儀禮가 가지는 특징을 살펴보았다. 주요 내용은 향사일, 참석인원과 제물, 의식절차 등으로 나누어 분석하였다.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에서는 이황과 그의 제자에 의하여 정립되었고, 황해도 지역에서는 이이를 중심으로 기초가 마련되었다. 이후 두 지역의 서원에서 시행된 향사의례는 역사적 변천을 거치면서 지역별로 변화되었다. 이황과 그의 제자가 정비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의 전범이었다. 그리고 이이가 제정한 서원관련 규정에서 볼 수 있는 향사의례는 황해도 지역에서 경기도·충청도·전라도의 서인계 서원을 중심으로 전파되었다.

향사일은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仲月 中丁日과 季月 上丁日이었고,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중월 중정일이었다.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재계할 때 제관들은 홍단령을 착용하고, 행례할 때 제관들은 흑단령을 착용하여 차이를 두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흑단령을 착용하였다.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향사의례의 犧牲으로 鷄腥을 사용하는 것이 특징적이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향사의례의 祭物로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19S1A5C2A02082813)

** 단국대학교 사학과 박사 / coll1123@naver.com

形鹽을 사용하여 籩豆의 수가 일치하지 않았다.

의식 절차는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현재까지 향사의례를 비롯하여 정알례, 삭망분향례 등 서원에서 정기적인 의례를 축소하지 않고 시행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또한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家禮에서 시행하는 의례들이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도 나타났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의식 절차에 講會가 많이 포함된 점이 특징적이었다. 또한 시기적으로 현대에 복원된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는 향교의 문묘에서 시행되는 석전의례의 영향을 여러 부분에서 살펴볼 수 있었다.

주제어 : 향사의례, 남인계, 서인계, 향사일, 제물, 의식 절차

Ⅰ. 서론

조선시대 서원은 16세기에 성립되면서부터 享祀儀禮를 시행하였다. 조선의 지식인들은 서원의 운영자로서 祭享人物에 대한 향사의례를 중시하였다. 周世鵬(1495~1554)은 白雲洞書院[紹修書院]의 향사의례를 제정하였고, 李滉(1501~1570)은 이를 수정하여 정비하였다. 이를 계승하여 盧慶麟(1516~ 1568)과 柳雲龍(1539~1601)은 영남지역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정립시켰다. 현재 16세기 사료가 남아있는 경상도 지역 서원(白雲洞書院·迎鳳書院·臨皐書院·吳山書院)의 院規를 살펴보면, 향사의례와 관련한 謁祀 또는 享祀 조항을 가장 앞부분에 기술하였다. 더욱이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의 서원지를 편찬하면서 享祀와 관계한 규정들을 독립시켜 별도의 卷으로 구성하였다.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서원의 여러 기능 중에서 중요한 부분이었기에, 가장 앞부분에 관련 규정을 수록하거나 별도의 卷으로 작성하여 서술하였던 것이다. 16세기 조선의 지식인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정립하였고, 이는 서원의 확대와 함께 조선 전역에서 전개되었다. 따라서 조선 전역의 지식인들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고, 시대적 변

천과 지역적 특수성으로 인하여 지속적으로 의례에 대한 고민을 하였을 것이다.

이상과 같은 향사의례의 중요성에도 불구하고, 현재까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연구는 미비한 실정이다.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본격적인 연구의 시초라 할 수 있는 윤희면의 연구,[1] 이황이 정비한 향사의례를 분석한 한재훈의 연구,[2] 16세기 서원의 享祀 정비에 대한 연구,[3] 현재 시행되는 향사의례를 분석한 사례 연구,[4] 9대 서원의 향사례를 비교한 연구[5] 등이 있다. 이 중에서 9대 서원의 향사례를 비교 분석한 연구는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대한 비교사적 분석이 시도되어 의미가 있다. 더욱이 9대서원(소수서원·남계서원·옥산서원·도산서원·필암서원·도동서원·돈암서원·무성서원·병산서원)은 전국적으로 분포하여 지역적 특성을 살펴볼 수 있는 단초를 제공하였다. 또한 현재 시행되는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분석한 연구는 서원 향사의례의 현대적 복원이란 관점에서 중요하다. 따라서 본문에서는 선행연구를 수용하여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남인계와 서인계로 대별하고, 지역적으로는 경상과 황해·경기·충청·호남 등으로 나누어 그 특징을 파악하고자 한다. 현대 개별 서원에서 변화하여 시행되고 있는 향사의례도 분석의 대상으로 포함하여 서원 향사의례의 변천과정을 함께 살펴볼 수 있으리라 기대한다.

본문에서 연구 대상으로 선정한 남인계 서원은 경상도 지역의 소수·남계·임고·영봉·도동·옥산·도산·오산·병산서원이다. 아래는 남인계 서원

1 윤희면, 「朝鮮時代 書院 祭禮와 位次」, 『진단학보』 90, 진단학회, 2000.
2 한재훈, 「退溪의 書院享祀禮 定礎에 대한 考察－白雲洞書院 享祀禮 修正을 중심으로」, 『퇴계학과 유교문화』 53, 경북대학교 퇴계학연구소, 2013.
3 임근실, 「柳雲龍의 『吳山志』 편찬 의도」, 『한국서원학보』 2, 한국서원학회, 2013.
4 김미영, 「서원 향사의 변화와 사회문화적 의미－도산서원 사례를 중심으로」, 『국학연구』 22, 한국국학진흥원, 2013; 최순권, 「道東書院 祭享儀禮의 特徵」, 『한국서원학보』 2, 한국서원학회, 2013.
5 한재훈, 「조선시대 서원향사례 비교연구－9대서원 향사의절을 중심으로－」, 『퇴계학논집』 20, 영남퇴계학연구원, 2017.

<표 1> 남인계 서원 일람표

지역	소재지	명칭	설립	사액	제향인물(제향연도)
경상	榮州	白雲洞書院 [紹修書院]	1543년 (中宗 38)	1550년 (明宗 5)	安珦(1543) 安軸·安輔(1544) 周世鵬(1663)
	咸陽	瀣溪書院	1552년 (明宗 7)	1566년 (明宗 21)	鄭汝昌(1552) 姜翼(1634) 兪好仁·鄭蘊(1642)
	永川	臨皐書院	1553년 (明宗 8)	1554년 (明宗 9)	鄭夢周(1553) 張顯光(1643) 皇甫仁(1787)
	星州	迎鳳書院 [川谷書院]	1558년 (明宗 13)	1573년 (宣祖 6)	李兆年·李仁復·金宏弼(1560) 程頤·朱熹·金宏弼(1568) 鄭逑(1623) 張顯光(1642)
	大邱 [玄風]	道東書院	1568년 (宣祖 1)	1573년 (宣祖 6)	金宏弼(1568) 鄭逑(1678)
	慶州	玉山書院	1572년 (宣祖 5)	1573년 (宣祖 6)	李彦迪(1572)
	安東 [禮安]	[陶山書堂] 陶山書院	1574년 (宣祖 7)	1575년 (宣祖 8)	李滉(1574) 趙穆(1615)
	龜尾 [仁同]	吳山書院	1588년 (宣祖 21)	1609년 (光海 1)	吉再(1588)
	安東	屛山書院	1572년 (宣祖 5)	1863년 (哲宗 14)	

의 기초 정보를 정리한 일람표이다.

서인계 서원은 황해도 지역의 문헌서원·은병정사[소현서원], 경기도 지역의 우저·자운·파산·심곡서원, 충청도 지역의 노강·돈암서원, 전라도 지역의 무성·필암서원 등이다. 아래는 서인계 서원의 기초 정보를 정리한 표이다.

<표 2> 서인계 서원 일람표

지역	소재지	명칭	설립	사액	제향인물(제향연도)

황해	海州	文憲書院	1549 (明宗 4)	1550 (明宗 5)	崔沖·崔惟善(1549)
	碧城	[隱屛精舍] 紹賢書院	1578 (宣祖 11)	1610 (光海 2)	朱子(1578) 趙光祖·李滉·李珥·成渾·金長生·宋時烈(追享)
경기	坡州	[聽松書院] 坡山書院	1568 (宣祖 1)	1650년 (孝宗 1)	成守琛(1568) 成渾(1628) 白仁傑(1683) 成守琮(1740)
	坡州	紫雲書院	1615 (光海 7)	1650년 (孝宗 1)	李珥(1615) 朴世采(1695) 金長生(1713)
	金浦	牛渚書院	1648 (仁祖 26)	1670 (顯宗 11)	趙憲(1648)
	龍仁	深谷書院	1605 (宣祖 38)	1650년 (孝宗 1)	趙光祖(1605) 梁彭孫
충청	論山	魯岡書院	1675 (肅宗 元)	1682 (肅宗 8)	尹煌(1675) 尹文擧(1682) 尹宣擧·尹拯(1723)
	論山	遯巖書院	1634년 (仁祖 12)	1659 (孝宗 10)	金長生(1634) 金集(1658) 宋浚吉(1688) 宋時烈(1695)
전라	長城	筆巖書院	1590 (宣祖 23)	1659 (孝宗 10)	金麟厚(1590) 梁子澂(1786)
	井邑	[泰山書院] 武城書院	1615 (光海 7)	1696 (肅宗 22)	崔致遠·申潛(1615) 丁克仁·宋世琳(1630) 鄭彦忠·金若默·金灌(1675)

이상의 서원을 대상으로 본문에서 분석하고자 하는 내용은 조선시대 남인계·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가지는 특징이다. 주요 내용은 祭享日[享祀日·展謁日·省墓日], 祭享服[享祀服·展謁服·省墓服], 祭官, 祭物, 祭器, 祭式, 春秋大享圖, 儀節 등이다. 이를 위해 각 서원의 書院志,[6] 院規,[7] 笏記,[8] 陳設圖,[9] 儀節[10] 등을 참고하였다.[11] 본문에서는 조선시대 서원의

6『竹溪志』,『迎鳳志』,『吳山志』,『魯岡書院誌』,『遯巖書院誌』(1884, 1936),『武城書院誌』,『筆巖書院誌』,『深谷書院誌』,『興巖書院誌』,「牛渚書院錄」.

7『臨皐書院凡規』,「隱屛精舍學規」,「文憲書院學規」,「(魯岡書院)學規」,「(魯岡書院)齋規」,『(武城書院)院規』,「坡山書院齋規」.

향사의례가 정립되는 과정과 이후 본격적으로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전개되는 양상 및 그 특징을 파악하고자 한다.

Ⅱ. 남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그 특징

남인계 서원은 16세기 조선의 경상도 지역에서 성립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典範으로 의식을 시행하였다. 이 시기 경상도 지역에 설립된 서원은 이후 절대 다수가 李滉(1501~1570)과 그 문인을 주축으로 건립·운영되었다. 이는 앞서 제시한 표 1의 제향인물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의 지식인은 조선 서원의 享祀儀禮를 정비하였다. 먼저, 周世鵬(1495~1554)은 조선 최초의 서원인 백운동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제정하였다. 그리고 이황과 그 문인은 향사의례를 정비하여 서원의례의 위상을 확정하였다.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의 서원은 남인계 서원 향사의례의 典範이었기에, 이를 함께 살펴보면서 논의를 진행하겠다. 남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가지는 특징을 享祀日, 祭品과 祭官, 의식저차 등의 사항으로 나누어 살펴보겠다.

1. 享祀日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는 날인 향사일은 季月 上丁日과 仲月 中丁日로 나누어졌다. 시행하는 달은 음력 2월, 8월

8 「牛渚書院笏記」(「牛渚書院祭物單子」, 「告由祭儀節」).
9 「安文成公春秋大享圖」.
10 「魯岡書院儀節」, 「濫溪書院儀節」.
11 이외에도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의 『古文書集成』과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의 『서원향사』를 주로 참고하였다.

인 중월과 음력 3월, 9월인 계월이며, 시행하는 날은 음력으로 매달 첫 번째 丁日인 상정일과 두 번째 정일인 중정일이었다. 州縣의 鄕校에서 시행하는 文廟 釋奠儀禮가 仲月 上丁日이었기에, 서원의 향사일을 선정하는 과정은 여러 의견이 있었다. 이 때문에 백운동·임고·병산서원에서는 계월 상정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고, 남계·영봉·도동·옥산·오산서원에서는 중월 중정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다.

<표 3> 경상도 지역 남인계 서원의 享祀日

	紹修	濫溪	迎鳳	臨皐	道東	玉山	陶山	吳山	屛山
季月 上丁	○			○					○
仲月 中丁		○	○		○	○	○	○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향사일을 선정하는 과정을 살펴보면, 논의의 시작은 최초의 서원인 백운동서원임을 알 수 있다. 주세붕은 백운동서원에서 安珦(1243~1306)의 향사의례를 진행하면서 춘추향사일을 계월 상정일로 정하였다. 그 이유는 문묘의 석전의례가 중월 상정일에 거행되기 때문이었다.[12] 백운동서원의 제향인물인 안향은 1319년(충숙왕 6)에 문묘에 배향되었다.[13] 안향은 고려 충렬왕대 문묘의 정비를 추진한 업적이 있었다.[14] 이 때문에 백운동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문묘의 석전의례

12 『國朝五禮序例』 卷1, 「吉禮·時日」.

13 박종배, 「조선시대 문묘 향사 위차의 특징과 그 교육적 시사– 명청시기 중국과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 『한국교육사학』 34–3, 한국교육사학회, 2012, 9~10쪽.

14 안향은 1303년에 國學의 學正 金文鼎을 元의 江南으로 보내어 공자와 70제자의 화상, 문묘의 祭器와 樂器, 서적을 구해오게 하였다. 그리고 관료들에게 養賢庫에 銀과 布를 내게 하여, 이자로 인재를 지원하도록 하는 정책을 개진하였다. 그는 다음해 5월에 贍學錢을 마련하여 博士가 출납을 관장하며 국자감의 운영을 지원하게 하였다. 그리고 그해 6월에 大成殿이 완성되자, 元에서 가져온 先聖[공자 등]의 화상을 모셨다(『高麗史』 卷105, 列傳18, 「文成公傳」).

와 같은 날에 진행하기 어려웠다. 이러한 사정으로 주세붕은 백운동서원의 향사일을 다른 날로 설정하였던 것이다. 주세붕은 竹溪에서 3월과 9월에 정취를 즐겼을 안향을 상상하면서 향사일을 계월 상정일로 하였다.[15]

이후 향사일에 대한 논의는 迎鳳書院을 건립한 盧慶麟(1516~1568)에 의해 이어졌다. 노경린은 영봉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제정하면서, 향사일은 仲月 中丁日으로 하였다. 또한 노경린은 만약 중정일에 큰 사고가 있으면 亥日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도록 하였다.[16] 이때 노경린은 의례를 진행하는 관원의 부족을 이유로 들며,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문묘의 석전의례를 동일한 일시에 시행할 수 없음을 주장하였다.

> "반드시 上丁日로 정해야 하지만 中丁日로 한 이유로 고을에서 그 일을 맡을 만한 적당한 관원이 적기 때문이다. 가려 뽑은 정성스럽고 삼가는 사람은 모두 文廟의 제사에 나아가게 해야 하는데 다만 일반인으로 이 숫자만 구차하게 채우면 제사를 지내도 지낸 것같지 않으니 어찌 신이 이르겠는가?"[17]

노경린은 만약 석전의례와 향사의례가 같은 날에 진행한다면 의례를 담당할 관원이 문묘에서 의식을 시행하여야 하기 때문으로 설명하였다. 즉, 노경린은 서원에서 시행하는 향사의례의 祭官으로 관원을 설정하였다는 점과 서원의 향사의례의 위상을 문묘보다 낮게 인식하였던 것이다.

15『竹溪志』卷5,「雜錄後」. "春秋大享, 例卜 季月上丁, 上丁有故, 改卜 中丁. ○凡舍菜先聖, 必於春秋仲月, 而此則卜 季月者, 公旣配享仲月, 而上巳之淸明重陽之佳節, 卽公平生所浴沂遊賞於此者. 追而祭之, 公必樂而降歆. 祭之日, 盡會一鄕父老斯文秀士於溪上, 而爲飮禧禮, 相與風詠而歸 則所謂神人以和者, 必於此而得之矣."

16『迎鳳志』,「學規錄」. "春秋大享, 例卜 仲月仲丁, 擇獻官備四執事, 有大故, 改卜 亥日【有故者, 如國諱.】."

17『迎鳳志』,「學規錄」. "如舍菜, 必於上丁, 而此卜 中丁者, 一鄕之堪爲官者, 鮮有其人. 精選誠謹者, 皆詣文廟, 而只以庸人, 苟充此數, 則祭如不祭, 安有神只格思乎."

다음 臨皐書院은 향사일로 季月 上丁日을 사용하였는데, 임고서원은 백운동서원의 원규를 인용하여 서원의 규정을 제정하였기에 같은 날을 향사일로 설정한 것이었다.

이후 대다수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중월 중정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다. 남계·도동·옥산서원의 향사일도 중월 중정일이었다. 또한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의 향사일을 중월 중정일로 설정하면서, 새로운 의견을 추가하였다.[18] 류운룡의 의견을 통해 남인계 서원에서 문묘와 서원의 위상에 차이를 두었음을 다시금 확인할 수 있다.

> "선비 중에 혹 서원이 있음을 알지 못하고, 학교가 있음을 알지 못하니 경중의 순서를 잃어버림이 심하다. 지금부터 매년 上丁에 서원에 들어온 선비들은 재에 모여 먼저 석채를 행한 후 中丁에 서원의 향사를 행한다【천곡원규】."[19]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에서 먼저 상정일에 석전의례를 시행한 후, 중정일에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진행하도록 하였다. 이를 보면 서원의 구성원들은 10일 사이에 순차적으로 2가지의 祭享을 진행하여야만 했다. 당시엔 일반적으로 향사일의 7일 전에 本官[仁同縣監]·敎官·斯文에 향사의례를 알렸고, 祭官과 學生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행하기 3일 전부터 서원에서 齋戒를 지냈다.[20] 그렇기때문에 문묘의 석전의례일 이후 서원 향사의 齋戒日은 며칠 차이가 나지 않는다. 따라서 열흘 사이에 순차적으로 석전의례와 향사의례가 가능하였던 것이다. 그리고 류운룡은 서원에 원생들에

18『吳山志』卷2,「享祀」. "春秋大享, 例卜 仲月中丁, 有故, 改卜 下丁. ○有故者, 如國忌之類."

19『吳山志』卷2,「享祀」. "士, 或未免知有院, 而不知有校, 輕重之失序甚矣. 自今每歲上丁, 入院之士, 齋會先行釋菜, 中丁行院祀【川谷院規】."

20『吳山志』卷2,「享祀」. "齋戒. 前期三日, 諸祀官幷散齋二日宿於正寢, 致齋一日於祀所, 學生則幷於前三日入齋【用紅團領】."

게 문묘의 석전의례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순차적으로 진행하게 하여 두 의례의 위상을 확인하게 하고, 연속적인 행사가 될 수 있도록 하였다. 이는 당시의 지식인에게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문묘의 석전의례처럼 반드시 준행하여야 하는 의례로 의식하도록 한 것이었다. 이로써 경상도 지역 서원의 향사일 선정에 대한 문제는 문묘와 서원의 관계를 별개로 구별하여 생각할 수 없는 사안으로 발전시켰다.

이후 17세기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한 대표적인 남인계 서원인 병산서원에서는 서원간의 위상을 고려하여 향사일을 결정하였다. 柳成龍(1542~1607)을 제향하는 병산서원에서는 계월 상정일에 향사의례를 진행하였다. 류성룡의 스승인 이황을 제향한 도산서원에서 중월 중정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기 때문에, 동일한 안동지역에 위치한 병산서원은 계월 상정일을 향사일로 선정하였다. 병산서원은 백운동서원의 예를 따른 것이라긴 보단, 서원간의 위상에 따라 향사일을 결정한 것으로 보인다.

2. 祭官과 祭物 선정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祭官을 점차적으로 다양하게 구성하였다. 특히, 이황과 류운룡은 祭官의 선정에서 『國朝五禮儀』의 釋奠儀禮를 반영하여 정비하였다. 초기 경상도 지역의 서원은 향사의례에서 제관을 선정할 때 3人의 獻官만 공통적으로 규정하였고, 執事는 각기 다르게 규정하였다. 주세붕은 백운동서원의 祭官을 獻官 3인과 執事者 6人으로 기록하였고, 노경린은 영봉서원의 제관을 헌관과 執事者 4인으로 기록하였다.

이후 이황은 백운동서원의 홀기를 개정하면서 獻官 3인의 자격과 祝, 贊者, 謁者, 贊引, 司尊, 奉香, 奉爐 등 執事者 7인을 규정하였다. 이는 오산서원 향사의례의 제관을 정리한 류운룡에게 이어졌다.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의 祭官으로 獻官 3인과 祝, 贊者, 謁者, 贊引, 司尊, 奉香, 奉爐, 掌饌,

盥洗位, 奠爵, 奉爵, 陳設 등으로 執事者를 세분화하여 규정하였다. 이렇듯 류운룡이 제관을 상세히 규정한 부분은 『國朝五禮儀』를 참고하였기에 가능한 사항으로 보인다. 『國朝五禮序例』를 살펴보면, 祭官의 인원과 인원은 시행하는 의례에 따라 다르게 규정되었다.[21] 이처럼 이황과 그 제자들이 참고한 『國朝五禮儀』는 이후 남인계 서원에서 계속적으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는데 필수적인 참고서였다.

또한 17세기 이후부터 현재까지 남인계 서원의 제관은 보다 다양한 구성을 보인다. 현재 백운동서원은 三獻官 이외의 祝, 贊者, 謁者, 贊人, 司尊, 奉香, 奉爐, 奉爵, 奠爵, 學生, 祭物有司, 司牲, 都陳設, 陳設 등 집사자가 6인 이상으로 증가하였다. 이들은 시대적 변천에 따라 제관에 다양한 역할을 분정하면서 추가적으로 등장한 것으로 보인다. 현재 옥산서원의 제관 중 判陳設(제물을 진설하고 그것이 잘 되었는지 판단하며 향사가 끝나면 제물을 수습함), 直日(서원의 유사와 같은 존재 향사 전후의 준비와 정리를 담당함), 公事員(분정 때 적임자를 추천하는 역할을 함), 曹司(향사 내내 글씨 쓰는 일을 도맡아서 함) 등이 특징적이다. 도동서원의 贊唱, 병산서원의 供飯 등도 개별 서원에서 나타나는 특징이자 시대적 변천을 반영하는 양상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다음은 남인계 서원의 祭物에서 보이는 특징이다.[22]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향사의례를 진행하며 진설하는 籩豆, 簠簋, 腥이 향교보다 소략하였다. 州縣의 문묘에서 진행하는 석전의례는 八籩八豆[刑鹽, 漁鱐, 乾棗, 栗黃, 榛子, 菱仁, 芡仁, 鹿脯,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兎醢, 筍菹, 魚醢][23]와 二腥[羊腥, 豕腥][24]이었다. 이와 대비하여 경상도 지역의

21 『國朝五禮儀序例』 卷1, 「祭官·州縣釋奠」. "初獻官【守令】, 亞獻官, 終獻官, 東西從享分獻官各一, 東西廡分獻官各一【縣, 則無】, 祝, 掌饌者, 執尊者【每尊所各一】, 執事者【隨位酌定】, 贊者, 謁者, 贊引四【縣二. ○亞終獻官, 分獻官, 以佐貳官, 敎授, 訓導, 及本邑閑散文官差. 祝以下諸執事, 皆以學生充.】."

22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진설하는 제물은 본문의 가독성을 위하여 <부표 1>로 수록하였다.

남인계 서원은 六籩六豆 또는 四籩四豆에 一腥만을 구비하였다. 또한 남인계 서원에서 희생으로 양과 돼지 이외에 닭도 사용하고 있는데, 이러한 부분도 문묘와 구별되는 점이었다. 그리고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사용했던 籩豆의 제물로 蜜果(백운동서원),[25] 栢子(백운동서원, 영봉서원), 乾雉(영봉서원)는 문묘의 석전의례에서 보이지 않는다.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사용하는 제물은 이황에 의하여 정비되었다. 이황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 교정하면서 제물도 정비하였다. 최초의 서원인 백운동서원의 홀기는 주세붕이 작성하였고, 그에 나타난 오류를 이황이 교정하였다. 이때 이황이 문제점으로 지적한 부분 중의 하나는 제물로 밀과를 사용한 점이었다. 이황은 俗祭에 사용되는 물품인 밀과를 향사의례에서는 사용할 수 없다고 생각하였다. 이황은 서원 향사의례의 위상을 俗祭보다는 상위로 생각한 것이다. 따라서 이황은 蜜果 대신 鹿脯를, 3종의 과일 중 하나를 줄이고 대신 魚鱐를 배치하여 진설의 균형을 맞추었다. 이황이 교정한 제물은 모두 문묘의 석전의례에서 사용하는 것이었다.[26] 이를 통해 보면 이황이 생각한 서원 향사의례의 위상은 俗祭의 이상

23 鄕校의 八籩八豆는 각 8개의 籩과 豆에 刑鹽, 漁鱐, 乾棗, 栗黃, 榛子, 菱仁, 芡仁, 鹿脯, 韭菹, 醓醢, 菁菹, 鹿醢, 芹菹, 兎醢, 筍菹, 魚醢를 담았다. 刑鹽은 소금이다. 漁鱐은 주로 대구 등의 생선을 말린 포이다. 乾棗는 대추열매를 말린 것이다. 栗黃은 밤이다. 榛子는 개암나무 열매이다. 菱仁은 물풀 열매이다. 芡仁은 연근이다. 鹿脯는 사슴고기를 말린 포이다. 韭菹는 부추김치이다. 醓醢는 소의 어깨고기 [膊] 를 말렸다가 잘게 썰어 여기에 쌀밥 [米飯], 누룩 [麴], 소금 [鹽], 술 [美酒] 을 섞어 항아리에 넣고 백일 동안 숙성시켜 만든다. 菁菹는 무김치이다. 鹿醢는 사슴고기를 탐해와 같이 만든 것이다. 芹菹는 미나리 김치이다. 兎醢는 토끼고기를 탐해와 같이 만든 것이다. 筍菹는 소금에 죽순을 절여서 만든다. 魚醢는 생선을 탐해와 같이 만든 것이다.

24 腥은 희생물의 생고기 중 7가지 부위[脾 2, 肩 2, 脅 2, 脊 1]를 匣에 담아서 俎[희생의 고기나 내장을 올려놓는 작은 탁자]에 두는 것이다. 향교에서는 양과 돼지를 腥으로 사용하였다.

25 蜜果는 油蜜果로 밀가루나 쌀가루를 반죽하여 모양을 빚어서 바싹 말리고, 기름에 튀긴 후 꿀이나 조청을 바르고 튀밥이나 고물을 입힌 과자이다.

26 한재훈, 「退溪의 書院 享祀禮 定礎에 대한 考察」, 『退溪學과 儒敎文化』 53, 경

이며, 문묘의 석전의례의 이하였다.

이황이 정비한 향사의례의 제물은 이후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계승하였다. 이황이 제물에서 문제시하여 제거한 밀과는 이후 남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 나타나지 않았다. 이황이 1540년대 개수한 백운동서원의 笏記에서 밀과가 보이지 않았다.[27] 그리고 1562년에 필사된 임고서원의 陳設圖에서도 밀과는 찾을 수 없다.[28] 다음으로 1567년에 이황이 易東書院의 향사의례를 제정할 때도 백운동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참고하길 권유하였는데, 실제 역동서원의 笏記는 수정된 이황의 홀기와 거의 일치하였다.[29] 그리고 류운룡이 작성한 오산서원의 陳設圖와 도동·옥산·도산·병산서원의 제물에서도 밀과는 없었다.[30] 이처럼 이황이 개정하여 제시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준용하였음은 밀과의 有無를 통해 증명할 수 있다.

또한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 중 일부에서는 雞腥을 희생으로 사용하였는데, 이는 羊腥과 豕腥을 올리는 문묘의 향사의례와 가장 큰 차이점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國家儀禮인 문묘의 석전의례는 희생으로 犧腥·羊腥·豕腥을 사용하였고, 州縣의 鄕校에서는 의례의 위상이 낮아 羊腥·豕腥만 사용할 수 있었다. 이러한 상황에서 雞腥은 국가의례에서는 사용되지 않는 제물이었다. 하지만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에서 雞腥을 향사의례에 사용하는 사항에 대하여 백운동서원과 도산서원의 의식에서 정당성을 찾았다.[31] 앞서 살펴본 서원의 향사일도 향교의 석전의례를 의식하여 결정하였다.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雞腥을 사용하여 향교와 서원에

북대학교 퇴계연구소, 2013, 10~11쪽.

27 국사편찬위원회, 「安文成公春秋大享圖」, 『朝鮮時代嶺南書院資料』, 1999, 국사편찬위원회, 117~121쪽.

28 『臨皐書院凡規』 「春秋大享圖」.

29 한재훈, 위의 논문, 2013, 19쪽.

30 『吳山志』 卷2, 「享祀」.

31 『吳山志』 卷2, 「享祀」. “雞腥幣篚用, 白雲陶山儀.”

서 시행한 儀禮의 차등을 가시적으로 표현한 것이다. 이처럼 희생을 雞腥으로 하는 양상은 경상도 지역의 서원에서 시행된 향사의례의 특징 중 하나이다. 현재도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雞腥을 향사의례의 제물로 사용하고 있다.[32] 하지만 현재 도산서원에서는 羊腥을 사용하다가 후대에 豕牲으로 바뀌었다라고 전하고 있다.[33] 이를 보면 계성에서 양성으로 변화하고, 이후 다시 한번 양성에서 시성으로 변화한 것을 알 수 있다. 또한 백운동서원에서도 현재 시성을 희생으로 사용하고 있다.[34] 이러한 부분은 서원에서 점차적으로 보다 상위의 의례에서 사용하는 희생을 진설하여 제향인물과 서원의 위상을 강화하려 했던 것같다.

3. 의식 절차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시행된 향사의례의 의식 절차는 이황에 의하여 기틀이 마련되었다. 이황은 주세붕이 작성한 백운동서원의 笏記를 개정하였다. 이황은 新笏記를 작성하면서 上香禮와 初獻禮를 구분하였고, 飮福 후 受胙로 수정하였으며, 受胙 이후의 行禮 절차를 보완하였다.[35] 이황이 개정한 향사의례의 의식절차는 이후 류운룡이 보다 진전된 형태로 정립하였다. 류운룡은 오산서원의 향사의례 절차를 10가지 단

32 윤숙경, 「鄕校와 書院의 祭禮에 따른 祭需에 관한 연구」, 『韓國食生活文化學會誌』 13, 한국식생활문화학회, 1998, 256~258쪽.

33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소수서원·도산서원』, 예맥, 2011, 280쪽.

34 <부표 1>에서는 백운동서원[소수서원]과 도산서원에서 초기 의식절차에서 사용한 雞腥을 ○로 표시하였다. 시대적 변천에 따라 羊腥과 豕腥을 희생으로 사용한 것은 *로 표시하였다. 또한 도산서원은 粱과 稷도 원래 보궤에 담아 진설하였으나, 현재는 稻와 黍만을 진설하였다. '癸未國滅'이란 기록을 볼 때 계미년에 나라에서 명하여 덜어냈다고 하지만 정확히 언제 시기와 이유는 알 수 없다(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소수서원·도산서원』, 예맥, 2011, 282쪽). 따라서 도산서원의 粱과 稷도 *로 표시하였다.

35 한재훈, 앞의 논문, 2013, 11~13쪽.

계로 구분하였고, 상세한 儀註를 수록하였다. 이황은 백운동서원 享祀禮의 儀註를 수정하면서『國朝五禮序例』「州縣釋奠正配位」와『國朝五禮儀』「州縣釋奠文宣王儀」를 참고하였을 것이다. 하지만 이황의 홀기는 소략하기 때문에 이에 대한 가시적인 증명은 어려운 상황이다. 그러나 류운룡은 스승의 영향을 받아 오산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정립하면서『國朝五禮儀』를 가장 중요한 참고 자료로 활용하였다. 류운룡은 작성한 오산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국조오례의』의 의주는 내용에서 대부분이 일치하고, 祭冠의 명칭과 配位의 유무가 다를 뿐이었다. 이처럼 류운룡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정립하는 데 있어 스승인 이황의 향사의례 개정에 영향을 받아『國朝五禮儀』를 주로 활용한 것이다. 그는 상세히 儀節을 규정하여 향사의례를 원활히 진행하려 하였다. 류운룡은 기존의 간략한 祭式과 笏記를 이용하여 향사의례를 실행하는데 어려움을 느꼈을 것이다. 그래서 류운룡은『國朝五禮儀』의 儀註를 참고하여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보충하였으리라 생각된다.

두 번째,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별로 향사의례의 진행 중 이루어지는 특수 의례가 있었다. 소수서원은 齋戒하는 중 敬讀하고, 行禮 중에는 樂章이 있었던 것이 특징이다. 소수서원에서는 향사일의 7일전에 本官·敎官·斯文에 알리고, 3일전부터 서원에서 재계하였다. 재계를 할 때 敬讀하였는데, 白鹿洞書院規·四勿箴·敬齋箴·心箴·夙興夜寐箴을 차례로 경독하고 제관들은 모두 揖하고 서서 경청하였다. 또한 소수서원에서는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시행될 때 祝文을 낭독한 후 樂章이 있어 道東曲을 낭송하였다. 악장의 낭속은 장로 1인과 유생 1인 서로 마주서서 부르게 하였는데, 예로부터 부르던 원음이 영원히 이어지게 하기 위함이었다. 또한 헌작할 때마다 헌관이 바뀌듯이 도동곡을 부를 유생도 헌관이 바뀔 때마다 장로를 제외한 유생은 3인이 바꿔서 부르게 하여 악장을 부르는 사람은 총 4명이었다. 하지만 현재는 악장을 전수하여 부를 수 있는 유생이 부족하여 가창에 익숙한 사람이 부르고 있다.[36]

도동서원과 남계서원은 향사의례 중에 三祭酒를 시행하였다. 삼제주는 家禮에서 降神을 위해 三上香 후 茅沙에 술을 3번 붓는 의식이다.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는 上香만을 시행하였는데, 도동서원과 남계서원에서는 삼제주도 함께 의식절차에 포함되었다.[37] 옥산서원에서는 향사의례에서 의식이 시행되기 전에 夜下를 제공하였다. 夜下는 밤에 내리는 음식이란 뜻으로, 옥산서원에서는 행례 전에 허기지지 말라고 미음 간식을 제공하였다. 이 예법은 경주에 위치한 양동마을의 여강이씨나 월성손씨 기제사에서도 볼 수 있는데, 밤참과 미음을 순차적으로 제공하였다. 서원에서 야하로 미음을 제공하는 의미는 저녁식사 이후 오랜 시간이 흘러 제관들이 시장할 것을 우려한 점도 있지만, 이로 인해 口疳으로 예의에 어긋날 수 있는 부분을 예방하기 위해서였다.[38]

이러한 도동·남계·옥산서원의 경우는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 家禮의 예법을 일부 반영하여 발생한 현상으로 보인다. 이는 경상도 지역에서 서원이 성립될 때부터 있었던 현상이다.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의 지식인들 사이에서는 行禮의 정비하고 주석서를 편찬하는 과정이 있었다. 당시 지식인들은 성리서를 활발히 연구하면서, 『朱子家禮』의 주석서를 편찬하였다. 특히 喪·祭禮를 중심으로 '行禮'의 매뉴얼을 정리하는 작업이 진행되었다.[39] 특히 퇴계학파의 류운룡과 그의 아버지인 류중영도 가례 중 喪·祭禮 지침서를 저술하였다. 류중영은 『家禮增解』를 편찬하였고,[40] 류운룡은 「追遠雜儀」를 저술하였다.[41] 이러한 류운룡의 경험이 오산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도 『주자가례』를 참고하여 예를 진행하였고, 이러한 부분이 반영되어

36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소수서원·도산서원』, 예맥, 2011, 84쪽.
37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남계서원·도동서원』, 예맥, 2013, 123쪽.
38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병산서원·옥산서원』, 예맥, 2012, 268쪽.
39 장동우, 「『家禮』 註釋書를 통해 본 朝鮮 禮學의 發展過程」, 『東洋哲學』 43, 동양철학회, 2010, 243~249쪽.
40 장동우, 위의 논문, 2010, <표 1>.
41 『謙庵集』 卷4, 雜著, 「追遠雜儀」.

상세한 儀註를 정비하였던 것이다. 따라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기본적으로 국가의례인 문묘의 석전의례에 차등을 두어 시행하였지만, 일부분은 家禮에서 차용된 사항도 있었던 것이다.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향사의례 이외도 朔望焚香禮, 正謁禮, 墓祭 등의 정기적인 의례를 지냈다. 백운동·남계·임고·도산·오산·옥산서원은 삭망분향례를 지냈다. 삭망분향례는 香謁禮, 焚香禮, 展謁禮 등으로 불렸는데, 음력 매월 초하루와 보름에 시행하는 의례였다. 매월 삭망일의 전날 齋有司는 입원하여 삭망날 이른 아침에 의관을 정제하고 奉香과 奉爐를 각 1인씩 앞세워 묘정에 나아가 관세위에 손을 씻고 계간에 나아가 세 번 향을 올리고 두 번 절한다. 그리고 묘우 안에 들어가 신위를 奉審하는 의식이다. 오산서원에서는 전알례로 불렸는데, 參禮하는 인원의 복장을 규정하였다. 벼슬이 있는 감사[道主], 현감 혹은 군수[邑主]는 品服을 착용하게 하고, 방문하는 인사들은 頭巾, 洪團領을 착용하며, 유생은 靑衿을 착용하도록 하였다.[42] 서원의 展謁에는 벼슬이 있는 사람이 品服을 착용한다는 점은 서인계 서원과 동일하였다. 하지만 院生의 복장은 남인계 서원에선 靑衿을, 서인계 서원에선 頭巾과 洪團領을 착용하는 차이점이 있었다. 또한 남인계 서원은 방문하는 인사들의 복장도 규정한 점이 특징적이다.

백운동·도산·옥산서원은 正謁禮를 시행하였다. 매월 정월 초 5일에 하는 의례로 正謁 또는 正朝謁廟禮라 한다. 새해를 맞이하여 서원의 선현에게 인사를 드리는 의례로서, 朔望焚香禮 보다 절차가 복잡하다. 정알례는 정초에 올리는 제사로 음력 정월 초 5일 正初謁廟의 의식이다. 하루 전에

42『吳山志』卷2,「享祀·展謁」. "每於朔望在院儒生盛服靑衿謁廟焚香二拜【川谷院規】. 遠近人士來尋者, 以明日早朝謁廟, 或不能留宿者, 以當日就夾室改服【頭巾紅團領】, 廟如朔望之儀【川谷院規】. 道主邑主到本院升正堂就夾室改復【品服】, 謁廟, 焚香, 二拜. 還正堂改服, 如欲宿齋而謁廟, 則當於明日早行禮如式【川谷院規】."

入齋에 들어가고, 다음날 새벽 5시경에 謁廟禮가 시작된다.[43]

오산서원은 제향인물인 吉再(1353~1419)의 묘소에 墓祭를 지냈다. 오산서원에서는 墓祭日을 淸明節로 규정하였다.[44] 오산서원은 길재의 墓 바로 옆에 건립되었기 때문에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별도로 묘제를 지내도록 하였다. 그래서 류운룡은 展謁의 마지막 부분에 省墓와 관련된 조항을 규정하였다.[45] 이와 더불어 임고서원의 『서원규범』에서도 같은 조항들이 보이는데, 이는 『오산지』의 조항을 그대로 필사하는 과정에서 생긴 착오로 보인다.

Ⅲ.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와 그 특징

서인계 서원은 16세기 조선의 황해도와 경기도 지역에서 성립한 書院의 규정을 계승하였다. 16세기 李珥(1536~1584)는 황해도와 경기도 지역에 서원을 설립하였고, 이후 서인계 서원은 이이의 문인을 주축으로 건립·운영되었다. 이는 앞서 제시한 표 2의 제향인물에서 확인할 수 있다.

---

43 소수서원에서 시행하는 정알례의 의식 절차는 다음과 같다. 정월 초 4일에 원장과 재유사 및 향중의 여러 유림들이 입원하여 초5일 이른 아침에 시행한다. 원장은 당상에서 남향하여 서고, 재유사와 참례자들은 북쪽을 향하여 묘정의 동서에 연차순으로 도열하여 선 뒤 揖禮를 한다. 이를 庭揖禮라고 하며 曹司가 재유사 앞에 나아가 읍하고 뵈면, 재유사가 집례를 추천한다. 다시 조사는 알자 앞에 나아가 서로 상읍례를 한뒤 제자리에 돌아가면 집례가 묘우로 가서 홀기를 창한다. 위차에 따라 예를 마치고 돌아가면 집례가 묘우로 가서 홀기를 창한다. 위차에 따라 예를 모두 마치고 모두가 강당에 돌아와 원장과 연장자들이 동벽에서 서향하고 서고, 집례 이하는 동향 상하로 서서 읍례한 뒤 물러난다(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소수서원·도산서원』, 예맥, 2011, 45쪽).

44 『吳山志』 卷2, 「享祀」. “每年淸明, 精備祭物, 眞掃墳塋. 祭品, 三色實果, 米麵食, 脯醢魚肉 炙肝雞腥. 連獻三爵, 行禮, 如家廟參拜儀. 有祝文.”

45 『吳山志』 卷2, 「享祀·展謁」. “省墓如謁廟儀. 但無焚香一節.”

이이는 황해도와 경기도 지역의 서원에서 시행되는 여러 儀禮와 규정을 정립하였다. 이후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이이의 書院論과 더불어 앞서 정비된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의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수용하면서 발전하였다. 서인계 서원은 황해도, 경기도, 충청도, 전라도 지역에서 주로 분포하였다.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가 가지는 특징을 享祀日, 祭品과 祭官, 의식 절차 등의 사항으로 나누어 살펴보겠다.

1. 享祀日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일은 仲月 中丁日이었다. 이이는 문헌서원의 향사일을 春秋라고 계절만 명시하였을 뿐 명확한 날짜를 설정하지 않았다.[46] 따라서 서인계 서원에서 중월 중정일에 향사를 시행하는 점은 앞서 정립된 경상도지역 서원의 향사일을 수용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다만, 1693년(숙종 19)에 朴世采(1631~1695)가 작성한 자운서원의 학규는 이이의 문헌서원학규를 기저로 작성된 것이다.[47] 그렇기에 자운서원의 향사일도 춘추로만 명시되었다.

현재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일은 사정에 따라 변경된 경우가 많았다. 경기도 지역의 牛渚書院은 현재 2월 중정일과 제향인물인 趙憲(1544~1592)의 기일(8월 18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고 있는데, 음력 6월 28일은 탄신제도 시행하였다.[48] 또 경기도 지역의 紫雲書院은 파산서원과 향사일이 겹치는 것을 우려하여 춘향제는 중월 상정일에 시행하였다. 坡山書院은 현재 향사일의 전일에 민간신앙인 안택고사를 지내고 있

46『栗谷全書』卷15, 雜著,「文憲書院學規」. “一. 春秋祭, 無故不參者黜座.”

47『南溪集』續集 卷19, 雜著,「紫雲書院院規【癸酉七月】」. “一. 春秋祭時, 齊任及諸生託故不參者黜座.”

48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서원향사-심곡서원·우저서원·현절사』, 예맥, 2014, 157쪽.

으며, 경현단에 대한 제향도 2월 중정일에 함께 시행하였다.[49] 충청도 지역의 서원에서도 동일한 향사일에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는 것을 우려하였다. 노강서원의 향사일은 돈암서원과 동일하여서 지방 유림들이 분산되어 참여가 저조하였다. 이 때문에 현대에 들어와 노강서원의 향사 일시를 변경하였다.[50]

2. 祭官과 祭物 선정

서인계 서원은 獻官 3人은 공통되지만 執事는 그 수가 서원마다 매우 달랐다. 서인계 서원은 조선시대에는 제관을 세분화하여 그 수가 많았으나, 현재는 수를 줄인 경우가 많았다. 동일한 서인계인 황해도, 경기도, 충청도 전라도 지역의 서원에서 제관은 상이한 모습을 보였다. 경기도 지역의 서원은 典祀官, 都陳設, 滌器, 貫涓, 都陳設, 堂下執禮 등의 제관이 있었다. 충청도 지역의 서원은 공통적으로 直日이 있었고, 노강서원에서는 相禮와 監飯이 있었다. 전라도 지역의 서원도 直日, 典祀, 贊唱, 陳設 등의 제관이 향사의례를 시행하였다.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향사일의 3일 전부터 入齋하였고, 현재는 당일 입재하는 경우가 많다. 또한 서인계 서원에서 향사의례를 진행하는 제관의 복장은 黑團領을 착용하였다. 돈암서원에서는 3일전 入齋할 때 獻官과 관직자는 公服 중 黑團領을 착용하였다. 관직이 없으면 黑笠에 黑團領을 입고, 執事 이하는 흑색의 巾服을 입었다. 이를 통해 볼 때 흑색을 향사복의 기본으로 생각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는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재계 때는 紅團領을 착용하고, 行禮 때는 흑단령을 착용하는 모습과 차이가 있다. 이와 대비하여 서인계 서원의 원생이 착용한 평상시 복장은 直領이었다. 이이는 평소 원생의 복장으로 直領을 착용하도록 하였고,[51] 은병정사

49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자운서원·파산서원』, 예맥, 2014, 285쪽.
50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노강서원·돈암서원』, 예맥, 2012, 49쪽.

에서는 평상시 원생의 복장으로 笠子 또는 冠巾에 直領을 착용하도록 규정하였다.[52] 그리고 현재 서인계 서원의 享祀服은 매우 다양하여 국가의례의 제례복, 유생복 등을 착용하였다. 일제강점기를 거쳐 현대에 들어와 전통적인 복식을 착용하지 않게 되면서 생겨난 현상으로 보인다.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 진설하는 제물은 각 지역별로 차이가 있다.[53] 먼저, 경기도 지역 서원의 祭物이 서로 다름을 알 수 있었다. 그리고 또 하나의 특징은 향교에서 사용하는 刑鹽이 심곡·우저·파산서원의 제물로 사용되며, 이때 籩豆의 수가 상응하지 않는 것을 볼 수 있다. 그리고 犧牲은 대부분 豕腥을 사용하나, 2가지 이상 사용하는 서원이 있었다. 우저서원에서는 양성[羔]과 시성을 올렸고, 파산서원에서는 豕腥과 함께 鷄炙을 올리고 있어 주목된다.

그리고 서인계 서원 중 경기도 지역의 우저서원은 서원이 건립되던 시기 김포 군수인 楊顯望에 의해 문묘에서 사용하는 제물을 따라서 8변 8두를 사용하였다. 우저서원은 鄕飮酒禮를 거행하는 곳이었다. 1727년(영조 3)에 우저서원에서 시행된 향음주례에는 姜奎煥(1697~1731)과 沈潮(1694~1756)가 참석하였다.[54] 1728(영조 4)에는 玄尙璧(1673~1731)이 작성한 「牛渚書院鄕飮酒禮詩序」가 있어, 서원에서 주기적으로 향음주례가 시행되었던 사실을 확인할 수 있다.[55] 이를 보면 우저서원은 김포에서

51『栗谷全書』卷15, 雜著, 「文憲書院學規」. "一. 常時, 恒整衣服冠帶. 拱手危坐. 如對尊長. 毋得以褻服自便【必著直領】 且不得著華美近奢之服. 凡几案書冊筆硯之具. 皆整置其所. 毋或亂置不整. 作字必楷正. 毋得書于窓戶壁上."

52『栗谷全書』卷15, 「隱屛精舍學規」. "一. 平明時, 皆以常服【笠子直領或冠巾直領之類. 但不用襦挾直領】."

53 서인계 서원에서 진설하는 제물은 본문의 가독성을 위하여 <부표 2>로 수록하였다. 경기도·충청도·전라도 지역의 서인계 서원의 제물을 부표로 정리하였고, 황해도 지역의 서인계 서원의 제물은 현재 알 수 없다.

54『賁需齋先生文集』卷5, 跋, 「金陵鄕飮酒禮儀跋」;『靜坐窩先生集』卷1, 詩, 「牛渚書院, 設鄕飮酒禮.【丁未】」.

55『冠峯先生遺稿』卷10, 序, 「牛渚書院鄕飮酒禮詩序【牛渚, 在金浦, 卽趙重峯俎豆之所也. ○戊申.】」.

문묘와 같은 위상을 가져서 지방 사족 사회의 중심적인 행사인 향음주례까지 진행하였던 곳임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문묘와 서원의 위상에 대한 차이를 명확히 하려는 움직임이 있었다.

1750년(영조 26)에 沈潮(1694~1756)는 우저서원의 제물의 수에 대한 문제를 제기하여 4변 4두로 축소하였다. 심조는 佾舞의 숫자가 천자는 8, 제후는 6, 대부는 4인 것을 이야기하고, 이러한 이유로 서원은 4로 규정하였다. 그리고 夷齊廟에서 시행되는 儀節을 예로 들어 문묘는 8, 賢祀 4, 제후인 백이·숙제는 6이라는 논리를 보강하였다.[56] 즉, 18세기 중엽의 우저서원은 기존에 문묘에 상응하는 위상을 僭濫하다고 평가하여, 본래의 위상으로 재설정된 것이다. 이때 佾舞의 숫자를 근거하여 서원의 변두를 규정한 것에 의미가 있다.[57] 이러한 부분은 서인계에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문묘의 석전의례에 준하여 시행하려 하였음을 보여준다. 남인계 서원에서 16세기에 이미 서원의 향사와 문묘의 향사에 차등을 두었던 것과 대비되는 양상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56『靜坐窩先生集』卷12, 雜著,「牛渚書院春秋享籩豆釐正議」. "牛渚書院春秋享, 自前用八籩八豆. 而聞諸先輩長老, 當初奉安時, 本倅楊顯望, 一依五聖位籩豆而定式曰, 從厚無妨, 仍爲謬規云云. 愚謂此非尋常謬規也, 直是僭禮也, 甚矣楊之無識. 先生有靈, 必瑟縮不安於受享矣. 今旣曉得, 則斯速正之, 有何遲疑, 或者以寧失於厚言之, 此大不然. 寧失於厚四字, 自有用處, 此處用不得矣. 盖行之已久, 苟無嫌於僭, 仍舊何妨, 而其於僭, 何獨不聞曾子愛人以德之語乎. 佾舞之數, 天子八, 諸侯六, 大夫四. 而范氏論季氏之八佾曰, 自上而下, 降殺以兩而已, 兩之外, 不可毫髮僭差也. 愚亦曰, 籩豆之數, 聖廟八, 書院四, 四之外, 不可一箇僭加也. 一國通行, 而此院獨如此, 此實吾鄕章甫之所羞, 而不可使聞於他院也. 南溪答人論夷齊廟儀節曰, 籩豆則文宣用八籩八豆, 賢祀用四籩四豆. 今夷齊以爵則侯, 以德則聖, 似與邦賢少異, 恐當用六數. 其後答安生玠書曰, 獻爵籩豆, 據禮皆用祀賢常例云云, 夫以夷齊之聖焉. 而猶不敢用文廟之禮, 始欲小異於邦賢, 畢竟以用四爲是. 況以我東之賢, 而抗禮於文廟乎. 此不待兩言而決矣."

57 18세기 우저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많은 변화가 있었다. 본문에서 살펴본 제물의 대대적인 축소 이외에 축문도 改撰하였다. 우저서원의 축문은 건립 초기의 원장인 이경석의 축문을 사용하다가 그가 삼전도비문을 쓴 사건이 춘추절의에 위배되어 1752년(영조 28)부터 새로 개찬한 축문을 사용하였다.

다음은 충청도·전라도 지역의 서원에서 향사의례의 제물이 가지는 특징이다. 충청도 지역의 서인계 서원인 노강서원와 돈암서원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 동일한 祭物을 진설하였다. 앞서 두 서원의 향사일도 서로 겹치는 것을 우려하여 조정한 것에서도 볼 수 있듯이 충청도 논산지역의 지식인들은 두 서원을 조화롭게 운영하고자 하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전라도 지역의 서인계 서원인 무성서원은 제물이 가지는 특징은 경기도 지역의 서인계 서원에서 볼 수 있는 刑鹽을 祭物로 사용하며, 이때 籩豆의 수가 상응하지 않는다는 것이다. 그리고 犧牲은 豕腥을 사용하였다. 또한 충청도 지역과 전라도 지역의 서원 제물에서 나타나는 특징 중 하는 정위와 배위의 차이였다. 현재 충청도 돈암서원에서는 豕腥 또는 羔腥을 犧牲으로 사용했는데, 정위에 右胖을 진설하고 배위에 左胖을 진설하였다. 현재 돈암서원에서는 正位에는 돼지머리를 올리고 配位에는 돼지고기를 사용하였다.[58] 폐백은 돈암서원에서는 幣로 苧布 1丈 8尺을 사용하는데, 없으면 白布와 白綿布로 대신하였다. 이때 造禮器尺을 기준으로 하였다.[59] 필암서원에서는'幣布는 모두 29尺인데, 正位에 18尺, 배위에 11尺이다.'[60]는 규정이 있어 폐비를 사용할 때 정위와 배위에 차등이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무성서원에서는 幣로 帛 52尺 5寸을 사용하였다. 그리고 폐백으로는 모시[苧布]를 사용했으나, 현재 면포나 한지 대용하고 있다.

3. 의식절차

삭망분향례는 매월 초하루와 보름에 거행되는 의례로 서인계와 남인계 서원에서 공통적으로 시행하는 의식이었다. 하지만 황해도 지역의 서원과 경상도 지역의 서원은 참여 인원이 착용하는 복장이 달랐다. 이이는

58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서원향사-노강서원·돈암서원』, 예맥, 2012, 264쪽.
59『遯巖書院誌』「春秋享祀儀節」.
60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서원향사-무성서원·필암서원』, 예맥, 2013, p.262.

문헌서원의 원생에게 頭巾, 團領을 착용하게 하였다.[61] 또한 이이는 벼슬이 있는 사람은 紗帽, 團領, 品帶를 착용하게 하였다.[62] 서인계 지역에서 시행한 삭망분향례의 제관이 착용하는 복장은 이이가 제정한 황해도지역 서원의 규정을 따르는 지역이 많았다. 경기도의 자운서원,[63] 충청도의 노강서원, 전라도의 무성서원은 이이의 규정을 준용하였다. 또한 展謁에 입는 복장과 常服은 구별되었는데, 이 역시도 이이의 규정을 준수하는 서원이 많았다. 경기도 자운서원, 심곡서원, 충청도의 노강서원이 그러하였다. 이 서원들은 기호학파의 명맥을 계승한 서원으로 이이가 제정한 서원의 규정을 이어갔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삭망분향례를 행하면서 그 의식절차의 하나로 講會를 진행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심곡서원은 매월 초하룻날 焚香한 후 掌議와 直月, 齋에 거주하는 儒生은 講會를 가졌다. 이때 벽에 걸린 글들을 먼저 읽는데, 1명이 聲讀하면 여러 유생들은 그것을 들었다.[64] 노강서원은 삭망분향례를 할 때 상읍례를 한 후 당에서 學規를 읽은 후 경서를 읽는데, 『小學』, 『家禮』, 『心經』, 『近思錄』, 四書, 六經 등을 읽는다.[65] 파산서원에서도 향사 중에 講長과 執禮가 강당에 올라가 齋에 거주하는 여러

61 『栗谷全書』 卷15, 雜著, 「文憲書院學規」. “一. 每月朔望, 諸生具巾【頭巾】袍【團領】詣廟. 開中門, 焚香【年最長者焚香】, 再拜. 雖非朔望, 諸生若自他處初到, 或自院歸家時, 必於廟庭再拜【不開中門, 不焚香.】.”

62 『栗谷全書』 卷15, 雜著, 「隱屛精舍學規」. “一. 每月朔望, 師弟子皆以官服.【有官則紗帽團領品帶, 儒生頭巾團領條帶.】 詣廟開中門, 出廟貌, 再拜. 焚香. 【師若不在, 則齋中年長者焚香.】又再拜【敍立位次, 則師居前行, 弟子爲後行西上.】.”

63 『南溪集』 續集 卷19, 雜著, 「紫雲書院院規【癸酉七月】」. “一. 每月朔望, 諸生具巾【頭巾】袍【團領】 詣廟. 開中門, 焚香【年最長者焚香】, 再拜. 雖非朔望, 諸生若自他處初到, 或自院歸家時, 必於廟庭再拜【不開中門不焚香】.”

64 『陶菴集』 卷25, 雜著, 「深谷書院學規」. “每月朔日焚香後, 掌議與直月, 與居齋儒生設講. 錄中之人, 雖不能常時居齋, 亦可趁期來會. 講時先讀壁上所揭諸書, 一人抗聲讀之, 諸生竦然聽之.”

65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노강서원·돈암서원』, 예맥, 2012, 125~126쪽.

유생과 四書 중 하나의 대문을 面講하였다.[66] 이러한 강회는 서인계 서원에서 주로 시행되었고, 경상도 지역에 건립된 서인계 서원인 興巖書院에서는 東西唱을 시행하였던 기록이 있어 주목된다.

1694년(숙종 20) 갑술환국 후 집권한 노론정권은 영남에서 자파 세력 부식을 위해 노론계 서원 건립을 적극 추진했는데, 그 대표적인 서원이 同春堂 宋浚吉(1606~1672)을 독향한 상주목의 흥암서원이다.[67] 흥암서원의 「敦事節目」이 남아 있어, 삭망분향의 東西唱이 이루어진 것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돈사절목」을 작성한 宋來熙(1791~1867)는 송준길의 7세손으로서, 陶菴 李縡(1680~ 1746)의 학통을 이은 李直輔(1738~1811)의 문인이다. 송내희는 흥암서원의 쇠락해지는 것을 염려하며, 절약에 힘써 '춘추향례나 每朔의 분향의 비용지출의 기록은 반드시 本邑 別任과 齋員이 같이 해야하며, 행사 후에는 당일에 함께 모여 기록을 수정해서 돌려보아 재원이 남용하는 일이 없게 할 것. 삭망분향은 서원의 힘을 줄어 근간에 東西唱을 폐지했는데, 막중한 사액서원의 체면이 이상하니 8명의 執事가 교대로 거행하되 서원 本所에서 다루도록 할 것.' 등을 강조하였다.[68] 이를 보면 송내희는 이전의 흥암서원에서는 삭망분향례를 시행할 때 동서창을 시행하다가 여력이 부족하여 폐지했으나, 다시 거행할 것을 주장하였다.

경기도 지역의 深谷書院과 전라도 지역의 筆巖書院에서는 향사일에 講會를 의식절차에 포함하였다. 심곡서원에서는 '춘추 향사 때에 재사에 들어올 제생은 먼저 제사의 의례를 익히고 그 다음 퇴계 이황선생이 지은 행장과 율곡 이이선생이 지은 지문을 읽어둔다.'[69]는 규정이 있어 주목

66 『果齋先生集』 卷5, 「雜著·坡山書院齋規」. "一. 祭享中日, 講長與執禮升講堂, 會入齋諸生, 以四書中一大文面講事."

67 채광수, 『18세기 영남지역 노론계 서원 연구』, 영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9, 61쪽.

68 興忠保存委員會, 『興巖書院誌』, 「敦事節目」, 대진사, 2006, 127~143쪽.

69 『陶菴集』 卷25, 雜著, 「深谷書院學規」. "春秋享祀時, 入齊諸生 先爲習祭儀, 次讀退溪先生所撰行狀, 或栗谷先生所撰誌文."

된다. 이재가 작성한 「深谷書院學規」는 경기도 지역의 忠烈書院에서도 같은 節目을 사용하였다.[70] 또한 이재는 道基書院, 龍仁鄕塾, 道峯書院, 興賢書院 등 여러 서인계 서원의 學規와 운영에 참여하였는데, 이를 보면 이상의 서인계 서원에서 향사의례 후 강회를 운영했을 것으로 추측할 수 있다.

전라도 지역의 필암서원은 향사의례를 마친 후에 分胙禮도 별도로 봉행하면서, 「白鹿洞學規」를 낭독하였다. 분포례의 의식 절차는 다음과 같다. 헌관 이하 淸節堂에 차례로 좌정하면 謁者가 작은 床을 하나씩 모든 제관 앞에 놓은 胙肉을 올리면 제관은 읍을 하며 받는다. 또 贊者가 청주 한잔을 올리면 헌관 이하 다 같이 마신다. 그후 전원이 일어나서 동서로 마주하여 相揖禮를 하고, 다시 앉아 「백록동학규」를 돌아가면 읽는다.[71] 이와 더불어 전라도의 무성서원의 원규는 이이의 「隱屛精舍學規」와 金元行(1702~1772)의 「石室書院學規」를 종합한 것으로 18세기 말 이후에 작성되었을 본다.[72] 따라서 무성서원에서도 여타 서인계 서원의 예를 따라 향사의례를 지낼 때 강회가 동반되었을 가능성이 높다.

이외에 서인계 서원에서도 墓祭를 지내는 곳이 있었다. 경기도 지역의 심곡서원은 경상도 지역의 오산서원와 마찬가지로 제향 인물인 趙光祖(1482~ 1519)의 묘소 인근에 건립되었다. 따라서 墓祭를 지냈던 기록이 남아있으나, 현재는 지내지 않고 있다.[73] 그리고 현재 전라도의 무성서원은 삭망분향례를 지내지 않고 있다. 이는 현대 서원의 재정적 규모와 사용인의 문제로 많은 서원이 의례의 규모를 축소하여 시행하는 현실을 보여준다.

---

70 『陶菴集』 卷25, 雜著, 「忠烈書院學規」. "節目詳深谷院講規."
71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노강서원·돈암서원』, 예맥, 2012, 269쪽.
72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무성서원·필암서원』, 예맥, 2013, 22~23쪽.
73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심곡서원·우저서원·현절사』, 예맥, 2014.

Ⅳ. 결론

조선시대 서원을 대상으로 남인계와 서인계 서원의 享祀儀禮가 가지는 특징을 분석하였다. 주요 내용은 향사일, 제관의 복장 및 역할, 특수한 의식 절차 등으로 나누어 살펴보았다. 조선시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에서 이황과 그의 문인을 중심으로 정립되어 역사적 변천을 거치며 지역별로 변화되었다. 이황과 그 문인들은 서원의 향사의례를 문묘의 석전의례 보다는 낮으나, 일반적인 俗祭보다는 높은 위상으로 설정하였다. 그리고 서원의 享祀日을 설정하면서 국가의 석전의례와 뗄 수 없는 관계로 자리매김하게 하였다. 또한 그들은 국가의례를 참고하여 祭官, 祭物, 儀註 등의 규정을 정립하였다. 16세기 경상도 지역을 중심으로 정립된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이후 조선 전역의 서원 보급과 함께 전국적으로 실행되었다. 이이는 서원의 향사에 대한 부분보다는 강학에 중점을 두고 학규를 정비하였다. 서인계 서원은 이이의 학규를 중심으로 서원의 운영을 규정하였고, 16세기부터 현재에 이르기까지 역사적 변천과 함께 변화를 함께 겪었다. 서인계 서원은 건립 시기에 영향을 받아서 17~18세기 이후에 향사의례를 정비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남인계 서원과 서인계 서원의 향사의례는 많은 부분에서 공통점을 가지나, 그 차이점도 분명히 존재하였다. 향사일은 남인계 서원은 중월 중정일과 계월 상정일로 나뉘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중월 중정일에 시행하였으나, 현재는 많이 축소되거나 변형되었다. 제향 복장과 관련한 규정을 보면 향사의례를 행할 때는 주로 團領을 착용하였음을 알 수 있다. 남인계 서원에서 제관들은 재계를 할 때 홍단령을 착용하고, 행례를 할 때 흑단령을 착용하여 차이를 두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구분없이 흑단령을 착용하였다. 제물은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鷄醢을 사용한 점이 특징적이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문묘에서 사용하는 刑鹽이 심곡·우저·파산·무

성서원의 祭物로 사용되며, 이때 籩豆의 수가 상응하지 않는 것을 볼 수 있었다. 의식 절차는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현재까지 향사의례를 비롯하여 正謁禮, 朔望焚香禮 등 서원에서 정기적인 시행하는 의례를 축소하지 않고 운영하는 경우가 많았다. 또한 경상도 지역의 남인계 서원에서는 家禮에서 시행하는 의례들이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도 나타나는 특징이 있었다. 서인계 서원에서는 의식절차에 講會가 많이 포함된 점이 특징적이었다. 또한 시기적으로 현대에 복원된 서원의 향사의례에서는 향교의 문묘에서 시행되는 석전의례의 영향을 여러 부분에서 살펴볼 수 있었다. 이상과 같이 남인계와 서인계 서원에서 시행한 향사의례를 분석한 결과로 두 세력간에서 일정한 차이점을 가졌다는 사실을 확인하였다. 이는 기존의 개별 서원의 사례연구에서 한걸음 진전되어 계열별 서원간의 공통점과 차이점을 확인하였다는 점에서 의미가 있다. 향후 보다 많은 사례를 추가적으로 분석하고, 이를 시대적 구분을 통해 세밀히 나눈다면 조선시대 향사의례의 역사적 변천과 학파별 변화를 명확히 살필 수 있으리라 기대한다.

*부표

<부표 1> 鄕校와 남인계 書院의 祭物 비교표

	祭需	鄕校	白雲洞	濫溪	迎鳳	臨皐	道東	玉山	陶山	吳山	屛山
籩豆	刑鹽	○									
	漁鱐	○		○	○	○	○	○	○	○	○
	乾棗	○	○	○	○	○	○	○	○	○	○
	栗黃	○	○	○	○	○	○	○		○	○
	榛子	○			○				○		
	菱仁	○									
	芡仁	○									
	鹿脯	○	○	○	○	○	○	○	○	○	○
	韭菹	○	○		○	○			○	○	○
	醢醢	○									
	菁菹	○	○	○	○	○	○	○	○	○	○
	鹿醢	○		○		○	○	○	○	○	○
	芹菹	○		○			○	○			
	兎醢	○			○						
	筍菹	○		○	○						
	魚醢	○	○		○	○	○	○	○	○	○
	蜜果		○								
	栢子		○		○						
	乾雉				○						
腥	羊腥	○							*		
	豕腥	○	*	○			○	○	*		○
	雞腥		○		○	○			○	○	
簠簋	稻	○	○		○	○	○	○	○		○
	粱	○	○	○	○	○			*		
	黍	○	○	○	○	○	○	○	○	○	○
	稷	○	○		○	○			*		
酒	明水	○		○							
	醴齊	○									
	明水	○									
	盎齊	○									
	玄酒	○									
	淸酒	○	○	法酒	○	○	○	○	○	○	○

	計	八籩 八豆 二腥 二簠 二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二簠 二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六籩 六豆 一腥 二簠 二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二簠 二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부표 2> 鄕校와 서인계 書院의 祭需 비교표

	祭需	鄕校	深谷	牛渚	紫雲	坡山	魯岡	遯巖	武城	筆巖
籩豆	刑鹽	○	○	硎鹽		○			○	
	漁鱐	○			○				石魚	○
	乾棗	○		○	○	○			○	
	栗黃	○	○	○	○	○	○	○	○	○
	榛子	○								
	菱仁	○	○				○	○		○
	芡仁	○								
	鹿脯	○	脯籩	○	○	○	○	○	○	○
	韭菹	○	○		○	○	○	○		
	醓醢	○			○					
	菁菹	○	○	○	○	○	○	○	○	○
	鹿醢	○	醢豆	○			○	○	○	○
	芹菹	○		○		○			○	○
	兎醢	○								
	筍菹	○				○				
	魚醢	○		○	○	○			○	○
	乾柿			○						
腥	羊腥	○		○			○	○	○	○
	豕腥	○	○	○	○	○	○	○	○	○
	雞腥					鷄炙				
簠簋	稻	○	○	○	○	○	○	○		
	粱	○	○		○				○	○
	黍	○		○		○				
	稷	○								
酒	明水	○							醴酒	
	醴齊	○								
	明水	○								
	盎齊	○								
	玄酒	○					○	○		祭酒
	淸酒	○	○	○	○	○	○	○	○	○

	計	八籩 八豆 二腥 二簠 二簋	三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五豆 二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五豆 二腥 一簠 一簋	三籩 三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三籩 三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五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四籩 四豆 一腥 一簠 一簋

【참고문헌】

1. 사료

『高麗史』, 『國朝五禮儀』, 『國朝五禮儀序例』
『魯岡書院誌』, 「(魯岡書院)齋規」, 「(魯岡書院)學規」, 「魯岡書院儀節」, 「濫溪書院儀節」, 『遯巖書院誌』, 『武城書院誌』, 『(武城書院)院規』, 「文憲書院學規」(『栗谷全書』, 『深谷書院誌』, 「安文成公春秋大享圖」, 『迎鳳志』, 『吳山志』, 「牛渚書院笏記」, 「隱屛精舍學規」(『栗谷全書』), 『臨皐書院凡規』, 『竹溪志』, 「坡山書院齋規」, 『筆巖書院誌』, 『興巖書院事實錄』, 『南溪集』, 『陶菴集』, 『果齋集』, 『貢需齋集』, 『冠峯遺稿』, 『靜坐窩集』

2. 연구논저

1) 단행본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古文書集成－濫溪書院篇－』 24, 1999.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남계서원·도동서원』, 예맥, 2013.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노강서원·돈암서원』, 예맥, 2012.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무성서원·필암서원』, 예맥, 2013.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병산서원·옥산서원』, 예맥, 2012.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소수서원·도산서원』, 예맥, 2011.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심곡서원·우저서원·현절사』, 예맥, 2014.
국립문화재연구소, 『서원향사－자운서원·파산서원』, 예맥, 2014.

2) 논문

김미영, 「서원 향사의 변화와 사회문화적 의미－도산서원 사례를 중심으로」, 『국학연구』 22, 한국국학진흥원, 2013.
박종배, 「조선시대 문묘 향사 위차의 특징과 그 교육적 시사－명청시기 중국과의 비교를 중심으로」, 『한국교육사학』 34-3, 한국교육사학회.
설석규, 「謙庵 柳雲龍의 學問과 現實對應 자세」, 『동방한문학』 20, 동방한문학회, 2001.

윤숙경,「鄕校와 書院의 祭禮에 따른 祭需에 관한 연구」,『韓國食生活文化學會誌』13, 한국식생활문화학회, 1998.
윤희면,「朝鮮時代 書院 祭禮와 位次」,『진단학보』90, 진단학회, 2000.
임근실,「柳雲龍의『吳山志』편찬 의도」,『한국서원학보』2, 한국서원학회, 2013.
장동우,「『家禮』註釋書를 통해 본 朝鮮 禮學의 發展過程」,『東洋哲學』43, 동양철학회, 2010.
최순권,「道東書院 祭享儀禮의 特徵」,『한국서원학보』2, 한국서원학회, 2013.
채광수,『18세기 영남지역 노론계 서원 연구』, 영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9.
한재훈,「조선시대 서원향사례 비교연구－9대서원 향사의절을 중심으로－」,『퇴계학논집』20, 영남퇴계학연구원, 2017.
한재훈,「退溪의 書院享祀禮 定礎에 대한 考察－白雲洞書院 享祀禮 修正을 중심으로」,『퇴계학과 유교문화』53, 경북대학교 퇴계학연구소, 2013.

Abstract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 of Sacrificial rite in Seowon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 A Study on the Seowon of Namin-line and Seoin-line -

Lim, Geun-Sil*

We looked at the characteristics of ancestral rites at Seo-won in the Joseon Dynasty. The main contents were analyzed by dividing them into ritual days, attendants, sacrifices, and ritual procedures. The characteristics rites of the Seo-won of the Joseon Dynasty were established by Yi-Hwang(李滉) and his disciples in Gyeongsang-do, in the 16th century, and the foundation was laid around Yi-Yi(李珥) in Hwanghae-do. Later, the ritual ceremonies of incense were changed by region through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rituals were implemented in the Seo-won of the two regions. Yi-Hwang and his disciples organized the memorial service for the Seo-won, which was a war criminal of Namin-line(南人系) Seowon in Gyeongsang-do. In addition, the rite, which can be seen in the Seowon-related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by Yi-Yi, was spread around Seoin-line Seowon in Gyeonggi-do, Chungcheong-do, and Jeolla-do.

The ritual days of Seo-won were the second Jungday of the second month(仲月 中丁日) and the first Jungday of the third month(季月 上丁

* Ph.D. Department of History Dankook University / coll1123@naver.com

日) in Namin-line Seowon, and second Jungday of the second month in Seoin-line Seowon. In Namin-line Seowon, Hong-Danryeung(紅團領) clothing was worn during the ceremony(齋戒) and Heuk-Danryeung(黑團領) clothes were worn at the ceremony(行禮), making a difference. At the Seoyeon-line Seowon, they wore Heuk-Danryeung clothes during ceremonies. In Namin-line Seowon, it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use of chickens(鷄腥) at the sacrifice of ancestral rites. At the Seoin-line Seowon, the number of Byeondus(籩豆) did not match because Hyungyeom(形鹽) was used as a ritual.

In Namin-line Seowon, ceremonial procedures have often been carried out without reducing regular ceremonies at seowon, including ancestral rites, the first day of January ceremonies(正謁禮), and the first day and the fifteenth day ceremonies(朔望禮). In addition, ceremonies conducted by the family(家禮) in Namin-line Seowon in Gyeongsang-do were also shown in the Confucian rites of the seowon. Seo-line Seowon was characterized by the fact that Ganghye(講會) were included in the ritual process. In addition, the Sacrificial rite of Seo-won, which were restored in modern times, were able to examine the influence of the Seokjeon rite(釋奠儀禮), which was implemented at the local Confucian school's Munmyo Shrine(文廟).

Key word : Sacrificial rite of Seo-won(享祀儀禮), Namin-line(南人系), Seoin-line(西人系), ritual days of Seo-won(享祀日), sacrifices, ritual procedures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30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 기획논문 2 : 세계문화유산 옥산서원의 인문·자연경관과 위상

▣ 朱子书院文化与韩国书院的发展

▣ 理学背景下武夷精舍与玉山书院周边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
- 以中国武夷九曲和韩国玉山九曲为中心

▣ 조선시대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위상 변화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4 91

朱子书院文化与韩国书院的发展*

张品端**

Ⅰ. 序論
Ⅱ. 本論
　一· 朱子书院文化为韩国书院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
　二· 韩国书院文化的发展

【국문초록】

본 논문은 朱子書院文化가 조선시기 서원에 어떻게 영향을 끼쳤고, 이 영향을 받은 조선시기 서원들이 이를 토대로 어떻게 건립되고 발전한지를 논술했다. 이를 위해 논문은 <한국 서원 건립에 사상적 근거를 제공한 주자서원문화>와 <한국 서원문화의 발전>으로 나누어 고찰했다.

1장 <한국 서원 건립에 사상적 근거를 제공한 주자서원문화>에서는 世宗 시기부터 宣祖 시기까지 서원이 설립되고 발전하는 과정을 설명했다. 세종 때는 朱子의『白鹿洞書院揭示』의 영향을 받아 서원들이 점차 세워졌다. 中宗 시기에 과거제도의 부실운영과 관학의 학생 수 급감으로 서원이 널리 세워지는 계기가 되었다. 서원이 제도화되고 독립성을 갖게 된 것은 李彦迪과 李滉 등의 노력이 있었다. 이언적은『玉山書院學規』를 이황은『白鹿洞學規集注序』와『白鹿洞規圖』를, 李珥는『隱屛精舍學規』를 만들어 서원운영을 체계화하였다. 마지막에는 19세기에서 지금까지 서원의 상황과 서원의 복구 및 서원의 역할 등을 설명했다.

2장 <한국 서원문화의 발전>에서는 주자서원문화의 영향을 받고 설립된 조선시기 서원들이 교육기관으로서 역할을 수행하고 중국 서원과 대별되는

* 본 논문은 2020년 10월 19일 경주 옥산서원에서 개최된 《2020 세계유산축전 '옥산서원' 한중국제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것을 수정·보완한 것이다.

** 武夷学院朱子学研究中心主任, 教授/dzhdzx@126.com

조선시기 서원들의 독특한 발전특징을 기술했다. 논문에서는 조선시기 서원들의 두드러진 특징으로 유가의 지식전수와 문화전승, 제사활동, 禮學의 발전과『朱子家禮』의 전파, 예학 저술의 발달, 주자를 높이는 활동 등을 꼽았다.

주제어 : 주자서원, 한국서원, 중국서원, 이황, 백록동학규집주서

Ⅰ. 序论

中国书院之名始于唐代, 清代著名学者袁枚说 : “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 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 为修书之地, 非士子肄业之所”. 实际上, 唐开元时宫廷中设有的丽正书院·集贤书院, 只是皇室编校·典藏图书的地方, 即为皇家的图书馆. 具有教育性质的书院一般说法始于五代. 周予同先生在《中国学校制度》一书中说 : “南唐升元中, 因庐山白鹿洞建学馆, ……于是含有学校性质的书院才开始出现.”到宋代, 书院成为理学家讲学传道之所, 学子研学之地. 黄以周在《儆季杂著·史说略》中论及书院时就曾说 : “书院沿及南宋, 讲学之风聿盛, 奉一人为师, 聚徒数百, 其师既没, 诸弟子群居不散, 讨论绪余.”这时, 书院发展成为一种具有读书·讲学·著书·藏书·祭祀为一体的新型教育组织.

在书院发展的历史进程中, 朱子书院文化中蕴含的兴学精神·求理精神·求实精神·开放精神·力行精神, 不仅影响中国书院文化的发展, 而且也影响近古东亚书院的发展. 13世纪, 朱子学开始向韩国传播, 朱子书院文化也随朱子学传入韩国, 在韩国发展起来.

Ⅱ. 本论

一. 朱子书院文化为韩国书院建立提供了思想资源

韩国书院建立过程受到了朱子书院文化的影响, 特别是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的影响. 如朝鲜时代李朝世宗元年(1419), 朝廷下诏"凡儒士私置书院, 教诲生徒者, 启闻褒赏."[1] 世宗二十一年(1439)九月, 又"令各官学校明立学令, 命下礼曹与成均馆议之. ……成均馆议曰：谨按朱文公淳熙间在南康请于朝, 作白鹿洞书院学规."[2] 朝廷鼓励民间办书院, 并诏令各官学效法朱子《白鹿洞书院学规》办学. 这时, 全国各地开始酝酿建立一种仿效中国书院文化以奉祀先贤与教育子弟的书院.

到了朝鲜中宗(1506－1544)时期, 科举制度混乱, 官学学生人数骤减, 这就为书院广泛建立提供了契机. 这时, 代表地方中小地主阶级利益的新兴的士林派, 开始提倡乡村教育. 他们聚徒讲学, 主张实施道德政治, 培养崇尚道德的学者, 寺庙道观办学成为了一种社会风尚. 为了扩大自己在乡村的势力, 他们在乡村活动中尝试推行乡饮酒礼, 使民众认识道德的重要性, 进而倡导文庙宗社活动. 当时, 新士林派赵光祖(1482~1519)等依靠开展文庙宗社活动, 摸索新的教育形式, 朝鲜书院的合理性开始得到了官方认可, 进而推动了朝鲜书院的建立.

中宗三十六年(1541), 朝鲜时代著名的儒家学者周世鹏(1495~1554)被朝廷任命为丰基郡守. 他于1542年在高丽名儒安珦读书的竹溪宿水寺旧址修建文成公庙, 创办兼顾儒生教育的白云洞书院, 并向国家要求赐额和支持. 随后岭南监司为保证白云洞书院的长久运营, 购入了学田和附属院落, 并在物质上·财政上给予支持. 据《中宗实录》卷95载："世鹏于之旧居为建祠宇, 春秋享之, 名曰白云洞书院, 左右有序, 以为儒生栖息之所, 储谷若干,

1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2, 首尔：琛求堂1984年版.
2 朝鲜李朝『世宗实录』卷86.

存本取利, 使郡中凡民俊秀者聚食而学焉." 《明宗实录》 卷10亦载 : "丰基白云洞书院, 黄海道观察使周世鹏所创立, 其基乃文成公安珦所居之洞, 其制度规模, 盖仿朱文公之白鹿洞也, 凡所以立学令, 置书籍田粮供给之具, 无不该尽, 可以成就人才也."周世鹏在丰基郡竹溪创办的白云洞书院, 是朝鲜书院建立的开端.

朝鲜书院的制度化和独立性格的形成, 是朝鲜著名的朱子学家李彦迪(号晦斋, 1491~1553)·李滉(号退溪, 1501~1570年)等人的努力. 1548年, 李退溪継任丰基郡守时, 公务闲暇即到白云洞书院讲学. 他自谓"滉自到郡以来于书院一事, 未尝不欲其心焉."[3] 1550年, 他依据朱熹修复白鹿洞书院的先例, 上书朝廷要求承认丰基郡白云书院为正式的教育机构, 并请求明宗皇帝为白云洞书院提匾. 据《增补文献备考·学校考》记载 : "明宗庚戌(1550年), 文纯公李滉継莅本郡, 以为教不由上则必坠废, 以书遗监司请转闻于上, 而依宋朝白鹿洞故事, 赐额颁书给田土臧获, 俾学子藏修. 监司沈通源从其言, 启闻, 赐额绍修书院, 命大提学申光汉作记, 仍颁《四书》 《五经》·《性理大全》等书, 书院赐额始此."明宗采纳了李退溪的建议, 特亲书"绍修书院"匾额. 这也是朝鲜书院得到国家认可的一大标志. 在朝鲜书院史上, 有皇帝赐额的书院叫"赐额书院".

此后, 全国各地的书院都要求赐书和赐额. 肃宗时期有书院417所, 其中131个书院得到赐书赐额, 后来这种赐额书院发展到269所, 占朝鲜书院总数的40%以上.[4] 由于有皇帝手书的金字招牌作保证, 这就大大推动了朝鲜书院的发展, 至高宗八年(1870), 书院多达679所, 几乎一县超过二所.

同时, 李退溪认为, 当时朝鲜地方官学的乡校已有"环境上的非教育性"和"教育上的非自律性"等缺点. 他想在没有科学弊端的书院实施教育活动, 认为书院的宗旨是"志于学", 是"乐育人才之地"[5], 在书院学习不是为了应付科

3 [韩]李退溪『上沈方伯』, 丁范镇 : 『增补退溪全书』(一), 首尔 : 成均馆大学校大东文化研究院1978年影印本, 第263页

4 [韩]『增补文献备考』卷210, 『学校考』, 首尔 : 高丽书籍株式会社1980年版.

5 [韩]李退溪『拟与荣川守论绍修书院事』,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338页.

举. 李退溪明确指出当时科举制乃阻碍人才的发展, “世间无限好人才尽为科举坏了”[6]. 在教学的方法上, 官学的乡校也远不如书院. 官办学校往往“徒设文具, 教方大坏, 士反以游于乡校为耻”[7]. 因此, 李退溪认为“惟有书院之教盛兴于今日, 则庶可以救学政之缺”[8]. 又因为“学校风化之源, 首善之地”[9], 因而书院必须树立正派的道德院风, “知重道义, 尚礼让, 彬彬乎习于士君子之风, 此书院之所以贵”[10].

朝鲜时代, 儒家学者借鉴中国发达的书院制度, 制定书院院规, 对书院的学习活动和运营方式都做了具体规定. 出于对朱子崇拜, 朝鲜书院把朱熹的《白鹿洞学规》作为蓝本, 制定了各种的院规, 进而加快了书院的制度化过程, 书院也开始承担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使命. 如李彦迪把朱熹的《白鹿洞书院学规》作为书院教育的基本的理论根据, 制定了《玉山书院学规》, 李退溪不仅撰写了《白鹿洞学规集注序》, 还将《白鹿洞书院学规》绘成图, 以便于学者理解. 他在《答金而精》中说 : “公亦尝闻朱先生白鹿洞规乎?滉以为欲治五病, 在此一规. 盖其为教也, 本于明伦, 而以博学·审问·慎思·明辨为穷理之要. 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 为笃行之目. 夫学问思辨而物格知至, 则理无不明, 而学术可造于精微矣. 修身主于忠信笃敬, 而补之以惩窒迁改, 则行无不笃, 而心虑不至于躁杂, 行已不至于颠倒矣. 处事以正义明道, 接物以行恕反己, 则笃行又见于事物, 而浮妄非所忧, 泛忽非所虑矣.”[11]李退溪把朱子《学规》归结为明人伦, “穷理力行, 以求行夫心法切要处”.[12] “心法”即传心养性的方法. 晚年, 李滉将《白鹿洞规图》收入《圣学十图》(第五图). 他为学一生, 身体力行, 最后由十个圣图把其思想和践履工夫揉合成一个整体, 构成他的完整思想体系. 他于68岁时向宣祖进献

6 [韩]李退溪『与甲启叔』,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284页.
7 [韩]李退溪『拟与丰基郡守论书院事』,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342页.
8 [韩]李退溪『上沈方伯』,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264页.
9 [韩]李退溪『李子粹语』卷4, 『增补退溪全书』(五), 第403页.
10 [韩]李退溪『拟与丰基郡守论书院事』,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341页.
11 [韩]李退溪『答金而精』, 『增补退溪全书』(二), 第91页.
12 [韩]李退溪『进圣学十图箚并图』, 『增补退溪全书』(一), 第205页.

《圣学十图》. 后来, 《白鹿洞规图》成为朝鲜书院所标示的人格教育的蓝本.

李退溪在创办的伊山书院时, 制订了《伊山院规》(共十二条). 该院规, 鼓励学生"立志坚固, 趋向正直, 业以远大自期, 行以显义为归者为善学", 对那些"诡经反道, 丑言辱亲, 败群不率者, 院中共议摈之", 要求"诸生常宜静处, 各斋专精读书, 非因讲究疑难, 不宜浪过他斋虚谈度日, 以致彼我荒思废业".[13] 后来, 《伊山院规》成为朝鲜书院教育史上的典范.

另一位朝鲜时代的朱子学代表人物李珥(号栗谷, 1536~1584年), 亦依据朱子《教规》的思想, 制订了《隐屏精舍学规》(共二十二条). 其第十一条规定：非圣贤之书, 性理之说, 则不得披读于斋中. 若欲作科业者, 必习于他处. 可见, 朝鲜书院非常重视性理学教育. 宣祖时期(1552－1608), 李栗谷为求教育实效, 建议朝廷实施书院院长从休官者和退官者中选拔, 并将其制度化. 可见, 朝鲜时代的书院教育在朱熹《白鹿洞书院教规》的影响下, 具有真正的人文教育价值.

在朝鲜书院教育发展史上, 朱子具有重要地位. 正如韩国学者金相根先生在《韩国书院制度之研究》中指出："自书院制度发达以后, 学者则改书院为乐园, 专心修治, 使学术独立发展. ……培育出徐敬德·李彦迪·金麟厚·李退溪·曹植·奇大升·李珥·张显光等优秀的儒学家, 而确立朝鲜儒学的体系. 尤其他们受朱学的影响最大, 对性理之论, 树立空前绝后的成绩. 故后人认此期为朝鲜儒学之黄金时代."

到了19世纪, 朝鲜时代的书院大部分由创建者的后孙经营, 书院逐步丧失了礼乐教化的功能. 1864年, 兴宣大院君在对书院的社会作用进行调查的基础上, 开始考虑是否将其撤废. 1871年, 官方为了振兴学术, 决定在全国挑选学问优秀的人物, 按照"一人一院"的原则, 保留书院47所, 其余予以撤废. 47所书院中具有代表性的书院有玉山书院·陶山书院·龙山书院.

由于历史战争破坏, 到1945年韩国光夏时书院损坏殆尽. 韩国文化部特

13 [韩]李退溪『李子粹语』卷4, 『增补退溪全书』(五), 第411页.

别出资支持修夏·重建，恢夏原貌，书院的文库藏书才得以传承了下来. 20世纪80年代，韩国开展“青少年人性教育现场教室”活动，通过对先贤的祭祀提高青少年涵养，书院的社会教育功能兴起，并承担着监察地方民风民俗的作用. 据韩国文化体育观光部2018年10月统计，韩国现存具有社会机能的书院共有581所. 书院不仅在韩国历史上，而且在现代社会对于塑造社会价值理念·淳化社会风气·践行良好民风民俗都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

二. 韩国书院文化的发展

儒家思想·知识范式和价值理念，依托书院得到传播发展. 就韩国而言，书院是儒家知识分子的集聚之地，也是儒家学者弘道的场所，发挥着社会教化功能. 读书人在书院读书讲学，从事教育活动，以儒家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根本指导思想，以君子·圣人品格为个人道德修养的最高理想.

新士林派主张发展儒学政治培养人才，振兴儒家礼乐教化，书院的教学内容主要以朱子《小学》《近思录》《朱子家礼》《四书》，以及《性理大全》《五经》为主. 朝鲜时代前期，著名的儒家学者李彦迪在制定的《玉山书院学规》中，就明确规定：“诸生读书以《四书》《五经》为本原，《小学》《家礼》为门户.”[14] 可见，韩国的书院承担着儒家文化知识传承与文化传播的使命.

朝鲜时代，书院开展的祭祀活动，表现为一种对儒家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践行，可以增强士人对于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的认同感. 书院祭祀依朱子考亭书院奉祀制度，祭祀对象颇为广泛，主要有先圣·先贤以及历代儒家大师，既有中国的先圣先贤，也有朝鲜时代的儒学大家. 朝鲜书院祭祀朱子是一种普遍现象，在当时朝鲜八个道中的七个道，有二十五所书院，皆奉祀朱子. 其中，京畿道有临漳书院；忠清道有云谷·忠贤·宗晦·道东·晦庵等书院；全罗

14 李彦迪『『玉山书院学规』』，『晦斋集』卷21，『韩国文集从刊』(第24册)，首尔：景仁文化社1996年版.

道有三川·紫阳和谷川等书院；庆尚道有新安影堂；黄海道有绍贤·白鹿洞·飞凤·龙岩·正源·鹭峰·景贤·凤冈·道东和风岩等书院；平安道有新安·朱文公等书院.[15] 据韩国学中央研究院编撰的《韩国民族大百科词典》记载, 书院祭祀朝鲜时代的大儒有安珦·郑梦周·李彦迪·李退溪和宋时烈等.

朱子礼学在高丽时期得到儒家学者的重视, 据记载："时俗丧祭, 专尚乘门法, 梦周始令士庶仿《朱子家礼》, 立家庙, 奉先礼."[16] 高丽重臣郑梦周要求人们用朱子《家礼》行冠·婚·丧·祭. 以取代佛教的仪式. 在一大批高丽官方学者的倡导下, 《朱子家礼》在高丽末得以较广泛的流传. 恭让王二年(1390), "行礼仪一依朱文公家礼, 随宜损益"[17], 高丽政府已把它作为大夫士庶人的家礼. 其后, 一般家庭的礼制便都以《朱子家礼》为标准.

朝鲜时代, 礼学得到了极大的发展和繁荣. 《朱子家礼》中的"冠·婚·丧·祭"等礼仪在全社会得到了普及. 赵光祖·金安国等新进士林, 积极倡导自治主义, 以《朱子家礼》革新社会礼俗, 以《小学》之理念为社会化. 据《李朝实录》(中宗大王十三年十一月)载, 金安国上书曰："所谓《家礼仪节》者, 皇朝大儒丘浚所删定也. 文义之脱略, 补而备之, 为《朱子家礼》之羽翼也. 亦印颁而使人讲行为当."《家礼仪节》即明代丘浚注释《朱子家礼》的一部礼学著作, 收录《性理大全》(卷4), 在朝鲜流传很广, 影响极大.

朱子被奉为先贤, 书院尊朱子的活动经久不衰, 其祭礼的规格也越来越高, 以至《朱子家礼》成为国家之大典的内容之一. 成宗二年(1471), 朝鲜《经国大典》问世. 该大典规定了李朝的社会制度·伦理道德, 规定了国朝五礼仪：吉·凶·军·宾·嘉；规定了民间礼仪：冠·婚·丧·祭.

在朝鲜时代, 儒家学者在书院撰写了大量礼学著作, 推动了韩国礼学的发展. 据首尔大学奎章阁图书馆所藏韩国本《综合目录礼类》记载, 韩国学者对《朱子家礼》进行新诠释, 出现有曹好益《家礼考证》·李瀷《家礼疾

15 韩国『增补文献备考』卷210, 『学校考』.
16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3, 『列传』, 朝鲜科学院古籍出版社1957年版.
17 [韩]郑麟趾『高丽史』卷63, 『大夫士庶人祭礼』.

书》·丁若鏞《丧礼四笺》等100多部礼学著作. 此外, 还有《朝鲜儒学史》等书收录的, 散藏于韩国其他各地图书馆及民间者, 就更多了. 可见, 朱子文化通过书院的传播深度和广度增加, 朝鲜时代社会形成了崇拜朱子文化的社会风气.

朱子书院文化不仅在中国书院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且在朱子学传播方面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全面了解韩国书院的发展过程·社会功能及历史地位, 有益于我们更准确地把握朱子书院文化在韩国传播发展的情况, 有益于推动中韩两国文化的交流.

【參考文獻】

朝鲜李朝 《世宗实录》, [韩]李退溪 《上沈方伯》 《增补退溪全书》,
[韩]李退溪 《增补退溪全书》 《拟与荣川守论绍修书院事》, 《与甲启叔》,
[韩]郑麟趾《高丽史》
[韩] 《增补文献备考》, 《学校考》,
李彦迪《《玉山书院学规》 《晦斋集》, [韩]郑麟趾《高丽史》
丁若鏞 《丧礼四笺》, 李瀷 《家礼疾书》, 韩国学者对《朱子家礼》,
朝鲜《经国大典》
出现有曹好益《家礼考证》

Abstract

The Culture of Zhu-xi's Seow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eowon

jang, pin-dan*

This study states that how Zhu Xi's Seowon(Shuyuan) culture affected Seowons in Joseon and how Seowons in Joseon were established and developed with the influences. For this, the study reviews both <Zhu Xi's Shuyuan culture offering intellectual ba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Korean Seowons> and <Development of Korean Seowon culture>.

Chapter 1 <Zhu Xi's Shuyuan culture offering intellectual base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Korean Seowons> explains the process of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Seowons at the time between King Sejong and King Seonjo. In the era of King Sejong, with the influences of Zhu Xi's ≪A Note on Bailudong-Shuyuan≫(≪白鹿洞書院揭示≫), Seowons had been established. Because of bad management in civil examinations and dramatic decrease in students in the governmental school in the era of King Jungjong, Seowons were widely established. The systematization and independence of Seowons came from efforts of Yi Eon-jeok and Yi Hwang. Yi Eon-jeok wrote ≪Educational Regulation of Oksan Seowon≫, Yi Hwang wrote ≪Bailudong Educational Regulation Commentaries≫(≪白鹿洞學規集注序≫) and ≪Bailudong Regulation

* Director, Zhu Zi Research Centre, Wuyi Academy / zhuzixue001@163.com

Schemes≫(≪白鹿洞規圖≫) and Yi Yi wrote ≪Educational Regulation on Eunbyeongjungsa≫(≪白鹿洞規圖≫), respectively, systemizing Seowon operation. In final part, the situations of Seowons from the 19th Century to present, and its restoration and roles are explained.

Chapter 2 <Development of Korean Seowon culture> describes that the Seowons in Joseon Era, which had been established under the Zhu Xi's Shuyuan culture's influences, played a role of educational institutes and its uniqueness in development, contrasting to the Chinese Shuyuans. In the study,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Seowons in Joseon include transiting Confucian knowledge and inheriting culture, sacrifice activities, development of Yehak(禮學), spreading <<Chu-tzu Cha-li>>(≪朱子家禮≫), development of writing Yehak(禮學), and praising Zhu Xi, etc.

Key word : Keywords: Seowon dedicated to Zhu Xi, Korean Seo-won, Chinese Shuyuan, Yi Hwang, Bailudong Educational Regulation Commentaries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8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5 103

理学背景下武夷精舍与玉山书院周边的“人居环境”比较研究*

－以中国武夷九曲和韩国玉山九曲为中心

彭 鸿 绪**

Ⅰ. 绪言, 韩国书院外的人居环境
Ⅱ. 背景, 韩国九曲园林与中国的背景渊源；
Ⅲ. 考察, 韩国九曲园林的空间分布
Ⅳ. 研究与考察, 中韩九曲园林的比较 - 武夷九曲与玉山九曲为例 -
Ⅴ. 研究总结与发展建议

【국문초록】

본 논문은 중국 武夷山 武夷精舍와 玉山書院 주변의 '人居環境'을 武夷九曲과 玉山書院九曲을 중심으로 비교한 논문이다. 본 논문은 총 5장으로 이뤄져있으며 중국 九曲園林과 한국구곡원림의 연원관계, 한중 구곡원림의 공간분포, 한중 구곡원림의 비교로 기술되어있고, 마지막에는 결론 부분과 옥산구곡서원의 발전방향에 대한 조언이 담겨있다.

1장 <한국 서원 밖의 인거환경>에서는 중국에서 九曲이 설정되는 배경을 설명하고, 조선시기 서원들이 서원 밖의 '인거환경'이 주자의 무이구곡을 모방하게 된 역사적 배경을 설명했다.

2장 <한국의 구곡원림과 중국의 배경연원>에서는 조선시기 유학자들의 朱子 숭배와 당쟁에 대한 회의로 산수자연을 이상향으로 간주하면서 구곡원림이 설정되었다는 점과 구곡의 造型상의 특징을 기술했다. 또한 무이산 하천

* 본 논문은 2020년 10월 19일 경주 옥산서원에서 개최된《2020 세계유산축전 '옥산서원' 한중국제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것을 수정·보완한 것이다.

** 福州大学建筑与城乡规划学院/教授/ penghongxu@naver.com

과 한국의 하천에서 나타나는 특징을 언급하고 구곡이 들어선 입지를 설명했다.

3장 <한국 구곡원림의 공간분포>에는 전국에 분포된 구곡을 지역별로 통계를 내고, 구곡이 집중된 지역의 지리적 특성과 역사적 연원을 설명했다. 아울러 일제강점기에서 현재까지 설정된 구곡도 설명했다.

4장 <한중 구곡원림 비교>는 무이구곡과 옥산구곡의 특징을 각각 기술하고, 이를 토대로 두 곳을 비교했다. 이곳에서는 지형과 지질, 구곡의 설정자와 후대 학자, 문화와 사상, 시화와 석각, 경관 구성, 경의의 부여 등 여러 방면으로 나눠 상세하게 설명했다.

5장 <연구 정리와 발전 건의>는 이상의 연구를 정리하고 옥산서원과 옥산구곡이 갖는 현대적인 의미를 설명하고, 옥산서원과 옥산구곡을 더욱 발전시킬 수 있는 방안에 대해서 몇 가지 조언을 했다.

주제어 : 무이정사, 옥산서원, 구곡원림, 주자, 옥산구곡

Ⅰ. 绪言, 韩国书院外的人居环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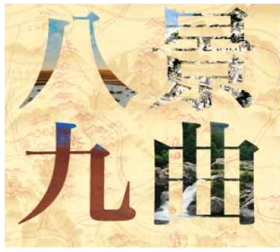
由于朱子在武夷山隐居期间于武夷精舍下的九曲溪中, 经营[1] 了武夷九曲. 其德行和其创作的《武夷棹歌》, 在朝鲜士林们的治学生活中开始流行起来, 成为先导. 朝鲜时期的儒林学子不只追崇朱子的思想境界, 还致力于对其治学(书院)周边的"人居环境"进行模仿. 于是, 韩国书院传统人居环境便植入了"九曲文化"的基因.

在朝鲜时期, 出于对朱子幽居讲道这一行为的崇敬, 朝鲜半岛的儒林学子掀起了模仿风潮, 这使得半岛本土的九曲文化得到独特的发展. 朝鲜时期, 在半岛上犹如火花般蔓延的九曲文化是士林们对"桃花源仙境的希求"和"对朱子崇慕"的反映, 且是表现朝鲜士林思想世界观的现实实践表现.

1 营造"九曲溪"周边的山水, 对其自然赋予人文思想的意义.



1.朱子相(朝鲜时期)



2.园林分类



3.景观类别分析图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九曲文化中的九曲园林；

八景和九曲是中韩日3国 “人居景观文化”的核心话题. 自然山水结合文化景观复合创建的‘九曲园林’是‘山水庭苑’的重要代表, 可以作为代表地域的观光资源, 且具有可视化的观光开发价值.

一般九曲设定在拥有美丽自然景观的溪谷与河川中. 九曲设定者或者营造者, 以儒家美学的精神反映在文化景观中；而九曲文化的核心之一“九曲园林”的原始理念是来自于中国武夷山下朱子经营的武夷九曲, 这条长约9.5km的溪流, 四周山石环绕, 仰首可见凿于岩壁上的诗词歌赋, 体现了自然美与人文美的统一, 泛舟其上, 青山绿水, 诗意盎然, 飘飘乎若临仙境. 这使得武夷九曲成为朝鲜时期士大夫们的自然理想圣地, 同时也成为寄托现实理想的“乌托邦”.

朝鲜九曲文化是士林们生活中追求朱子学的实践表现,九曲文化不仅促进了士林们的日常交流, 还使他们对“天人合一”的境界有了更切身的体会. 九曲与精舍的结合, 促进了山水游赏和读书讲学兼备的园林文化, 增强了对美的感知, 使士林们有了更为自觉的对自然山水的审美意识, 并掀起了绘制《九曲图》等山水画的风潮, 性理学的理想乡(乌托邦)终于得以振作和推广. 通过九曲诗歌的创作, 使特定的区域空间的美化成为规范化, 九曲与书院·精舍等一起, 是理解韩国儒生文化的独特混合文化遗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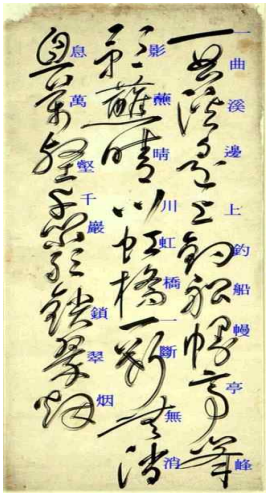
4.韩国版武夷九曲图

Ⅱ. 背景, 韩国九曲园林与中国的背景渊源；

1. 朝鲜时期儒学者对的朱子尊崇

16世纪以后, 朝鲜中·后期, 朱子的思想不仅得到了儒学者们的接纳和大力传扬, 其生活方式还被广为推崇, 这种场所性的实践表现为"九曲文化"－武夷九曲歌的次曲, 新九曲诗·九曲画的创作, 以及九曲园林的兴建.

朱子性理学完善了原始传统儒学形而上学的理论体系, 且"九曲大多是以自己隐居地为中心设定"体现了性理学的世界观. 士林们转入到山水景胜优秀的地方, 建精舍, 设九曲, 藏修道学[2], 并在此保持游息.



5. 武夷九曲歌中第2首
(宝物第1671号, 韩国
国立中央博物馆收藏
童土 尹舜举)

士林们在山川秀丽的地方经营九曲, 如栗谷的高山九曲·退溪的陶山九曲·尤庵的华阳九曲等. 他们崇尚朱子, 同时对党争产生怀疑, 所以这里作为实现憧憬的地方,

2 这里的道学：指传到韩国的朱子理学－"性理学"

作为朝鲜时代有识之士的理想乡.

对朝鲜书生们来说, 朱子对武夷九曲的命名设定与经营体现了最理想的生活, 他们掀起的九曲文化风潮, 既是一种文化现况, 同时也是对朱子尊崇的表现.



6.孔子



7.朱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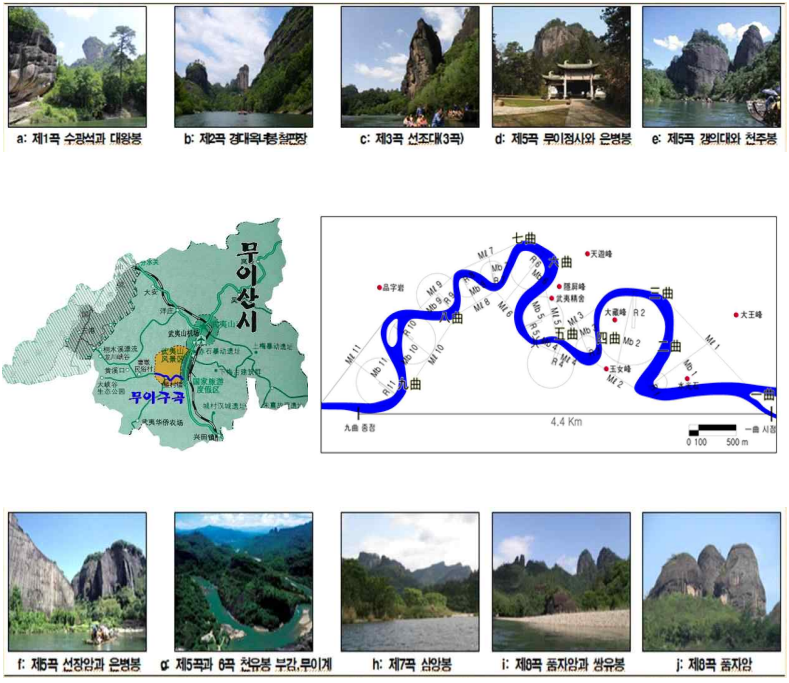
8.太极图

2. 九曲的造型特点, 弯曲的造型美学和水石曲

曲是水之谷的意味, 水从直流经过河道到各个方向, 有着高低变化·曲直急缓. 且武夷山有三十六座山峰, 四座溪谷, 十一个山谷, 构成了十分有利的曲谷, Jean-Charles Jambon(2005)"曲(chants)或谷(bend)·土地-景观(pays- paysags)的观念相通与人和自然的形成分离的统和观点认识表现了'场所-空间'的概念. 源于武夷九曲的朝鲜九曲既是象征韩国人乌托邦的地方, 也是感知作为形态和美学的根据地.

武夷山山水绮丽·地貌多样, 在5曲和6曲之间, 随着行进中不断变换的河川曲折, 风景曼妙, 令人不禁“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言之不足故嗟叹之, 嗟叹不足古咏歌之……”, 由是, “棹歌”便作. 具有这种立地文本性的韩国国内九曲非常少见, 武夷九曲的河道从西向东流, 水流次数共11次, 相比而言代表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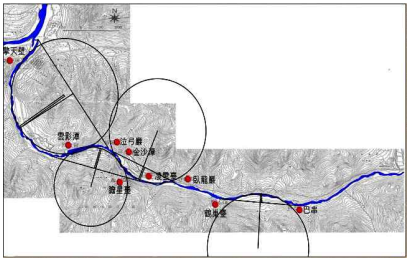
国的华阳九曲4次·仙游九曲3次, 武夷九曲具有明显的弯曲河川地形学特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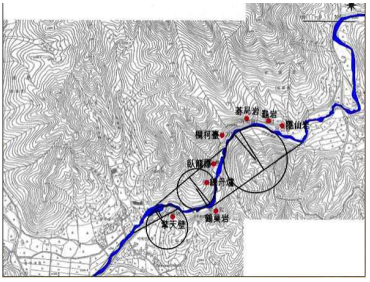
9.武夷九曲的河川形态学特点和各曲的主要景物

* 参考结合 韩国 卢载铉 教授 的研究内容 表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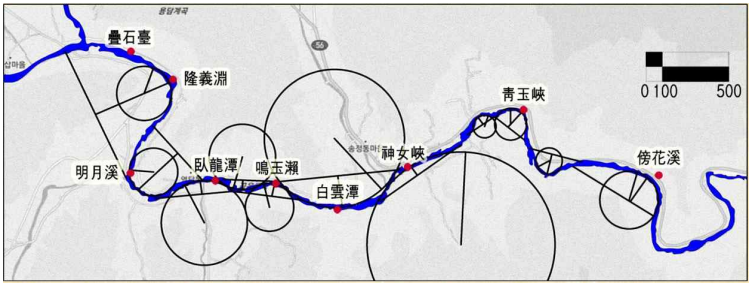
武夷九曲的河川屈曲度是 2.15(A/B), 而蛇行波长是韩国内河川的1.5~1.8倍, 具有很大的特点, 证明了河川的"蛇行性"比韩国内的九曲强很多. 连锁景观的河川曲径部分以景观变换焦点, 形成特异景观的可能性较大, 九曲确定的韩国河川主要在黑云母花岗岩内, 水平垂直节理发达, 发达的河床·河床带等由于被侵蚀, 而中国武夷九曲的红色砂岩经过长时间的地质运动, 呈现出风化·堆积的地形特性[3].



10.华阳九曲



11. 仙游九曲



12.谷云九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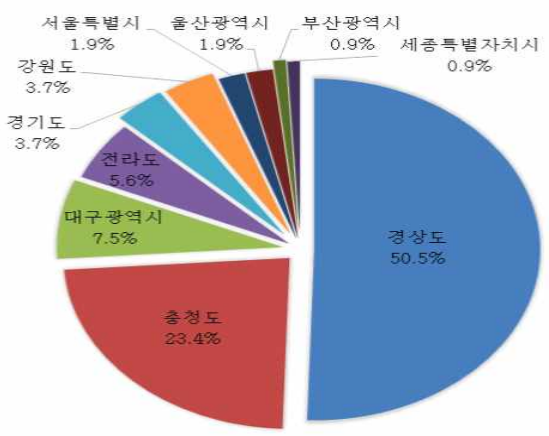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Ⅲ. 考察，韩国九曲园林的空间分布

目前研究已确认现有的九曲园林中， 占全部设定其50%以上的九曲共有107处被发现，据笔者调查，截至目前，包括九曲歌和石刻等在内，通过学者文集等确认九曲经营的地方共有170余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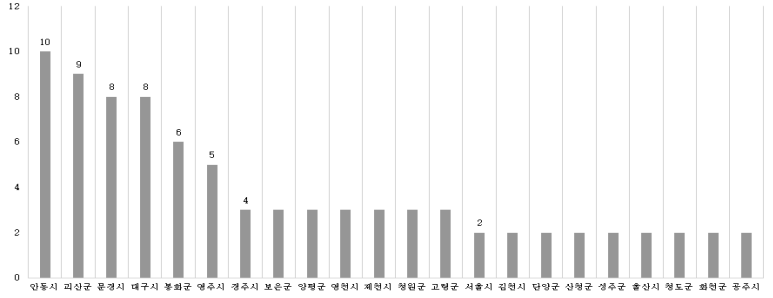
以朝鲜时代八道(省)， 区分上依次被确认的庆尚道65处(60.7%)·忠清道26处(23.4%)·全罗道6处(5.6%)·京畿道和江原道各4处(3.7%)·汉阳2处等.

3 卢载铉(2008)，中国武夷九曲的场所美学和河川形态学特点:以与韩国九曲的比较为中心. 韩国传统造景学会志 26(4):1-11.



13.韩国九曲园林分布图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按现行广域自治体分类, 庆尚北道47处(43.93%)·忠清北道22处(20.56%)·大邱市8处(7.48%)·庆尚南道7处(6.54%)·全罗北道5处(4.67%)·京畿道和江原道各4处(3.74%)·忠清南道3处(2.80%)·首尔特别市和蔚山广域市2处(1.87%)·釜山·世宗特别自治市·全罗南道各1处(0.9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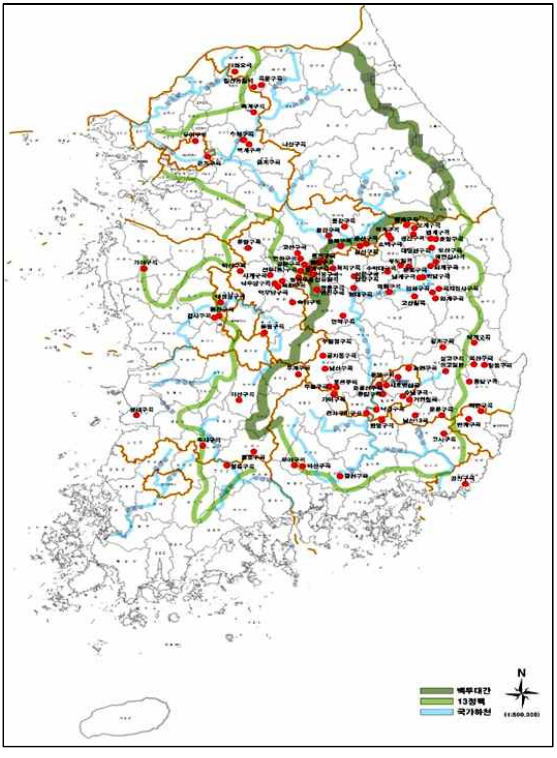
韩国市区九曲园林的分布情况图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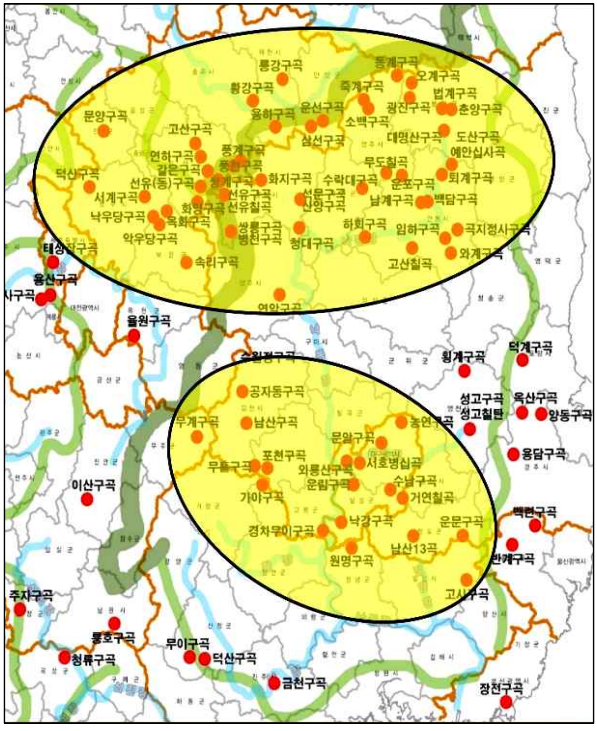
从基础地方自治团体(市, 郡)来看, 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庆州玉山书院

外的玉山九曲，保存良好且完整；而九曲园林分布最多的，要数被誉为"韩国精神文化之都"的安东市，这里的九曲园林有10处(9.35%)，其后依次为：槐山郡9处(8.41%)·利川市8处(7.48%)·奉化郡6处(5.61%)·永州市5处(4.67%).

在以李珥为中心的性理学深化的十六世纪，尤其在成为岭南性理学宗主的李退溪仙逝后，作为献养(祭祀)事业的一环，以东江本流和支流为中心所营造的陶山九曲或退溪九曲，其相关的九曲设定和所经营的性理学文化，对岭南九曲园林的形成与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在南韩确认的九曲园林主要以庆北和忠北为中心，位于岭南·畿湖学派的中心舞台.





从地形图上看韩国九曲的分布特点
*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弦 教授

Kee(2012)也指出, 韩国的东川九曲主要分布在太白山脉和小白山脉的山地地区, 韩国内的九曲分布, 主要集中在连接小白山-月岳山-俗离山的白头大干山脉上, 左右岸和洛东江流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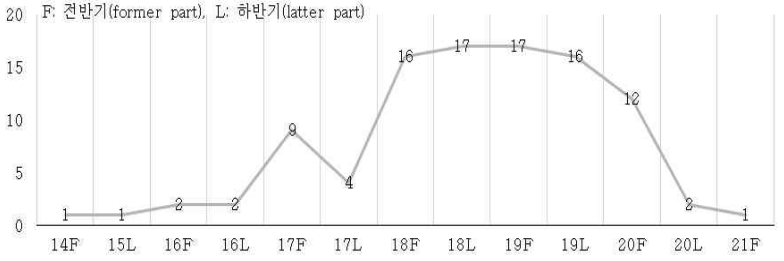
Kim(2014)根据 逍遥堂 朴河淡(1479~1560)的云门九曲, 将此视为韩国最早的九曲园林, 之后根据2006年发现的采芝堂朴龟元(1442~1506)的姑射曲诗, 将云门九曲确定为位于小麦阳面·古礼里一带的姑射九曲. 另外, 据《海东杂录》记载, 适庵曺伸(1454~1529)在陕川红流洞经营的伽倻九曲, 其中部分岩石字迹已由韩国学者确认完毕.

在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及之前, 朝鲜时代儒生最终经营的九曲, 应为

华云 闵禹植所经营的双龙九曲.

到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时期和韩国解放以后,设定九曲园林的九曲文化又得传承, 最近的九曲设定, 应为2009年 潞山 金顼祚(1961年~至今)在槐山设定的丰川九曲.

且在2006年闻庆九曲园林的保存会(代表李万有), 也在进行新的颍江九曲的创作.



韩国各个年代九曲园林的分布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从18世纪前半段到20C前半段, 一直持续不断地编曲创作, 具体来看, 18世纪和19世纪设定的九曲有33个(33.0%)·20世纪14个(14.0%)·17世纪13个(13.0%)·16世纪4个(4.0%)·14世纪, 15世纪, 21世纪 各1个(1.0%)等, 18~19世纪设定的九曲有66个(66.0%).

正如2016年闻庆九曲园林保存会(代表李万有)等9人所设的横跨利川市永江12.7公里的颍江九曲[(永新森林·松亭沼·水晶洑·舟律·鳖岩·犬滩·三太极·屏岩·龙渊)], 现在在韩国九曲的设定还在継续, 九曲文化正在进行中.

16世纪是经过中宗年间(1506~1544)在性理学上形成社会伦理, 对性理学者的修养·学问·隐居的儒教空间要求增大的时期. 退溪李滉, 栗谷李珥等大儒的登场, 构成了性理学的学术成就的基础. 17世纪, 朝鲜社会面临士祸的混乱期, 士林遭受巨大损失, 但士林通过乡约强化在地方的支配力, 通过书院使中小地主知识人及士林地位的扩大, 在宣祖年间(1567-1608)掌握

了政界的主导权.

特别强调"隐居山林, 潜心于道学或教育, 才是儒生正确的道路"的隐士文化与朝鲜时代的九曲园林设定非常紧密相连. 17世纪初·中期寒冈郑郑(1543~ 1620)的星州的武屹九曲的经营·宋时烈(1607~1689年)的槐山华阳九曲的经营和儒林后学们的九曲宣扬, 为18世纪以后朝鲜儒生们的九曲经营提供了绝佳的参照样本.

朱子学的传入及其后性理学得到的广泛传播与接受, 对九曲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朝鲜时代的儒生们不仅崇尚朱子的学问, 还崇慕朱子的行迹, 这就形成了为建立历史习俗和九曲经营建造园林的过程. 朝鲜中期是性理学的全盛时期, 退溪 李滉的陶山书堂和陶山九曲园林·栗谷李珥的石潭精舍和高山九曲园林, 因其典型的九曲风格, 之后其系谱也得以传承. 追随李滉的岭南学派和追随李珥的畿湖学派之间的竞争, 通过九曲实现道学的正史建立和九曲歌·九曲图的制作, 使众多九曲园林得以营造和展现.

九曲의 嚆矢	始原型 九曲園林	典型的 九曲園林		
創設者/ 九曲名稱	創設者/ 園林名稱	學派名稱	創設者/ 九曲名稱	設定者/九曲名
朱熹 (1130~1200) 武夷九曲	李珥 (1404~1418) 武夷精舍園林	嶺南學派	李滉: (1501~1570) 陶山九曲	鄭逑(1543~1620)/武屹九曲
				李重慶(1599~1678)/梧壑九曲
				李衡祥(1653~1733)/城皇九曲
				鄭萬陽(1664~1730)/槿溪九曲
				蔡憲(1715~1795)/石門九曲
				李漢膺(1778~1864)/春陽九曲
				李源祚(1792~1871)/布川九曲
	李彦迪: (1491~1553) 玉山精舍園林	畿湖學派	李珥: (1536~1584) 高山九曲	宋時烈(1607~1689)/華陽九曲
				金壽增(1624~1701)/谷雲九曲
				權尙夏(1641~1721)/寒江九曲
				權燮(1671~1759)/花枝九曲
				洪良浩(1724~1802)/耳溪九曲
				柳重教(1832~1893)/玉溪九曲
				李道復(1862~1938)/ 顚山九曲

朝鲜书生们设定的代表性九曲园林谱系

* 来源 韩国 又石大学 风景园林系 卢载铉 教授

Ⅳ. 研究与考察, 中韩九曲园林的比较
－武夷九曲与玉山九曲为例

接下来是本文比较研究中韩九曲园林的部分，分析研究对象是中国武夷九曲和韩国玉山九曲.

笔者对武夷九曲的设曲背景和渊源进行了探索，发现武夷山拥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神话中的彭祖及其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 武夷九曲位于福建省武夷山的九曲溪中，是宋朝理学代表人物朱熹经营的园林. 笔者通过《武夷棹歌》,《武夷九曲图》等古文献和古画分析了古代武夷九曲的景观. 此外，在近4年来，笔者共进行了10余次现场调查及专家访谈, 对当地武夷九曲的景观要素进行了调查和分析.

玉山九曲是 晦斋 李彦迪的“玉山书院”旁流经的紫溪川, 即以玉山川为对象设定的九曲园林. 本研究对玉山九曲园林进行了数字仪器分析, 文献调查及现场实测分析, 确认玉山九曲的位置和设置情况. 用Trimble Juno SB GPS测定的九曲经纬度同时，利用Google Earth Pro及韩国地理情报院公开的玉山九曲的数值与地形图确定了位置.

对此，本研究对武夷九曲和玉山九曲相关古文献中出现的景观因素和文化背景进行了比较研究, 得出以下结论:

1. 武夷九曲

1）武夷山拥有源远流长的文化传统, 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神话中的彭祖及其两个儿子彭武和彭夷. 坐落于武夷山九曲溪的武夷九曲是理学的代表人物宋朝朱熹经营的园林.

2）中国武夷山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自然文化遗产名录，是自然文化遗产兼人文文化遗产, 即夏合文化遗产. 武夷九曲作为中国福建省武夷山市的代表性旅游胜地, 也倍受关注. 朱熹在武夷九曲第五曲中建立武夷精

舍, 经营周边山水, 创作出了著名的《武夷棹歌》.

在韩国, 大部分的九曲园林都是由尊崇正统的理学家模仿朱熹的武夷九曲园林而设, 为数众多；而武夷九曲是中国唯一的九曲园林. 九曲园林虽然与理学有着很深的关系, 但其文化景观的形成受其他文化的综合性影响也是很大的.

3) 构成武夷九曲的本体性核心的文化要素是由理学·佛教文化·古闽族文化·古汉城遗址·道教洞天和武夷宫构成, 代表的名胜区是天游峰·九曲溪·大红袍景区·水帘洞等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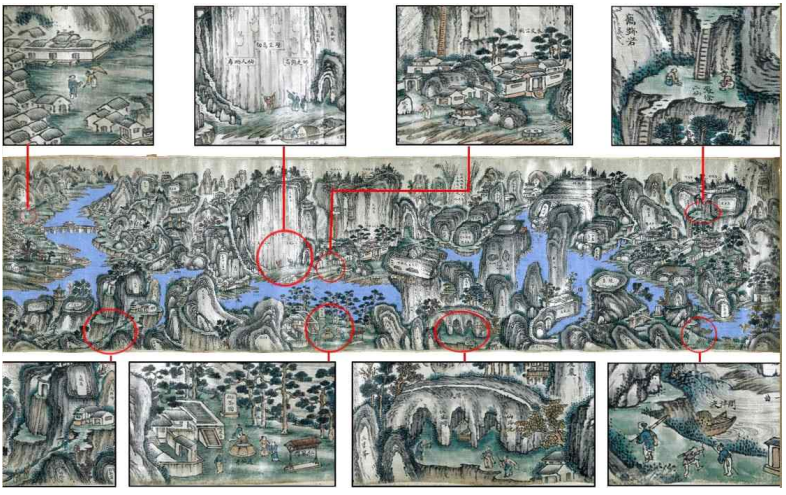
4) 对朱熹《武夷棹歌》中出现的"景观因素"和"景观现象", 笔者以"形态因素", "意义因素"和"风土因素"进行区分, 分析后得出, 朱熹的造园观以自然山水为理想乡, 游荡于大自然之中的游刃有余的心情和无常感都隐藏在其中.

5) 经现场勘查, 武夷九曲不仅有"水上九曲", 也设有"路上九曲". 现"路上九曲"从第四曲到第九曲, 正在修复中. 而从第一曲到第三曲, 由于年久失修, 损毁严重.

6) 通过考察朱熹的《武夷棹歌》中的景观因素和景观现象出现的频率, 笔者发现"山" 和 "水" 是造营九曲园林的绝对要素. 因此, 在《武夷棹歌》中, 不仅蕴含了朱熹的理学思想中的儒教思想, 还包含了立足于佛教思想的因缘解脱和道教的不老长生思想和强调 "与自然共存的生活".



武夷九曲图细节分析



*韩国又石大学，程朝霞 博士(2020.2)

2. 玉山九曲

1）退溪李滉的9世孙李野淳在李彦迪死后270年的1823年春，访问了玉山书院. 当时，在李野淳的提议下，李彦迪的后人 李鼎儐，李鼎基，李鼎秉等和多位书生共同设定了玉山九曲，并一起创作了《玉山九曲歌》. 李鼎儐的《玉山同行记》是了解玉山九曲设定时情况的决定性资料.

2）大部分九曲园林不是一般的诗人墨客经营的园林，而是正统性理学家经营的园林，李彦迪和李滉的后代共同创作了《玉山九曲歌》，这是因为李彦迪和李滉被视为正统性理学的継承者，子孙后代为之自豪.

3）李鼎儐的《玉山同行记》中，详尽而具体地记录了“玉山九曲歌”的创作过程和九曲的设定过程， 这份对九曲歌的设区过程与当时的情况记录如此细致的材料，在学界应该说是非常罕见的.

4）重新界定了已知的玉山九曲其第一曲，第八曲，第九曲的位置. 第1曲松坛的位置是 北纬 36° 0'23.68"，东经 129° 9'55.21". 确定的第八曲濯缨台的位置信息为 北纬 36°01'08.60"，东经 129°09'31.20". 参考古文献，九曲狮

子岩位置进行纠正, 再定义为东西两壑流水汇合的下方岩石. 此处的位置现判定为玉山坝内北纬36°01'30.46", 东经129°09'35.02".

5) 李鼎俨《玉山九曲歌》中出现的景观因素和景观现象, 可分为形态因素·意义因素和风土因素. 认真分析可了解李鼎俨的造景观：山水是理想乡, 在这里可以感受到闲游自然的心情和无常感.

6) 通过对观察景观因素和景观现象的出现频率的统计分析, 笔者发现在李鼎俨的九曲歌中反复出现的"水" 和 "山" 是造营九曲园林的绝对要素. 另外, 该九曲歌不仅内载了神仙思想及隐居思想, 还通过山水间的协调, 体现了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物我一体的思想和性理学修行观.

3. 武夷九曲与玉山九曲园林的比较结论

1) 地形和地质

武夷九曲的地形·地质为丹霞地貌, 韩国玉山九曲则是堆积岩和花岗岩, 主要位于流经山地内部的曲流河道, 其周围各种地形要素构成主要景观.

2) 九曲的设定者和後代学者

武夷山是记录人类生活史, 地理史的世界自然遗产及人文文化遗产. 玉山九曲的人文历史层面则是以理学为中心, 由后生儒学者所设定和享有的自然指向性园林.

3) 文化与思想

中国武夷九曲的思想背景, 是儒道释共同存在的. 韩国玉山九曲主要以儒教思想为基础,也涉及部分佛教思想.

武夷九曲所包含的文化要素, 不仅只有理学文化, 同时还有古闽族·闽越族文化遗址·宗教文化·茶文化·摩崖石刻·古建筑, 遗址等. 因此,武夷九曲可以说是包容万千·底蕴深厚的九曲园林.

玉山九曲则主要以理学和朱熹为九曲文化构建的核心思想. 从历史角度看, 这反映了后世的朱子学人継承了晦斋 李彦迪的学问, 并在朱子学的基础上, 结合韩国实际, 有所创新.

4）诗画和石刻

以中国武夷九曲为创作背景的诗歌只有朱熹的《武夷棹歌》,"武夷九曲图"则成为中国绘画的一个题材, 在宋·明·清有多幅作品传世. 董天工的九曲图《武夷九曲图》便是其中代表, 该画作细致入微地描绘了武夷九曲每曲的细节. 而在韩国, 以韩国玉山九曲为创作背景的《玉山九曲歌》至今已发掘出13部. 暂未发现正式的"玉山九曲图", 只有《骊江李氏世谱》所传概念化的玉山九曲图.

5）景观构成

武夷九曲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定的世界文化遗产, 为自然及人文综合文化遗产的名胜地. 武夷九曲周边自然景观包括三十六峰·五十四石·七十二洞·九十九岩, 是整个武夷山的景观精髓所在. 另外, 结合传世的诗文及画作, 以及理学传统的浸润, 自然景观得天独厚的武夷九曲, 人文景观也非常卓越.

玉山九曲是向晦斋李彦迪的“玉山书院”旁流经的紫溪川, 即玉山川为对象设定的九曲园林. 自然景观和武夷九曲相比规模相当小. 但是从人文景观的渊源和継承来看比武夷九曲更持久.

6）景意赋与

-九曲园林的景意赋与

景意的赋予, 让学者们将对朱熹的尊敬和理学思想寄托在其周边的风景上. 观察武夷九曲的文化构成要素, 可以发现武夷九曲不仅包含“理学文化”, 还包含“古闽族, 闽越族文化遗址”, “宗教文化”, “茶文化”, “摩崖”, “碑刻”, “古

建筑”, “君王文化”. 如上所述, 武夷九曲是由多元文化构成的九曲园林. 所以, 武夷九曲的景意赋与, 自然也体现了博大纷呈的内涵.

-对九曲园林的态度

玉山九曲的设定者以对朱熹和理学的尊崇, 设定了九曲园林；而武夷九曲, 则是以武夷多元文化与得天独厚的九曲溪景观为背景, 设定的九曲园林.

-九曲园林的义理特性

玉山九曲强调的理学特点是“道德天理”, 而武夷九曲的思想则更多地体现出“天命观”和“人格神”的交织.

-朝鲜时代对朱子的钦慕与模仿文化

如果将韩国玉山九曲与武夷九曲相比的话,武夷九曲可以说是“实景性”的九曲.「九曲棹歌」是朱熹坐船逆流而上游九曲时所作. 或许可以这么认为,「九曲棹歌」是一首即兴的·写景抒怀的优秀诗歌作品, 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的山水观.

玉山九曲是朝鲜时代儒林们, 出于对朱熹的钦慕和其行迹的追寻模仿而营造, 深刻反映了晦斋 李彦迪的思想. 玉山九曲和武夷九曲比较起来, 玉山九曲是“观念”上的九曲, 其规模虽然很小, 但在设定者心中, 一定向往着武夷九曲一样规模宏大的山水园林, 从这点来看与武夷九曲的意景是有一定的差异的.

Ⅴ. 研究总结与发展建议

李彦迪所营造的九曲园林和所反映的九曲文化, 在韩国传承至今, 留下了宝贵的自然和人文遗产. 玉山九曲景区内有玉山书院. 独乐堂内有天然带, 走到外面就会看到沿着紫溪徐徐展开的先儒曾吟咏过的景观, 漫步期间, 最后到达的是晦斋先生经常光顾并读书并留下来的洗心台. 这里保留着《玉山同游记》和《玉山九曲》等吟咏·描绘书院内外和周边环境名胜的文学

作品，生动地传达出晦斋在那里感受到并享受的感慨和快乐. 特别是从玉山书院到洗心台的路线，在晦斋仙世后，他的后裔们沿着"老先生"的足迹，踏上了缅怀之旅，并回味其感兴和情绪，留下了包括旅程记杂·感兴抒怀在内的人文遗产，增加了玉山九曲的人文底蕴.

这些与晦斋有关的人文·自然空间和景观以及与此相关的文学作品，可与今天流行的“新休养文化”相呼应. 现在中国游客访问玉山书院只是为了观赏自然风光和韩国园林建筑，追求休闲观光的乐趣，却少有人能能体会到晦斋先生所描绘和强调的"油然而生情怀"的那种充实的快乐.

结合传统与现实，笔者认为，玉山书院应完善能够体验晦斋的山水之乐和文学感性的境地的解说内容和并开发相关项目. 另外，我们还应考虑在一年中选择特定日子(这些日子，景区夜间也可开放)的特殊观光方案，例如在月圆之夜"玉山与武夷杂咏"中开发参观低洼空间和对象的特别体验项目. 有必要开发将玉山九曲周边环境与玉山书院的美丽空间·景物与晦斋和后辈们的诗一起进行考察的项目. 特别是玉山，紫溪，考虑到以登山为兴趣的广泛人口，需要强调自然与文化遗产的双重意义，开发将晦斋和后辈们的文学融为一体进行鉴赏的遗产项目. 为此，有必要考虑制作包括自然地理信息与历史人文信息相结合的国际化遗产地图(如制成方便携带的小册子或小折形式的刊物，或登山手巾形式的地图)，相信这些设计将极大增进其国际化的发展进程.

【参考文献】

彭鸿绪(2019), 韩中九曲园林比较研究. 以武夷九曲和玉山九曲为中心, 东国大学博士论文.

卢载铉(2008), 中国武夷九曲的场所美学和河川形态学特点:以与韩国九曲的比较为中心. 韩国传统造景学会志 26(4):1-11.

卢载铉(2009), 九曲园林的原流. 中国武夷九曲的文本性:以国内传承过程为中心. 韩国造景学会杂志36(6):66-80.

卢载铉(2015), 通过明宫郑㮚的山清武夷溪谷园林经营看到的九曲文化的模仿和变容. 韩国传统造景学会志33(3):84-94.

闵主志(1999), 朝鲜时代知识分子的审美乌托邦:以"武夷九曲"的艺术表现为中心. 韩国美学杂志26:23-51.

允一一(2007), 朝鲜中期岭南士林楼顶建筑的儒家土著化. 《大韩建学会论文集》 计划23(3), 2:153-160.

李殷昌(1988), 韩国儒家传统园林的研制:以儒学环境的卜居和九曲经营为中心. 韩国传统文化研究Vol.4:191-304.

李钟默(2016), 朝鲜时代景江的别书同好篇, 京仁文化社.

郑宇洛(2017), 大邱地区的九曲文化及其特点. 韩民族语文学第77题:121-149.

郑宇珍, 卢载铉(2017), 北汉山溪, 九曲的位置碑亭和集景特点, 韩国传统造景学会35(3):41-66.

华川文化院(http://www.hcmunhwa.or.kr/)

Abstract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f Wuyijingshe and Ok-san Seowon in the background of Neo-Confucianism

Peng, hong-xu*

This study is about compare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s’ between Mooijungsa in Mount Mooi, China and Oksan Seowon, focusing on Mooi Gugok and Oksan Seowon Gugok. This study consists of the total five chapters about the relations of origins of Gugok gardens in China and Korea, spatial distributions in both Korean and Chinese Gugok gardens, and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Gugok gardens, and finally there are conclusions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Oksan Gugok Seowon.

Chapter 1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utside the Korean Seowons> explains the background to set Gugok in China and the historical background that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utside Seowons in Joseon mimicked Zhu Xi’s Mooigugok.

Chapter 2 <The Korean Gugok Garden and the Origin from China> describes that Confucians in Joseon worshiped Zhu Xi and they also considered natural landscapes of mountains and waters as utopia due

* Professor, Faculty of Architecture and Urban and Rural Planning, Fuzhou University / penghongxu@naver.com

to their regret for factions and then, Gugok gardens was set and the garden's characteristics in designs. In additi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rivers in Mount Mooi and in Korea are mentioned with the explanations on the locations of Gugok.

Chapter 3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Korean Gugok Gardens> contains the statistics of Gugok gardens in Korea by region and explains geograph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historical origin of the regions concentrated with Gugoks. In addition, the Gugoks set between the Japanese Colonial Times and the present are also described.

Chapter 4 <Comparison between Korean and Chinese Gugok Gardens> describes the respective characteristics of Mooi Gugok and Oksan Gugok and then compares both the places based on them. The chapter offers detailed descriptions with several sections including topography and geology, who set Gugok and next generations of the scholars, culture and ideas, poetic drawing and stone carving, landscaping, and making the meanings in the landscapes.

Chapter 5 <Summary and Suggestions for Development> summarizes the study, explains the contemporary meanings of Oksan Seowon and Oksan Gugok, and makes some suggestions for developing them.

Keywords: Mooijungsa, Oksan Seowon, Gugok Garden, Zhu Xi, Oksan Gugok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8,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6 125

조선시대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위상 변화*

이 병 훈**

Ⅰ. 머리말
Ⅱ. 초창기 경주지역 수원(首院)으로서의 위상 정립
Ⅲ. 17~18세기 중반의 위상 유지 노력
Ⅳ. 18세기 후반 영남의 대표 서원으로의 위상 제고
Ⅴ. 맺음말

【국문초록】

경주 옥산서원은 조선시대 서원 제도가 도입되던 초창기에 건립되어 대원군의 원사 훼철 시에도 존치되었던 곳으로서 한국 서원의 변천사를 대표하는 곳 중의 하나이다. 옥산서원은 건립 당시부터 경주지역 수원(首院)으로서의 역할을 하였다. 일반적으로 서원의 위상은 제향인의 위상과 사액의 유무를 기본으로 정해진다. 여기에 사회·정치적 기능, 경제적 기반, 출판·도서관적 기능 등이 복합적으로 작용하였다. 옥산서원은 이러한 요소가 시기별로 상호작용하면서 그 위상이 부침을 거듭하였지만 경주지역 수원으로서의 지위는 변함이 없었다.

옥산서원은 문묘 종사 대현인 이언적을 제향하는 서원으로서 경주부윤과 향인, 후손, 문인가의 적극적인 지원으로 건립되었다. 또한 건립 직후 사액이 되면서 국학에 준하는 지위를 가지게 되었다. 임진왜란 당시에도 건물과 장서를 온전히 보존하였던 옥산서원은 전란 이후 경주지역을 대표하는 교육기관으로서 위치했다. 17세기 중반 이후 거재와 거접 등의 강학을 강화하면서 유생 교육의 중심처로 위치하였다. 당시는 당쟁이 심화되던 시기였음에도 불구

* 본 논문은 2020년 10월 19일 경주 옥산서원에서 개최된 《2020 세계유산축전 '옥산서원' 한중국제학술대회》에서 발표한 것을 수정·보완한 것이다.

**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연구교수/ yukhl@ynu.ac.kr

하고 제향된 이언적이 당색과 무관한 인물이었으며, 서원의 운영 방향도 당쟁과 거리를 두면서 당색을 불문하고 많은 인사들의 방문이 이어졌다. 또한 지방관의 방문도 계속 이어지면서 옥산서원의 사회적 위상이 제고되는 효과를 보았다. 그러나 경주부내의 당파간 신분간 분쟁에 적극적으로 관여하지 않으면서 18세기부터는 경주부 남쪽에 대한 영향력을 상실하게 되었다.

한편 문중서원의 건립이 본격화되면서 서원 운영에 참여하던 원유들의 이탈로 서원 운영에도 어려움이 발생하였다. 그래서 각종 규정을 제정하고, 원임의 선발 범위를 경주부 전역으로 확대하는 등 다양한 방안을 시도하였으나 크게 개선되지 않았다. 그런 가운데 정조의 즉위 이후 이언적의 학문에 대한 국왕의 관심이 커지면서 그를 제향한 옥산서원에 대한 관심도 함께 커져갔다. 그 결과 인조반정 이후 단절되었던 치제가 재개되고, 서적의 하사도 이어지면서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제고되었다. 이때부터 옥산서원은 도산서원과 더불어 영남의 양대 서원으로 위치하였다. 하지만 19세기에 들어오면서 서원 운영의 어려움이 더욱 심화되면서 원장의 선발도 도내로 확대하고 후손들의 서원 참여율도 더욱 증가하였다. 그러던 중 1839년(헌종 5)의 구인당 화재로 서원 재정은 악화되었지만 재사액과 국왕의 특명에 따른 치제가 거행되면서 서원의 위상은 재정립되는 효과를 얻었다. 그 후 원장에 경주부윤이 천망되면서 서원 운영에 도움을 받게 되었다. 하지만 서원 운영의 핵심가문인 경주손씨와 학문연원 시비가 발생하면서 19세기 중반 이후 손씨들이 옥산서원에서 완전히 이탈하였다. 나아가 신향들의 원임직 소통을 둘러싼 시비도 격화되어갔다. 그러나 대원군의 원사 훼철에도 존치되면서 더욱 위상이 높아져서 1884년(고종 21) 복제개혁 반대 만인소를 주도하기도 했다.

주제어 : 이언적, 옥산서원, 위상, 강학, 향전

Ⅰ. 머리말

2019년 7월 6일 아제르바이잔 바쿠에서 열린 유네스코 세계유산위원회 제43차 총회에서 경주 옥산서원을 비롯한 영주 소수서원[안향], 안동 도산서원[이황]·병산서원[류성용], 현풍 도동서원[김굉필], 함양 남계서

원[정여창], 논산 돈암서원[김장생], 정읍 무성서원[최치원], 장성 필암서원[김인후] 등의 '한국의 서원(Seowon, Korean Neo-Confucian Academies)'이 유네스코 세계문화유산에 등재되었다. 이들 서원은 세계문화유산 등재 신청이전부터 그 역사적 가치를 인정받아서 국내에서 '사적(史蹟)'으로 지정된 곳이었다.

이들 서원에 대한 높은 평가는 조선시대에서도 마찬가지였다. 다만 조선시대에는 건물이나 서원의 기능보다는 제향인에 대한 평가가 절대적이었다. 실제 9개 서원의 제향인은 병산서원(류성용)을 제외하고 모두 문묘(文廟)에 종사된 인물들이었다. 그래서 대원군의 원사 철폐령 당시에도 이들 서원은 해당 인물을 대표하는 곳으로 인정되어 훼철되지 않았다.[1] 이처럼 조선시대에는 서원의 위상을 언급하는 데 있어서 가장 중요한 것이 제향인이었다. 제향인의 위상에 따라서 서원을 건립하기 위한 논의 단계에서부터 참여 인원의 다소(多少)와 관(官)의 관심도에서 차이가 났다. 이러한 차이는 부조(扶助)의 규모와 공사 기간 및 건물의 규모하고도 관련되었다. 즉 제향인의 위상이 높을수록 서원의 건립에 필요한 비용과 노동력의 공급이 수월하였기에 건물의 규모도 크고, 공사 기간도 단축할 수 있었다. 아울러 건립이후 서원운영에 필요한 경제적 기반을 마련하는 데에도 큰 영향을 주었다.

---

1 대원군은 존속되는 서원과 사우의 기준을 道學과 忠節人으로 제시하고, 1인에 1개 서원이나 사우만 남기고 모두 훼철하였다. 그러나 기준이 명확하지 않고 자의적으로 해석할 여지가 있었다. 당대에도 이미 높은 벼슬에 있던 후손들에 대한 배려와 청탁에 의해 존속한다고 보았다. 실제 響山 李晩燾의 『響山日記』 1871년(고종 8) 4월 4일자를 보면 "陰 嶺南留院 不過五賢本院及紹修 其他忠烈若干祠而已 屛山以有相孫 不在撤中 用淸陰院例云"이라 하였다. 즉 영남에서 남은 서원은 5현의 본원과 소수서원, 기타 약간의 충렬인 사우에 불과한 데, 병산서원은 재상[좌의정 柳厚祚(1799~1876)]이 자손이기 때문에 훼철되지 않았으니 金尙憲 서원의 사례와 같다고 하였다. 실제 병산서원이 1863년(철종 14) 사액을 받은 것 역시 류후조 등의 후손들 역할이 컸다. 그러나 당시 서원 존속의 기준은 무엇보다도 대원군의 의지가 가장 중요한 요소였다.

서원 건립 후에는 안정된 운영을 위한 경제적 기반 구축과 기타 관에서의 침해를 최소화하고, 사림의 자치적 기구로서의 자율성을 확보하려는 노력이 이어졌다. 그것은 '사액(賜額)'을 통해 국가의 공인을 받으려는 것으로 나타났다. 주지하다시피 '사액'은 백운동서원(白雲洞書院) 건립 이후 1549년 풍기군수 이황(李滉, 1501~1570)의 요청에 의해 처음 제기되었다. 백운동서원은 소수서원(紹修書院)으로 사액된 후 교육적·경제적 기반을 공고히 하고, 조야(朝野)에서의 위상이 격상되었다. 그 결과 소수서원 이래로 신설하는 서원들은 건립과 동시에 사액을 청원하는 것이 일반적이었다. 그러나 사액은 사림의 공론에 의해 청원을 하더라도 무조건 승인을 해주지는 않았다. 제향인의 위상과 해당 서원과의 연고(緣故), 사액으로 인한 사회적·교육적 파급 효과 등을 고려하여 진행되었다.[2]

이와 같이 조선시대 서원의 위상은 제향인과 사액 유무가 기본적인 평가 기준이었다. 제향인의 경우 문묘종사대현(文廟從祀大賢) 내지 유현(儒賢)으로 '백세(百世)의 사표(師表)'가 될 만한 유학자가 선정되었다. 또한 사액서원 간에도 국왕의 관심에 따라 치제(致祭)와 서적 하사(下賜) 등의 빈도가 달랐다. 이외에도 해당 서원의 위상을 파악하기 위해서는 원임과 원생의 사회적 지위, 서원의 정치·사회적 활동, 교육 활동의 지속성과 이를 보조하기 위한 장서(藏書)의 구비, 제향인의 학문을 계승·확산하기 위한 문집과 저서의 출판 등이 종합적으로 파악되어야 한다. 실제 조선시대에 건립된 1,800여 개소의 서원·사우 가운데 이처럼 다양한 활동을 전개한 곳은 매우 제한적이었다. 이는 막대한 경제력이 뒷받침되어야 가능한 일이었기 때문이다. 특히 출판과 대규모 유회(儒會)를 개최하는 것은 경제력 외에도 제향인과 해당 서원의 대표성이 우선되었다. 그렇기에 조선시대 서원 중 막대한 비용이 필요한 출판 활동 및 대규모의 유회(儒會) 개최 및 거접·거재와 같은 교육 활동을 지속할 수 있었던 곳

2 이병훈, 「16세기 서원의 출현과 정비」, 『한국서원학보』 10, 한국서원학회, 2020.

은 각 지역을 대표하는 수원(首院)들이었다.

옥산서원 역시 앞서 언급한 사안들을 충족하는 경주지역의 수원이었다. 옥산서원은 1572년(선조 5) 건물을 완공하고 이듬해인 1573년(선조 6) 2월에 위패를 봉안하였다. 아울러 바로 사액을 요청하여 12월에 재가를 받은 후 1574년(선조 7) 2월에 사액이 되었다.[3] 그 후 대원군의 원사 철폐령에도 존치되면서 현재까지 이어지고 있다. 이처럼 옥산서원은 한국 서원의 역사를 축약하여 보여주는 곳이다. 또한 현존하고 있는 건축물과 소장 자료의 질적·수적인 면에서도 도산서원과 함께 가장 뛰어나다고 평가된다. 이것은 450여 년 동안 이를 보존·관리하기 위한 서원 측의 노력 때문이다. 그러나 옥산서원과 관련한 자료정리와 연구는 그 상징성과 역사적 위상 및 현존하는 자료에 비하여 매우 소략하다.

1993년 영남대 민족문화연구소에서 중요 자료를 선별하여 『옥산서원지(玉山書院誌)』를 간행하면서 처음 자료정리와 소개가 있었다. 그 후 2004년 문화재청이 주도하여 재차 영남대 민족문화연구소에서 옥산서원에 소장된 고서·고문서, 책판·현판 등에 대한 대대적인 조사가 진행되었다. 당시 전체적인 규모와 간략한 내용은 파악되었지만 본격적인 연구는 미진하였다.[4] 옥산서원에 대한 선구적 연구는 이수환에 의해 진행되었다. 그는 1992년 옥산서원 역사와 운영에 대한 전반적인 내용을 개관한 이래

3 이는 조선시대 서원 가운데 28번째이며, 사액 순으로는 9번째였다. 옥산서원에 앞서 사액된 서원은 풍기 소수서원(1550, 안향), 영천 임고서원(1554, 정몽주), 해주 문헌서원(1555, 최충), 강릉 오봉서원(1556, 공자), 함양 남계서원(1566, 정여창), 순천 옥천서원(1568, 김굉필), 성주 영봉서원(1573, 程朱·김굉필), 화순 죽수서원(1570, 조광조) 등이다. 이들 서원은 중국의 성현과 사림에 의해 문묘종사 운동이 전개되고 있던 유현들을 제향한 곳으로서 해당 지역의 교육과 공론 형성의 중심처로서 성장하였다(이병훈, 앞의 논문, 2020, 부록 참조). 한편, 옥산서원 건립 당시 경주에는 1561년(명종 16) 부윤 李禎이 건립한 서악서원[서악정사]이 있었지만 사액은 1623년(인조 1)에 되었다.

4 대표적으로 옥산서원 소장 자료에 대한 목록과 영인은 『玉山書院誌』(이수환 해제, 영남대 민족문화연구소 편, 영남대출판부, 1993)와 『2004년 일반동산문화재 다량소장처 실태조사 보고서』(문화재청, 2004) 등이 있다.

로 제향인의 위상, 경제적 기반과 운영 실태, 사회적 역할과 위상, 손이시비와 같은 세부 주제를 단계적으로 진행하였다. 그 후 이병훈에 의해 기존의 연구에서 누락된 인적구성과 출판·도서관적 기능, 강당 중건 등에 대한 연구가 진행되면서 옥산서원의 전반적인 운영 실태가 규명되었다.[5]

이러한 연구의 성과로서 옥산서원은 시대의 진전에 따라서 부침이 있었지만 건립 이래로 경주를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 존재했음이 밝혀졌다. 나아가 18세기 이래로 여타 서원들의 위상이 약화되는 가운데 옥산서원 역시 향촌사회에서의 영향력을 유지하기 위한 노력을 경주하였다. 그 결과 18세기 말 이래로 도산서원과 함께 영남의 양대 서원으로 성장하여, 19세기 말에는 영남뿐만 아니라 전국적으로도 그 위상이 제고(提高)되었다. 본 발표는 이를 염두에 두고서 기존의 연구 성과를 참고하여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건립 당시부터 대원군의 훼철령이 내려지던 시기까지 통시적으로 살펴보고자 한다.

Ⅱ. 초창기 경주지역 수원(首院)으로서의 위상 정립

1. 제향인의 높은 격 : 조선 성리학의 선구자, 이언적

옥산서원은 건립 당시부터 경주부를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 위치하였다. 이것은 제향자인 회재(晦齋) 이언적(李彦迪, 1491~1553)이 가진 조야

5 이수환,「조선후기의 서원－옥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국사관논총』32,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92 ;「회재 이언적과 옥산서원」,『경주사학』16, 동국대 사학회, 1997 ;「18~19세기 경주 옥산서원 원임직 소통을 둘러싼 적서간의 향전」,『고문서연구』16·17, 한국고문서학회, 2000 ;「경주지역 손이시비의 전말」,『민족문화논총』42, 영남대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09 ; 이수환·이병훈 외,『옥산서원』,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출판부, 2018. 이병훈,『조선후기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운영과 역할』, 영남대 박사학위논문, 2018. 이외에도 서지학과 건축학 분야에서도 연구가 일부 진행되었다.

(朝野)에서의 높은 위상에 따른 결과였다. 이언적은 16세기 초반을 대표하는 성리학자로서 정파 상으로는 초기의 사림파에 속하며, 학파 상으로는 영남학파의 이론적 토대를 마련하였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러나 퇴계에 의해 추숭되기 전까지는 그의 학자로서의 면모는 드러나지 않았다. 이언적의 학문은 아들 이전인(李全仁)이 이황에게 '행장(行狀)'을 부탁하면서 세상에 알려지게 되었다.[6] 이황 역시 이언적의 생존 시에는 몰랐지만 그의 저서와 사적을 보고난 뒤 비로소 그의 학문과 출처에 대하여 알게 되고는 극찬을 하였다.

> 우리 동방 이학(理學)은 포은 정몽주를 조종으로 삼고, 한훤당 김굉필·정암 조광조를 우두머리로 삼는다. 다만 이 세 선생의 저술을 구할 수가 없어서 지금은 그 학문의 깊이를 알 수 없다. 요즘 『회재집(晦齋集)』을 보았는데, 그 학문의 바름과 그 터득함의 깊이가 거의 근세의 제일이라 할 수 있었다.[7]

> 선생이 유배지에서 『대학장구보유(大學章句補遺)』, 『속대학혹문(續大學或問)』, 『구인록(求仁錄)』을 짓고 또 『중용구경연의(中庸九經衍義)』를 편수했는데, 『중용구경연의』는 미처 완성하지 못하였지만 더욱 심력을 기울인 것이었다. 이 세 책을 통해서 선생의 학문을 볼 수 있거니와, 그 정밀한 견해와 홀로 터득한 묘리는 … 우리 유학의 본원을 밝히고 이단(異端)의 사설(邪說)을 물리친 것으로, 정미함을 꿰뚫고 상하를 관철한 뜻이 순수하게 모두 바른 도리에서 나왔다. 그 의미를 깊이 탐색해 보면 모두 송

6 이언적의 관학자로서의 면모를 알리고 선양하는 것에는 潛溪 李全仁(1516~1568)과 求庵 李浚(1540~1623) 부자의 역할이 컸다. 이전인은 퇴계에게 행장을 부탁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이언적이 유배지에서 작성한 「進修八規」를 그의 사후 명종에게 받쳤다(『明宗實錄』 권33, 명종 21년(1566) 9월 4일). 이준은 유희춘을 찾아가 『中庸九經衍義』를 印出해주길 청하여, 이후 왕명으로 弘文館에서 이를 교정하였다(『선조실록』 권8, 선조 7년(1574) 9월 27일 ; 11월 4일).

7 李滉, 『退溪言行錄』 5, 類編, 「論人物」. "嘗言語東方理學 以鄭圃隱爲祖 而以金寒暄趙靜庵爲首 但此三先生著述無徵 今不可考其所學之淺深 近見晦齋集 其所學之正 所得之深 殆近世爲最也(禹性傳)"

(宋)나라 유학자들의 학설을 이어받은 것인데 특히 주희(朱熹)에게서 얻은 것이 많다. … 우리나라가 예로부터 인현(仁賢)의 교화를 입었으나 그 학문이 전해지지 않았다. 고려 말부터 조선에 이르기까지 호걸스런 선비로서 이 도에 뜻이 있고 세상 또한 도학자라고 칭송한 사람이 없는 것은 아니지만, 당시를 생각하면 모두 명성(明誠)의 실함을 다하지 못하였고, 후세에 칭송을 받더라도 또한 학문의 연원을 징험할 바가 없으며, 후세의 학자들로 하여금 찾고 따르게 할 바가 없어서 지금의 암울한 상황에까지 이르게 되었다. 이언적 선생은 학문을 전수받은 곳이 없으면서도 스스로 유가의 학문에 떨쳐 일어나 어렴풋한 속에서 날로 빛나고 덕이 실천과 딱 들어맞으며, 밝게 글이 나와서 주장이 뒤 사람에게 전해졌으니 우리나라에서 찾아보아도 선생과 짝할 사람은 거의 드물 것이다.[8]

이언적이 스스로 붙인 '회재(晦齋)'라는 호가 성리학을 집대성한 주희의 호 '회암(晦庵)'에서 따온 것처럼 그의 학문은 근본적으로 공맹에 뜻을 두었으며 그에 이르는 방법으로 정주(程朱)를 따랐다.[9] 그러나 그는 자기의 관점에서 일치하지 않을 때는 주자의 설도 취하지 않았다. 그 대표적 사례가 1549년(명종 4)에 저술한 『대학장구보유(大學章句補遺)』다. 이언적 스스로도 서문을 통하여, "비록 회암이 다시 나온다 하더라도 이에서 취함이 있을 것이다"라고 하여 자신감과 더불어 자주적 학문 태도를 보여주었다.[10] 나아가 정조는 『속대학혹문의』 서문을 직접 써서 이언적의 저술 동기를 높이 사고, '주희를 잘 배웠다'고 극찬하였다.[11]

이언적은 활발한 저술활동을 통해서 경세가로서 뿐만 아니라 정주(程朱)의 학설을 따르면서도 자주적이고, 독창적인 면모를 보인 16세기의 대표적인 철학자로 우뚝 서게 되었다. 아울러 개인적 도덕수양에 머물지

8 李彦迪, 『晦齋先生集』 附錄, 行狀, 「晦齋李先生行狀」(李滉).

9 李彦迪, 『晦齋全書』 卷1, 山堂病起. "平生志業在窮經 不是區區爲利名 明善誠身希孔孟 治心存道慕朱程"

10 李彦迪, 『大學章句補遺』, 序. "… 雖晦庵復起 亦或有取於斯矣"

11 正祖, 『弘齋全書』 卷55, 雜著2, 「題先正晦齋續大學或問卷首」. "… 先正之於大學方可謂善學朱子也歟'

않고 사회적으로 이를 실현하기 위한 노력을 아끼지 않았다. 이에 이황은 '덕과 행이 부합하였으며 뚜렷이 문장으로 나타내고 훌륭한 말을 후세에 남겼으니, 이러한 분을 우리나라에서 구한다면 그에 짝할 만한 사람이 없을 것'이라고 극찬하였다. 나아가 이황이 이언적을 김굉필, 정여창, 조광조와 더불어 동방사현(東方四賢)으로 추존한 이래로 조선 성리학의 적통을 계승한 인물로 확정되었다.

한편 이언적에 대한 신원(伸冤)과 추숭(追崇)작업도 퇴계와 그의 문인들이 주도하여 진행되었다. 그 결과 선조가 즉위(1567)하던 해에 신원되고, 이듬해(1568, 선조 1)에는 영의정에 추증되었다.[12] 나아가 1569년(선조 2)에는 문원(文元)이라는 시호(諡號)가 내려지고, 이어서 명종의 묘정(廟庭)에 배향되었다.[13] 1570년(선조 3)에는 왕명으로 김굉필·정여창·조광조·이언적 등의 행적을 모아서 류희춘(柳希春)이 『국조유선록(國朝儒先錄)』을 편찬하였다.[14] 이 책의 간행은 국가에서 이들 4인을 조선 성리학의 정통을 계승한 유현(儒賢)으로 공인하는 의미를 내포하고 있었다.

이에 1570년(선조 3) 성균관 유생들의 '사현문묘종사' 청원이 처음 추진되었으며, 1573년(선조 6)부터는 이황을 포함한 동방오현(東方五賢)의 승무(陞廡)운동이 조야에서 꾸준히 제기되었다. 그 결과 1610년(광해군 2) 조선 초기 대표적 사림파였던 김굉필·정여창·조광조·이황과 함께 문묘(文廟)에 배향되었다. 조선왕조 500년간 이처럼 종묘와 문묘에 배향된

12 이언적의 신원되고 이후 1568년(선조 1) 영의정 증직, 종묘 배향이 가능했던 것은 당시 퇴계와 그의 제자 奇大升의 역할이 컸다. 이들은 선조가 즉위한 이래 經筵 석상에서 꾸준히 이언적의 학문적 위업을 알리고, 명종대의 처벌(유배)과 일각에서 제기되었던 을사사화 당시의 행적에 대한 비판적 견해의 부당함을 반박했다(『선조실록』 권1, 선조 즉위년(1567) 10월 15일, 10월 23일, 11월 4일, 11월 17일 ; 권3, 선조 2년(1569) 윤6월 6일, 윤6월 7일).

13 文元의 문은 '도와 덕이 높으며 학문이 넓다'는 뜻의 '道德博文'에서 따왔고, 원은 '의를 주로 삼아 덕을 행한다'는 뜻의 '主義行德'에서 따온 것이다(『선조실록』 권3, 선조 2년(1569) 7월 10일 ; 권4, 선조 3년(1570) 5월 6일).

14 『선조실록』 권4, 선조 3년(1570) 5월 4일, 5월 16일, 5월 18일.

인물은 이황, 이이, 송시열, 김집, 박세채뿐이었다. 이것은 신하와 학자로서 최고의 영예이자, 국가와 사림으로부터 확고부동한 유현(儒賢)의 지위를 공인 받았음을 증명한다.[15]

이러한 이언적의 높은 위상은 그를 배향한 서원들을 통해서도 짐작할 수 있다. 이언적은 전국적으로 14개 서원에 제향 되었으며, 그 가운데 9개소가 사액 되었다.[16] 그것은 문묘종사대현이자 분당 이전의 인물로서 당색과 무관하였기 때문이다. 17세기 이래로 서원은 제향과 강학 기능 외에도 재지사족들의 정치·사회·경제적 이해를 대변하는 조직으로 자리 잡아갔다. 그렇기에 서원을 갖추지 못한 고을에서는 사족들의 활동이 부진할 수밖에 없었다. 그러나 서원을 건립하기 위해서는 지역과 연고가 있는 제향인물이 필요하였다. 17세기 중반이후 서원이 남설 되면서 제향인의 기준이 낮아졌지만, 원래 서원 제향인은 반드시 학문이 깊고 사문(斯文)에 공이 있어야 가능하였다.[17] 그래서 사림의 종사(宗師)로 추앙받는 유현을 배출하지 못한 고을은 각종 연고를 내세워 서원을 건립하였다.

<표 1> 이언적 제향 서원

서원명	소재지	창건	사액	제향인	비고

15 이러한 현양사업은 이전인-이준 부자의 노력이 지대하였다. 이전인은 퇴계를 매개로 당국자를 만나 협조를 구하면서, 퇴계에게는 행장을, 기대승에게는 神道碑文을, 유희춘과 노수신에게는 遺稿와 관련한 서·발문을 받고 동시에 이들에게 유고의 교정도 받았다. 이전인의 사후에는 이준·이순 형제가 향중사림과 함께 옥산서원 건립에 적극 협조하였다. 이처럼 회재의 伸冤, 贈職, 諡號, 宗廟配享, 文集과 遺稿 간행, 서원 설립이 차례로 진행되고, 1610년 문묘에 종사되면서 회재에 대한 추숭사업은 일단락되었다.

16 『조두록』에는 이언적을 성주 천곡서원에 제향한 것으로 기재되어있다. 그러나 그 외의 문헌에서는 확인할 수 없다. 이에 『열읍원우사적』을 기준으로 하여서 천곡서원(영봉서원)은 제향서원 목록에서 제외하였다.

17 정만조, 「17~18세기 서원·사우에 대한 시론」, 『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7, 92~95쪽.

氷溪書院	義城	1556	1576	金安國·李彦迪·柳成龍·金誠一·張顯光	처가(1600)追享
玉山書院	慶州	1572	1573	李彦迪	본향
華山書院	全州	1578	1658	李彦迪·宋麟壽	첫 외관(수령)지
沂川書院	麗州	1580	1625	金安國·李彦迪·洪仁祐·李元翼·李植·洪命耆	貫鄕(1611)추향
景賢書院	羅州	1583	1607	金宏弼·鄭汝昌·趙光祖·李彦迪·李滉·金誠一·奇大升	추향(1589)
道南書院	尙州	1605	1677	鄭夢周·金宏弼·鄭汝昌·李彦迪·李滉·盧守愼·柳成龍·鄭經世	
曲江書院	興海	1607		李彦迪·趙絅	묘소
景賢書院	江界	1609	1675	李彦迪	유배지
南江書院	盈德	1621		李彦迪·李滉	
觀瀾書院	慈仁	1659		李彦迪	
道山書院	居昌	1660	1662	金宏弼·鄭汝昌·李彦迪·鄭蘊	
鷗江書院	蔚山	1678	1694	鄭夢周·李彦迪	隣鄕
鶴山書院	淸河	1692		李彦迪	
槃龜書院	彦陽	1712		鄭夢周·李彦迪·鄭逑	

경주는 일찍부터 재지사족이 번성하였고 이언적이 태어나고 성장한 곳이자, 그의 별업이 있는 곳이었기에 가장 먼저 옥산서원이 설립되었다. 전주 역시 재지사족이 번성하였던 곳으로서 이언적이 처음 지방관[부윤]으로 재직한 연고로 화산서원을 건립하였다. 흥해의 곡강서원은 이언적과 선대의 묘소가 있으며, 강계의 경현서원은 유배지였다. 의성의 빙계서원은 애초 김안국의 관향이라는 이유로 설립되었다. 그러나 1600년(선조 33)에 이건하면서 이언적의 처향(妻鄕)이라는 이유로 그를 추향하였다.[18]

18 이언적의 처가는 여말 이래 의성에 세거해온 함양박씨 가문이었다. 부인 咸陽朴氏는 세종대에 좌군총제를 역임한 朴成陽의 손자 訓導 朴崇阜의 딸이었다.

여주의 기천서원 역시 그곳 출신인 김안국을 제향하기 위해서 건립하였지만, 이언적이 문묘에 배향되자 김안국과의 인연과 그의 관향이라는 사유를 들어 1611년(광해군 3) 추향하였다.

나주의 경현서원은 호남 학맥의 연원인 김굉필을 제향하기 위해 건립되었지만 후에 동방오현 모두를 추향하였다. 비슷한 사유로 상주 도남서원에도 동방오현이 제향 되었다. 이외에도 울산 구강서원, 영덕 남강서원, 청하 학산서원, 언양 반구서원, 자인 관란서원 등은 경주에 비하여 재지세력의 형성과 그들의 향촌 장악이 늦은 지역이었다. 이들 지역은 서원에 제향 할 만한 본읍 출신의 인물이 없었기에 이웃한 경주 출신의 대현(大賢)인 이언적을 제향 하였다.[19] 인조반정 이래로 북인이 몰락하고 그로 인해 강우(江右)지역의 남명문인 가운데 서인내지 남인으로 전향하는 자들이 많았다. 이런 분위기 속에서 거창의 도산서원은 현풍·함양·경주 지역 남인 세력의 지원을 받기 위하여 김굉필·정여창·이언적 등을 제향한 것으로 보인다.

이상과 같이 이언적은 그의 사후 이황에 의하여 동방사현으로 추숭된 이래로 문묘와 종묘에 배향되고, 각 지역에서 서원이 설립되면서 17세기 이래로 조선 성리학의 정통을 잇는 대현이자, 지역적으로는 영남과 경주를 대표하는 인물로서 조야의 인정을 받았다. 비록 이이와 조식 이래로

여주이씨는 이언적 이래로 의성지역 재지사족과 혼인이 이어졌다. 회재의 양자 이응인은 함양박씨의 종손녀와 혼인하였으며, 그의 아들 李宜潛은 의성에 거주하는 永川李氏 李山岳의 사위가 되었다.

19 이수환, 「울산 구강서원의 설립과 사액과정」,『대구사학』 49, 대구사학회, 1995, 47~48쪽. 자인의 관란서원의 경우 경주부 속현으로 있던 자인현이 1637년(인조 15) 복현되고, 1653년(효종 4) 진량을 복속시킴으로서 성장의 기틀을 마련하였다(이광우·이수환, 「16~17세기 경상도 자인현 복현과정과 이를 둘러싼 자인경주지역 재지사족의 동향」,『고문서연구』 41, 2012). 이후 재지사족들이 성장하는 가운데 16세기 후반 경주에서 이거해온 여주이씨[李蓂-李運(晦齋 從弟)-讚仁-儀俊]들이 향촌지배력을 강화하기 위하여 이언적을 제향하는 1659년(효종 10) 관란서원을 건립하였다.

그들의 문인들로 대표되는 서인과 북인들에게 비판도 받았지만 남인 내에서는 퇴계와 더불어 높은 위상을 가졌다. 그러나 오랜 관료생활로 인하여 문인들을 크게 양성하지 못함으로써 그의 학문이 계승·발전해 나가는데 한계가 있었다.[20]

2. 옥산서원 건립과 조야(朝野)의 높은 관심

조선시대 서원제도는 주세붕에 의한 백운동서원의 설립으로 출현되었지만 이후 그것을 조선 사회에 보급·정착시키고 그 성격을 규정하여 발전의 토대를 마련한 것은 이황이었다. 그는 풍기군수 시절 백운동서원의 사액을 청하여 국가의 공식적 승인을 받았고, 이후 그의 문인들과 함께 서원 보급 운동을 전개하였다.[21] 이후 사림이 완전히 정권을 장악하게 되는 선조 대에 오면 서원은 본격적인 발전을 하게 된다.

제향자도 확대되어서 김굉필·정여창·조광조·이언적 등 사화기에 피화된 인물이 집중적으로 나타나고, 이황·이이·조식 등 당시 형성된 학파의 영수 및 성리학 발전에 크게 기여한 인물로까지 그 범위를 넓혀 나갔다. 사림은 서원의 제향 인물을 통해서 그들의 도학적 정통을 천명하고, 정치적 입장을 일정하게 강화하였다. 이러한 서원의 발전은 선조대 사림의 집권과 함께 시작된 붕당 정치와도 밀접한 관계가 있었다.[22]

---

20 현재 이언적의 문인으로 파악되는 인물들은 후학을 자처한 許曄(1517~1580), 盧守愼(1515~1590)등의 관료와 부내의 權德麟(1529~1573), 李弘慤(1539~?), 孫光皜(1520~?) 등이 있다. 이언적은 낙향하여 독락당을 짓고 수학하던 1531~1537년과 1547년 9월 강계에 유배를 가기 전까지 1년 동안 향리에 머물렀다. 이때에 보다 많은 문인들을 양성했을 것으로 추정되지만 현재 확인이 어렵다.

21 정만조, 「조선 서원의 성립과정」,『한국사론』 8,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80(『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7, 11-48쪽 재수록).

22 정만조, 「조선조 서원의 정치·사회적 역할」, 『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7, 175~194쪽.

옥산서원의 건립도 이러한 정치적·사회적 분위기 속에서 이루어졌다. 특히 제향자인 이언적은 당시 사림파의 도학적 정통 계승자로 천명되었기에 그를 위한 서원의 건립은 당연한 일이었다. 이언적의 위패는 옥산서원이 건립되기도 전인 1568년(선조 1)부터 부내의 서악서원(西岳書院)에 별묘 형태로 제향 되어 있었다.[23] 이황이 이언적의 행장을 지었던 1566년(명종 21) 이래로 조선 성리학의 정통을 계승한 동방사현으로 추숭되고, 선조가 즉위한 이래로 신원(伸冤)과 추증(追贈)이 이루어지자 그의 고향인 경주에서도 그를 추모할 필요성이 제기되었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나아가 1569년(선조 2) 시호(諡號)가 내려지고 종묘에 배향된데 이어서 『국조유선록』이 편찬되면서 그의 위상이 더욱 높아졌다. 이에 본격적으로 서원 건립에 대한 논의가 있었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옥산서원은 1572년(선조 5) 경주부 북쪽 화개산 아래의 자계천가에 건립되었다. 이곳은 회재가 어린 시절 독서하던 정혜사와 직접 건립한 독락당·계정이 있으며, 그가 소요하던 장수지(藏修地)였다.[24] 옥산서원의 창건 과정에 대해서는 구체적인 기록이 없지만 지방관과 향인·후손·문인 등이 공동으로 서원을 건립하였던 여타 초창기 서원의 창건 과정과 유사하였다.[25] 허엽(許曄)이 지은 『옥산서원기(玉山書院記)』를 보면, 경주부

23 「西岳書院考往錄謄草」(『옥산서원지』) "戊辰(1568) 奉安晦齋李先生位版 萬曆元年癸酉(1573)二月 移案于玉山書院" ; 『慶尙道邑誌』, 慶州府 玉山書院. "癸酉(1573) 自西岳鄕賢祠 移安位版". 당시 제문은 경주부윤 柳順善이 지었다(무첨당 소장, 『院規』, 「晦齋先生西岳書院奉安祭文(府尹 柳順善)」).

24 이언적은 이곳에서 도학과 주변의 자연경관에 대한 많은 시를 남겼는데, 대표적인 시가 1535년(중종 35)에 지은 「林居十五詠」이다(李彦迪, 『晦齋先生集』 卷2, 律詩絶句, 「林居十五詠 乙未(1535)」). 그는 이 시를 지어 은거하는 삶과 그 志趣를 노래하였다. 또한 독락당 주변으로 흐르는 자계천 주변의 盤石에 澄心臺, 濯纓臺, 詠歸臺, 洗心臺, 觀魚臺라는 오대의 이름을 짓고, 이를 둘러싼 서쪽의 紫玉山, 북쪽의 華蓋山, 남쪽의 舞鶴山, 동쪽의 道德山 등 네 산도 직접 이름 붙였다(李彦迪, 『晦齋先生集』, 年譜).

25 정만조, 「17~18세기 서원·사우에 대한 시론」, 『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7, 107~139쪽.

윤 이제민(李齊閔)이 회재 문인 권덕린(權德麟, 전 합천군수) 등 향중의 사림의 건의를 받아들여 이를 경상감사에게 보고하자, 감사 임설(任說)이 예조에 계청(啓請)하여 창건하였다. 그 과정에서 부윤 이제민은 서원 창건에 소용되는 재목과 물품을 기부하고, 또 직접 터를 잡고 인부를 고르는 등 창건 역사를 실질적으로 주관하였다. 여기에 향촌 내 유생들이 힘을 더하여, 1572년(선조 5) 2월에 공사를 시작하여 8월까지 사우(祠宇)·강당(講堂)·동서재(東西齋) 등 총 40여 칸이 완성되었다.[26] 그리고 이듬해 2월에는 이언적의 위패를 서악서원 별묘에서 이안(移安)하였다.

당시 건립된 건물 중 사당인 체인묘(體仁廟), 강당인 구인당(求仁堂), 강당의 좌·우협실인 양진재(兩進齋)와 해립재(偕立齋), 무변루(無邊樓), 정문인 역락문(亦樂門)은 영의정 노수신(盧守愼)이 명명하고, 현판은 당대의 명필인 석봉(石峰) 한호(韓濩)가 썼다. 동재·서재인 민구재(敏求齋)와 암수재(闇修齋)는 성균관 대사성 허엽(許曄)이 명명하고, 현판은 승지 배대유(裵大維)가 썼다. 옥산서원 사액판은 교서를 받들어 영의정 이산해(李山海)가 썼다.[27] 특히 이들 당호는 이언적의 학문과 연관되어 있다는 점에서 더욱 의미를 가진다.[28] 체인묘의 서북쪽에는 1577년(선조 10)에 건립된 신도비(神道碑)와 이를 보존하기 위해 지은 비각을 세웠다.

---

26 『列邑院宇事蹟』, 慶尙道 玉山書院, 「書院記」(許曄) ; 許曄, 『草堂先生文集』記, 「玉山書院記」 ; 李彦迪, 『晦齋先生集』附錄, 「玉山書院記」(許曄). "府尹李侯齊閔 採鄕十三之願 躬卜定其基 告于監司 請建書院 出其庫餘 以主其費 鄕老儒士亦盡其力 壬申(1572)二月始事 八月訖功 則祠宇與講堂 暨東西兩齋 及乎前樓總四十餘間 吁盛矣哉". 현재 향인 13인의 건의로 부윤이 주도한 것으로 해석하고 있다. 그러나 공론의 博採라는 점에서 경주 인근의 13개 마을[鄕]로 보는 것이 타당할 것이다.

27 『열읍원우사적』, 경상도 옥산서원, 「建院事實」, 「書院記」.

28 구인당의 '구인'은 이언적의 저술인 『구인록』에서 따온 것으로 성현의 학문이 오로지 '仁'을 '求'하는 데 있다는 이언적 성리학의 핵심 사상을 의미한다. 사당인 체인묘의 '체인'은 어질고 착한 일을 실천에 옮긴다는 의미이며, 성리학의 중요 사상 가운데 하나로 이언적 사상의 근간을 이루는 것이다(정만조 외, 「옥산서원 편」, 『한국의 서원유산』 1, 한국서원연합회, 179~182쪽).

이 신도비는 기대승(奇大升)이 지었고, 글씨는 이산해가 썼다.[29] 이외에도 서원 외부 암반의 '세심대(洗心臺)'와 '용추(龍湫)' 각자(刻字)는 이황의 글씨였다. 이처럼 옥산서원의 건물 명칭은 이언적의 철학을 담아내고 있었다. 아울러 이를 명명하고 편액을 썼던 인사들은 모두 당대 최고의 문장가이자 관료들이었다. 이것은 그만큼 이언적의 위상이 조야에서 높았음을 알려준다.

한편 옥산서원의 안정적 운영을 위한 초창기 경제적 기반을 마련하는데 당시 부윤이었던 이제민과 그의 후임이었던 박승임(朴承任)의 역할이 컸다. 이제민은 서원 인근의 정혜(定惠)·두덕(斗德)[도덕암]의 2개 사원 및 사기(沙器)·수철(水鐵)·야철점(冶鐵店)을 서원에 소속시켜 그 경제적 기초를 마련하였다.[30] 후임 박승임(朴承任) 역시 녹봉을 내어서 서원의 운영 재원을 마련하는데 도움을 주었다. 또한 1573년(선조 6)에는 감사 김계휘(金繼輝)가 계달(啓達)하여 사액(賜額)이 내려졌다.[31] 사액은 국학기관인 향교에 준하는 지위를 국가로부터 공인받는 것일 뿐만 아니라 서적을 하사하고, 제수가 관급(官給)되었다.[32] 이외에도 서원에 소속된 토지와 원속은 해당 지방관의 명으로 면세(免稅)·면역(免役)되는 것이 관례화되어 있었다. 그렇기에 사액은 해당 서원의 사회적 지위를 격상하

29 1586년(선조 19)에 향중의 사림들은 이언적의 묘소 앞에 또 하나의 신도비를 세웠다. 碑銘은 기대승이 지은 것을 사용했지만, 글씨는 양동 출신의 진사이자 원장을 역임하였던 孫嶲이 썼다.

30 「玉山書院 傳敎謄書 謄草」 末尾 「考往錄」(謄抄) "隆慶五年壬申 府尹李公齊閔 定惠斗德兩寺 及沙器水鐵冶鐵各店 定屬完護". 임신은 융경 6년(1572, 선조 5)이므로 오기로 보인다. 현재는 전하지 않는 초창기 서원의 역사를 기록한 『고왕록』에서 발췌한 것으로 보인다.

31 『선조실록』 권7, 선조 6년(1573) 11월 28일 ; 「1839(己亥) 慶州士林幼學孫永祿等 上書」(『玉山書院誌』 수록). "萬曆壬申 道伯任相公狀請 而刱建之 翼年癸酉 黃江金尙書啓達 而宣額焉 至於辦物鳩材 又有其時本尹 李公齊閔朴公承任相繼 而捐廩以至相 基調丁必躬必親 本州之人士 則爲士者趍事 而已爲工者殫巧"

32 경주부에서는 옥산서원 춘추향사에 제수로 쌀을 보내왔는데, 사액이후 1910년까지 계속 지원되었다(『집사기』 참조).

고, 교육 및 경제적으로도 큰 혜택이었다.

이외에도 교육기관으로서의 면모를 갖추기 위한 서적 기증이 이어졌다. 경주부에서는 옥산서원 건립 이전까지 간행하였던 경서(經書)와 역사서 등을 기증한 것 외에도 왕명에 따라 그의 문집과 저술을 간행하여 기증·보급하였다. 1574년(선조 7)에는 부윤 이제민이 경상감사 노진(盧禛)에게 건의하여 국가의 지원을 받아 1575년(선조 8)에 『회재집』을 경주부에서 처음 간행하였는데, 이때 그의 저술인 『대학장구보유』와 그 부록으로 『속대학혹문』도 함께 간행하였다.[33] 특히 『(중용)구경연의』의 경우에는 옥당(玉堂)[홍문관]에서 교정하고, 1583년(선조 16) 경주부에서 간행하였다.[34] 이처럼 서원 건립 직후에는 경주부와 후손·문인들로부터 기증된 서적이 옥산서원 장서의 초석(礎石)을 이루었다. 뿐만 아니라 왕명으로 1577년(선조 10)과 1588년(선조 21), 1590년(선조 23)에 서적이 하사되었다.[35] 이처럼 옥산서원은 건립 당시부터 지방관의 적극적인 지원과 국왕의 명으로 사액과 서적이 내려지고, 회재의 문집이 간행되었다. 그 결과 옥산서원은 건립과 동시에 경주 부남(府南)의 향교(鄕校), 서악

33 당시 『회재집』의 교정은 이언적의 동료였던 유희춘이 이준의 요청으로 보았다(『회재선생집』, 柳希春 跋. "… 願見全集者久矣 今鷄林尹李侯齊閔請於方伯盧公禛鳩材募工開板 …"). 유희춘은 이외에도 詩文과 年譜의 교정도 아울러 보았는데, 후에 『회재집』 발문을 지었다((국역)『미암일기초』, 계유(1573) 12월 15일 ; 무술(1574) 1월 11일). 이언적과 사우 관계있던 노수신은 『회재집』 서문과 「年譜後叙」, 「大學補遺後跋」 및 「玉山書院諸額贊」을 지었다(이수건, 「회재 이언적 가문의 사회·경제적 기반」, 『민족문화논총』 12,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1991, 68~69쪽).

34 이언적의 『구경연의』는 1574년 9월 庶孫 李浚이 유희춘을 찾아가 鑄字로 인출하기를 요청하자, 유희춘이 啓上하여 경상도에서 인출할 것을 요청하고, 11월에 옥당에서 이를 교정하였다(『선조실록』 권8, 선조 7년 9월 27일 무술 ; 선조 7년 11월 4일 갑술). 하지만, 실제 간행은 1583년(선조 16) 경주부에서 처음 간행되었다.

35 『열읍원우사적』, 경상도 옥산서원, 「古蹟」. "…萬曆五年 我宣祖大王十年丁丑八月 宣賜四書六經各二帙 朱子大全 朱子語類 儒先錄各一帙 十六年戊子 宣賜諺解小學一帙 十八年庚寅 宣賜四書諺解各一帙 以上諸書 竝藏置于尊經閣…"

서원(西岳書院)과 더불어 부북(府北)을 대표하는 교육기관으로 자리매김하였다. 그러나 16세기 후반의 강학 활동 실상은 관련 자료가 없어서 확인이 불가능하다.

Ⅲ. 17~18세기 중반의 위상 유지 노력

1. 유생 강학을 통한 위상 유지

옥산서원의 창건 이후 변천과정에 관해서는 구체적으로 알 수 없다. 원래 서원의 역사를 정리한 『고왕록(考往錄)』이 있었지만 현재는 19세기의 『고왕록』(1816~1873) 1책만이 남아있다.[36] 그러나 현전하는 자료를 통해 옥산서원에서 중요하게 여기며 수세기 동안 관리해온 것들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그것은 서원 초창기부터 있었던 건물과 이언적의 문집 및 저서를 판각한 책판, 내사본을 비롯한 장서(藏書)들이었다.

주지하다시피 임진왜란으로 조선 사회는 큰 피해를 입었다. 특히 왜군의 진격로에 위치하였던 경상도는 피해가 심하였다. 경주 역시 치열한 공방전이 있었던 곳이기에 이를 복구하는 데 많은 시간과 노력이 들었다. 그러나 옥산서원은 경주 외곽의 계곡에 위치해 있어서 전란의 피해를 상대적으로 적게 받았다. 비록 대부분의 경제적 기반이 붕괴 되었지만 서원 건물은 창건 당시의 형태를 유지할 수 있었다. 이후에도 18세기까지 대대적인 중건·중수는 없었으며, 시간이 지나 퇴락한 건물을 간단히 보수하는 정도였다.[37] 아울러 사액 당시 하사받은 내사본(內賜本)과 회재의 친필고

36 19세기 후반 작성된 「경주 옥산서원 및 여주이씨 무첨당 소장 서적목록」(《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에는 『고왕록』 5책이 당시 있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이는 18세기 작성된 『傳與記』에서도 확인된다.

37 자료의 부족으로 모든 건물을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묘우에 한정하여 보면, 1605년 8월과 1611년 2월, 1618년 2월에 묘우에 비가 새어서 改修하였으며, 1626년

본(親筆稿本) 등의 서적 또한 온전히 보존할 수 있었다. 이처럼 각 건물에 남은 명필들의 필적과 초창기 장서(藏書)들은 전란이후 대부분의 자취가 사라진 다른 서원들과 대비되었다.[38]

한편 임진왜란을 겪으면서 경주를 비롯한 인근 지역의 향교와 서원은 모두 소실되었다. 임란 직후부터 이를 중건하려는 노력이 진행되었지만 교육기관으로서의 기능을 회복하는 데는 오랜 기간이 소요되었다. 실제 경주 인근의 영천(永川) 임고서원(臨皐書院)은 임란 당시 소실되어 1603년(선조 36)에 중건하였다. 경주의 서악서원도 임란 당시 소실되어서 1600년(선조 33)에 사묘를 중건하여 위패를 봉안하였지만, 강당과 재사는 1610년(광해군 2)에 중건하였다. 경주향교 역시 1600년(선조 33)에 대성전을 중건했지만, 명륜당과 동·서재는 1614년(광해군 6)에 중건하였다. 이처럼 향교와 서원이 교육 기능을 회복하는 기간 동안 유생들의 교육은 중단될 위기에 처하였다.

반면 옥산서원은 건물과 서적의 피해가 전무하였다. 그래서 1610년 이전까지 경주부 전역에서 유일한 교육기관이 되었다. 게다가 경연(經筵)에 사용할 것이 부족할 만큼 서적이 귀하였던 시기였기에 내사본을 비롯

6월 17일부터 10월까지는 묘우를 重建하였고, 1689년 7월에도 개수가 있었다(『집사기』 2책, 1585~1696). 현전하는 중건·중수 관련 자료는 19~20세기에 작성된 것들이다. 대표적으로는 1839년 화재로 소실된 구인당 중건이 있었다(『구인당중건일기』, 1840). 당시에도 창건 이래 처음 겪은 화재이자, 대규모 중건으로 인해 매우 혼란스러웠음이 확인된다.

38 초창기 옥산서원 장서의 수량은 정확히 알 수 없다. 그러나 서책치부(1713)와 현전하는 서적 등을 토대로 추정하면 임란이전 115종(1,239책)의 장서가 있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이 수치는 1602년에 소수서원이 소장하고 있던 장서 107종(1,678책)과 비슷한 수량으로써 비록 소수서원보다 30년 늦게 건립되었지만,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그만큼 높았음을 나타낸다. 특히 전란 중에도 서적을 보존할 수 있었던 옥산서원에서는 1599년 왕명으로 경전 23권을 홍문관에 진상(『열읍원우사적』, 경상도 옥산서원, 「고적」 ; 『선조실록』 권116, 선조 32년(1599) 8월 11일)한 사실과 이후 문묘종사 대현을 제향하는 서원에만 서적이 반질됨으로 인해 영남 내에서도 도산서원과 더불어 다수의 내사본을 갖춘 서원이 되었다. 그러나 임란이전 古本은 옥산서원이 많다.

하여 다양한 장서를 갖춘 옥산서원은 지방 유생들의 지식 함양과 과업(科業) 준비에 매우 유용한 장소였다.[39] 이러한 장점에도 불구하고 당시는 임란 직후였기에 사회·경제적으로 매우 피폐한 상황이었고, 서원의 재정 상태도 나빴기에 정상적인 교육은 진행되기 힘들었다.[40]

그렇기에 많은 비용이 소용되는 거재(居齋)와 거접(居接)은 당장 시행하지는 못하였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이런 가운데 1610년(광해군 2) 5월 옥산서원은 당시 영천에 거주하였던 장현광(張顯光, 1554-1637)을 초대하여 강회(講會)를 개최하였다. 이 강회는 당시 원장이자, 그의 문인이었던 권응생(權應生, 1571~1647)의 주선으로 마련되었다. 당대의 거유(巨儒)였던 장현광의 강회는 경주와 인근 지역의 침체된 문풍(文風)을 쇄신하고, 유생들에게 옥산서원의 교육 활동을 과시하는 효과가 있었다.[41]

같은 해 8월에는 이언적이 문묘에 종사되고, 치제(致祭)가 내려지면서

---

39 실제 옥산서원은 1599년(선조 32)에 왕명으로 경전 23권을 홍문관에 진상하였다. 이는 옥산서원 장서가 경주뿐만 아니라 전국적으로 비교해도 당시 양질의 장서를 갖추고 있었음을 알려준다(『열읍원우사적』, 경상도 옥산서원 고적; 『선조실록』 권116, 선조 32년 8월 11일; 권117, 선조 32년 9월 25일).

40 17세기 옥산서원 재정 상황은 당시 관찰사·경주부윤·경상우수사·흥해현감·연일현감 등에게 屬寺, 屬店의 院屬과 院奴에 대한 免役, 免稅를 청원하였던 上書와 題音을 筆寫한 『呈書謄錄』(1585-1683)에 잘 들어난다(<영남권역자료센터 http://yn.ugyo.net>에서 원문과 이미지를 서비스하고 있다. 이하 영남권역자료센터에서 인용한 고문서 등은 별도로 출처를 밝히지 않는다).

41 李玄逸, 『葛庵集』 別集, 卷6 行狀, 「宣敎郎行大君師傅 盧公(亨弼)行狀」. "聞旅軒張先生講道玉山 卽負笈往從之 質疑問難 自是聞見日益富 交遊日益廣" ; 『尋院錄』(宙), 庚戌(1610) 5월 1일. 강회의 정확한 날짜는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심원록』에서는 여헌이 永川에 거주하던 시기에 방문한 것이 확인된다. 그래서 영천에 거주하는 문인 曺瓊, 鄭四震, 全有性 등과 함께 내원하였다. 당시 옥산서원 원장은 권응생으로 장현광의 문인이었다. 당시 강회의 구체적 내용은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盧亨弼(1605-1644)의 행장을 참고하면 '理氣論'을 강론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당시 강회는 그만큼 수준이 높았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한편 강회의 절차는 1606년(선조 39)에 鄭逑가 제정한 「講法」과 「通讀會儀」(『寒岡續集』 卷4, 雜著)가 이미 있었기에 두 인물의 긴밀한 관계를 유추한다면 이 규식에 따라서 거행되었을 개연성이 높다.

서원의 위상은 더욱 높아졌다.[42] 더불어 그의 학문에 대한 관심도 증가하였다. 이에 1575년(선조 8) 왕명으로 경주부에서 처음 출판하였던 이언적의 문집과 저서의 판목을 옥산서원으로 옮겨와서 이를 거듭 중간(重刊)하였다.[43] 당시 어려운 재정에도 불구하고 많은 비용이 소모되는 문집 중간을 수차례 추진한 것은 '회재학'의 확산뿐만 아니라 서원의 위상 제고에도 도움이 되었기 때문이다.[44] 실제 중간이 많다는 것은 서적의 인출이 많았다는 것이며, 그만큼 이언적의 학문이 널리 알려졌다는 것을 의미한다. 옥산서원에서는 그 과정에서 거듭된 인출로 훼손된 판목을 수리하거나 새로이 판각하였다. 그런 점에서 회재의 문집과 저술 책판을 보관하고, 그의 친필이 새겨져있던 정혜사의 중요성도 더욱 부각되었다.[45]

---

42 현전하는 이언적이 승무 당시의 기록은 전무하다. 다만 『심원록』을 통해 문묘 종사가 되던 1610년(광해군 2) 8월 19일 옥산서원에서도 치제가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당시 사제관은 예조좌랑 南以俊이며, 大祝은 영천군수 孫燿였다(『심원록』(宙) 경술(1610) 8월 19일). 그 외 다른 인물은 확인되지 않는데 아마 별도의 명단을 만들었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43 옥산서원에서는 경주부에서 목판을 옮겨와서 1624·1631·1641·1665년에 『회재집』(3-6刊)을 거듭 改版하여 중간하고, 1631년(인조 9)에는 『漢史』를, 1662년(현종 3)에는 정구가 이언적·조한보와 주희·육구연 등의 태극논쟁, 주돈이의 「太極圖說」등을 모아서 편찬했던 『太極問辨』을 간행하였다(이병훈,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장서 수집 및 관리 실태를 통해본 도서관적 기능」, 『한국민족문화』 58,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6, 433~435쪽). 이외에도 경주부에서 『東京雜記』(1669), 『梅月堂四遊錄』(1670), 『益齋亂藁』·『櫟翁稗說』(1693) 등을 출판하여 보내오고, 소론계 경상감사 최석항은 1701년 『光國志慶錄』을 보내왔다. 이것은 옥산서원이 色目에 구애받지 않을 만큼 당쟁에서 벗어나 있었음을 나타낸다.

44 책판의 제작에는 많은 비용이 필요했다. 그렇기에 여타 서원이나 문중의 도움을 받아서 제작하는 경우도 있었지만 회재의 저서와 문집은 『퇴계집』 등에 비해 분량이 적은 편이었다. 그래서 옥산서원은 책판 제작 시에 미리 계획을 세워서 일정기간 동안 제작비를 모아서 추진하였다. 일례로 「1735년(을묘) 8월 21일 당중 완의」를 보면, 4~5년 후에 이언적의 저서 판목을 중간할 계획을 세우고 소용될 물력을 미리 준비하기 위하여 청도 전답에서 수곡한 금액 중 일부를 전용하고 있다.

45 옥산서원에서는 거듭된 관의 침해로부터 정혜사를 보호하기 위하여 17세기 이

출판 비용의 증가로 서원 재정에 부담을 주었지만 실제로는 옥산서원에서 얻는 이익이 더욱 컸다. 실제 회재학의 확산으로 회재를 존모하여 서원에 알묘하고, 서원 주변에 남아있는 그의 자취를 탐방하는 인사들이 꾸준히 이어졌다.[46] 이에 서원 측은 건물을 수리하고, 원내의 유생들과 방문객들에게 음식을 제공하는 데 많은 자금이 필요하였다.[47] 그러나 임란 이후 사회·경제적 피해가 매우 심하여 이를 회복하는 데 오랜 기간이 필요했다. 그런 만큼 임란이후 서원의 경제적 기반을 회복하고, 나아가 확대하는 데 관의 지원이 절대적으로 필요한 상황이었다. 그렇기에 이언적과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높아질수록 중앙정부와 지방관의 지원을 받는 것이 더욱 용이했던 것이다.

옥산서원은 17세기 들어 높은 사회적 위상을 갖추었지만 임진왜란 직

래로 꾸준히 完文을 성급 받고, 한편으로는 낡은 사찰의 수리와 중수를 적극 지원함으로써 승려들의 逃散을 막기 위해 노력하였다. 1785년(정조 9)에 작성된 『本寺重修後餘錢置簿』를 보면, 1780년(정조 4) 폐허가 된 정혜사를 대대적으로 중수한 후 승려들을 새로이 모집하고, 그들의 도산을 막기 위해 규약을 제정하였다. 이러한 거듭된 노력은 정혜사가 1834년(순조 34) 소실된 후 서원의 재력이 부족하여 사찰을 중수하지 못하게 될 때까지 계속 반복되고 있었다.

46 일례로 前修撰 李仁復은 1718년 3월 3일에 방문하여 알묘를 한 후 회재가 유식하였던 계정과 주변을 둘러보고, 家藏된 회재의 유묵을 보았다. 또한 옥산서원의 『심원록』을 열람하며 자신의 5대조 李元翼이 방문한 사실을 보고 감회를 적었다(『심원록』呂, 무술(1718) 3월 3일). 『심원록』에는 이처럼 방문객들이 先祖나 어릴 적 자신의 묵적을 찾아보고 감상을 적은 글귀가 다수 있다.

47 실제 옥산서원은 1613년 廚庫가 비었고, 노비가 죽어 없어져서 多士의 供饋를 지탱할 수 없으니 近邑 屬公奴婢 약간을 特給해 주길 순찰사에게 요청하였다(『정서등록』 만력 41년(1613) 2월 21일). 서원 운영에서 공궤 비용이 많은 부분을 차지함을 알 수 있다. 1743년(계해) 7~12월 『會計記』를 보면 일반적으로 매달 14~15냥이 일용비로 사용되었으며, 향사가 있을 시에는 35냥을 썼다. 그 외에 거재, 향회 등의 모임이 있으면 20~25냥을 사용했다. 많은 유생들이 모이는 달에는 비용이 그만큼 늘어났다. 18세기 중반 작성된 『등록』에서도 많은 선비들이 就接時에는 선비들을 소작인의 처소에 머물도록 했고, 3두락으로 한정하여 창고에서 닭 1마리씩을 받드는 데 쓰도록 했다(多士聚接時則士防[畓]田半作人處限三斗落庫鷄一首式棒用事).

후였기에 물력의 부족으로 강학 활동을 활발히 전개하지는 못하였다. 하지만 창건이래로 유생들의 강학을 위한 장서를 지속적으로 구비하고 관리해 왔다. 그 결과 18세기 중반까지 장서를 1권도 잃어버리지 않고 전승해왔다. 또한 부정기적이지만 명사를 초빙하여 강회(講會)를 개최하거나, 거재(居齋)를 통해 학문과 예법을 익히는 교육기구이자, 향론을 주도하는 향촌지배기구로서의 역할을 수행하였다. 일반적으로 18세기 이래로 서원들의 남설과 정부의 제재로 인한 서원의 위상이 약화되고 교육적 기능도 사라져갔다. 이러한 때에 옥산서원은 원생들의 거재(居齋)와 거접(居接)을 정기화하면서, 오히려 교육적 기능을 강화하고 있었다.

옥산서원이 교육기구로서 본격적인 강학 활동을 한 것은 서원 재정이 안정화되던 17세기 후반부터였다. 실제 『심원록』을 보면 17세기 후반부터 거접과 거재를 실시했으며, 서원 재정이 악화되는 18세기 중반이후 중지된 것으로 보인다.[48] 그러나 현재 구체적인 강학활동 기록이 남아있지 않아서 자세한 사정을 파악하기는 어렵지만 대략적인 흐름은 파악이 가능하다. 당시 옥산서원 거재와 거접에는 타읍 유생들의 참여가 꾸준히 이어지고 거듭 참석하는 자들도 많았다. 이것은 옥산서원이 강학처로서 유생들에게 명성이 높았음을 알려준다.

일례로 의성의 오시봉은 1708년(숙종 34) 생원시에 입격하기 전까지 옥산서원 거재와 거접에 총 4차례 참여하였다. 1693년(숙종 19) 11월의 거재에 참여한 영천의 월송재(月松齋) 정석임(鄭碩臨, 1669~1739)은 이현일(李玄逸)의 제자였던 훈수(塤叟) 정만양(鄭萬陽, 1664~ 1730), 지수

48 거접, 거재와 같이 일정기간 동안 유생들이 머물면서 학습하는 방식은 서원 입장에서는 많은 비용이 필요한 일이었다. 16세기의 사정은 파악할 수 없지만 『呈書謄錄』(1585~1683)에 의거하면 전란직후 옥산서원에서는 임란 당시 망실한 원전과 노비 및 원속을 정비하는 한편 이를 확대해 나갔다. 그 결과 17세기 말에 이르러 경제적 기반이 안정화되자 이를 바탕으로 거재와 거접을 시행하였다. 이것은 당시 급변하는 정국 속에서 서원의 교육적 기능을 유지·강화함으로서 내실을 키우려는 의도로 추정된다.

(箴叟) 정규양(鄭葵陽, 1667~1732) 형제 등과 교유했으며 학문으로 명망이 높았다. 정만양 역시 1697년(숙종 23) 거접에 참여하였다. 또한 1687년(숙종 13) 2차례 거재에 참여한 소헌(所軒) 박태주(朴泰胄)는 영해 인량리에 거주하는 무안박씨의 장손이었다. 이들은 모두 당시에는 20~30대로서 인근 고을의 명문가 자제들이었으며, 학문 정진과 과업을 목적으로 옥산서원 거재와 거접에 참여하였다.[49]

옥산서원의 거재는『심원록』을 참고하면 최소한 1764년(영조 40)까지 시행되었다. 그러나 거접은 1753년(영조 29) 2월을 기점으로 폐지된 것으로 보인다.[50] 주된 사유는 서원의 서책을 거접 유생들이 마음대로 산당에 가져다 보면서 많은 서적을 잃어버렸다는 것이다. 하지만 이외에도 거접에 소용되는 비용이 많았던 것과 그 실효성에 대한 부정적 인식도 한 요인으로 추정된다.[51] 옥산서원 당중에서 산당 거접에 대한 지원 중단을

49『심원록』에서 확인되는 거재와 거접에 참여한 인사들은 모두 해당 지역의 명문가 자제들이었다. 이들은 의성의 고창오·경주최·의성김·아주신·안동권·함안조씨, 영천의 영일정·창녕조·영천이·달성서씨, 영해의 재령이·안동권·무안박·영해백씨, 현풍의 현풍곽씨, 성산의 성주이씨, 안동의 풍산류·의성김·한양조씨 가문의 자제들이었다. 게다가 확인되는 인물들은 대부분 宗派에 해당되었다. 이는『심원록』에 입록하는 인사들에 대한 철저한 신분 확인이 진행되었음을 나타내기도 하지만, 옥산서원 강학 활동이 이들 가문과의 연대를 강화하는 수단으로도 이용되었음을 짐작케 한다.

50「계유(1753) 2월 초10일 당중 완의」. "一.書冊山堂來往已成痼弊 此後則栖寺讀書製述之員 偕非自院役施 則任自切勿出給事"

51 경주에서는 임란이후 1618년(광해군 10) 李宜活을 시작으로 서인 집권 하에서 1625년(인조 3) 金宗一, 1657년(효종 8) 李耆徵, 1684년(숙종 10) 孫德升 만이 급제했다. 이후 남인이 집권했을 때인 1693년(숙종 19) 南九明을 마지막으로 갑술환국이후 1741년(영조 17) 南濟萬, 朴弼相이 급제할 때까지 48년간 1명의 문과 급제자도 없었다. 이후 영조의 탕평책 하에서도 경주지역에서는 1750년(영조 26) 李憲默만이 확인된다. 그의 급제이후 요직 승진에는 영조가 이언적에 특별히 관심을 가지며 후손을 등용하였기 때문이다. 경주 출신 인사들의 과거급제는 정조가 집권하였을 때 10명으로 가장 많았다. 1777년(정조 1) 南景羲, 權應範, 李鎭宅, 1783년(정조 7) 李鼎德, 崔璧, 1786년(정조 10) 李鼎秉, 1790년(정조 14) 李鼎牧, 李觀吾, 1792년(정조 16) 崔心健, 1795년(정조

결정하기 이전인 1752년(영조 28) 가을에는 부남의 용산서원에서 거접을 처음으로 시행하였다.

용산서원『거접시도기(居接時到記)』를 보면 1752년(영조 28)에는 169명이 거접에 참여하였다. 거접 참여자 수는 이후 점차 줄어들었지만 1761년(영조 37)에 78명, 1797명(정조 21)에 68명 등 대체로 70명 내외로 참여하고 있었다. 참여자들은 경주최씨가 가장 많았지만 경주이씨·손씨, 풍천임씨(豊川任氏), 서산류씨(瑞山柳氏), 곡산한씨(谷山韓氏), 여주이씨 등 용산서원 주변과 경주의 대표적 사족들이 고루 참가하였다. 당시 경주최씨들은 18세기 들어 최진립(崔震立, 1568~1636)의 현양(顯揚)사업을 추진하면서 1711년(숙종 37) 사액된 숭렬사우(崇烈祠宇)를 용산서원으로 승원(陞院)하고, 1740년(영조 16)에는 초대형 신도비(神道碑) 건립을 추진하였다. 그 연장선상에서 대규모 거접을 시행하면서 서원으로서의 정당성을 확보하고자 했던 것이다. 이러한 거접이 매년 시행되었는지는 확인할 수 없지만 옥산서원이 산당 거접에 대한 지원을 중단한 후 용산서원에서 거접을 주관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렇게 거접이 승계될 수 있었던 것에는 당시 옥산서원 원장의 역할이 컸다.

1714년(숙종 40)부터 1753년(영조 29)까지의 옥산서원 원장 31명 가운데 10명이 용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했으며, 부남에 거주하는 인사의 원장 선임이 크게 증가하고 있었다.[52] 이것은 18세기 이래로 옥산서원과 용산서원이 이들 원장을 매개로 교류가 확대되어 왔음을 알려준다. 특히 용산서원에서 대규모 거접을 시행하고, 옥산서원에서 거접에 대한 지원을 중단하였던 1752년(영조 28) 당시의 옥산서원 원장인 최적기(崔迪基, 1686~1754)는 최진립의 증손자이자, 1742년(영조 18)에 용산서원 원장

19) 崔仁簡 등이 있다(경주시사 편찬위원회 편,『경주시사』2, 세종인쇄출판사, 2006, 820~822쪽 ; 한국역대인물종합정보시스템 http://people.aks.ac.kr).

52 이병훈,「경주 옥산서원 원임의 구성과 성격」,『민족문화논총』67,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7, 54-69쪽.

을 역임했었다. 그렇기에 1752년(영조 28) 용산서원 거접을 계기로 이후 그곳에서 부내 유생들을 대상으로 거접을 계속 주관했을 개연성이 있다.

즉 1752년(영조 28) 당시 옥산서원은 장서를 대량 서실(闕失)하고, 서원 운영의 어려움이 심화되어 대대적인 쇄신(刷新)을 시행하던 시기였다.[53] 그래서 이미 폐단이 드러난 산당 거접의 계속된 운영은 부담이 되었다. 반면 용산서원은 강력한 경제적 기반을 바탕으로 승원이후 서원으로서의 정당성을 확보하기 위하여 교육적 기능을 강화할 필요가 있었다. 이처럼 두 서원의 이해관계가 합치되면서 당시 옥산서원 원장 최적기의 주선으로 용산서원에서 거접이 시행되었던 것으로 판단된다.

옥산서원은 18세기 중반이래로 거접과 거재를 순차적으로 중지하였다. 그 이유는 장서의 훼손을 방지한다는 것도 있었지만 경제적 부담이 가장 큰 이유였다. 그러나 서원의 교육적 기능을 완전히 배제할 수 없었다. 그렇기에 상대적으로 비용이 적게 들지만 꾸준히 유생들의 학업 성취도를 확인할 수 있는 순제(旬題)를 시행하였다. 이것은 거접을 대신하는 효과가 있었다. 이러한 전환은 옥산서원뿐만 아니라 당시 교육 활동을 이어가던 대부분의 서원에서는 일반적인 일이었다.[54]

옥산서원은 지방관이 직접 유생들에게 강회와 백일장(白日場)을 개설

53「계유(1753) 2월 초10일 당중 완의」. “完議 右爲完議事 本院書冊之典守 已至累百年之久矣 不意前秋所失 至於百餘卷之多 斯門之不幸極矣 看守之虛踈甚矣 若此不已則莫重經籍散失殆盡 豈非士林 惕念處耶 此莫非不能尊閣之致 不可無遵舊懲後之道 玆因享時齊會更定規例 以爲永久遵守之地 …”

54 용산서원에서는 1804년(순조 4) 이래로 1836년(헌종 2)까지 총 16회의 순제를 거행하여 평균 2년에 1번씩 시행하였다. 이후 순제와 관련한 내용은 확인되지 않는다. 옥산서원 순제는 1818년(순조 18)부터 1821년(순조 21)까지 매년 시부와 의의를 구분하여 시행하였다. 당시 순제에 응시한 자들은 1818년(순조 18) 60명, 1819년(순조 19) 49명, 1820년(순조 20) 44명, 1821년(순조 21) 89명으로 式年을 앞두고 증가하는 추세였다. 특히 1821년(순조 21)에는 영일과 흥해에서 14명이 순제에 응시하였다. 당시 구체적인 운영이나 시제, 시상 내역은 확인이 불가능하지만 부남의 용산서원에서 순제가 科試 형태로 진행되고 있었기에 옥산서원 역시 동일한 형태로 진행되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하기도 했다. 1749년(영조 25) 10월 4일에는 부윤 조명정(趙明鼎, 1709~1779)이 유숙한 후 유생들에게 '숙흥야매잠(夙興夜寐箴)'을 강(講)하였으며,[55] 1761년(영조 37) 4월 23일에는 부윤 홍양한(洪良漢, 1719~1763)이 유생들에게 강회(講會)를 열었다. 이외에도 같은 해 6월 26일에는 백일장을 개최하여 장현광의 독락당 시를 시제로 내기도 했다.[56] 이후 확인되는 백일장은 1840년(헌종 6) 3월 7일의 옥산서원 구인당 낙성식에서 경상감사 김도희(金道喜, 1783~1860)가 개최한 것이다. 당시에는 향내·외 유생 8,300여 명이 응시하여,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제고하는 데 큰 도움을 주었다.[57]

한편 1818년(순조 18)에는 소론(少論)의 명유로 칭송받던 봉화의 해은(海隱) 강필효(姜必孝, 1764~1848)가 『태극도설(太極圖說)』을 주제로 강회를 개최하였다. 태극론은 회재학의 핵심이 되는 이론이자 성리학의 근간이었다. 이러한 강회의 개최는 옥산서원이 과거 중심의 교육뿐만 아니라 성리학을 통한 유생 장수처로서의 본래 의무를 이어나가고자 했었음을 나타낸다. 그러나 유생 교육에 대한 비용 부담이 갈수록 심화되면서 1867년(고종 4)에는 용산서원과 강회를 합설하자는 의견이 나오기도 했다.[58]

---

55 『심원록』(己巳三月日), 1749년 10월 4일. "己巳十月初四來謁 仍宿兩進齋 去往生講夙夜箴".

56 『심원록』(崑) 辛巳(1761) 4월 22일 "辛巳四月二十二日 以府尹來謁留一日 聚諸生設講會"; 6월 26일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 設白日場于杏壇 以旅軒獨樂堂詩 命題試士信宿而歸"

57 이병훈, 「19세기 초 경주 옥산서원 강당 중건과 위상변화」, 『한국학연구』 57, 고려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 2016, 266~267쪽.

58 「1867년 정월 5일 옥산서원 회원 유학 이남상 외 통문」. 한편 1868년(고종 5)에는 朝令에 의해 사액서원에 지방관이 원장으로 임명되었다. 당시 경주부윤 趙耆永은 補院錢 300냥을 내어 府吏廳에 殖利하게 해서 그곳에서 나오는 이자 120냥을 부내의 옥산서원, 서악서원, 용산서원에 40냥씩 나누어 주어 흥학자금으로 쓰도록 했다. 이처럼 19세기 말의 서원 교육은 지방관의 지원이 필요할 만큼 재정적 어려움이 커져가고 있었다.

이상과 같이 서원의 교육 활동은 해당 서원의 위상을 확립하고 유지하는 토대가 되었다. 그러나 옥산서원의 인적·물적인 문제가 점차 심화되면서 이러한 사정을 고려하여 유생 교육을 탄력적으로 운용하였다. 즉 많은 비용이 소모되고 폐단이 많은 거접과 거재를 차례로 중단하고, 순제와 강회를 통해 19세기 말까지 교육 활동을 계속 이어갔다.

2. 다양한 방문객을 통한 위상 유지

옥산서원에는 서원 방문객의 명단인 『심원록(尋院錄)』과 『본향심원록(本鄕尋院錄)』이 남아있다. 『심원록』이 부외(府外) 인사들의 명단이라면, 『본향심원록』은 부내 인사들의 명단이다. 서원이 건립되던 1573년(선조 6)부터 기록된 『심원록』은 1875년(고종 12)까지 31,225명이 수록되어 있다. 반면 『본향심원록』은 1756년(영조 32)에 처음 작성되어 1875년(고종 12)까지 22,260명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심원록』의 입록은 타 지역 방문객의 신분과 지위 등을 확인하여, 알묘 후 자필로 작성하는 것이 원칙이었다. 그렇기에 선별된 인사만이 기재되었다고 볼 수 있다. 그럼에도 약 300년간 3만 명이 넘는 인원이 방문했다는 것은 옥산서원을 방문했던 관료 및 지방관과 각 지역을 대표하는 사족가문의 인사들이 그만큼 많았음을 나타낸다. 반면 120년 동안 2만 명이상의 경주부내 사족들이 방문하여, 외부 인사들에 비하여 그 수가 많은 것은 당연한 결과였다. 부내 인사들은 옥산서원의 각종 향례와 유회 등에 참석하기 위하여 방문하거나, 강학과 문회(文會) 등의 기타 사유로 수시로 방문하는 자들이 많았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일반적으로 여타 서원에서는 본향 출신들의 방문시 방명록을 작성하지 않았다. 옥산서원에서도 마찬가지였다.

그런데 1756년(영조 52)부터 옥산서원에서는 다른 곳과 달리 『본향심원록』을 만들었다. 이것의 제작 사유는 첫째, 원칙적으로 『심원록』에는

외부의 인사들만 기록이 가능하였기에 옥산서원에 출입했던 경주부내 선부로(先父老)들의 자취를 찾을 수 없다는 것이었다. 그래서 부내 인사들의 방문 내역을 기록하여 후손들이 찾아볼 수 있도록 한다는 것이다. 두 번째는 원복(院僕)들의 사기(詐欺)로 폐단이 누적되어 서원 재정을 악화시켰기 때문이다. 그래서 부내 방문자들의 성명과 동행한 노마(奴馬), 숙박 유무 등을 기록하고, 그날의 『고자용하기(庫子用下記)』를 서로 비교하여 매일의 사용하는 것을 점검할 목적에서 만들었다.[59] 한편 『심원록』에서도 1804년(순조 4) 4월부터 동행한 노비와 말의 수를 기재하고 있다.[60] 이 역시 『본향심원록』의 제작 목적과 같이 재정현황을 파악하기 위하여 시행된 것이다. 또한 이때부터 내방객을 제외하고 그와 동행하였던 자제(子弟)나 노비와 말의 식대를 받았을 가능성이 높다.[61] 하지만 향사 및 유회 등의 공적인 일로 내방한 자들에 대한 음식 공궤는 전란이후인 17세기 초반의 어려운 환경에서도 유지되었으며 그런 전통은 20세기 초까지 이어졌다.[62]

인조반정 이후에는 안동권 인사들이 폭발적으로 증가하고, 상주권 인

59 『본향심원록』, 「당중 완의」(1756년(병자) 10월 15일). 1756년 10월 16일부터 경주 향내 방문객들의 성명과 방문일, 유숙여부와 노비와 말을 끌고 온 내역 등을 기록하였다.

60 1739년 12월 10일에 처음으로 자제를 거느리고 알묘한 사례가 확인된다(『심원록』(結), 기미(1739) 12월 10일. "南陽 洪鳳祚 己未十二月初十日 率子弟謁"). 그러나 동행한 子弟, 奴馬 등에 대한 본격적인 기록은 1804년 4월 부터였다(『심원록』(海), 갑자 4월 11일. "永川 李箕相·李奎相·李台相 居德坪 同月十一日 樂育齊至路 俱奴馬 來宿祗謁").

61 비슷한 시기 도산서원에서는 19세기 초부터 방문객과 동행한 말, 노비의 식대를 받기 시작하였다. 또한 후손이라 하더라도 원안에 입록되지 않았다면 음식을 공궤하지 않았고, 나아가 서원의 출입도 금지하였다(도산서원, 「丁卯年 完議」, 「丁未年 式例」).

62 1912년 「완의」(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옥산서원은 소작인들의 세금을 삭감해주는 방식으로 이들이 방문객들에게 음식과 잠자리를 제공하도록 했다.

사들의 방문도 크게 늘어났다. 그 이유로는 인조반정이후 남인을 대표하는 인사들이 대부분 안동과 상주권에 있었고, 이언적이 이황과 더불어 영남 남인의 정신적 지주였다는 데서 낙향한 인사들의 방문이 많았던 것이다. 이처럼 17세기 이래로 안동권, 경주권, 상주권 인사들의 방문은 계속 증가 추세였지만 진주권 인사들은 급감하였다. 그 이유는 이언적의 신원과 추숭 과정에서 서로 상반된 입장을 견지했기 때문이다. 이황과 그의 제자인 기대승(奇大升), 류성용(柳成龍) 등은 선조의 이언적에 대한 부정적 시각에 대하여 세세하게 수정함으로써 그의 문묘종사 결정에 일조하였는데, 특히 류성용의 역할이 컸다.[63] 그 이후 여주이씨로 대표되는 경주권 사림들과 안동권의 퇴계학파와는 긴밀한 협조체제를 유지하였다. 반면 조식(曺植)은 이언적에 대하여 비판적 입장을 견지하였고, 그의 제자 정인홍(鄭仁弘)은 이언적과 이황을 무훼(誣毁)하는 상소를 작성하였다.[64] 그로인해 옥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한 경주권 사림과 진주권의 남명학파는 더욱 멀어져 갔던 것이다.

한편 서울에서의 방문은 16세기 이후 전체적인 비율은 감소하였지만 방문객 수는 18세기 이전까지 꾸준히 증가하였다. 이들은 지방관과 왕명으로 지방에 파견된 관료 및 그들의 자제와 조카들이 대부분이었다. 옥산서원은 임진왜란 당시에도 큰 피해 없이 건물을 보존하고, 사액이후 국가로부터 받았던 서적들도 온전히 보전하였다. 임진왜란 이전에 건립된 서

63 이언적, 『회재집』 부록, 「恭書御札答館學諸生疏後(柳成龍)」 ; 류성용, 『서애집』 권4, 소, 「晦齋辨明疏」(갑진, 1604). "彦迪之欲直言强諫 與權橃何異 其所以或言或不言者 時勢然也 賢人君子所同者心 所異者跡 不然(중략)世人徒見權橃救解三人 而彦迪無所語 以此或不快於彦迪 而謂直截不及於權橃 然以臣等今日所見 則權橃之所言者小 彦迪之所言者大"

64 『광해군일기』 권39, 광해 3년(1611) 3월 26일. 남명의 문인 정인홍은 '회퇴변척소'를 올려 이언적과 이황의 문묘종사가 부당함을 극론하였다(『광해군일기』 권40, 광해3년 4월 8일, 4월 10일, 4월 14일, 4월 18일 ; 권41, 광해3년 5월 19일). 이에 정인홍을 두둔하는 경상우도 유생들의 상소가 올라오기도 했다(『광해군일기』 권42, 광해3년 6월 19일 ; 권44, 광해3년 8월 4일).

원 가운데 옥산서원과 같이 원형을 보전한 것은 도산서원과 소수서원 등 일부에 불과하였다. 그렇기에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한 자들은 내사된 서적과 이언적의 친필 저서들을 열람하고, 서원의 건물과 편액을 둘러본 후 이언적이 머물고 거닐었던 독락당과 주변 경관을 감상하였다.

이외에도 방문객들은『심원록』에서 과거에 방문했던 선조(先祖)의 서명과 감상을 적은 글을 보고 더욱 옥산서원에 관심을 가지기도 했다. 그래서 거듭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하거나 서원을 방문한 소회를 시나 기행문으로 남기는 자들도 많았다. 일례로 1598년(선조 31) 접반사 김수(金睟)는 체찰사 이원익(李元翼)과 옥산서원에서 새해를 맞이하며, 술자리를 갖고 그 감회를 시로 남겼다.[65] 동악(東岳) 이안눌(李安訥, 1571~1637) 역시 1613년(광해군 5) 경주부윤으로서 방문하여 서원의 풍경을 시로 읊었다.[66]

한편 옥산서원은 당쟁이 격화되던 시기뿐만 아니라 그 이후에도 당색을 불문하고 각 당파 내 인사들의 방문이 이어졌다. 노론을 대표하였던 송시열이 장기현에 유배되었던 1675~1679년 동안 이우휘(李遇輝), 이만형(李萬亨), 유명뢰(兪命賚), 송주석(宋疇錫), 송은석(宋殷錫), 송하석(宋夏錫) 등과 같이 우암의 문인들이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하여 참배하였다.[67] 이후에도 이희조(李喜朝)[우암 문인], 조영복(趙榮福)[김창협 문인], 김근행(金謹行)[한원진 문인], 조인영(趙寅永), 조수삼(趙秀三) 같은 노론계

65 金尙容,『仙源遺稿』(上), 五言律詩,「同體察使李議政 住玉山書院餞歲酒席 次接伴使金相公睟韻」. "先賢留古廟 遠客憩征驂 當日身投北 千秋道在南 高山多士仰 遺澤小民談 往事悽遊旅 潸然淚不堪" ;「同體察使李議政 住玉山書院餞歲酒席 次接伴使金相公睟韻 二首」"蕭洒堂依竹 寬平石作除 溪山圖畫裏 松桂雪霜餘 壁掛蘇翁句 門留退老書 春來當再訪 林下跨靑驢 豪氣衰猶王 詩情病未除 顚狂遊物表 吟嘯試冬餘 酒或携從事 期能顧尙書 蕭然風雪興 長在灞橋驢"

66 李安訥,『東岳先生集』卷11, 月城錄,「題畫竹扇 贈玉山書院儒生」. "寫得琅玕一兩莖 淸風六月手中生 坐塵酷吏兼醫俗 認取山翁不世情"

67『심원록』(來), 병진(1676) 12월 21일 ; 정사(1677) 7월 일 ; 무오(1678) 12월 일.

인사의 방문이 19세기 초반까지 있었다.[68]

이들 외에도 서인계 거두인 유홍(俞泓)이 방문하여 노수신의 시에 차운하고,[69] 1676년(숙종 2)에는 소론의 대표적 인물인 윤증(尹拯)이 서원을 방문한 후 소회를 시로 남기기도 했다.[70] 1700년(숙종 26)에는 경차관이었던 이정신(李正臣), 이듬해에는 관찰사 최석항(崔錫恒), 1702년(숙종 28)에는 도사(都事) 윤회(尹會), 1712년에는 경주부윤 권이진(權以鎭) 등과 같은 윤증의 문인이 방문하였다. 19세기에는 봉화 법전의 강필효(姜必孝), 박시원(朴時源) 등의 소론계 인사들의 방문이 잇달았다. 특히 강필효는 1818년(순조 18) 옥산서원에서 『태극도설』를 강론하였는데 이때 그의 문인이었던 경산현령 성근묵(成近默)이 함께 참석하였다.[71] 이처럼 소론과 노론계 인사들의 방문은 이언적이 분당 이전의 인물로서 당색과 무관하였기 때문이다.

이외에도 남인의 영수였던 권대운은 1680년(숙종 6) 경신환국 당시 실각하여 영일현에 유배되었다가 1689년(숙종 15) 남인이 재집권한 후 상경할 당시 옥산서원에 들러 참알하였다. 이때 사헌부 지평으로 있던 그의 아들 권규(權珪)와 성주목사로 있던 이형상(李衡祥), 배종하던 황산찰방 홍만기(洪萬紀) 등도 함께 알묘 하였다. 또한 강위(姜瑋, 金正喜 門人), 권말(權沫, 許傳 門人) 등의 기호남인들의 방문도 있었다. 그러나 가장

68 송시열의 참배는 확인되지 않는데 정치적 견해보다는 장기에서 유배를 하다가 거제도와 제주도 등으로 移配되었기 때문에 기회가 없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실제 서인의 영수였던 李珥는 이언적의 을사사화 행적에 대하여 신랄히 비판하며 문묘종사에 부정적이었다. 이후 송시열 역시 이언적의 가정 문제에 대하여 언급하며 그의 흠을 지적하였으나, 이언적에 대한 평가를 피하며 그의 大德을 인정하였다.

69 俞泓, 『松塘集』 卷1, 詩, 「玉山書院 次盧相公韻 二首」. “只有溪邊竹 而無種竹人 一丘吾欲買 習隱養天眞 決決紫溪水 蒼蒼華盖山 無機烟裡鳥 雙去又雙還” 유홍은 윤증의 스승인 金集의 장인이 된다.

70 尹拯, 『明齋先生遺稿』 卷2, 詩, 「訪玉山書院 謁晦齋先生祠有感」. “紫玉山中訪古祠 洗心臺上獨躕踟 千秋遺恨無人問 吾道如何又至斯”

71 『심원록』(朔) 무인(1818) 3월 22일.

많은 방문객은 퇴계학파의 인사들이었다. 퇴계의 고제인 조목(趙穆)과 금난수(琴蘭秀)의 방문 외에도 관찰사 박승임(朴承任), 김집(金潗), 권우(權宇), 장현광, 권두경(權斗經), 이재(李栽), 손기양(孫起陽), 도성유(都聖俞), 이현일(李玄逸), 정충필(鄭忠弼), 남경희(南景羲, 李象靖 門人), 최상룡(崔象龍, 이상정 문인) 등이 방문한 후 소회를 남겼다.

다음으로 지방관과 관료들의 옥산서원 방문을 보면, 갑술환국 이후 3~5년의 공백이 나타나기도 하지만 대체로 19세기 말까지 계속해서 방문이 이어졌다. 다른 고을 지방관 등은 부임하는 경로에 들러서 참배를 하였는데, 주로 흥해·장기·청하·울산·동래·영일·밀양·청도·영천·하양·자인 등 경주 인근에 위치한 곳이었다. 경주부윤은 1572~1875년 사이 207명이 부임하여, 154명(74.4%)이 방문하였다. 관찰사는 같은 기간 262명이 부임하여, 106명(40.4%)이 방문하였다. 특히 이시발은 경주부윤과 관찰사 재직시 거듭 방문했으며, 16~17세기 초반에는 강첨·윤휘·이민구·김시양·정세구 등의 관찰사들도 수차례 방문하였다.

이들 지방관은 대부분 알묘만 하거나, 독락당 등을 둘러본 후 당일에 돌아갔지만 유숙하는 경우도 있었다. 일례로 1749년(영조 25) 10월 4일 경주부윤 조명정(趙明鼎)은 서원에서 숙박한 후 다음날 원생들을 대상으로 '숙흥야매잠(夙興夜寐箴)'을 강론하였다.[72] 1761년(영조 37) 경주부윤 홍양한(洪良漢)은 4월 22일 방문하여 유숙하면서 강회를 열고, 6월에 다시 방문하여 행단(杏壇)에서 백일장(白日場)을 개최하였다.[73] 1752년(영조 28)에는 감사 윤동도(尹東度)가 방문하여 강당의 양진재(兩進齋)에서 유숙하였다. 이처럼 감사나 부윤이 방문하여 알묘하거나 유숙할 경우 옥산서원 입장에서는 위상이 제고되는 효과가 있었다.

---

72 『심원록(生)』(1749~1751), 己巳(1749) 10월 4일. "己巳十月初四來謁 仍宿兩進齋 去往生講夙夜箴"

73 『심원록』(崑) 신사(1761) 4월 22일. "以府尹來謁留 一日聚諸生設講會" ; 6월 26일. "同年六月二十六日 設白日場于杏壇 以旅軒獨樂堂詩 命題試士信宿而歸"

1755년(영조 31)「완의(完議)」를 보면, 감사나 부윤의 방문 소식을 접한 인근 고을의 민원인들이 소장을 제출하기 위하여 대거 운집하면서 각종 폐단이 일어났다. 이에 옥산서원에서는 질서를 유지하기 위하여 소송인들의 서원 출입을 제한하였다.[74] 실제『본향심원록』을 보더라도 부윤이나 감사가 향사에 참석하거나, 순력하면서 들리는 날에는 평소의 5~6배되는 인사들이 방문 하였다. 옥산서원은 감사나 부윤이 방문했을 때 사족의 권익 보호와 향촌민의 풍속 교화라는 측면에서 사송(詞訟)의 결정에 일정부분 영향력을 행사하였다. 이러한 영향력은 결국 옥산서원의 위상과 직결되었다.

이러한 지방관의 방문은 옥산서원 사림과 긴밀한 상호협조관계에서 이루어진 것으로 보인다. 실제 경주부윤은 옥산서원뿐만 아니라 서악서원과 용산서원에도 방문하여 부북과 부남의 사족들을 위무하였다.[75] 서원 측은 수령의 방문을 계기로 경제적 이익과 사회적 영향력을 확대하였고, 수령은 서원과 사족들의 협조 하에 향촌지배를 원활히 하였던 것이다. 그러나 관찰사의 경주지역 서원 방문은 옥산서원에 국한되었으며, 부윤의 서원 참알 역시 옥산서원에서만 행하였다. 이는 제향인과 서원의 위상에 기인한다. 즉 문묘와 종묘에 제향된 대현인 회재에 대한 존경을 표현하고, 나아가 그의 자취와 국왕 및 명신들의 유묵을 직접 확인하기 위해서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하여 참알하였던 것이다.

3. 향론주도기구로서의 위상 약화와 운영규정 정비

74「을해 2월 완의」"一. 詞訟之人 不得出入院門 自是前輩已定之規 而近來不遵前例 此廢湖滋 巡使及士主 到院之日 多持爭訟文字門熱巷 貽弊院中 此非美事 且聞風奔走 無事聚會 曠日留連 不勝紛如手 又非士子美習 是豈勵廉隅謹行止之道乎 此後則各自惕念 勿爲如此出入事"

75 1804년 경주부윤 崔獻重은 4월 17일에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한 후 5월 2일에는 용산서원을 방문하여 백일장을 개최하였다(옥산서원『심원록』(海) 4월 17일 ;『거접소도록』갑자년 5월 2일).

옥산서원은 종묘와 문묘에 배향된 이언적을 제향하는 대표적인 서원으로서 경주부내 다른 사액서원인 서악서원[김유신·설총·최치원], 용산서원[최진립] 등에 비해서도 더 높은 위상을 가졌다. 또한 서원의 운영을 담당했던 대표적 가문들 가운데 후손들이 경주부내의 사림사회를 실질적으로 주도하고 있었다. 인조반정 이래로 영남지역 사족사회가 침체를 격을 때에도 옥산서원은 당색을 불문하고 많은 경향(京鄕)의 인사들이 방문하였다. 아울러 회재의 문집과 저서를 출판하고, 장서를 확충하면서 교육 기능을 강화하고 내실을 키워나갔다. 아울러 서원 운영과 향촌사회 제문제를 논의하는 당회(堂會), 향회(鄕會), 도회(道會) 등도 수시로 개최되었다.[76]

17~18세기 옥산서원은 정치·사회적 변화를 관망하며 경제적 기반을 확충하고, 회재학의 확산과 보급에 주력하였다. 당시 도내의 여론을 적극적으로 주도하지는 않았지만 사림 전체의 위상을 실추하는 행위에 있어서는 단호히 의견을 제시하며 전면에 나서기도 했다. 이러한 옥산서원의 사회적 활동으로 대표할 수 있는 것은 향회, 도회와 같은 유회를 주관한 것이다. 실제 18세기 초반 옥산서원의 사회적 활동과 도내에서의 위상을 가늠할 수 있는 일이 있었다. 그것은 1717년(숙종 43) 7월 19일 숙종과 노론 대신인 좌의정 이이명(李頤命)과의 독대(獨對) 사건이 원인이었다.

독대의 문제는 청정(聽政)이라는 중요한 사안을 사관 등을 물리치고 대신과 독대를 했던 것이며, 독대 당시에 있었던 이야기를 알지 못한다는 것이다. 이이명은 당시 집권세력인 노론의 대표였으며, 소론이 지지하는 세자(경종)는 숙종이 점차 멀리하고 있던 상황이었다. 이에 소론 측에서는 숙종의 청정에 대한 본의를 파악하기가 어려웠기에 독대의 부당함 등

76 일례로 1717년 영남유소를 봉입하는 과정에서 발생한 일에 대한 소유들의 처벌에 대하여 옥산서원이 이를 주도하여 도회를 개최하였다(정유(1717) 10월 11일『道會諸名錄』).

을 들어 세자의 청정을 철회하도록 강하게 주장하였던 것이다. 이에 세자를 지지하던 영남 남인들은 1717년(숙종 43) 8월 9일에 경상좌우도의 유생들이 감시의 초시를 파장하고는, 그곳에 모인 유생들이 독대의 부당함과 청정의 철회를 주장하는 유소(儒疏)를 제출하기로 공의를 모았다. 그러나 당시 영남 유소를 봉입하는 과정에서 발생하였던 원본의 수정 및 복합(伏閤) 자진철회라는 초유의 사태로 도내의 의견이 나뉘어 대립하게 되었다.

이 문제로 인해 옥산서원에서 1717년(숙종 43) 10월 11일 도회(道會)를 개최하였다. 옥산서원은 경주와 인근 영천, 영해, 흥해, 영일 등지의 유생들과 논의한 후 사태의 조기 진정을 위하여 소두(疏頭)와 소색(疏色) 등의 벌목(罰目)을 의정한 후 도내에 통고하였다.[77] 이를 보면 소두 김승국(金升旺)은 남들을 위협하고 겁을 줘서 상소의 원본을 고치는 것을 도모하였기에 출도(黜道)를 시행하고, 소색 김몽렴(金夢濂), 김계탁(金啓鐸)은 소수에게 붙어 사림에게 수치를 주었으므로 손도(損徒)를 시행한다고 했다. 또한 김사국, 김형국은 이미 유소의 일이 있음에도 부끄러움을 모르고 시험장에 들어갔으니 영손(永損)을 시행하고, 배소(陪疏)한 여러 인사들은 우선은 죄를 논하지 않는다고 하였다. 이런 처벌에 대하여 안동지역 사림들은 답통(答通)을 통해 옥산서원의 결정에 따른다고 했다.

이처럼 옥산서원은 18세기 초반 도내의 혼란을 수습하기 위하여 직접 도회를 개최하고, 그 결과를 통보하여 분열된 도내 사론을 진정시켰다. 당시 유소를 주관했던 곳은 안동지역 사림들이었다. 그러나 서로 의견이 대립하여 진정될 기미가 없자 옥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한 경주지역 사림들이 나선 것이다.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18세기 초반에 이미 도내 여론을 이끌 정도로 높았음을 알 수 있다. 나아가 19세기 말 병호시비(屛虎是非)로

77 『도회제명록』, 정유(1717), 10월 11일.

안동의 사림들이 분열되었을 때도 옥산서원이 중재하여 이를 봉합한 사례가 있다.[78] 이는 두 지역 사림들 간의 오랜 세의(世誼)도 한 요인이 되지만, 영남지역 내 옥산서원의 높은 위상에 기인한 것이었다.

한편 부남의 서악서원은 옥산서원보다 먼저 건립되어 한때 이언적의 위패를 보관하였으며, 경주부에서는 옥산서원 다음으로 사액되었다. 이 과정에서 옥산서원과도 긴밀한 관계를 유지하며 서원 운영과 향촌사회의 현안에 대한 여론을 주도해 왔다.[79] 두 서원은 서원운영의 기본규약인 원규를 같이하고, 원안(院案)을 합록(合錄)하면서 17세기까지 경주지역의 남북을 대표했다. 그러나 서악서원의 경우 뚜렷한 구심체가 없다는 점에서 옥산서원이 실질적으로 향론을 주도해왔다.[80]

그러나 인조반정과 갑술환국으로 남인이 점차 실세하고, 경주의 향촌사회에서도 신출 노론과 서얼 계층의 성장으로 큰 변화를 맞이하게 되었다. 당시 경주지역 남인계를 대표하던 옥산서원의 정치·사회적 위상도 격하되어 갔다. 즉 16~17세기에는 옥산서원의 주도하에 부남(府南)의 향교·서악서원과 공조하여 향내외의 현안에 대하여 공동 대응하였지만, 18세기 이래로 향교와 서악서원을 장악한 신출 노론과 용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한 남인계와의 대립이 격화되는 가운데 중립적 입장을 고수했던 옥산서원은 부남 일대에 대한 영향력을 상실하게 되었던 것이다.

부남에서는 17세기부터 세력을 키워온 내남면 이조리의 경주최씨가 18세기 들어오면서 남산의 풍천임씨, 두릉의 곡산한씨, 보문의 영양남씨

78 「1888년 안동 李秀懲 등 통문」(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79 서악서원은 건립이래로 20세기 초반까지 운영 주체에 따라서 정도의 차이는 있지만 옥산서원과 긴밀한 관계를 유지하면서, 향론 주도의 한 축을 형성하였다. 일례로 손이시비가 발발하자 중립적 위치에서 두 가문의 화합을 강조하거나(「1846년 서악서원 통문」), 김유신을 배향하는 금산재사가 화재로 소실되자 다시 중건하는데 옥산서원의 도움을 요청하기도 했다(「1851년 서악서원 통문」). 이외에도 옥산서원이 제안한 이팽수 재실 건립에 찬성(「1923년 서악서원 통문」)하는 등 옥산서원과 향내 문제에 공동 대응하였다.

80 「1785년 서악서원 통문」(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등과 연계하여 독자적인 세력을 형성하였다. 이들은 부남의 서악서원을 거점으로 활동하고 있었지만 경주최씨가 1700년(숙종 26)에 최진립을 제향하는 충렬사(忠烈祠)를 건립하고, 1711년(숙종 37) 숭렬사우(崇烈祠宇)로 사액된 직후 부남의 사족들을 중심으로 승원(陞院)하려는 여론이 형성되었다. 당시 옥산서원은 승원에 반대하는 의견을 내었다.[81] 그것은 부남에서의 영향력이 축소되는 것을 경계했기 때문으로 보인다. 또한 용산서원 건립은 서악서원 원생과 원임 선발에 어려움을 초래하는 한 요인이 되기도 했다.[82]

이처럼 17세기 이래로 사족들의 향촌활동에 서원의 역할이 커져가자, 18세기 들어오면서 부내의 유력한 가문들을 중심으로 문중서원과 사우 건립이 본격화되었다. 각 가문들은 이들 원사를 중심으로 문중 구성원의 결집을 강화하고, 상호 연결하여 향촌사회 제문제에 대응해 나갔다. <표 2>와 같이 18세기 말부터 각 가문의 소재지를 중심으로 문중원사의 건립이 활발히 진행되었다. 한편으로는 재지적 기반이 강한 가문들을 중심으로 분립 현상도 심화되고 있었다.

17세기 말까지 경주부에는 옥산서원과 서악서원만이 있었지만 그 후 부북(府北)에 위치한 경주이씨, 경주손씨, 여주이씨, 안동권씨 가문에서

81 「1711년 옥산서원 당중 통문」(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편, 『고문서집성』 51, 2000). 이외에도 「1799년 옥산서원 통문」에는 여전히 용산서원을 숭렬사로 표기하고 있다. 이를 보면 18세기까지 옥산서원은 용산서원을 인정하지 않았지만, 1800년에 서악서원과 역할을 분담하면서 그 이후부터 부남을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 인정하고 있다.

82 실제 이조의 경주최씨를 중심으로 풍천임씨, 영양남씨, 여주이씨, 경주이씨, 이천서씨, 경주손씨 등의 남인계 가문들은 신출노론과 신향들의 향교와 서악서원 출입이 증가하면서 용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활동하였다. 그 결과 서악서원은 몇몇 유림들에 의하여 그 명맥을 이어오면서 임사를 선출할 여력도 남지 않아 闕享하는 지경에 이르게 되었다. 이에 "천거하는 일이 오래도록 폐지되어 廣川以南의 사람 가운데 儒錄에 이름을 올린 사람이 70~80세 이상 된 노인 5~6명에 불과해 천거하는 일을 할 수 없게 되었다"고 토로하고 있다(「1785년 서악서원 통문」, 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구강서원, 동강서원, 운천서원, 용산서원을 건립하고, 부남의 경주최씨는 용산서원을 건립하였다. 이처럼 부북 지역에서 서원 건립이 많은 것은 16세기 이래로 재지사족이 성장해왔기에 그만큼 재지적 기반이 안정되어 있었기 때문이다. 한편 1738년(영조 14)의 운천서원 건립은 서로 다른 두 가문이 공동으로 건립한 사례이다. 안동권씨와 여주이씨는 부북을 대표하는 가문이었다. 특히 여주이씨 이언괄 가문[향단파]은 옥산서원 건립이래로 운영의 중심에 있었다. 그럼에도 두 가문에서 함께 서원을 건립한 것은 같은 계파 내 가계별 분립이 이 시기부터 나타나고 있음을 의미한다.

<표 2> 경주지역 서원·사우 현황

번호	원사명	건립지	건립	사액	제향인	비고
1	西岳書院	경주 서악	1561	1623	金庾信·薛聰·崔致遠	金海金氏·慶州偰氏·慶州崔氏
2	玉山書院	안강 옥산	1572	1574	李彦迪	驪州李氏
3	梅月堂祠	양북 호암	1670		金時習	江陵金氏
4	龍山書院	내남 이조	1699	1701	崔震立	慶州崔氏
5	龜岡書院	안강 양월	1696		李齊賢	慶州李氏
6	東江書院	강동 유금	1707		孫仲暾	慶州孫氏
7	仁山書院	경주 인왕	1719		宋時烈	
8	鶴皐祠	내남 망성	·		朴堤上	慶州朴氏 / 영조17(1741)撤
9	鶴南祠	기계 화대	1722		金洵·金光福	慶州金氏/ 영조17(1741)撤
10	三綱祠	강동 다산	1736		李希龍 李文軫, 妻 金氏	沃溝李氏
11	雲泉書院	서면 운대	1738		李彦适·權德麟	驪州李氏·安東權氏
12	德淵世德祠	기계 기북	1779		李藩·李彦适	驪州李氏
13	章山書院	안강 옥산	1780		李全仁	驪州李氏/ 정조21(1797)陞院
14	羅山祠	양남 나산	1780		金文起	金海金氏[慶州金氏]
15	泰巖祠	기계 대곡	1780		鄭淵·鄭克毅	迎日鄭氏
16	雲谷書院	강동 왕신	1785		權幸·權山海·權德麟	安東權氏
17	龜山書院	현곡 하구	1786		徐愈·徐一元	利川徐氏, 헌종14(1848)陞院

18	智谷祠	산내 외칠	1786		黃石奇	昌原黃氏,智淵祠→1830 智谷祠
19	虎溪祠	안강 산대	1786		權士諤	安東權氏
20	靜山書堂	안강 노당	1787		金宗一	慶州金氏, 1925중건
21	花川祠	건천 화천	1792		柳宜健	瑞山柳氏
22	斗山祠	양북 두산	1798		金石堅	金海金氏(汶翁派)
23	光山祠	건천 조전	정조대		白以昭	鰲山[淸道]白氏
24	聖山書社	안강 하곡	1811		鄭克後	迎日鄭氏
25	德山祠	감포 팔조	1828		金自隱	慶州金氏
26	汶湖祠	경주 충효	1829		李承曾	慶州李氏
27	北山祠	강동 호명	1830		李乙奎	慶州李氏
28	明山書院	경주 보문	1831		成渾·朴泰輔	許宓, 李成洛 건립, 소론계
29	南岡祠	경주 탑동	1831		金虎	慶州金氏
30	丹漳祠	안강 검단	1831		孫宗老	慶州孫氏
31	景山祠	강동 양동	1840		李宜潤	驪州李氏
32	花岡祠	건천 화천	1844		全繼信	玉山全氏
33	活川祠	외동 활성	1846		金得禮	三陟金氏
34	杜陵祠	강동 검단	1847		韓汝愈	谷山韓氏
35	玉淵祠	안강 두류	1850		權士敏	安東權氏
36	慕賢祠 (丹邱書院)	신광 모현	1862		李世基·李蒨·李從允	慶州李氏/ 1927(강동 단구리)
37	南岳祠	경주 월산	1868		任華世	豊川任氏
38	杜谷影堂	강동 양동	1883		李宜潛	驪州李氏
39	德山書社	안강 산대	1924		李彭壽	淸安李氏
40	星岡祠	기계 禾垈	·		高彦伯	濟州高氏
41	秋江祠	죽장 감곡	·		南孝溫	宜寧南氏
42	恩山書堂	부동 암곡	·		南九明·南龍萬·南景羲	英陽南氏
43	金山齋	부서 송화산	·		金庾信	金海金氏
44	稷山書社	안강 산대	·		李樹仁	淸安李氏
45	友菊齋祠宇	안강 산대	1868		洪敬孫	南陽洪氏

※『경주읍지』(1933)를 참고함.

이처럼 기존 남북의 서악과 옥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향론을 주도해오던 가문들의 분립은 기존 사족지배체제의 결속이 약화되고 있음을 나타낸다. 또한 이러한 분열은 향촌내 기득권을 두고 사족간의 대립을 발생시켰다. 일례로 부남의 곡산한씨는 노론의 영수 송시열(宋時烈)을 제향하는

인산영당(仁山影堂) 건립을 주도하면서 부내 남인계 가문들과 치열한 향전(鄕戰)이 발발하였다.[83] 이러한 분위기에서도 옥산서원은 문묘종사대현을 제향하는 사액서원으로서 여전히 부북 일대의 여론을 주도하였다. 하지만 내부적으로는 신향들의 원임직 소통 요구에 맞서 18세기 말부터 대립이 격화되고 있었다.

1772년(영조 48) 영조의 서얼통청 명령이 있는 후 이전인의 후손인 옥산파(서파)의 향사 참알(參謁)을 두고 옥산서원과 신향(新鄕)간에 발발한 향전은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그만큼 약화되고 있었음을 나타낸다.[84] 이 사건이후 경주지역 신향을 대표하는 옥산파는 부내의 노론계와 제휴하여 1780년(정조 4) 장산사(章山祠)를 건립하면서 옥산서원에 대립하였다.[85] 이처럼 18세기 말에 이르러서는 경주부 전역에서 남인계 사족들과 신출 노론 및 신향간의 대립이 본격화되었다. 그 과정에서 부북의 옥산서원은

83 1719년(숙종 45)에는 곡산한씨의 주도하에 노론계 경주부윤인 유숭, 권호의 후원으로 송시열의 영정을 제향하는 인산영당을 건립하였다. 그러나 정국이 급변하면서 1722년(경종 2) 소론계 경주부윤 권세항과 남인계 경주사족들에 의해 훼철되었다. 이후 다시 정국이 급변하면서 1725년(영조 1)에 노론계 경주부윤 민진원과 조명봉의 후원으로 인산영당을 복설하고, 연이어 인산사로 이름을 고쳤다. 그 후 1764년(영조 40) 인산서원으로 사액되었다.

84 이와 관련해서는 이수환, 「18~19세기 경주 옥산서원 원임직 유통을 둘러싼 적서간의 향전」, 『고문서연구』 17, 한국고문서학회, 2000 참조 바람.

85 일례로 경주에서는 여주이씨 옥산파(이전인계)와 노론으로 전향한 곡산한씨와의 관계가 주목된다. 곡산한씨는 1719년(숙종 45) 송시열을 제향하는 仁山影堂 건립을 추진하고, 1738년(영조 14) 안동 김상헌 서원 건립에도 참여하는 등 경주의 대표적 신출 노론이었다. 곡산한씨는 1720년(숙종 46) 여주이씨 옥산파와 도산서원간의 대립으로 난항을 격었던 『관서문답록』 중간에도 적극 개입하였다. 이에 경주지역 新鄕을 대표하는 옥산파는 1745년(영조 21) 송시열·송준길의 문묘 배향에 참여하면서 노론들과 입장을 같이 하였다. 곡산한씨는 1775년 옥산서원 향례 參謁을 둘러싼 옥산파와 양동의 적파(이응인계)간의 문제에도 개입하여 옥산파를 옹호했으며, 1780년(정조 4)에는 잠계 이전인을 제향하는 章山祠 건립에도 참여하였다. 나아가 1797년(정조 21)에는 도내 노론계의 협조 하에 章山書院으로 陞院하였다. 1847년(헌종 13) 『潛溪遺稿』 간행을 추진할 때에도 옥산파와 연대하고 있었다.

17세기와는 달리 부남의 문제에 적극적으로 개입하지 못하였고, 부남의 서악서원은 신향과 노론계의 주도로 운영되었다.

경주지역 향촌사회는 이처럼 복잡한 이해관계 속에서 기득권 유지를 위한 사족 상호간의 협력과 대립이 함께 경주되어갔다. 이들은 노론과 신향들에게는 공동으로 대응하였지만 각 가문의 이해관계에 있어서는 심각한 대립이 발생하기도 했다. 그런 가운데 옥산서원 운영의 핵심이었던 가문들의 이탈도 가속화되면서 원임 선정과 서원 운영에 어려움이 나타났다. 그 결과 옥산서원은 그 위상이 약화되면서 서적 반출과 같은 지방관의 침해도 나타났다. 아울러 서원 운영이 정상적으로 이루어지지 않으면서 타읍에 대한 토지와 노비를 관리하는 것도 힘들어졌다. 결국 18세기 이래로 노정되어온 이러한 문제로 인해 옥산서원은 18세기 중반 대대적인 운영규정의 정비를 단행하였다.[86]

일례로 별책으로 구성된 1755년(영조 31)의 「당중완의(堂中完議)」의 서문을 보면 폐단이 전반적으로 진행되어 규정의 정비가 필요했음을 알 수 있다.

> 근래 서원의 형세가 점점 쇠퇴한 것은 진실로 습속이 옛날 같지 못하여 임사가 해이하고, 옛 법은 점차 폐해지고 새로운 폐단이 날로 자라나는 것 때문이다. 이와 같은 구습을 버리지 못하여 개혁할 길이 없어지면 마침내 바로잡을 길이 없어진다. 이에 향례를 드릴 때에 모여서 다음과 같이 개혁을 해야 할 해로운 조례들을 대략 열거하였다. 이날 이후로 맡은 자는 낱낱이 거행하여 영원히 지켜서 저버리지 않는다면 참으로 다행할 것이다.[87]

---

86 당시 운영규정을 정비는 시대의 변화를 반영하여 진행되었다. 1756년『본향심원록』의 작성, 토지, 노비, 원속, 원임, 장서 등 서원 운영 전반 관한 규정인 1755년(을해) 「완의」와 1760년 「등록」이 대표적이다. 특히 장서의 관리와 관련한 완의, 立議, 완문이 다수 제정되었다.

87 「완의」 을해(1755, 영조 31) 2월 13일. “右完議事 近來書院形勢之漸替 亶由於習俗之不古 任司之解體 古法漸廢新廢日滋 如是因循無所更張 則卒無以扶正黨一 玆因享時聚會 略擧應革之弊 條例于左 日後爲任者 一一擧行 永守勿替幸甚”

「완의」에서는 각 조목별로 서원의 유생선발과 건물 유지, 금양(禁養), 회계, 원속(院屬), 간행소, 속사, 방문객 등과 관련한 운영 전반에 대하여 규정을 열거하고 있다. 이 조목들은 원임이 관리해야하는 것들로서 완의에서도 원임이 정기적으로 이를 살펴서 폐단을 예방하도록 당부하였다.

이상에서 살펴본 대로 옥산서원은 17세기 이래로 이언적의 문묘종사 이래로 문집과 저서의 출판 및 강학 활동을 강화하면서 위상을 신장시켜 왔다. 17세기 말부터 노론의 집권과 신향의 성장이라는 정치·사회적 변화로 인해 그 위상이 약화되었지만, 18세기 초반까지는 여전히 도내와 향내의 여론을 주도할 만큼 위상을 가지고 있었다. 그러나 옥산서원의 운영에 관여하고, 경주부 향론을 주도하였던 부북의 재지사족들이 문중서원을 건립하고 그곳의 운영에 집중하면서 이탈하였다. 그로인해 원임의 선발과 서원의 운영에 어려움이 발생하였다. 그 결과 원장의 선발 범위를 부남을 포함한 경주 전역으로 확대하고 후손들의 원임직 참여가 증가하였다. 이런 분위기 속에서 옥산파를 중심으로 한 신향들의 원내 진출 요구가 커지면서 향전이 발발하기도 했다.

옥산서원은 대내외적 위기 속에서 18세기 초반부터 정치·사회적 활동을 자제하고, 원유들의 결속과 서원의 위상을 유지하기 위하여 강학 활동을 강화하였다. 나아가 서원 운영을 정상화하기 위한 각종 규정을 제정하였다. 그 결과 당색을 불문하고 경주부윤과 관찰사의 방문이 이어졌으며, 이는 위상을 유지하는데 일정한 도움이 되었다. 그렇지만 부남의 각종 향전에 미온적 태도를 유지하면서 부남에 대한 영향력이 약화되고, 원유들의 이탈도 계속되면서 부남의 사족들과 연대를 강화할 수밖에 없었다.

Ⅳ. 18세기 후반 영남의 대표 서원으로의 위상 제고

갑술환국 이후 옥산서원은 정치권의 관심에서 벗어나게 되었고, 기존 원유들의 이탈과 서얼로 대표되는 신향들의 도전 속에서 정치·사회적 위상이 격하되면서 서원 운영에도 어려움을 겪었다. 그런 가운데 18세기 말에 이언적의 학문이 영조와 정조에게 주목 받으면서 그를 제향하는 옥산서원 역시 다시금 중앙정부의 관심을 끌게 되었다. 특히 정조대에 수차례의 치제(致祭)와 서적(書籍)하사가 이어지면서 옥산서원은 국가로부터 재차 그 지위를 공인받는 효과를 얻었다.

치제는 신하내지 학자로서 사표가 될 만큼의 큰 업적을 남긴 자에게 내려지는 은전이었다. 특히 남인이 실권한 이래로 영남 남인계 서원에 대한 치제와 서적 하사는 전무한 실정이었다. 퇴계와 회재 등 문묘종사대현에 대한 사제(賜祭)가 간혹 있었지만 이는 서원이 아닌 후손가의 부조묘(不祧廟)에 한정된 것이었다. 그런 가운데 1781년(정조 5) 4월에 옥산서원으로 예관(禮官)을 보내어 노론계의 대표적 서원인 화양서원(華陽書院)[송시열 제향]의 사례에 준하여 제관(祭官)과 사품(祀品)을 갖춰 치제하도록 명한 것은 이언적에 대한 존경의 뜻이었다.[88]

이후 1792년(정조 16) 3월에도 옥산·도산서원에 치제가 있었는데 정조가 직접 제문을 지어서 보내었다. 이 어제제문은 왕명에 의해 판각하여 강당에 게시하였다. 당시 예관으로 왔던 이만수(李晩秀)는 왕명으로 이언적의 『속대학혹문(續大學或問)』을 대여해 갔다. 정조는 어람 후에 직접 『어제제선정속혹문권수(御製題先正續或問卷首)』의 서문을 지은 후 1794년(정조 18) 3월에 옥산서원으로 돌려보내 소장하도록 했다.[89] 또한 승지 이익운(李益運)이 1794년 계정(溪亭)에 보관하고 있던 「인종어찰(仁宗

88 『정조실록』 권11, 정조 5년(1781) 4월 23일 병인. 영조는 회재의 후손을 錄用토록 하고, 경상감사에게 명하여 회재를 제향한 옥산서원의 경치를 그려 올리도록 하였다(『영조실록』 권102, 영조 39년(1763) 8월 25일 기유).

89 『홍재전서』 권55, 잡저 ; 『정조실록』 권34 정조 16년(1792) 3월 2일 신미 ; 권40, 정조 18년(1794) 8월 30일 갑신.

御札)」을 반출해갔었는데 그것도 어람한 후 1794년 8월에 돌려보냈다.[90]

아울러 1794년(정조 18) 이래로 1797(정조 21)·1798(정조 22)·1799년(정조 23)에 연이어 서적이 하사되었다.[91] 이것은 예안 도산서원, 영천 임고서원(臨皐書院), 현풍 도동서원(道東書院)에도 내려졌는데, 이들 서원은 문묘에 종사된 대현을 제향하는 사액서원으로서 일향(一鄕)을 대표하는 곳이었다. 그러나 이들 서원 중 4차례 모두 서적을 하사 받은 곳은 옥산과 도산서원뿐이었다. 이런 분위기 속에서 옥산서원은 경주권 내지 나아가 영남의 대표적인 서원으로서 위치를 재정립할 수 있었다.

실제 1781년(정조 5)부터 치제와 서적 하사가 거듭되면서, 1781년(정조 5) 이래로 정조연간에는 춘추향사 때마다 영해·영천·밀양·성주·영덕·영일·대구·울산·청도·하양·의흥 등 경주 인근과 영남 중부권에 위치한 고을에서 방문객들이 급증하였다. 이전에 안동권에서의 방문객이 많았던 것과는 대조적이다. 이것은 옥산서원과 도산서원이 동시에 치제가 있었고, 두 서원의 위상이 같이 회복되면서 나타난 결과였다. 즉 안동권 인사들은 도산서원으로 출입하며 향사에 참석하였고, 경주권과 대구권의

90 『정조실록』 권40, 정조 18년 8월 30일(甲申). '인조어찰'이 언제부터 계정에 보관되었는지 알 수 없지만, 독락당 어서각에 걸린 1618년 경상감사 朴慶新이 적은 「서책불출문외」현판을 보면 그 이전부터 계정에 보관되어 온 것으로 보인다. 하지만, 옥산서원 『전여기』 서책질에는 '仁廟御製'라 표기되어 '儒案櫃'에 함께 보관하고 있다고 한다. 『서책전여도록』(1796~1874)에도 기재되어 있지만, 『書冊現在都錄』(1862~1974) 에는 없는 것으로 보아서 18세기 이래로 1862년 이전까지 옥산서원에 보관되었던 것으로 판단된다. 18세기를 전후한 시기에 서원으로 이관된 이유를 알 수 없지만 당시 적서간의 서원 소통을 둘러싸고 발생하였던 향전의 영향으로 보인다. 당시 적파의 우세 속에서 서파의 중심인 독락당의 유물을 탈취함으로써 서파들의 서원 참여 근거를 없애려는 시도가 있었기 때문이다(이수환, 「18~19세기 경주 옥산서원 원임직 소통을 둘러싼 적서간의 향전」『고문서연구』 16·17집, 2000).

91 『서책전여도록』에 따르면 1794년에 『御定朱書百選』이, 1797년에는 『鄕禮合編』, 1798년 『春秋』, 『御定五經百篇』, 1799년 『御製雅訟』, 『御定春秋四傳』, 『禮說』 등이 頒賜되었다.

인사들은 옥산서원을 방문하였던 것이다. 요컨대 18세기 말 옥산서원은 거듭된 치제와 서적 하사로 위상이 제고되었으며, 특히 경주·대구·밀양을 비롯한 영남의 중남부지역으로 영향력이 집중되었던 것이다.

그러나 정조 사후인 19세기에 들어와서는 치제뿐만 아니라 서적의 하사도 더 이상 내려지지 않았다. 게다가 양반지배체제의 해체가 가속화되고 사회·경제적 문제가 노정되면서, 개별서원 내지 한 가문의 힘만으로는 향촌사회의 각종 현안을 해결하기가 어려워졌다. 이는 오랜 기간 경주지역의 수원으로 있었던 옥산서원 역시 마찬가지였다. 19세기 옥산서원은 원임 선발이 더욱 어려워지면서 건물과 장서 및 토지·노비·원속 등의 경제적 기반의 유지·관리가 어려워졌다. 또한 신향들의 원임 및 향사 참여 요구가 거세지고, 기존의 원유들 간에도 분쟁이 심화되었다. 그런 만큼 서원의 제반 업무를 관장하는 원장의 선발이 더욱 중요한 시기였다.

하지만 명망있는 인사를 선발하는 것이 어려운 현실 속에서 특정인사의 중임(重任)이나 후손들의 원장 참여가 증가하였다. 이러한 사정은 다른 서원도 마찬가지였다. 일례로 19세기 초반 4차례 원장을 역임한 구암(懼菴) 이수인(李樹仁, 1739~1822)은 옥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한 후 연이어 구강서원과 용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하였다.[92] 당시 경주부내에서 원장에 선임될 만큼의 학문과 인망을 갖춘 자가 적었다는 의미도 있다. 하지만 이들 남인계 서원에 동일 인물이 임명된다는 것은 부북과 부남의 남인계 사족들이 더 이상 독자적으로 향촌사회 문제를 해결할 수 없었던 것을 의미한다. 즉 신향들의 거센 도전에 이수인과 같은 공동 원장을 매개로 서로 협력해 나간 것이다.

92 李樹仁은 1794·1799·1802·1807년 옥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하고, 1795년 구강서원, 1797년 용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했다. 이러한 특정 인사의 옥산·구강·용산서원 원장 역임은 19세기에 더욱 심하였다. 한편 원장직을 수행하더라도 옥산서원 유사가 구강서원 원장을 지내거나, 옥산서원 원장 수행후 구강서원과 용산서원 원장을 지내는 등 원격(院格)에 따라서 순차적으로 재임하였다.

한편 특정 인사를 원장직에 중임(重任)하는 것도 한계에 이르면서 후손들의 원장직 참여가 급증하였다. 실제 1800년(정조 24)이래로 강당을 중건하던 1839년(헌종 5)까지 40년간 54명의 원장이 임명되어 평균 8.7개월을 재임하였다.[93] 이 가운데 회재의 후손인 여주이씨가 29명으로 과반을 넘었으며, 다음으로 건립이래로 서원 운영의 핵심 가문이었던 경주손씨로서 6명이었다. 하지만 경주손씨들은 1845년(헌종 11) 이래로 손이 시비가 본격화되면서 원임직에서 확인되지 않는다. 선발된 원임들도 2~4회씩 중임(重任)하였다. 이것은 각 가문별로 자신들의 원사 운영에 집중하면서 원임 선발이 어려웠기 때문이다. 그 결과 1845년(헌종 11)부터 다른 고을에 거주하는 전직 관료나 경주부윤이 옥산서원 원장을 역임하였다.[94] 이들의 원장 참여는 1839년(헌종 5)의 재사액과 치제로 인해 높아진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이 반영된 결과였다. 옥산서원은 어려워져가는 서원 내외적 환경에 대응하기 위하여 이들 원장을 통해 돌파구를 강구하였

93 이들 원장의 본관은 여주이씨 29명, 경주손씨 6명, 淸安李氏 4명, 안동권씨·영양남씨 각 3명, 경주이씨·영일정씨 각 2명, 達城徐氏·경주최씨·豊川任氏·경주김씨·寧越辛氏 각 1명이었다. 이들 가문은 안강을 중심으로 경주부 북쪽에 세거해온 곳들로서 당시 실질적으로 옥산서원의 운영에 관여하고 있었던 가문들이었다.

94 1845년부터 도내의 인사들 가운데 문벌과 학식 및 관료였던 자를 선발하고 있다. 2월의 춘향 때에는 상주에 거주하는 前府使 李建基가 원장으로 선출되었으며, 8월의 추향 때에는 예안에 거주하던 퇴계의 10대 종손 前正言 李彙寧이 원장을 맡았다. 특히 이휘녕은 1848년 2월의 춘향 때에도 원장으로 천망되었다. 이후 봉화의 참봉 權載鈺(1846), 안동의 前縣監 柳道宗(1846)·柳進翼(1848~1849), 前承旨 柳進翰(1854), 前校理 金龍洛(1856), 예안의 前參判 李孝純(1852), 前牧使 李晩胤(1902), 고령의 前都事 金奎華(1908), 영천의 通政 鄭鎭泰(1909) 등 예안의 진성이씨, 안동의 풍산류씨, 의성김씨, 봉화의 안동권씨 및 고령 서흥김씨, 영천 영일정씨 등 도내의 각 지역을 대표하는 명문가의 인사들이 원장을 역임하였다. 이들은 관직뿐만 아니라 당시 영남을 대표하는 가문의 인사들이었다. 옥산서원은 이들을 통해 거도적인 협조를 끌어내고자 했다. 경주부윤은 1847년 李時愚가 처음 맡은 이래로 증가하였다. 1868년 왕명에 따라 부윤이 원장직을 맡기 이전인 1857년부터 부윤이 원장직을 수행하였다.

던 것이다.

서원의 사회적 위상은 제향인 후손들의 현달에 달려 있기도 했다. 특히 영남지역에서는 인조반정이래로 사환(仕宦)이 매우 어려웠기에 과거에 급제하여 사환했다는 것만으로도 관직의 고하를 막론하고, 향촌 사회에서의 영향력이 클 수밖에 없었다. 여주이씨들은 영조대의 탕평정국 하에서 이의잠의 현손인 이헌묵(李憲默)이 문과에 급제한 이래로 다수가 사환하였다.[95] 인조반정이래로 경주지역에서의 사환이 거의 없었던 상황에서 영조대 이래로 여주이씨들의 사환이 증가한 것은 그만큼 옥산서원의 위상도 경주부내에서 높아졌음을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 결과 1839년(헌종 5) 구인당 중건 당시 향내의 적극적인 협조와 승지를 역임했던 이연상(李淵祥)과 개인적 친분이 있었던 당시 경상감사 김도희(金道喜)의 적극적인 조처로 재사액을 빠르게 추진할 수 있었다. 당시 강당을 중건하고 재사액 받는 과정 등을 통해 옥산서원은 위상이 제고되는 효과를 얻었는데, 이를 더욱 강화하고 확립한 것은 치제와 낙성식이었다.

1839년(헌종 5) 옥산서원의 재사액을 요청하는 과정은 처음 사액을 요청했을 때와 동일하게 진행되었다. 경주부와 도내 유림들의 공론을 토대로 감사의 계청에 의해 재사액이 결정되었던 것이다. 옥산서원은 공론을 결집하고, 재사액에 따른 의례를 준비하는 과정에서 향내·외 유생들의 도움을 이끌어 내면서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재차 각인시킬 수 있었다. 재사액을 통해 옥산서원 위상이 다소 높아졌지만 확고한 재정립의 발판은 치

95 이를 보면 영조대 李鼎揆(大司憲), 정조대 李鼎德(司諫)·李鼎秉(사간)·李鼎牧(副正字), 순조대 李淵祥(臺諫)·李晉祥(梁山郡守), 헌종대 李凝祥(參議)·李在立(正言)·李在濢(정언)·李能燮(都承旨), 철종대 李在原(지평)·李在圭(正字), 고종대 李能華(참의)·李能馥(正言)·李中久(校理) 등이 있었다. 사마시는 숙종대 李德標·李壽聃·李時中, 경종대 李德祿, 영조대 李鼎勳·李憲洛, 정조대 李鼎翊·李鼎儼·李觀祥, 순조대 李鍾祥·李鼎基·李鼎益·李泰祥·李耆祥·李海祥, 헌종대 李在伋·李能玄, 철종대 李在棘, 고종대 李能模, 李寅久·李紀元·李能斗·李能祜 등이 입격했으며, 蔭職으로 순조대 李在正(禁府都事), 고종대 李在永(假監役)·李炳壽(가감역) 등이 사환했다(『교남지』 경주군, 인물조).

제였다. 1839년(헌종 5) 12월의 치제는 1792년(정조 16) 이래로 처음 실시되는 것이었으며, 전국적으로도 9개 서원에만 시행되었던 것이다.[96] 게다가 영남에서는 도산서원과 옥산서원에서만 치제가 시행 되었기에 옥산서원 내지 경주부민 전체의 자랑이 되었다. 또한 왕명에 의해 경주부윤 유장환(俞章煥)을 헌관으로 주변 고을의 수령이 집사관으로 참여하면서 도내의 유생들뿐만 아니라 경주와 주변 고을의 수령들에게도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각인할 수 있는 계기가 되었다.

이렇게 변화된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확인시켜주는 것이 1840년(헌종 6) 3월의 낙성식에 참여한 관민의 규모였다. 경상감사와 경주부윤 외에도 인근 12개 고을의 수령들과 경주를 포함한 38개 고을에서 전현직 관료 및 만여 명의 유생들이 참석하여, 왕명에 의해 제작된 편액들을 걸고 8,300여 명이 백일장을 거행한 것은 재정립된 옥산서원의 높은 위상을 관민이 인정하는 것이었다. 이것은 1792년(정조 16)의 도산별시(陶山別試)[7,228명] 때보다도 더 많은 인원이었다.

이러한 일련의 과정을 통해 옥산서원의 사회적 위상은 유지될 수 있었다. 하지만 옥산서원과 직·간접적으로 관련된 원내외의 현안을 해결하기 위해서는 경주부 내외의 원사 및 사족 가문들의 협조가 필요했다. 그래서 옥산서원은 향내 문제에 대하여 부남의 용산서원과 함께 적극적으로 대응하고, 도내 제 문중 및 원사와의 소통도 강화하였다. 결과적으로 옥산서원의 적극적인 향촌사회 활동은 도내와 향내에서 재차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제고하였다.

용산서원의 경우 1711년(숙종 37) 숭렬사우로 사액된 직후 부남의 공론에 의해 용산서원으로 승원 되었지만, 옥산서원은 조정에서 내린 사액

96『헌종실록』권6, 헌종 5년 11월 10일. 9개 서원은 關西의 仁賢[기자], 海西의 紹賢[주자], 松京의 崧陽[정몽주], 畿輔의 道峰[조광조], 湖南의 竹林[이이·성혼·김장생], 영남의 옥산[이언적]·도산[이황], 湖西의 화양[송시열]·黔潭[송준길]서원 등이다.

명칭에 반하는 것이라며 반대 입장을 나타내었다. 이러한 입장은 그대로 견지되어 1799년(정조 23) 옥산서원에서 유안(儒案)이 무단으로 삭제되는 사건을 논의하기 위해 용산서원으로 보낸 통문에서도 여전히 '숭렬사'라는 명칭을 사용하였다. 부남의 사족들과는 달리 옥산서원에서는 이때까지 숭렬사를 서원으로 인정하지 않았던 것으로 추정된다. 그러나 19세기 들어오면서 입장을 바꾸어 용산서원의 지위를 인정하고 있다. 그것은 통문에서 용산서원으로 표기하고, 나아가 1824년(순조 24) 최진립 문집 간행에 대한 「사제문(賜祭文)」 기재 의견이나, 1856년(철종 7) 위패의 호를 '정무공(貞武公)'에서 '잠와(潛窩)'로 개제(改題)하자는 의견을 보낸 것에서도 확인된다. 나아가 1867년(고종 4)에는 옥산서원과 용산서원의 강회(講會)를 관에 상신하여 합설(合設)하자는 의견까지 제시하였다. 즉 최진립의 전공은 인정하지만 유현으로서 자격이 부족하다고 판단하였던 기존의 입장을 뒤집고, 부남을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서 용산서원을 인정하고 연계를 강화하고 있었다.

옥산서원이 외부의 우호 세력을 확대하고 내부의 결속을 다지려는 움직임은 19세기 들어 다양하게 표출되고 있었다. 부외 지역으로는 안동의 의성김씨와 영양의 한양조씨, 영천의 영일정씨 등 오랫동안 세의(世誼)를 이어왔던 곳과 결속을 강화하였다. 즉 표은 김시온의 제향처 건립에 대한 여론을 조성하는 통문을 안동 갈전의 순흥안씨 문중에 보내고, 영양의 영산서원으로는 옥천 조덕린의 신원(伸冤)을 위한 상소를 올리는 의논을 제안했던 것이다. 또한 영천 영일정씨의 정극후·정사물 입암서원 병향 논의에 대하여 적극적으로 경주부내 여론을 조성한 것도 그러했다.

한편 옥산서원은 원내의 사안에 대하여 향내·외에 적극적으로 알려서 협조를 구하거나 부정적 여론을 근절하고자 했다. 일례로 1839년(헌종 5) 구인당이 화재로 소실되었을 당시 중건 과정에서 물력의 부족으로 어려움을 겪기도 했지만 거도(擧道)적인 협조를 통해 무사히 해결되었다. 그러나 1846년(헌종 12) 동강서원 상량문 문제로 옥산서원 운영의 핵심

가문인 경주손씨 사이에 반목이 생기면서 손씨들이 서원에서 이탈하였다. 또한 여주이씨 내부에서도 계파별로 후손들의 분립이 심화되면서 결속이 약화되었다. 회재의 적장손인 이의잠의 영해 곡강서원 추향(追享) 무산과[97] 이번과 이언괄을 제향하는 덕연세덕사의 경영난[98]에 지원하지 않은 것은 이처럼 핵심가문의 이탈과 무관하지 않았다. 이러한 내부 문제는 서원 운영에도 영향을 주어서 경영이 악화되고, 사회적 위상이 약화되는 요인이 되었다.

이러한 핵심가문들의 이탈을 방지할 필요성이 대두되면서 1855년(철종 6) 정월에는 옥산서원이 주관하여 안동권씨 권산해와 권덕린의 문집 간행을 위한 향회를 개최하였다. 당시 향회는 원고의 수집과 정리가 끝난 상태에서 문집 간행에 대한 공론을 수렴하는 자리였다. 특히 권덕린은 옥산서원 건립에 참여했던 인물로 이언적의 문인이기도 했기에 그의 문집인 『구봉유집(龜峯遺集)』은 옥산서원에서 간행하고, 권산해의 『죽림선생실기(竹林先生實紀)』는 운곡서원에서 분담하였다. 안동권씨 가문의 문집 간행에 앞서 1851년(철종 2) 노암 김종일의 문집을 간행하는 일에 협조하거나, 같은 해에 서악서원의 요청으로 화재로 소실된 금산재사(金山齋舍)를 중건하는 데 도움을 준 것도 당시 경주김씨 가문의 협조를 끌어내려는 의도였다.

이처럼 내외부의 세력을 강화하는 가운데 대원군의 훼철령으로 경주

97 「1809년 홍해 곡강서원 답통」(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이에 1840년 京山祠를 건립하여 이의윤을 제향하였다. 일반적으로 종파는 원사의 운영에 간여하지 않았지만 19세기 들어 가문별, 가계별 분립이 심화되면서 각 파조를 제향하는 원사 건립이 필요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98 「1820년 동강서원 통문」(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 덕연세덕사는 이언적의 부친인 이번을 주향으로 건립 되었고, 옥산서원 원임을 지낸 후손들 중 세덕사 임원이 된 자들이 많았다. 그러나 옥산서원의 세덕사에 대한 지원은 초창기 향사 때에 제기와 향로를 빌려주고, 서원서 인출한 회재의 저서를 보내준 것뿐이었다. 경제적 지원은 확인되지 않는다(이수환, 「경주 세덕사 연구」, 『민족문화논총』 45,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0, 192쪽).

부에는 옥산서원과 서악서원만이 남게 되었다. 문중원사의 훼철로 구심체를 잃은 각 가문들은 사액 서원을 중심으로 재결집하였다. 특히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은 더욱 확대되어 1884년(고종 21) 「복제개혁반대만인소」를 주도하였다. 그런 가운데 1904년(광무 8) 이언적의 학문연원을 두고 경주손씨와 시비가 재발하였다. 이때의 시비는 예안의 퇴계 후손도 연계되면서 영남뿐만 아니라 성균관과 타도까지 확산되어 치열히 전개되었다.

이후 일제와 병합되면서 강압정치로 인해 사족들의 향촌활동도 위축되었다. 그러나 1919년 3. 1운동을 기점으로 일제의 식민 정책이 변화면서 사족들의 활동도 증가하였다. 주로 문집 간행과 훼철된 원사의 복설이 진행되었다. 옥산서원은 1918년 구강서원(경주이씨) 복설을 추진하는 데 찬성하고, 1923년 임란 당시의 의병장이었던 두촌(杜村) 이팽수(李彭壽)를 제향하는 덕산서사(德山書社) 건립을 주도하였다.[99] 또한 1934년 『회재선생별집』을 간행하면서 이언적의 학문을 계승·보급하는 노력을 이어갔다. 당시 경주내외의 37개 문중에서 부조가 있었으며, 간행된 별집은 122개소에 배포함으로써 회재의 학문적 정통성을 제고하였다.[100]

Ⅴ. 맺음말

99 이팽수 제향처 건립에 찬성하는 1923년 2월 구강서원, 3월 경주향교·용산단소·운곡단소, 7월 서악서원의 답통이 남아있다.

100 경주에서는 후손가를 중심으로 안동권씨, 영일정씨, 청안이씨, 경주이씨, 달성서씨, 경주김씨, 창녕조씨, 곡산한씨, 풍천임씨, 경주최씨, 아산장씨, 영양남씨 등 경주의 대표적 사족 가문을 포함한 37개 처에 배포하였다. 반면 타 지역은 61개 처로서 안동의 도산서원과 진성이씨, 영천이씨, 광산김씨, 풍산류씨, 풍산김씨, 의성김씨, 전주류씨, 안동김씨, 진양하씨, 봉화의 안동권씨, 김해김씨, 영주의 청도김씨, 예안김씨, 상주의 진양정씨, 풍산류씨, 문경의 광산노씨, 칠곡의 인동장씨, 왜관 광주이씨, 달성의 서흥김씨, 밀양박씨, 경주최씨, 성주의 청주정씨, 성주이씨, 함양 남계서원, 진주 덕천서원, 영천 창녕조씨, 영일정씨, 영천이씨, 경주이씨, 안동권씨, 영양 재령이씨, 영덕의 수원백씨, 영양남씨, 안동권씨, 밀양박씨, 함양 벽진이씨, 대전 은진송씨, 서울 부림홍씨 등이었다.

옥산서원은 서원 제도가 도입된 초창기에 건립되어 대원군의 원사 훼철시에도 존치하였던 한국 서원의 역사이다. 그 과정에서 변용되어온 내부 구성과 강학, 출판 및 사회적 활동 등은 옥산서원의 사회적 지위를 유지하려는 노력의 일환이었으며, 이언적의 대표적 제향처로서 그의 학문을 전승·보급하고, 유생의 장수처(藏修處)라는 서원 본연의 '정체성'을 유지하려는 과정이었다. 옥산서원은 건립 당시부터 높은 위상을 가지며, 경주지역 수원으로 자리하였다. 특히 이언적의 종묘와 문묘 종사 및 국왕의 명으로 치제(5회)와 서적 하사가 거듭되었다. 이는 서원의 위상을 제고하는 요인이었다. 이러한 수원으로서의 지위는 다소의 부침은 있었지만 조선후기 전 기간에 걸쳐 변함이 없었다. 또한 임란이전부터 존속되어온 건물과 장서, 그리고 이언적의 높은 위상은 당색을 불문하고 많은 인사들의 서원 방문을 이끌었다. 특히 경주에서 관찰사의 방문과 부윤의 향사 참여는 옥산서원이 유일했으며, 인근 고을의 수령들도 부임시 방문하였다.

옥산서원은 철저한 장서 관리와 회재문집 및 저술을 출판하면서 지역의 도서관 역할과 회재학의 보급·확산에 노력하였다. 특히 서원의 강학기능이 쇠퇴하는 17세기 중반이래로 오히려 강학 활동을 강화하면서 경주와 인근지역 유생 교육의 중심처로서 역할 하였다. 그 결과 영남지역 남인계 서원이 침체되는 가운데에도 그 위상을 유지할 수 있었다. 18세기 이래로 원유들의 이탈과 그로인해 운영이 어려워지자 서원의 규정을 강화하고, 원임의 선발 범위를 점차 확대하면서 유연히 대처하였다. 이런 상황에서 정조와 헌종대의 치제는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재정립하는 요인이었다. 실제 정조대 이래로 옥산서원은 영남의 2대 서원으로 인식되었다. 게다가 19세기 이래로 향촌사회의 현안에도 적극적으로 개입하면서 향론을 발의·주도하면서 위상이 제고되었다. 대원군의 훼철령 이후에는 더욱 위상이 높아져서 만인소를 주도하고, 이후 일제강점기에도 그 위상에 맞는 사회적 책임을 수행하였다.

옥산서원은 건립이래로 큰 공사가 없었기에 대부분의 건물이 초창기 원형을 유지하고 있으며, 건립 당시부터 생성된 각종 고문서와 장서가 남아있다. 이들 고전적은 그 분량과 사료적 가치를 보더라도 한국 서원을 대표한다. 그럼에도 아직까지 일부 고서만 국가지정문화재로 지정되어 있을 뿐이다. 비록 현재 세계문화유산에 지정이 되었지만 그 위상에 어울리는 국가의 체계적 관리와 일반인과 연구자들의 관심을 증대시키기 위해서라도 중요 고문서와 고전적에 대한 문화재 지정이 시급하다. 이는 고전적의 안정적 관리와 도난 예방을 위해서도 필요한 일이며, 현대적 관점에서 옥산서원의 위상을 제고하는 데에도 큰 역할을 할 것이다.

【참고문헌】

1. 자료집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편, 『玉山書院誌』, 영남대학교출판부, 1993.
이수건 외, 『朝鮮時代 嶺南書院資料』,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99.

2. 단행본

정만조, 『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7.
이수환, 『조선후기 서원연구』, 일조각, 2001.
경기대학교 소성학술연구원 편, 『한국의 서원과 학맥 연구』, 국학자료원, 2002.
윤희면, 『조선시대 서원과 양반』, 집문당, 2004.
한국서원연합회, 『한국의 서원문화』, 2014.

3. 논문

이병훈,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장서수집 및 관리 실태를 통해본 도서관적 기능」, 『한국민족문화』 58, 부산대학교 한국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6.
이병훈, 「19세기 초 경주 玉山書院 강당 중건과 位相변화」, 『한국학연구』 57, 고려대학교 한국학연구소, 2016.
이병훈, 「19~20세기 영남지역 향촌사회와 경주 玉山書院의 동향」, 『한국서원학보』 4, 한국서원학회, 2017.
이병훈, 「조선후기 영남지역 원사의 건립과 변화 검토」, 『한국서원학보』 6, 한국서원학회, 2018.
이병훈, 『조선후기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운영과 역할』, 영남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8.
이수건 외, 「조선후기 경주지역 재지사족의 향촌지배」, 『민족문화논총』 15,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1994.
이수환, 「조선후기의 서원－옥산서원을 중심으로－」, 『국사관논총』 32, 국사

편찬위원회, 1992.
이수환, 「울산 구강서원의 설립과 사액과정」, 『대구사학』 49, 대구사학회, 1995.
이수환, 「회재 이언적과 옥산서원」, 『경주사학』 16, 동국대학교 사학회, 1997.
이수환, 「18~19세기 경주 옥산서원 원임직 소통을 둘러싼 적서간의 향전」, 『고문서연구』 16·17집, 한국고문서학회, 2000.
이수환, 「경주지역 손이시비의 전말」, 『민족문화논총』 42,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09.
이수환, 「경주 세덕사 연구」, 『민족문화논총』 45,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10,

4. 보고서 및 기타

문화재청, 『2004년 일반동산문화재 다량소장처 실태조사 보고서』,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2004.
한국학자료센터 영남권역센터(http://yn.ugyo.net)

Abstract

The changes in status of Oksan Seowon in Gyeongju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Lee, Byoung-hoon*

Oksan Seowon in Gyeongju was built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Joseon Dynasty when the Seowon system was introduced, and was preserved even when the original temple of Daewon-gun was destroyed. Oksanseowon has served as a Suwon in the Gyeongju area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In general, the status of the seowon was based on the status of the ancestral person and the presence or absence of private money, and the socio-political function, the economic base, and the publishing and library functions were combined. Oksanseowon's status as a Suwon in the Gyeongju region remained unchanged as these factors interacted with each other in different periods.

Oksan Seowon was a scholar dedicated to Lee Eon-jeok, the Daehyun of Munmyojongsa, and it became a private residence immediately after its establishment, and had a status comparable to that of national studies. As a result, from the time of its establishment, there has been active support from Gyeongju Buyun and other descendants and literary literaries. Oksan Seowon, which preserved buildings and books intact

* Institute of Korean Cultural Studies at Yeungnam University, Researcher professor/yukhl@ynu.ac.kr

during the Imjin War, was located as a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 representing the Gyeongju area after the war. Since the middle of the 17th century, it has been positioned as the center of education for larvae while reinforcing lectures such as Geojae and Geojeop. At that time, even though the party was intensifying, the scholar Lee Eon-ji was a person who had nothing to do with the party, and the direction of the operation of the seowon was also separated from the party, and many people regardless of party were visited. As local government visits continued, the social status of Oksan Seowon was improved. However, from the 18th century, the influence of the southern part of Gyeongju was lost without being involved in the disputes between the elderly and the new and old in the village society.

In addition, as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Munjung Seowon began in earnest, difficulties in operating the Seowon occurred due to the departure of crude oils participating in the Seowon operation. Therefore, various measures were attempted, such as enacting various regulations and expanding the selection range of senior directors to Bunam, but did not significantly improve. In the meantime, the king's interest in the science of Yieonjeok grew after the throne of King Jeongjo. As a result, the government resumed, which had been cut off after the artificial rebellion, and the status of Oksan Seowon was improved as the sergeant of books continued, and it was positioned as two major Seowons in Yeongnam along with Dosan Seowon. However, in the 19th century, as the difficulty of operating the scholarship intensified, the selection of directors expanded to the province, and the participation of the descendants in the scholarship also increased.

In the meantime, the finances of the Seowon deteriorated due to the

fire of Guindang in 1839 (the 5th year of King Heonjong), but the status of the Seowon was re-established as the rehabilitation amount and the remedy under the king's special order were held. After that, Gyeongju Bu-yoon was scolded by the director, and he received great help in the operation of the Seowon. However, after the middle of the 19th century, a dispute occurred with Gyeongju Son, the core family of the Seowon operation, and after the mid-19th century, the Sons completely departed from Oksan Seowon. Furthermore, the dispute over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new hyangs and senior officers has intensified. However, as Daewon-gun was preserved in the ruins of the original material, its status rose even further, leading the opposition to the cloning reform in 1884 (Gojong 21).

Key word : Yieonjeok(李彦迪), Oksan Seowon(玉山書院), status(位相), lecture(講學), Hangjeon (鄕戰)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9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 일반논문

▣ 김자운 17세기 말-18세기 초 석실서원의 강학 실제와 특징
—농암 김창협의 강학 활동을 중심으로—

▣ 裵賢淑 朝鮮時代 書院 刻板本의 淵源 硏究

▣ 邓洪波·赵伟 白鹿洞书院的建立背景与中国书院的变化
—宋元明清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7 185

17세기 말–18세기 초 석실서원의 강학 실제와 특징
–농암 김창협의 강학 활동을 중심으로–

김 자 운*

Ⅰ. 서론
Ⅱ. 김창협의 강학활동과 석실서원의 풍경
Ⅲ.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인식과 독서법
Ⅳ. 김창협 사후 석실서원 강학의 변화
Ⅴ. 결론

【국문초록】

본고에서는 17세기 말부터 18세기 초반까지 김창협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진 석실서원 강학의 실제와 특징을 고찰하고자 한다. 석실서원은 김상용과 김상헌의 충절을 기리기 위해 1656년에 건립되어 조선후기 서울 지역 노론계의 대표적 서원으로 성장하게 된다. 그 계기 중 하나는 '충절서원'으로 출발한 석실서원이 '강학서원'으로 변모했다는 점에서 찾을 수 있다. 조선후기 사회의 정치적 동향과 안동김씨 가문의 정치적 입지, 당시 서울·경지 지역의 문화적 특징과 서울 학계의 변화 등을 기반으로 김창협 형제는 전통 주자학의 의리론을 고수하던 당시 주류 노론과는 구별되는 매우 독특한 학풍을 지니고 있었고, 석실서원에서의 강학과 교류는 그들의 학풍이 서울 학계에 확산되는 데 핵심적인 역할을 하였다.

또한 김창협 사후 당쟁의 여파로 18세기 초반 한 때 침체되었던 석실서원은 18세기 중반 이래 김원행이 부활시킨 강학활동을 계기로 낙론의 학문을

* 공주대학교 강사/ jaunkim@hanmail.net

전파하고 이후 전국 각지에서 정치적, 학문적으로 활발하게 활동한 많은 문인들을 배출함으로써 낙론의 본거지로서 학문적, 정치적 위상을 재정립하게 된다.

지금까지 정치사와 사상사 분야에서는 석실서원에 대한 많은 연구가 이루어졌다. 이를 통해 석실서원의 정치적 성격과 위상, 사상적 특징과 호락논쟁 사이의 연관성, 김원행 학문의 특징과 강학활동, 석실서원을 통한 지식과 지식인의 재생산이 조선후기 북학사상의 태동에 끼친 영향, 낙론 사상의 계승과 변모 양상 등이 상세히 구명되었다.

그러나 석실서원 강학에 대한 선행연구는 주로 김원행이 제정한 석실서원 학규와 강규에 대한 소개, 그리고 김원행 시기의 강학활동에 집중되어 있을 뿐 김창협의 강학활동에 대한 본격적인 연구는 거의 시도된 바 없다. 그 이유는 김창협의 강학에 관련된 직접적인 자료가 없기 때문이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농암집』에 수록된 시, 편지, 제문, 어록, 연보 등에 산견되는 기록을 최대한 검토하여 김창협 시기 이루어진 강학의 일상과 풍경의 단면을 들여다봄으로써 선행연구의 한계를 부분적이나마 보완하고, 17세기 말에서 18세기 초반까지 김창협이 수행한 강학의 실제와 특징을 체계적으로 분석하고자 하였다.

Ⅱ장에서는 김창협이 석실서원에서 본격적으로 강학을 시작한 시기, 강학의 운영 주기, 입원 자격과 조건, 강학 참여자들의 출신지역과 계층 및 배경, 서원에 유숙한 기간, 서원에 상주하며 강학에 참여한 문인들의 규모, 입문 절차와 입문 의례, 科業에 종사하는 유생들의 입원 허용 여부, 서원에서 공부한 서책, 강학의 방식과 형태, 강학의 절차와 강학 의례, 서원 공간의 활용, 김창협 부재 시 문인들의 학업 지도 등을 중심으로 김창협이 운영한 석실서원의 강학 실제와 운영 양상을 검토하였다. 이를 통해 18세기 중반 김원행이 수행한 강학활동과의 차이를 일정부분 해명할 수 있었다.

Ⅲ장에서는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김창협의 독특한 시각과 현실 대응관을 조명하였다. 그의 관점이 석실의 문인들을 교육하는 과정에서 구체적으로 어떤 식으로 관철되고 있었는지를 석실 문인들의 과거 공부에 얽힌 몇 가지 일화들을 통해 소개하였다. 또한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그의 독특한 입장과 현실 대응은 퇴계와 율곡의 관점을 어떤 점에서 절충하고 넘어선 것이었으며, 김원행의 관점과는 어떤 차이를 드러내는지 구명하였다. 또한 김창협이 석실의 문인들에게 강조한 독서법과 공부론에 있어 그의 스승 이단상과 조성기의 관점을 어떤 점에서 계승하고 발전시켰는지를 아울러 검토하였다.

마지막으로 Ⅳ장에서는 김창협 사후 두 차례의 사화를 겪으면서 석실서원이 겪은 수난과 김창협을 이어 이재와 김원행에 의해 석실서원의 학풍과 강학이 어떻게 계승되었는지를 간략히 검토하였다.

주제어 : 김창협, 석실서원, 낙론, 과거 공부, 독서법, 공부론

Ⅰ. 서론

본고에서는 17세기 말부터 18세기 초반까지 김창협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진 석실서원 강학의 실제와 특징을 고찰하고자 한다. 이 때 '실제'라 함은 18세기 중반 김원행이 작성한 석실서원의 학규, 강규에 규정된 강학의 규범적 측면과는 구별됨을 뜻한다. 일부 연구에서는 김원행의 학규를 김창협 시기의 강학활동과 착종하여 범범하게 혼용하는 경우가 있으나 김창협과 김원행이 수행한 강학활동은 시대, 이념, 실제에 있어 일정부분 분명한 차이를 드러내기 때문에 반드시 구별될 필요가 있다.

석실서원은 김상용과 김상헌의 충절을 기리기 위해 1656년(효종 7) 경기도 양주에 건립되어 1663년(현종 4) '石室'이라 사액 받고, 이후 김수항, 민정중, 이단상, 김창협 등을 추배한 뒤 조선후기 서울 지역 노론계의 대표적 서원으로 성장하였다. 그 성장의 계기 중 하나는 '충절서원'으로 출발한 석실서원이 '강학서원'으로 변모했다는 점에서 찾을 수 있다.[1] 18세기를 전후로 한 이 같은 변화는 석실서원이 이후 호락논쟁에서 서울 지역 낙론의 사상적 기반을 확립하는 터전이자 조선후기 진경문화의 기틀로 자리매김하는 데 결정적 역할을 하였고, 그 중심에는 김창협 형제의 독특한 학풍과 김창협을 중심으로 한 강학활동이 있었다. 조선후기 사회의 정치적 동향과 안동김씨 가문의 정치적 입지, 당시 서울·경지 지역의 문화적 특징과 서울 학계의 변화 등을 기반으로 김창협 형제는 전통 주

1 정만조, 『남양주시지』 제1권 역사, 「제1절 석실서원」, 2000.

자학의 의리론을 고수하던 당시 주류 노론과는 구별되는 매우 독특한 학풍을 지니고 있었고, 석실서원에서의 강학과 교류는 그들의 학풍이 서울 학계에 확산되는 데 핵심적인 역할을 하였다.[2]

또한 김창협 사후 당쟁의 여파로 18세기 초반 한 때 침체되었던 석실서원은 18세기 중반 이래 김원행이 부활시킨 강학활동을 계기로 낙론의 학문을 전파하고 이후 전국 각지에서 정치적, 학문적으로 활발하게 활동한 많은 문인들을 배출함으로써 낙론의 본거지로서 학문적, 정치적 위상을 재정립하게 된다. 이와 같이 석실서원이 조선후기 서울지역 노론계의 대표적 서원으로 성장하며 낙론이라는 조선 성리학의 독자적 학맥을 구축한 배경에는 정치적, 사회문화적 배경과 더불어 김창협 형제의 독특한 학풍 그리고 그 학풍의 계승과 교류를 가능하게 한 김창협과 김원행의 강학활동이 있었다.

지금까지 정치사와 사상사 분야에서는 석실서원에 대한 많은 연구가 이루어졌다. 이를 통해 석실서원이 서울지역 노론계를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서 위상을 확립하게 된 역사적 배경과 그 정치적 성격이 밝혀지고,[3] 노론이라는 큰 범주에서 송시열과의 사상적 연속성에만 주목하던 기존 시각을 넘어 김창협 형제의 학풍이 어떤 점에서 송시열을 계승하고 어떤 점에서 차이가 있었는지를 밝힘으로써 그들의 사상적 특징과 호락논쟁 사이의 연관성이 해명되었다.[4] 또 '實心'으로 대표되는 김원행 학문의 특징과 그의 강학활동 및 김원행에게 수학한 뒤 귀향한 석실 문인들의 향촌 강회활동을 통해 기호노론의 진원지였던 석실서원의 학통과 사상이 어떤 경로와 과정을 거쳐 지방에까지 전파되었는지가 밝혀지고,[5] 석실서

2 조준호, 「조선후기 석실서원의 위상과 학풍」, 『조선시대사학보』 11, 1999.

3 조준호, 「경기지역 서원의 정치적 성격: 석실서원을 중심으로」, 『국학연구』 11, 2007.

4 조성산, 「17세기 후반-18세기 초 김창협, 김창흡의 학풍과 현실관」, 『역사와 현실』 51, 2004 및 이경구, 「김창흡의 학풍과 호락논쟁」, 『한국사론』 36, 1996 참조.

원을 매개로 한 지식과 지식인의 재생산이 조선후기 북학사상의 태동에 끼친 영향이 구명되었으며,[6] 18세기부터 19세기 세도정치기에 이르기까지 정치적 변동에 따른 낙론 사상의 계승과 변모 양상이 밝혀지는 등[7] 많은 연구 성과가 축적되었다. 또 최근에는 역사학, 정치학, 철학, 문학, 교육학, 건축학을 망라한 다학문적 접근을 통해 석실서원을 입체적으로 조명하는 동시에 대중적 접근이 용이하도록 평이한 문체로 풀어낸 최초의 학제간 연구가 시도된 바 있다.[8] 이 연구를 통해 석실서원의 역사와 정치적 변천, 학풍과 교육, 문학작품에 묘사된 석실서원의 모습부터 공간구조의 복원에 이르기까지 석실서원의 면모가 종합적으로 소개되었다.

그러나 석실서원 강학에 대한 선행연구는 주로 김원행이 제정한 석실서원 학규와 강규에 대한 소개, 그리고 김원행 시기의 강학활동에 집중되어 있을 뿐 김창협의 강학활동에 대한 본격적인 연구는 거의 시도된 바 없다. 그 이유는 김창협의 강학에 관련된 직접적인 자료가 없기 때문이

5 이경구, 「김원행의 실심 강조와 석실서원에서의 교육활동」, 『진단학보』 88, 1999 ; 오항녕, 「석실서원의 미호 김원행과 그의 사상」, 『북한강유역의 유학사상』, 한림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1998 ; 정만조, 같은 글; 김인규, 「김원행의 학문과 석실서원에서의 강학활동」, 『동방학』 22, 2012 등 참조.

6 조성산, 「18세기 후반 석실서원과 지식·지식인의 재생산」, 『역사와 담론』 66, 2013.

7 권오영, 「18세기 낙론의 학풍과 사상의 계승양상」, 『진단학보』 108, 2009; 조성산, 『조선후기 낙론계 학풍의 형성과 전개』, 지식산업사, 2007.

8 조준호 외 5인, 『석실서원』,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출판부, 2018 참조. 그 중 4장 「18세기 조선을 새롭게 디자인한 석실의 학풍과 교육」에서는 김창협 형제에게 영향을 끼친 세 스승의 사상과 석실서원의 학풍, 김창협과 김원행의 강학활동을 『농암집』에 수록된 다양한 자료들을 토대로 통시적으로 조명하였다. 그러나 이 연구는 강학과 관련된 자료의 편린들을 단편적으로 나열하거나 소개하는 데 그치고 있어 김창협이 수행한 석실서원 강학의 규모와 양상 및 특징을 체계적으로 분석하거나 구명하지 못한 한계가 있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그 중 일부를 참고하고 수정, 보완하여 김창협 시기 석실서원 강학의 몇 가지 특징을 보다 체계적으로 분석하고 구명함으로써 기존 연구 성과를 좀 더 발전시키고자 한다.

다. 특히 17세기 말부터 18세기 초반까지 10여년 이상 강학을 수행하였음에도 당시 석실서원의 강학에 대해 체계적으로 규정한 학규나 관련 조항은 김창협과 관련된 어떤 기록에도 뱔견되지 않는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농암집』에 수록된 시, 편지, 제문, 어록, 연보 등에 산견되는 기록을 최대한 검토하여 김창협 시기 이루어진 강학의 일상과 풍경의 단면을 들여다봄으로써 선행연구의 한계를 부분적이나마 보완하고, 17세기 말에서 18세기 초반까지 김창협이 수행한 강학의 규모와 양상 및 몇 가지 특징을 체계적으로 구명하고자 한다.

Ⅱ장에서는 김창협이 석실서원에서 본격적으로 강학을 시작한 시기, 강학의 운영 주기, 입원 자격과 조건, 강학 참여자들의 출신지역과 계층 및 배경, 서원에 유숙한 기간, 서원에 상주하며 강학에 참여한 문인들의 규모, 입문 절차와 입문 의례, 科業에 종사하는 유생들의 입원 허용 여부, 서원에서 공부한 서책, 강학의 방식과 형태, 강학의 절차와 강학 의례, 서원 공간의 활용, 김창협 부재 시 문인들의 학업 지도 등을 중심으로 김창협이 운영한 석실서원의 강학 실제와 운영 양상 및 일상적 풍경을 검토하였다. 이를 통해 18세기 중반 김원행이 수행한 강학활동과의 차이를 일정부분 해명할 수 있었다.

Ⅲ장에서는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김창협의 독특한 시각과 현실 대응관을 조명하였다. 그의 관점이 석실의 문인들을 교육하는 과정에서 구체적으로 어떤 식으로 관철되고 있었는지를 석실 문인들의 과거 공부에 얽힌 몇 가지 일화들을 통해 소개하였다. 또한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그의 독특한 입장과 현실 대응은 퇴계와 율곡의 관점을 어떤 점에서 절충하고 어떤 점에서 넘어선 것이었으며, 김원행의 관점과는 어떤 차이를 드러내는지 구명하고자 하였다. 또한 김창협이 석실의 문인들에게 강조한 독서법과 공부론에 있어 그의 스승 이단상과 조성기의 관점을 어떤 점에서 계승하고 발전시켰는지를 아울러 검토하였다.

마지막으로 Ⅳ장에서는 김창협 사후 두 차례의 사화를 겪으면서 석실

서원이 겪은 수난과 김창협을 이어 이재와 김원행에 의해 석실서원의 학풍과 강학이 어떻게 계승되었는지를 간략히 검토하였다.

Ⅱ. 김창협의 강학활동과 석실서원의 풍경

1656년 건립된 이래 김창협(1651~1708)이 석실서원에서 본격적인 강학활동을 전개하며 서울 학계에 영향력을 행사하기 시작한 것은 1695년부터다. 그는 숙종대 환국하에서 관직을 버리고 은거하다가 부친 김수항이 신원될 무렵 석실서원 인근으로 거처를 옮기며 본격적인 강학활동을 시작하였다. 부친의 뜻에 따라 영평(현 경기도 포천)의 농암에서 여생을 마치고자 했던 김창협은 45세가 되던 1694년 경기도 양주 금촌으로 이주한다. 당시 모친이 서울에 계셨기 때문에 문안하고 모시기에 편리하도록 근교로 거처를 옮긴 것이다. 이듬해인 1695년 11월부터 그는 석실서원에 머물며 강학을 시작하였고, 1697년 8월에는 석실서원 인근에 다시 집을 지어 '삼주 삼산각'이라 이름하였다. 서원의 주변 산수가 깨끗하게 탁 트여 한가로이 거처하며 공부하기에 최적의 장소였기 때문이다. 그 앞에 모래톱 세 개가 있었으므로 그는 그 곳을 '三洲'라고 명명하였다. 그는 꽤 크고 넓은 외헌을 지어 가운데 두 칸은 방으로 만들고, 바깥의 삼면은 난간으로 막았으며, 방의 서북쪽 반 칸은 따로 잠자는 곳으로 만들었다. 외헌의 동쪽 면 처마에는 큰 글씨로 쓴 '三山閣'이라는 현판을 달고 방의 서쪽 벽에는 작은 書樓를 만들어 '光明閣'이라 하였다. 이는 주자의 기록 중 '惠我光明'이라는 말에서 취한 것이었다.[9] 그는 삼산각에 거처를 정한 뒤 특별한 일이 없으면 석실서원과 삼산각을 일상적으로 오가며 강학과 독서를 하였고, 이따금씩 증조부 김상헌이 살던 松柏堂[10]에 머물기도 하였

9 『농암집』 별집, 권 3, 어록, 「어유봉록」.

10 송백당은 증조부 김상헌이 살던 석실마을의 옛 집으로 지금은 사라지고 유허비만 남아 있다.

다.

농암집에 기록이 남아있지 않고 김원행 때 비로소 학규와 강규가 처음 제정된 것으로 보아 김창협이 주도하던 시기 석실서원에는 강학과 관련된 정례화된 규정이 아직 마련되지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러나 1695년 11월 무렵 '당시 선생은 미음에 우거하며 늘 서원에 왕래하였는데, 미음과 서원은 모두 양주 땅에 있다. 이때에 이르러 서원에 머물며 강학하였는데, 원근의 선비들이 매우 많이 와서 모였다'[11]거나 김창협, 김창흡 형제의 명성이 알려지자 '사방에서 쫓아오는 선비들이 구름처럼 많고, 매일 밤마다 방안에 줄줄이 켜진 불빛이 꺼지지 않을'[12] 만큼 전국 각지에서 많은 문인들이 석실서원에 몰려와 배움을 청하였다는 기록에 따르면, 이 시기 강학은 비록 비정기적이긴 하지만 일상적,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또 '서원을 열어 강학하며 향음례와 향사례를 행하니, 글 읽는 소리 넘쳐흘러 날마다 강당이 북적거렸다'[13]는 기록에 따르면 강회를 마친 뒤 향사례와 향음주례 등의 의례가 시행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와 같이 서원에서 강회 뒤에 향사례와 향음주례를 시행한 것은 소수서원이나 죽림서원 등 조선후기 다른 서원에서도 확인된다.[14] 향사례와 향음주례, 정읍례 등 行禮의 과정은 조선후기 서원 강학에 필수적으로 수반되는 의례 절차 중 하나로 여겨졌다. 이는 단지 문자를 매개로 한 지식의 전수 뿐 아니라 유자로서 예를 익히고 실천하는 데 서원 강학의 또 다른 목적이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대목이다.

이 때 석실서원을 찾은 문인들은 서울, 경기지역을 넘어 전국에 걸쳐 분포하고 있었으며 계층과 연령도 매우 다양하였다. 어유봉, 이현익, 이

11 『농암집』 권36, 부록, 연보 하, 을해년 11월.
12 『頭陀草』, 책13, 「送金士寬 壇 南歸序」.
13 "講開白鹿 禮行飮射 洋洋絃誦 日滿黌舍"(『농암집』 별집, 권2, 부록, 제문, 崔守紀 申綠 등).
14 「竹林書院節目」, 『市南先生別集』 권7, 雜著 ; 『邁埜集』 권4, 「遊白雲洞記」.

하곤, 김담, 오대훈, 오대준, 황주하 등 김창협보다 20세 이상 연하의 문인이 있는가 하면, 최주악은 동갑, 김극광과 홍세태는 두 살 아래였다. 또 김극광은 전라도 장성에서, 오대훈·오대준 형제는 나주에서, 이하곤은 충북 진천, 황주하는 강원도 원주에서 석실까지 찾아와 문인이 되었다. 또 김창협의 아들 김숭겸과 8촌 동생 김성후, 조카 김시보, 족질 김시좌 등도 문인으로 석실서원의 강학에 꾸준히 참여하였다. 특히 김창협, 김창흡이 그 문학적 재능을 높이 평가하여 몹시 아꼈던 홍세태는 중인 출신이자 유명한 위항시인이었고, 중국 사신이 조선의 시를 보고 싶어하자 좌의정 최석정이 그의 시를 추천할 만큼 시에 뛰어난 인재였다. 최주악도 사천 이병연, 겸재 정선과 시회를 맺고 활동할 만큼 시로 이름이 높았으며, 이하곤은 조선후기 유명한 문인화가이자 평론가로 이병연, 정선, 윤두서 등 당대 유명한 시인, 화가들과 교유한 인물이었다.

이들은 보통 짧게는 며칠에서 한 달, 길게는 6개월에서 1년여를 석실서원에 머물며 강학에 참여하였다. 1697년 김창협이 권상하에게 보낸 편지에 '저와 함께 어울리고 있는 벗들이 항상 10여 명은 된다'[15]는 기록에 따르면, 문인들에 따라 머무는 기간에는 서로 차이가 있었지만 통상 평균 10여 명 정도의 규모가 유지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그 중 강원도 원주 출신의 황주하는 김창협이 강학을 시작한 1695년 겨울 석실서원으로 찾아와 정식으로 제자의 예를 청하고 각별한 사제관계를 맺은 문인이었다. 서원에 머물며 강회에 참석하던 황주하가 어느 날 문득 옛 관복을 입고 예물을 들고 책을 갖추어 섬돌 아래 서서 제자의 예로 뵙겠다고 청하자, 김창협은 깜짝 놀라 사양하며 세 번을 돌려보낸 뒤에야 비로소 허락하였다고 한다.[16] 이후 황주하는 아침저녁으로 스승을 만날 때마다 더욱 경건하게 예를 갖추었고, 김창협은 '자질이 매우 아름다운 데다 옛 것을 좋아하고 학문에 힘쓴다'[17]며 그를 각별히 총애하였다.

15『농암집』권12, 書,「答權致道 丁丑」.
16『농암집』권30, 哀辭,「黃生柱河哀辭 幷序」.

그러나 석실에서 공부를 마치고 고향으로 돌아간 이듬해 7월 황주하는 병으로 급서하고 말았다. 이에 김창협은 애사를 지어 애도의 뜻을 표한 뒤, 8월에는 원주에 가서 그의 장례식에 직접 참석하여 시를 짓고 이튿날에도 무덤을 떠나며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남겼다.

<황생 주하의 장례를 보고>[18]

팔월 달 동쪽 언덕 비가 내리니	八月東原雨
하늘이 선인 장례 슬퍼하신 것	天悲葬善人
큰 포부 실천할 날 다시는 없고	無年寄長筭
황천에 묻혔으니 한스러울 뿐	有恨閉窮塵
더 이상 스승 찾는 의리 없으니	不復求師義
뉘라서 도를 향해 가까이 갈까	誰能向道親
천지의 운이 벌써 쇠한 지 오래	乾坤久衰運
예로부터 기린을 슬퍼했다네	自昔已傷麟

<이튿날 아침 인제로 떠나기에 앞서 무덤에 곡하고 또 시를 짓다>[19]

부러진 칼을 이미 슬퍼했거니	已惜金刀折
옥수 묻힌 슬픔을 어이 견딜꼬	那堪玉樹埋
황량한 언덕에서 통곡을 하고	荒原盡一慟
나그네 길 또다시 떠나야 하네	客路復相乖
섬강의 가을 여울 목메어 울고	秋瀨蟾江咽
치악산의 찬 구름 컴컴도 한데	寒雲雉嶽霾
돌아가는 황생 넋 미포 지날 제	歸魂過渼浦
서글픈 이내 심정 알아주려나	定否顧傷懷

17『농암집』 권36, 부록,「연보」 하, 병자년 7월.
18『농암집』 권4, 시,「觀黃生柱河葬」.
19『농암집』 권4, 시,「翼朝向麟蹄 哭墓又賦」.

이로부터 8개월 뒤, 김창협은 원주에 있는 황주하의 집을 또다시 찾았다. 그는 황주하의 아버지로부터 주하가 살아있을 때 공부하던 서실 곁에 매화나무 한 그루가 있어 서실 이름을 '索笑菴'이라 하였는데, 주하가 죽기 몇 개월 전에 갑자기 말라죽었다는 이야기를 들었다. 그는 죽은 매화나무를 바라보노라니 슬픔이 북받쳐 또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지었다.

<황원백 쇠의 강변 누각에서 매화나무 분재를 보고>[20]

화분 속 시든 매화 눈물 절로 솟구쳐　　淚濺盆中半落梅
희미한 달빛 아래 일어나 서성이네　　澹雲微月起徘徊
서실 동쪽 늙은 나무 넋이 먼저 끊긴 것은　　齋東老樹魂先斷
색소암에 찾아 올 이 없을 줄을 알았었나　　應爲無人索笑來

<색소암에 들러>[21]

빈 서실 쌓인 먼지 그 얼마나 두터울까　　虛室凝塵幾許深
적막한 담장 아래 봄 새가 우짖누나　　墻陰寂寂囀春禽
서성이며 차마 방안 엿보지 못하노니　　徘徊未忍窺帷戶
책을 보면 쏟아지는 눈물 금치 못하리　　恐觸圖書淚不禁

이듬해 겨울에는 아우 김창흡이 원주의 색소암을 찾아 시 두 수를 지어 보내자 김창협은 '한 달만 못 보아도 비루한 마음이 생겼는데 벌써 그가 죽은 지 3년 세월이 흘렀음에 덧없어하고 이제 그의 죽음으로 세상에 더 이상 스승 찾는 의리가 사라졌다'고 한탄하며 서글픈 심정을 담아 또 화답시를 남겼다.[22]

1697년에는 金壇과 李夏坤이 서원으로 찾아와 제자의 예를 갖추고 문

20『농암집』권5, 시,「黃遠伯釗 江榭 見盆梅有感」.
21『농암집』권5, 시,「過索笑菴」.
22『농암집』권5, 시,「子益過廣津黃氏亭 有感懷 二律寄示 和之」.

인이 된 후 한 달 이상 머무르며 강학에 참여하였다. 1698년에는 전라도 나주에서 上舍 吳玄錫이 아들 吳大勛, 吳大濬 형제를 데리고 와 가르침을 청하였다. 오현석은 김창협보다 다섯 살 위로 20여년 전 김창협의 벗 창계 林泳의 집에서 만난 인연이 있었다. 이 때 김창협은 '上舍 吳啓休 玄錫이 천리 길을 찾아와 두 아들을 맡겼는데 그 뜻이 매우 간절하였다'라고 기록하고 있다. 두 아들을 부탁하고 나주로 돌아가는 오현석에게 김창협은 20여년 전의 인연을 기억하며 전별시를 지어주었다.[23]

1699년에는 이른바 '己卯科獄'이라 불리는 유명한 과거 부정 사건이 있었다. 합격자 33명 중 15명이 부정으로 합격한 것이 발각되어 전원 합격이 취소되고 시험 감독관을 비롯한 10여 명이 절도로 유배 간 사건이었다. 이 때 기묘과옥에 연루되었던 魚有鳳은 평생 다시는 과거를 보지 않겠다고 선언한 뒤 석실서원에 들어와 김창협의 문인이 되었다. 자신을 찾아온 어유봉에게 김창협이 무슨 책을 공부하고 싶냐고 묻자 어유봉은 '늘상 『소학』을 숙독하고자 하였으나 과거공부에 골몰하여 겨를이 없었는데 이제 이 책을 반복하여 익히겠다'고 답하였다. 이에 김창협은 "나는 갑인년부터 경신년까지 과거공부를 그만두고 독서에 전념하였는데 매우 효과가 있었다. 일생 사용한 것은 단지 그 몇 해 동안의 공부에서 나온 것이었다. 사람이 세상을 살면서 이러한 시절이 없어서는 안 된다"고 하며 과거를 과감히 포기하고 도학에 뜻을 돌린 어유봉을 높이 평가하며 격려하였다.[24] 어유봉은 후일 김창협이 자신이 지은 사칠논변에 대한 글의 교정을 먼저 부탁하고 함께 토론할 만큼 학문적 진보를 이루어 김창협의 수제자가 되었다.

한편, 김창협은 석실서원에서 본격적으로 강학을 시작한 1695년부터 봄가을로 풍광이 좋은 날이면 자제와 문생을 데리고 산에 들어가서 며칠

23 『농암집』 권5, 시, 「吳上舍啓休 玄錫 千里命駕 託以兩郎 其意甚勤 臨去索詩不置 輒次林德涵韻以贈 戊寅」.

24 『농암집』, 별집 권3, 부록 2, <語錄>, 「魚有鳳錄」.

씩 노닐다 돌아오곤 하였는데, 그것이 매년 정례적인 일이 되었다.[25] 이 때 그가 봄가을로 노닐었던 산은 석실서원이 있는 양주로 이주하기 전 여생을 마치고자 했던 영평의 농암, 즉 현재 포천의 백운산을 말한다. 1695년 석실서원을 찾아와 『대학』을 공부하던 徐文若이라는 문인이 김창협이 백운산으로 유람 갈 때 함께 들어가 백운산에서 공부를 끝마친 뒤 돌아갔다[26]는 기록에 따르면, 매년 봄, 가을마다 이루어진 백운산 유람에서는 단지 유람에 그치지 않고 독서와 강회가 함께 이루어졌음을 알 수 있다.

또 서원은 제향과 강학 외에 유식과 회합을 위한 공간으로 활용되었다. 해마다 정월대보름이나 섣달그믐, 중양절 등 특별한 날이면 김창협은 으레 유생들과 서원에서 회합을 가졌다. 1696년 정월 대보름에는 유생들과 서원에 모여 달구경을 하며 수창시를 짓고, 같은 해 섣달그믐에는 팔촌 아우 김성후, 문인 홍세태 등과 회합을 가진 뒤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지었다.

눈 오는 날 강변의 서루에 앉았자니　　江繞書樓坐雪天
요사이 심사 날로 초연해져 가누나　　邇來心事日超然
추운 밤에 화롯불과 낡은 책이 있으니　　寒宵宿火殘編在
오도카니 노년을 보냄직도 하여라　　兀兀差堪送老年[27]

몇몇 군데 매화 피어 섣달을 전송하나　　幾處梅花送臘天
초가 밖 새벽 눈이 푸르스름 빛나누나　　衡門曉雪故蒼然
그대 통해 홍애에게 내 한번 묻겠노니　　因君去問洪厓子
세월 의미 답한 시가 정녕 없지 않으리라　　定不無詩答歲年[28]

이듬 해 정월 보름밤에도 유생들과 서원에 모여 앉아 자유롭게 古詩를

25 『농암집』 권36, 부록, 「연보」 하, 을해년.
26 『농암집』 권22, 序, 「贈徐生文若序」.
27 『농암집』 권4, 시, 「上元夜 石室書院 同諸生觀月 呼韻共賦 丙子」.
28 『농암집』 권4, 시, 「石室除夕 次仲裕次洪生世泰韻 述感」.

외고 이튿날에는 전날 유생들이 읊은 고시에 대해 각각 절구를 지어 제생들에게 보여주었다.

한편, 당시 김창흡은 양근 벽계에 살고 있었으므로 김창협처럼 석실서원에 상주하지는 못하였으나 한 번 올 때마다 서원에서 며칠 씩 유숙하며 김창협과 더불어 강학을 주도하였다. 특히, 김창흡이 강학에 참여한 날은 밤늦게까지 강론이 계속되었고, 때때로 새벽닭이 울 때까지 밤새도록 문인들과 함께 강론하며 수창시를 주고받았다. 어느 날 김창흡이 석실서원의 풍경을 묘사한 시를 짓자 김창협은 속세를 벗어나 자연에 머무는 기쁨과 함께 서원에 모신 선조들의 행적을 충실히 기리고 계승하겠다는 뜻을 담아 다음과 같은 차운시로 화답하였다.

<서원을 읊은 자익의 시에 차운하다>[29]

맑은 집에 속된 일 하나 없으니	淸齋無俗事
밤낮으로 구름 낀 산을 마주해	日夕對雲峯
시서 맛 담뿍 취해 부족함 없고	醞藉詩書趣
예악 갖춘 의표로 기거하겠지	回翔禮樂容
언 강은 교교한 달빛 머금고	江氷含皎月
설봉엔 외론 솔 우뚝하거니	嶺雪表孤松
완악한 자 일깨운 만고의 참뜻	萬古廉頑意
두 분 조부 행적을 우러른다오	瞻依二祖蹤

강학의 교재로는 경전과 성리서 외에 때때로 증조부 김상헌의 문집인 『청음집』을 보기도 하였다. 1696년 어느 날은 김창흡이 서원에 오자 김시좌, 어유봉 등 문인들과 함께 밤늦게까지 『논어』를 강론한 뒤 『청음집』을 보다가 시 한 편을 골라 다함께 차운시를 지었다.[30] 또 동생 김창흡과

29 『농암집』 권4, 시, 「次子益詠書院韻」.
30 『농암집』 권4, 시, 「次子益韻」.

문인들이 밤늦도록 서원에서 강학할 때면 그 모습에 흐뭇해하며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지어 유생들을 격려하였다.[31]

늙어지면 학문을 이룰 수가 없으니	老矣金丹不可成
그대들은 창창한 앞길 향해 노력하소	諸君努力向脩程
한가한 밤 들려오는 등 앞의 독서 소리	閒宵臥聽燈前誦
낭랑하기 예전 듣던 비파소리 같구려	鏗爾當年鼓瑟聲

김창협 형제의 명성이 알려지자 '사방에서 쫓아오는 선비들이 구름처럼 많고, 매일 밤마다 방안에 줄줄이 켜진 불빛이 꺼지지 않을'[32] 만큼 전국 각지에서 많은 문인들이 석실서원에 몰려와 배움을 청하였다. 김창협은 함께 강학하던 문인들이 서원을 떠날 때마다 때로는 아쉬움을 달래며, 때로는 격려와 근심의 마음을 담아 각자의 처지에 맞는 이별시를 지어주었다. 어느 날 문인이자 족질인 김시좌가 서원에서 공부하다 도성으로 떠나게 되자 번화한 서울에 가더라도 서원에서 도학 공부에 매진하던 마음을 부디 명리에 빼앗기지 말 것을 당부하며 다음과 같은 이별시를 지어주었다.[33]

눈 녹은 봄 푸른 강 빛 하얀 모래 비치는데	雪盡春江綠映沙
물가 정자 이별의 정 봄빛마저 서글퍼라	湖亭別意悵年華
돌고 도는 천도가 그칠 리 있으랴만	天機袞袞何曾息
분분한 세상사도 끝이 없이 이어지니	世事紛紛未有涯
번화한 곳 그대여 부디 눈 크게 뜨소	鬧處須君明著眼
명리 마당 예로부터 구설수도 많다네	名場自昔易生瑕
이전부터 이러한 도 강구한 지 오래지만	向來此道商量久
작별하는 이 자리 새삼 더욱 당부하오	今日臨分意更加

31 『농암집』 권4, 시, 「次子益韻」 중 제 2수.
32 『頭陀草』 책13, 「送金士寬 ○○南歸序」.
33 『농암집』 권5, 시, 「道以自書院入城 口號以贈」.

또한 문인들이 서원을 떠날 때 뿐 아니라, 자신이 부득이한 사정으로 서원을 잠시 떠나야 할 때에도 서원에 남아 공부하는 유생들을 한시도 잊지 않았다. 그는 시시때때로 시를 지어 보내 자신의 소식을 전하고 유생들의 안부와 학업의 근만을 물었다. 1699년 12월에는 백형 김창집이 근무하던 강화도에 어머니가 머무시는 바람에 정월 초하루 명절을 보내기 위해 강화도로 잠시 떠나야 했다. 그는 강화도로 떠나기 전날 밤 이별시를 지어 제생들에게 보여주고, 강화도에 머무는 기간에도 석실 문인들을 생각하며 다음과 같은 시를 지어 보냈다.

<강화도로 출발하기 전날 밤 서원의 제생들에게 보여주다>[34]

서원의 파란 옷깃 생도들이여	院裏靑衿子
재실 앞 푸른 꽃잎 매화나무여	齋頭綠萼梅
지금껏 함께 서로 어울리다가	向來相藉在
떠나자니 발걸음 아니 떨어져	此去故遲回
이제 가면 드넓은 바다뿐이니	雲海他時闊
밤 깊도록 서글퍼라 싸늘한 강가	寒江永夜哀
헤어져도 언젠가 다시 보련만	別離應更見
흘러가는 세월이 못내 아쉬워	最惜歲華催

<밤에 앉아 시를 지어 서원의 제생들에게 부치다>[35]

천 봉우리 산 속에서 서책을 읽고	書卷千峯上
오경의 깊은 밤에 마음 닦는데	心齋五夜中
눈이 남아 빈방은 환히 밝고요	雪留虛室白
불씨 묻혀 작은 화로 붉게 빛나네	火宿小鑪紅
이처럼 깊은 산중 누가 오랴만	境絶何人到
격의 없는 두세 벗이 함께 있다오	形忘數子同

34『농암집』권6, 시,「將向江都 夜吟 示書院諸生」.
35『농암집』권5, 시,「夜坐有吟 寄書院諸生」.

오늘밤 미수가 서원에서는　　今宵渼上院
몇몇이나 신선 세계 꿈을 꿀는지　　幾箇夢禪宮

이듬해 정월 초하루가 되자 그는 「강화도의 정월 초하루」라는 제목으로 다섯 수의 시를 지었는데, 앞의 네 수에서는 강화도의 정월 초하루 풍경을 노래한 뒤, 마지막 5수에서는 "석실서원 누대에 푸른 물결 일렁이리, 금년 정월 어느새 얼음이 풀렸으니, 푸른 옷깃 제생들은 몇 명이나 기다릴까, 봄 하늘 바라보며 생각에 잠긴다네" 라며 석실의 문인들을 그리워하였다.[36]

이상에서 검토한 내용을 토대로 김창협 시기 석실서원 강학의 실제와 몇 가지 특징을 요약하면 다음과 같다. 우선 김창협이 본격적으로 강학을 시작한 것은 영평에서 양주로 이주한 1695년이었다. 그는 특별한 일이 없는 한 매일 집과 서원을 오가며 일상적으로 강학을 주도하였다. 이 시기 강학은 정례화된 규정이 없었으므로 비록 비정기적이긴 하지만 김창협의 일상적 왕래로 일상적,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었던 것 같다. 입원 자격은 지역이나 계층에 차별을 두지 않았으며, 며칠에서 수개월에 이르기까지 편차가 다양한 것을 보면 서원에서 유숙하는 기간에도 특별한 제한을 두지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는 조선후기 대부분의 서원 강학이 거재기간과 상주 인원에 철저한 제한을 두고 수행된 것과 대조적이다. 문인들은 보통 짧게는 며칠에서 한 달, 길게는 6개월에서 1년여까지 석실서원에 머물며 강학에 참여하였다. 각자의 사정에 따라 머무는 기간은 서로 달랐으나 서원에 상주하며 강학에 참여한 문인들의 규모는 통상 평균 10여 명 정도였다.

입문 절차는 황주하, 김담, 이하곤처럼 정식으로 제자의 예를 청하고 공식적인 의례절차를 거쳐 사제관계를 맺는 경우도 있었으나 대개의 문인들은 공식적인 절차 없이 받아들여졌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사제관계의 공

36 『농암집』 권6, 시, 「江都元日 庚辰」.

식적 의례에 해당하는 '贄禮'를 필수적인 입문 절차로 규정한 서원의 사례[37]도 있었으나 석실서원에서는 필수적인 절차는 아니었다.

또한 어느 날 서원에서 공부하던 유생들이 전부 과거시험을 치러 서울로 나가 김창협 혼자 덩그러니 서원에 남게 되었다는 기록에 따르면, 당시 석실서원에서는 과거 공부에 종사하는 유생들도 폭넓게 수용하였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후일 서원에서의 과거공부를 엄격히 금지했던 김원행의 석실서원 학규 내용과 극명히 대조되는 대목이다. 이는 서원에서의 과거공부에 대한 김창협의 독특한 관점에서 기인한 것으로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문인 서문약은 『대학』을, 어유봉은 『소학』을 읽었으며 다함께 모인 자리에서는 『논어』를 강론했다는 기록 등에 따르면 강학의 방법으로는 각자 수준과 요구에 맞는 서책을 공부하는 '개별독서'와 다함께 모여 정해진 책을 강론하는 공동학습의 과정인 '강회'가 병행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또 비록 성문화된 강학 규정은 마련되지 않았지만 수시로 문인들과 강회를 마친 뒤 운자를 내어 다함께 수창시를 돌려 짓던 관행이나 강회를 마치고 향사례나 향음주례를 행했다는 기록에 따르면, 조선후기 서원에서 보편적으로 행해지던 강학에 수반된 의례가 당시 석실서원 강학에서도 시행되고 있었음을 확인할 수 있다. 수창시와 향사례, 향음주례 외에 조선후기 서원에서 강학에 필수적으로 수반된 또 다른 강학 의례로는 敬讀, 庭揖禮, 相揖禮, 開接禮, 罷接禮 등이 있었다.[38] 조선 서원은 보통 제향공간과 강학공간을 중심으로 크게 의례와 교육의 두 가지 기능을 한 것으로 이해되지만, 이처럼 강학의 과정에서도 의례는 매우 중요한 부분

37 돈암서원의 전신이었던 정회당이 이에 해당한다. 이에 대한 상세한 내용은 김자운, 「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 『유학연구』 48, 충남대학교 유학연구소, 2019, 162~163쪽을 참조.

38 敬讀, 講會, 通讀, 庭揖禮, 相揖禮, 鄕射禮, 鄕飮酒禮, 開接禮, 罷接禮, 酬唱詩 등 조선 서원의 강학 의례에 대한 상세한 연구는 김자운, 「조선 서원의 강학 의례와 교육적 의미」, 『민족문화논총』 76, 2020을 참조.

을 차지하고 있었다. 이는 서원의 강학 절차가 단지 문자를 매개로 한 지식의 전수 뿐 아니라 다단한 의례들이 긴밀하게 통합된 채로 이루어졌으며, 경전 속 지식의 습득 외에 유자로서 예를 익히고 실천하는 데 서원 강학의 또 다른 목적이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중요한 대목이다.

그 중 酬唱詩는 강회의 마지막 절차로 행해지던 강학 의례였다. 18세기 소수서원『거재록』과,[39] 18세기 역동서원의『심경』강회에 대한 기록[40] 등 조선후기 서원 강학의 여러 사례에서 이를 확인할 수 있다. 원장이나 원임이 韻字를 내면 유생들이 강학하면서 느낀 소회 및 배움의 성과, 학문적 뜻과 포부 혹은 원장이나 훈장이 유생들에게 학문 자세를 권면하는 내용을 담아 다함께 돌아가며 수창시를 짓고 이를 반드시 기록에 남기도록 하였다. 이처럼 강회의 마지막 절차가 평가나 시험이 아닌, 강회에서 느낀 소회와 교육적 성과를 서로 공유하고 권면하면서 스승과 제자가 함께 하는 '시 짓기'로 갈무리되었다는 사실은, 근대교육이 결하고 있는 조선시대 서원교육의 목표와 함의를 보여주는 의미 있는 대목이다.

후일 김원행이 제정한 석실서원의 강규에는 강회에 수반되는 이와 같은 강학 의례를 강규의 말미에 '講儀'라는 제목으로 상세히 규정하고 있다.[41] 이에 따르면 김창협 대에 시행되던 강학 의례가 훨씬 체계화, 세분화되었음을 볼 수 있다. 김원행이 규정한 강회의 의식은 집례 선정, 서안과 생통 설치 등 준비절차에서 시작하여 크게 '謁廟禮–강당으로 입장–相揖禮–到記 작성–應講–문답과 토론–敬讀–相揖禮–퇴장'의 순서로 진행되었다.

39「居齋錄」(1720~1760), 국사편찬위원회 및「居齋雜錄」(1761~1780), 국사편찬위원회 참조.

40「心經講會回文措語」, 유교넷, 도산서원고문서, 한국국학진흥원.

41『渼湖集』권10, 雜著,「石室書院講規」.

Ⅲ.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인식과 독서법

김창협은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독특한 인식과 대응관을 지니고 있었다. 그는 科業과 道學의 우선순위는 엄격히 구별하면서도 두 가지 공부는 본질상 별개의 공부가 아니므로 방법이 올바르기만 하다면 과거 공부를 통해서도 道義를 깨달을 수 있음을 강조하면서 문인들에게 과거 공부를 보다 적극적으로 장려하고 지도했다는 점에서 율곡이나 퇴계와는 차별화되는 입장을 지니고 있었다. 이는 석실서원 문인들에 대한 교육과 문인들의 과거 공부에 얽힌 아래의 몇 가지 일화를 통해 확인할 수 있다.

1695년 석실서원에서 『대학』 공부를 마친 뒤 돌아가기 전 문인 徐文若은 김창협에게 다음과 같이 심중의 고민을 털어놓았다. “몸을 삼가고 행실을 닦아 훌륭한 선비가 되고 싶은 뜻은 있지만, 나이가 많은 데다 또 과거 공부가 누가 되어 독서에 전념하지 못할까 근심스럽습니다. 우선 과거 공부를 제쳐 두고 독서만 하고 싶은데 형제와 벗들이 서로 만류하고 비난하며 비웃기까지 하니, 어찌하면 좋겠습니까?” 이에 김창협은 ‘선비가 오늘날 세상에 살면서 과거 공부를 어떻게 하지 않을 수 있겠는가’라고 한 뒤, ‘만약 익히는 것이 다른 학업이라서 성현의 글에 힘을 쏟을 수 없다고 한다면, 이것이 바로 오늘날 세상에서 과거 공부를 하는 사람들의 비루한 습관이고 고질적인 폐단이다. 문체가 나날이 비루해지고 인재가 나날이 줄어드는 것은 모두 이 때문에 생기는 문제이다’고 하며, 필세가 활기차고 조리가 분명한 문장을 지어 과거에 급제하는 것은 성현의 글을 독실하게 읽지 않고서는 결코 도달할 수 있는 경지가 아니라며, 과거공부와 도학공부는 본질상 별개의 공부가 아님을 역설하였다.[42]

그는 또한 ‘남의 글을 표절하고 문장만 화려하게 수식하여 우연히 과거에 급제한다 하더라도 이는 눈을 감고 활을 쏘아 우연히 정곡을 맞춘 것

42 『농암집』 권22, 序, 「贈徐生文若序」.

과 같을 뿐이니, 만약 조정에 나가서 임금께 간하고 학문을 논하는 자리에 있게 된다면, 어리둥절하여 한마디 말도 하지 못하고 한 가지 일도 결단하지 못한 채 목각 인형처럼 우두커니 앉아있는 꼴을 면치 못하게 될 것'이라고 하였다. 따라서 우선, '성현의 글을 공부하여 마음과 눈을 밝게 틔우고 근본을 배양한 뒤에 그 여력을 가지고 과거 문장을 익힌다면 앞으로 큰 성취가 있을 것'[43]이라며 과거공부의 성패는 겉으로 보이는 화려한 문장의 수식에 달려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반드시 성현의 글을 통해 의리를 탐구하고 마음을 먼저 닦는 데서 출발해야 함을 강조하였다.

이처럼 김창협은 당시 선비들의 문체가 나날이 비루해지고 인재가 나날이 줄어드는 근본적인 원인은 과거공부 그 자체에 있는 것이 아니라 과거공부를 도학공부와 본질적으로 종류가 다른 것으로 인식하여 의리를 탐구하지 않고도 완벽한 과거 문체를 짓고 급제할 수 있다고 착각하는 데서 오는 고질적인 폐단이라고 생각하였다. 따라서 후일의 김원행과 달리, 그는 서원에서의 과거 공부를 금지하지는 않았다. 대신 서원에서는 성현의 글을 통해 의리를 탐구하는 공부를 우선으로 하여 먼저 바탕을 쌓은 뒤 여력이 남거든 그 때 과거공부를 하라고 강조하였다. 특히 그는 젊은 시절 자신의 체험을 통해 왜곡된 방식의 과거공부는 자칫 의리 탐구와 내면 수양을 위한 마음공부에 얼마나 독이 되는지를 누구보다 잘 알고 있었다. 그는 문과에 급제하기 전 24세부터 30세까지 과거공부를 아예 포기하고 독서에만 전념한 적이 있었다. 과거공부에 뜻을 빼앗기지 않고 오롯이 독서와 사색에만 마음을 쏟은 결과, 그는 평생 이루지 못한 성취와 깨달음을 얻을 수 있었다며 석실의 유생들에게 자신의 경험담을 들려주었다.

그러나 대부분의 문인들은 젊은 시절의 김창협처럼 과거공부로부터 현실적으로 완전히 자유로울 수는 없었다. 어느 해 과거 시험이 있던 날, 석

43 『농암집』 권22, 序, 「贈徐生文若序」.

실서원에서 함께 공부하던 유생들이 전부 과거에 응시하러 서울로 가자 서원은 텅 비고 김창협만 덩그러니 홀로 남겨지게 되었다. 이에 그는 홀로 쓸쓸하게 미수가를 산책하며 다음과 같은 즉흥시를 지어 그 날의 심경을 표현하고 있다.[44]

물굽이 걷노라니 맑은 물이 맘에 들어　　步下灣碕愛水淸
물가 앉아 오도카니 물고기 구경하네　　磯頭兀坐見魚行
그 누가 거룻배로 물길 헤쳐 올라오나　　小舟逆浪知誰子
놀라 깬 기러기 떼 어지러이 날으네　　驚起沙鴻陣不成

물이 빠져 드러난 거칠은 큰 바위에　　老石槎牙落漲痕
가만 앉아 있노라니 거북 등을 탄 것 같아　坐來眞似踞龜黿
어느 제나 소나무 천 자 높이 자라나서　　何時長得松千尺
낚싯대며 술잔을 그 그늘에 놓아 볼까　　蔭著漁竿與酒樽

따순 햇살 솔바람 봄 날씨 다름없고　　暖日輕風絶似春
먼 산엔 선명하게 푸른 안개 펴나는데　　遙岑晴碧更氤氳
명예를 좇지 않는 사람은 하나 없고　　無人不赴名場去
맑은 강에 그림자만 마주하는 늙은 이 몸　對影淸江獨老身

–이때에 제생들이 모두 과거를 보러 서울로 갔다–
時諸生皆赴試京中

그러나 한편, 김창협은 과거공부와 도학공부를 이분법적으로 보는 관점을 경계하고 도학으로 근본을 배양한 뒤 여력으로 과거문장을 익혀야 한다는 전제 하에, 과거를 준비하는 문인들이 있으면 힘닿는 데까지 도와주고자 하였다. 1680년 무렵 영평의 응암에 머물고 있을 때 김창협이 문장에 조예가 깊다는 소문을 듣고 과거 문체를 배우기 위해 전라도 장성

44 『농암집』 권5, 詩, 「十八日卽事」.

에서 金克光, 金重曄, 鄭㷜이라는 세 문인이 그를 찾아왔다. 김창협은 멀리 전라도에서 첩첩산중 백운산 기슭까지 자신을 찾아준 그들을 반갑게 맞이하는 한편, 그들을 道義가 아닌 구구한 문장으로 찾아오게 만들었으니 부끄럽다고 고백하였지만, 그들과 한 달 넘게 동고동락하며 과거 문체를 성심껏 가르치고 이들을 정성껏 대접하였다.

한 달이 조금 지나 마침내 문인들이 돌아갈 때가 되자 그는 삼복더위와 장맛비에 천장은 비가 새고 벽은 열기가 달아오르며, 해충과 뱀, 벼룩과 모기들이 번갈아 가며 사람을 괴롭히는 누추한 집에서 거친 밥과 나물, 국도 충분히 대접하지 못했다고 미안한 마음을 전하였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세 군자가 누추한 환경을 편안히 여겨주고 아침저녁으로 문장을 익히는 여가에 깊은 계곡을 굽어보며 맑은 샘물에 몸을 씻고 너럭바위 위에 앉아 무성한 숲 아래서 바람을 쐬고, 좋은 밤에 술이 있으면 늘 거문고를 타며 시를 짓고 서로 노래로써 화답하였으며, 이따금 고금 문장의 잘잘못을 마음껏 담론하다가 점점 道義로 접근해 들어가기도 하였으니 무엇 하나 즐겁지 않은 일이 없었다'고 회상하며 떠나는 문인들에게 이별주를 대접하고 석별의 정을 담아 글을 지어주었다.[45]

이상에서 살펴본 과거 공부에 얽힌 일화들과 '고금 문장의 잘잘못을 담론하다 점점 道義로 접근해 들어갔다'는 기록은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김창협 특유의 시각과 현실적 대응을 잘 드러낸다. '익히는 것이 다른 학업이라서 성현의 글에 힘을 쏟을 수 없다'는 편견이 오늘날 과거 공부하는 사람들의 가장 고질적인 폐단이며, 科業과 道學을 근본적으로 이분법적인 것으로 간주해서는 안 된다는 그의 입장은 실제 과거 문체를 가르칠 때에도 점차 道義로 접근해 들어가게 함으로써 관철되고 있었다. 과거 공부를 바라보는 김창협의 이러한 인식은 퇴계나 율곡의 관점과 분명한 차이를 드러낸다. 그는 정치 명분과 의리론에 있어서는 송시열의 견해를 충실히

45 『농암집』 권21, 序, 「送鄭平仲 愹 金晦而 重曄 金顯甫序」.

따랐으나 심성론에 있어서는 율곡의 종지를 충실히 계승한 송시열과 달리, 퇴계와 율곡의 사상을 절충하는 입장을 취한 것처럼, 과거공부에 대한 인식과 현실적 대응에 있어서도 퇴계와 율곡을 절충한 새로운 관점을 지니고 있었던 것이다.

율곡은 「은병정사학규」에서 '정사에서는 성인의 책이나 성리의 설이 아닌 책을 읽어서는 안 되며 만약 과거 공부를 하고자 하는 자는 다른 곳으로 가야 한다'[46]고 하여 정사에서의 과거공부를 엄격히 금한 반면, 퇴계는 「이산원규」에서 '과거공부 또한 널리 힘쓰고 통달하지 않을 수 없으나, 마땅히 내외, 본말, 경중, 완급의 순서를 알아서 타락하지 않도록 해야 한다'[47]며 율곡보다 훨씬 완곡한 입장을 취하였다. 즉, 서원에서도 과거공부를 하지 않을 수는 없으나 그것은 어디까지나 바깥과 말단에 해당하는 비본질적인 것이며, 서원 강학의 본질은 道學과 爲己之學에 있음을 강조함으로써 道學과 科業의 관계를 '내외, 본말, 경중, 완급'의 관계로 해석하고 있다.

그러나 김창협은 여기서 한 발 더 나아가 문인들에게 두 가지 공부가 본질적으로 다른 공부가 아님을 깨달아야 함을 강조하였다. '필세가 활기차고 조리가 분명한 문장을 지어 과거에 급제하는 것은 성현의 글을 독실하게 읽지 않고서는 결코 도달할 수 있는 경지가 아니므로 먼저 성인의 글을 독실히 읽어 마음을 틔우고 근본을 배양한 뒤에 그 여력을 가지고 과거 문장을 익힐 것'을 보다 적극적으로 요청하고 있는 것이다. 나아가 몸소 문인들에게 과거 문체를 가르치면서 과거 문체를 공부할 때에도 얼마든지 도의에 접근해 들어가는 공부가 가능하다는 점을 직접 체험하게 해주고 있다. 즉, 공부의 우선순위는 과거가 아닌 의리 탐구에 두되 두 가지 공부는 본질상 하나라는 전제 하에 문인들의 과거 공부에 보다 적극적으로 개입하고 지원함으로써 김창협은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시각과 현

46 『栗谷全書』 권15, 雜著, 「隱屛精舍學規」.
47 『退溪集』 권41, 雜著, 「伊山院規」.

실적 대응에 있어 퇴계와 율곡을 넘어선 새로운 관점을 지니고 이를 실천하고 있었다. 이는 김창협 사후 18세기 중반 석실서원의 강학을 재개하면서 제정한 학규에서 서원에서의 과거 공부를 금지한 율곡의 입장을 그대로 계승한 김원행의 관점과 극명히 대립되는 것이었다.

한편, 김창협은 스승 이단상과 조성기가 전인의 학설에 대한 맹목적 답습을 경계하고 '자득'을 중시하였듯이, 독서법과 공부론에 있어 문인들에게 '끊임없이 의심하고 정밀하게 생각하여 자득의 경지에 도달할 것'을 강조하였다.[48] 그는 어느 날 문인 어유봉이 독서법에 대해 읽는 것과 생각하는 것 중 무엇이 우선인지 묻자, "만약 숙독하고서 또 정밀하게 생각할 수 있다면 이보다 좋은 것이 있겠는가. 그러나 생각하지 않고 그저 읽기만 하는 것이 많이 읽지 않으면서 정밀하게 생각하는 것보다 못하다"고 하며 '多讀'보다 '尋思'와 '精思'가 독서법의 근본임을 강조하였다. '숙독과 생각하는 것'은 학문에 있어서 지와 행의 관계처럼 하나라도 없어서는 안 되는 것이지만, 맹목적인 독서보다는 '정밀하게 생각하는 것'이 자득을 위해 더 근본적인 독서법임을 강조한 것이다. 그는 또한 "독서할 때는 의심을 품는 것이 가장 중요하다. 만약 의심을 품지 않는다면 빈틈을 발견하지 못할 것이니 어디에 생각을 집중하겠는가. 그러므로 독서하다가 의심스러운 부분을 만나게 되면 비록 고민스러울 듯하지만 실은 너무나도 다행한 일이다"고 하며, '尋思'와 '精思'에 이르기 위한 가장 중요한 방법으로 '會疑'를 제시하고 있다. 자득의 경지에 도달하기 위해서는 먼저 정밀하게 생각해야 하고, 정밀하게 생각하려면 먼저 의심을 품어야 함을 강조한 것이다.[49] 조성기가 중시했던 '사색을 통한 자득의 경지'가 김창협에게는 자득에 이르기 위한 '회의, 심사, 정사'의 공부론으로 계승되고 있음

48 김창협의 학문에 영향을 끼친 스승 이단상, 조성기에 대한 상세한 내용은 김자운, 4장 「18세기 조선을 새롭게 디자인한 석실의 학풍과 교육」, 3절을 참조(『석실서원』,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출판부, 2018).

49 『농암집』, 별집 권3, 부록 2, <語錄>, 「魚有鳳錄」.

을 볼 수 있다.

김창협은 1708년 4월 11일, 58세의 나이로 삼주 삼산각 정침에서 사망하였다. 그의 부음이 전해지자 조정과 초야에서 모두들 서로 조상하였고, 원근의 선비들이 달려와 슬픔을 다해 곡하였으며, 문인들 중에 加麻하는 이가 60~70명이나 되었다고 한다. 이어 6월에는 석실의 선영에 장사 지내고, 1713년 가을에는 석실서원에 위패를 모셔 배향하였다.[50]

Ⅳ. 김창협 사후 석실서원 강학의 변화

김창협 형제 사후 석실서원은 경종대 소론의 집권으로 김창집 등 일가가 죽임이나 유배를 당하고 석실서원에 모신 김창협과 그의 아버지 김수항의 위패를 철회하는 등 수난을 겪으면서, 김창협 때 꽃피웠던 강학활동도 잠시 그 명맥이 끊어졌다. 비록 강학은 중단되었지만 낙론의 학맥은 도암 이재(1680~ 1746)에게로 계승되었다. 신축년(1721)과 임인년(1722)의 사화 이후 18세기 중반까지는 노론 내부에서 의리를 정립하는 문제가 시급하였으므로 낙론계 안에서도 강경한 의리론이 우세를 점해가고 있었다. 이는 낙론계 내부의 학문성향과 도통 계승에도 영향을 끼쳐 낙론계의 학문 분위기는 경세학보다는 의리론을 중심으로 재편되고 있었다. 김창협과 김창흡의 수제자였던 어유봉과 박필주는 애초에 낙론의 학통을 계승할 인물로 여겨졌으나, 노소 당쟁의 과정에서 소론과 연루되면서 낙론의 도통 계승에서 점차 밀려나게 된다. 이러한 배경에서 낙론의 학맥을 계승한 인물이 바로 도암 이재였다.[51]

이재는 김창협·김창흡과 직접적인 사승관계를 맺은 인물은 아니었다. 그럼에도 그가 낙론계 학통의 적전이 된 것은 신임옥사 이후 노론 학계

50 『농암집』 권36, 부록, 「연보」 하.
51 조성산, 『조선후기 낙론계 학풍의 형성과 전개』, 지식산업사, 2007, 280쪽.

의 보수적인 분위기와 정치적 요구가 그의 집안 배경 및 학문성향과 긴밀하게 맞아 떨어졌기 때문이다. 그의 외가는 당시 노론의 의리론을 주도하던 민유중 가문이었고, 이는 이재의 의리론과 학문에 큰 영향을 끼쳤다. 당시 한천정사에서 강학하던 그는 강학을 통해 노론의 의리를 계승하고자 하였고, 의리론의 사상적 기반으로 송시열의 학문에 많은 영향을 받았다. 특히, 김창흡 사후 이재와 윤봉구 사이에서 또 다시 불거진 호락논쟁은 그가 낙론 학통의 적전이 되는 데 결정적 사건이 되었다. 1736년 이재와 윤봉구는 '성인과 범인의 마음이 같은가 다른가'를 두고 또 다시 논쟁을 벌였는데, 이재는 여기서 '성인과 범인의 마음이 같다'는 '聖凡心同說'을 주장하면서 낙론의 새로운 종장으로 부상하게 된 것이다. 그는 심성론에 있어 김창협·김창흡의 학문을 계승하여 낙론의 정체성을 확립하였고, 의리론에 있어서는 송시열의 입장을 충실히 계승하였다.[52]

18세기 중반 이후 노론의 의리가 점차 중앙 정계에 관철되어 가자, 이재의 문하에서는 의리론 외에 경세학과 상수학 등 다양한 학문적 경향들이 등장하기 시작하였고, 18세기 후반에 이르러 이재의 낙론 학맥은 김원행을 통해 계승되었다. 이재의 문인이자 김창협의 사손이었던 김원행은 신임옥사 때 김창집과 형제들이 유배와 죽임을 당하는 것을 보면서 과거와 벼슬을 단념하고 은둔하여 평생 학문과 문인들의 교육에만 전념하였다. 그는 신임옥사 이후 경기도 양주로 이주한 뒤 강학을 통해 경종 연간 소론의 박해로 침체되었던 석실서원의 학문적, 정치적 위상을 새롭게 확립하였다. 김창협 사후 중단되었던 석실서원의 강학이 부활하게 된 건 이 시기 김원행에 의해서였다.

학규와 강규를 정비하고 엄격한 의절에 따라 강학을 재개하자 김원행의 문하에는 전국 각지에서 점차 많은 문인들이 몰려들었다. 그들은 서울과 지방에 골고루 포진한 광범위한 문인집단을 형성하며 낙론의 학문을

52 같은 책, 280~286쪽.

전파하였고, 학문, 정치, 교육의 분야에서 활발하게 활동하였다. 파악된 문인의 수만 해도 150여명에 이르렀으니 그 영향력을 가늠해볼 수 있다. 김창협 사후 당쟁의 와중에서 한 때 침체되었던 석실서원은, 이처럼 18세기 중반 이래 김원행이 강학활동을 부활시킨 결과, 낙론의 본거지로서 그 학문적, 정치적 위상을 재정립할 수 있었다.

김원행은 1772년 70세로 사망하여 양주 석실의 선영에 장사되고, 1805년 '文敬'이란 시호를 받았으며, 1857년 석실서원에 배향되었다. 그의 사후 석실서원의 강학은 장자 김이안과 손자 김인순에 의해 계승되었다. 그러나 순조대에 이르러 안동 김씨 세도 정권의 존재 기반으로 변질되면서, 낙론의 전통을 계승해 온 석실서원의 강학 기능은 점차 그 효력을 상실하게 된다.

Ⅴ. 결론

이상에서 분석한 내용을 토대로 17세기 말부터 18세기 초반까지 김창협을 중심으로 이루어진 석실서원 강학의 실제와 특징을 정리하면 다음과 같다. 김창협 대에는 비록 강학과 관련된 체계화된 규정은 마련되지 않았으나 그의 문집에 산견되는 기록을 통해 당시 강학의 방법과 절차, 규모 및 대체적인 양상을 엿볼 수 있다.

우선 김창협이 본격적으로 강학을 시작한 것은 영평에서 양주로 이주한 1695년이었다. 그는 특별한 일이 없는 한 매일 집과 서원을 오가며 일상적으로 강학을 주도하였다. 이 시기 강학은 정례화된 규정이 없었으므로 비록 비정기적이긴 하지만 김창협의 일상적 왕래로 일상적, 지속적으로 운영되었던 것 같다. 입원 자격은 지역이나 계층에 차별을 두지 않았으며, 며칠에서 수개월에 이르기까지 편차가 다양한 것을 보면 서원에서 유숙하는 기간에도 특별한 제한을 두지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이는 조선

후기 대부분의 서원 강학이 거재 기간과 상주 인원에 철저한 제한을 두고 수행된 것과 대조적이다. 문인들은 보통 짧게는 며칠에서 한 달, 길게는 수개월에서 1년여까지 석실서원에 머물며 강학에 참여하였다. 각자의 사정에 따라 머무는 기간은 서로 달랐으나 서원에 상주하며 강학에 참여한 문인들의 규모는 통상 평균 10여 명 정도였다.

입문 절차는 황주하, 김담, 이하곤처럼 정식으로 제자의 예를 청하고 공식적인 의례절차를 거쳐 사제관계를 맺는 경우도 있었으나 대개의 문인들은 공식적인 절차 없이 받아들여졌던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어느 날 서원에서 공부하던 유생들이 전부 과거시험을 치러 서울로 나가 김창협 혼자 덩그러니 서원에 남게 되었다는 기록에 따르면, 당시 석실서원에서는 과거 공부에 뜻을 둔 문인들에게도 입원을 허락하고 서원에서의 과거 공부 역시 용인되었던 것으로 보인다. 후일 서원에서의 과거공부를 엄격히 금지했던 김원행의 석실서원 학규 내용과 대조되는 대목이다. 이는 서원에서의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김창협의 독특한 관점에서 기인한 것으로 주목할 필요가 있다.

문인 서문약은 『대학』을, 어유봉은 『소학』을 읽었으며 다함께 모인 자리에서는 『논어』를 강론했다는 기록 등에 따르면 강학의 방법으로는 각자 수준과 요구에 맞는 서책을 공부하는 '개별독서'와 다함께 모여 정해진 책을 강론하는 공동학습의 과정인 '강회'가 병행되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또 비록 성문화된 강학 규정은 마련되지 않았지만 수시로 문인들과 강회를 마친 뒤 운자를 내어 다함께 수창시를 돌려 짓던 관행이나 강회를 마치고 향사례나 향음주례를 행했다는 기록에 따르면, 조선후기 서원에서 보편적으로 행해지던 강학에 수반된 의례가 당시 석실서원 강학에서도 시행되고 있었음을 알 수 있다. 이처럼 강학의 과정에서도 의례는 매우 중요한 부분을 차지하고 있었다. 이는 서원의 강학 절차가 단지 문자를 매개로 한 지식의 전수 뿐 아니라 다단한 의례들이 긴밀하게 통합된 채로 이루어졌으며, 지식의 습득 외에 유자로서 예를 익히고 실천하는 데

서원 강학의 또 다른 목적이 있었음을 보여주는 중요한 대목이다.

다음으로 과거 공부를 바라보는 김창협의 독특한 인식과 대응관을 조명하였다. 그는 科業과 道學의 우선순위는 엄격히 구별하면서도 두 가지 공부는 본질상 별개의 공부가 아니므로 방법이 올바르기만 하다면 과거 공부를 통해서도 道義를 깨달을 수 있음을 강조하면서 문인들에게 과거 공부를 보다 적극적으로 장려하고 지원하였다는 점에서 율곡이나 퇴계, 김원행과는 구별되는 관점을 지니고 있었음을 확인하였다. 이를 통해 그는 성리학의 심성론에서 뿐 아니라 과거 공부에 대한 인식과 현실 대응, 교육 실제에 있어서도 전인의 학설을 맹목적으로 답습하는 데 그치지 않고 자신만의 독자적인 관점을 수립하기 위해 끊임없이 묻고 사색하는 '자득의 공부법'을 실천하고 있었음을 볼 수 있다.

마지막으로 김창협이 석실의 문인들에게 강조했던 독서법과 공부론을 검토하였다. 前人의 학설에 대한 맹목적 답습을 경계하고 '自得'을 중시했던 스승 이단상과 조성기의 관점을 계승하는 한편, 그는 자득의 경지에 도달하기 위한 구체적인 방법론을 '會疑-尋思와 精思-多讀'의 순서로 체계화하여 제시하고 다독에 앞서 반드시 먼저 정밀하게 생각해야 하고, 정밀하게 생각하려면 먼저 반드시 의심을 품어야 함을 강조하였다. 조성기가 중시했던 '사색을 통한 자득의 경지'가 김창협에게는 자득에 이르기 위한 '회의, 심사, 정사'의 독서법으로 계승되고 있음을 볼 수 있다.

【참고문헌】

1. 원전 자료

『農巖集』『頭陀草』『栗谷全書』『渼湖集』『市南先生別集』『退溪集』
「心經講會回文措語」, 유교넷, 도산서원고문서, 한국국학진흥원.
「居齋錄」, 국사편찬위원회.
「居齋雜錄」, 국사편찬위원회.

2. 논저

권오영, 「18세기 낙론의 학풍과 사상의 계승양상」, 『진단학보』 108, 2009.
김인규, 「김원행의 학문과 석실서원에서의 강학활동」, 『동방학』 22, 2012.
김자운, 「조선 서원의 강학 의례와 교육적 의미」, 『민족문화논총』 76집, 2020.
김자운, 「조선시대 서원 강학 관련 자료의 유형과 특징」, 『유학연구』 48집, 충남대학교 유학연구소, 2019.
오항녕, 「석실서원의 미호 김원행과 그의 사상」, 『북한강유역의 유학사상』, 한림대학교 아시아문화연구소, 1998.
이경구, 「김원행의 실심 강조와 석실서원에서의 교육활동」, 『진단학보』 88, 1999.
정만조, 『남양주시지』 제1권 역사, 「제1절 석실서원」, 2000.
조성산, 「18세기 후반 석실서원과 지식·지식인의 재생산」, 『역사와 담론』 66, 2013.
조성산, 『조선후기 낙론계 학풍의 형성과 전개』, 지식산업사, 2007.
조준호 외 5인, 『석실서원』,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출판부, 2018.
조준호, 「조선후기 석실서원의 위상과 학풍」, 『조선시대사학보』 11, 1999.
조성산, 「17세기 후반-18세기 초 김창협, 김창흡의 학풍과 현실관」, 『역사와 현실』 51, 2004.
이경구, 「김창흡의 학풍과 호락논쟁」, 『한국사론』 36, 1996.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Seoksil-Seowon in the late 17th-the early 18th century

-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Kim Chang-hyup-

Kim, Ja-woon*

The purpose of this study is to examine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at Seoksil-Seowon led by Kim Chang-hyup from the late 17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Seoksil-Seowon was built in 1656 to commemorate the integrity of Kim Sang-yong and Kim Sang-heon, and has grown into a representative seowon of the Noron community in Seoul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One of the reasons is that around the 18th century, Seoksil-Seowon changed from a seowon focused on integrity to a seowon focused on education. Based on the political trends of society in the late Joseon Dynasty, the political position of the Andong-Kim family, and cultural characteristics and academic changes in Seoul, Kim Chang-hyup brothers had a very unique philosophy that was distinct from the mainstream Noron at that time, which adhered to Chu Hsi's Neo-Confucianism. And education and exchange at Seoksil-Seowon played a key role in spreading their philosophy to the academic world in Seoul.

* Lecturer, KongJu National University / jaunkim@hanmail.net

In addition, Seoksil-Seowon, which was once stagnant in the early 18th century, has reestablished its academic and political status as the home of Nak-hak(洛學) since the mid-18th century. This was thanks to Kim Won-haeng restarting education at Seoksil-Seowon, preaching Nakhak and raising many disciples.

So far, many studies have been conducted on Seoksil-Seowon in the fields of history and philosophy. As a result, the historical, political, and ide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of Seoksil-Seowon were revealed, and Kim Won-haeng's philosophy and hi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were introduced. However, the preceding research on education of Seoksil-Seowon mainly dealt with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Kim Won-haeng, and little of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Kim Chang-hyup. The reason is that there are no direct data related to Kim Chang-hyeop's educational activities. Therefore, this study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practic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education Kim Chang-hyup conducted at Seoksil-Seowon from the end of the 17th century to the early 18th century by reviewing the education-related records in Kim's writings as much as possible.

First, in Chapter II, I reviewed when was Kim Chang-hyup first started education at Seoksil-Seowon, who participated in the education, what was the qualification to enter Seoksil-Seowon, and whether those who were preparing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ere able to enter, how long they had been educated, what books they studied in the Seowon, and how they were educated. Through this, it was possible to confirm the difference in educational activities between Kim Won-haeng and Kim Chang-hyeop.

In Chapter Ⅲ, I examined Kim Chang-hyup's unique perspective on

the stud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 and his self-cultivation theory. And it was confirmed in what point his viewpoint was different from Toegye, Yulgok, and Kim Won-haeng. In the last chapter IV, I reviewed what kind of hardships Seoksil-Seowon suffered and how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of Seoksil-Seowon changed after Kim Changhy-up died,

Key word : Kim Chang-hyup(金昌協), Seoksil-Seowon(石室書院), Nak-hak(洛學), the study for the civil service exam(科擧 工夫), self-cultivation theory(工夫論)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30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8 219

朝鮮時代 書院 刻板本의 淵源 硏究*

裵 賢 淑**

Ⅰ. 서언
Ⅱ. 서원의 서적 간행
Ⅲ. 중화 청량서원 장판 서적
Ⅳ. 성주 천곡서원 각판 서적
Ⅴ. 결언

【국문초록】

서원은 조선시대 사학으로서 先賢을 祭享하면서 講學과 학문연구를 하던 기관이었다. 강학하고 학문을 연구하기 위해 서적을 수장한 문고를 두고 있었고, 또 서적을 간행하기도 하였다. 정조연간 편찬한『鏤板考』에는 총 84개소 서원에서 판각한 184종의 서원판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종래 우리나라에서 최초로 서적을 간행한 서원은 평안도 中和의 淸凉書院으로 알려져 왔었다. 필자는 도산서원 자료를 탐색하다가 과연 중화의 청량서원 장판본을 서원판으로 볼 수 있느냐란 의문을 품게 되었다. 이에 중화의 청량서원 판본의 성격을 규명하고, 아울러 조선시대 서원 刻板의 시원에 대해 살펴보았다.

청량서원과 관련 있는 서적은 명종 20(1565)년 간행한『續文範』, 명종 21(1566)년 간행한『近思錄』과『漢書傳抄』, 선조 원(1567)년 간행한『庸學釋義』, 선조 1(1568)년 간행한『古史通略』이다. 중화에서 전후 5종을 간행한 것이다. 이들 서적을 각판한 인물은 中和郡守 安瑮(1511-1571)이었다.

『용학석의』는 저자인 이황이 소각시킬 것을 지시하여 판목이나 간본이 전

* 이 논문은 2019년 대한민국 교육부와 한국연구재단의 지원을 받아 수행된 연구임 (NRF-2019S1A5C2A02082813)

** 계명문화대학교 명예교수/ hspae7714@nate.com

래되지 않는다.『속문범』의 지문에는 "遂鋟梓藏于淸凉書院"이란 기록이 있고,『근사록』의 권말에는 "嘉靖丙寅郡守安瑋刊藏中和淸凉書院"이란 간기가 있다.『한서전초』의 발문에는 "玆敢入梓藏于淸凉書院..."이란 기록이 있다.『고사통략』에는 "隆慶戊辰(1568)刊 藏淸凉書院"이란 간기가 있다. 이들 지문에는 판각한 후 판목을 청량서원에 수장했다는 내용이 수록되어 있다.

한편 성주의 川谷書院에서 선조 7(1574)년에『薛文淸公讀書錄』, 선조 8(1575)년에『夙興夜寐箴』과『朱子書節要』를 간행하였는데, 당시 서원의 원장은 鄭逑(1543~1620)였다.『설문청공독서록』에는 "萬曆甲戌(1574)春 川谷書院刊"이란 간기가 있다.『숙흥야매잠』에는 "萬曆乙亥(1575)夏川谷書院刊"이란 간기가 있고,『주자서절요』에는 "萬曆乙亥(1575)季夏重刊于川谷書院朞年而工畢"이란 간기가 있다. 이들 간기에는 장판한 곳에 대한 언급은 없지만 판각한 곳은 천곡서원임을 밝히고 있다.

청량서원의 책판은 군수가 판각한 후 그 판목을 서원에 장치했던 것이다. 따라서 알려진 바와 달리 서원 각판의 효시는 성주의 천곡서원이라 하겠다.

주제어 : 서원, 청량서원, 천곡서원, 안상, 정구

Ⅰ. 머리말

조선시대에는 관학으로 중앙에는 성균관을 두었고, 지방에는 사부학당 또는 향교를 두었다. 성균관은 교육에 필요한 서적을 수장했지만, 활발하게 서적을 간행하지 않았던 것으로 보인다. 성균관에서는 교육하는데 필요한 서적은 국가에서 운영하는 서적간행 기관에서 조달했기 때문에 굳이 따로 간행할 필요가 없었기 때문으로 보인다. 그러나 성균관에서도 서적을 간행하였으니,『韓國冊板目錄總覽』을 보면 대개 유생의 교육에 필수적인 四書三經이었다.

지방의 향교에서도 서적을 간행하였다.『한국책판목록총람』에 의하면 13지역의 향교에서 서적을 간행하였고, 도합 84종을 간행한 것으로 나타

나고 있다. 이 가운데 제주향교에서 29종을 간행해서 가장 많은데, 이는 지역적인 특수성이 작용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다른 지역은 6곳의 12종에 지나지 않는데 비해, 전라도지역의 6곳 향교 간본이 도합 43종으로 전체의 절반이다. 43종 가운데 27종이 전주에서 간행되었다.

사학으로는 서원과 서당을 들 수 있다. 종래 書堂에서 서적을 수장하거나 간행했을 가능성에 대해서는 부정적이었다. 그러나 조선시대 서당에서 간행된 서적은 모두 26종이 확인되었다. 지역으로는 경상도 23종, 강원도 1종, 충청도 2종으로 경상도에서 가장 많이 간행되었다. 서당간본 가운데 괄목할만한 점은 靑松의 扈江書堂에서 문집 3종과 유학서 5종, 도합 8종을 간행[1]한 것이다.

서당에 비해 상급인 서원에서는 서적을 많이 간행하였고, 수장을 위해 문고를 두고 있었다. 『鏤板考』에는 서원판도 적지 않게 수록되어 있는데, 총 84개소 서원에서 판각한 184종의 책판이 수록되어 있다. 그중 경상도의 서원에서 127종을 개판하여 수위를 차지하고 있으며, 다음은 충청도 22종, 전라도 21종, 황해도 8종, 경기도, 평안도, 함경도 각 2종이다. 전라도에서는 향교에서 가장 많이 개판한 것과는 대조가 된다.

이를 통해서 보면 교육기관에서의 서적간행은 전라도는 향교에서 서적간행을 주도하였고, 경상도는 서원에서 서적간행을 주도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지금까지 최초로 서적을 간행한 서원은 中和의 淸凉書院으로 알려져 왔었다. 필자는 도산서원 판각본에 대한 자료를 탐색하다가 우연히 과연 중화의 청량서원 장판본을 서원판으로 볼 수 있느냐란 의문을 품게 되었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중화의 청량서원 판본의 성격을 규명하고, 아울러 조선시대 서원 刻板의 시원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

1 裵賢淑, 「朝鮮朝 書堂의 書籍 刊行과 收藏에 관한 硏究」, 『書誌學硏究』 35. 2006, 5~40쪽.

Ⅱ. 書院의 書籍 刊行

조선 중기에 최초로 설립된 서원은 중종 38(1543)년 주세붕이 건립한 白雲洞書院이라고 알려졌다. 그러나 세종 연간에 이미 사사로이 설립한 書院이 있었다. 세종 즉위(1418)년 11월에 국왕은 서원을 설치하고 생도를 가르치는 자가 있으면 포상할 것이라고 유시하였다.[2] 이후 사재로 서원을 설치하고 생도를 훈도하는 서원에 대한 보고가 기록되어 있다. 세종 2(1420)년 1월에는 金堤의 전 敎授官 鄭坤과 光州의 생원 崔保民,[3] 9월에는 평안도 생원 姜友諒[4]이 서원을 설립하고 생도를 교수한다는 기사가 있다. 이로서 조선 최초의 서원은 세종연간에 설립된 것을 알 수 있다. 그러나 이때의 서원활동에 대한 자세한 내용과 활동을 알 수 없을 뿐만 아니라 후대에 전승되지 못하였으므로, 조선 최초의 서원은 설립과 활동에 대한 분명한 기록이 있는 백운동서원을 꼽는 것이다.

조선시대에는 서원과 유사한 성격의 기관으로 祠宇가 있었다. 사우는 여말 鄭夢周 등이 家廟 설치를 제창하면서 보급되기 시작하였고, 조선 건국 후에는 국가에 공헌이 있고 충의를 다한 명현들을 적극 추존하였다. 이는 민간에서 사우를 건립하는데 큰 영향을 미쳐 전국적으로 파급되었다. 이후 鄕祠·里祠·別廟·影堂·世德祠·遺愛祠·鄕賢祠 등 다양한 형태로 전개되었다. 사우는 처음부터 공이 있는 인물에 대한 봉사를 통해 향촌민의 교화에 그 목적을 두고 있었다. 따라서 사우는 선현과 선사를 봉사하는 기능이 위주였다.

---

2 『世宗實錄』 권2, 즉위(1418)년 11월3일 기유.
邓洪波, 赵伟, 「조선왕조 서원제도 수용에 관한 몇 가지 문제」, 『한국서원학보』 9, 2019, 210쪽.

3 『世宗實錄』 앞의 책, 권7, 2(1420)년 1월21일 庚申.
邓洪波, 앞의 논문, 210쪽.

4 『世宗實錄』 앞의 책, 권9, 2(1420)년 9월24일 己丑.
邓洪波, 앞의 논문, 210쪽.

그러나 서원은 선현과 선사를 봉사하는 祠와 자제를 교육하는 齋가 결합된 형태이다. 따라서 서원은 초기부터 사우와는 존립 목적과 기능이 구별된다고 할 수 있다. 서원에 있어 先賢祭享 기능 외에 講學과 학문연구[藏修]의 기능은 간과할 수 없는 필수 요소였다. 그러나 조선후기에 서원을 건립하기 위한 전 단계로 사우를 건립한 후 서원으로 승격시키기도 하여 점차 두 개념은 혼용되고, 여러 문제를 야기하기에 이르러 마침내 훼철의 위기를 맞았다. 이에 본고에서는 강학 기능을 수행한 서원에만 국한해서 살펴보기로 한다.

조선시대 지방 사학기관인 서원은 신재 주세붕이 중종 38(1543)년에 고려 安珦의 사당을 순흥의 白雲洞으로 옮기고, 그 사당 앞에 서원을 건립한 것에서 비롯되었다. 조선 최초의 백운동서원은 이황이 풍기군수로 부임한 후 명실상부한 유생의 장수처이자 강학처로 도약하게 되었다.[5] 명종 5(1550)년 퇴계의 건의로 국왕이 백운동서원에 紹修書院이라는 편액 외에 서책·노비·전결 등을 하사함으로써 국가적인 지원을 받는 공인의 서원이 되었다. 이후 명종 9(1554)년에는 영천의 臨皐書院, 명종 10(1555)년에 해주의 首陽書院, 그리고 명종 15(1560)년에는 함양의 濫溪書院이 사액되었다.

사액된 서원은 사학이지만 국왕의 인준을 받은 교육기관으로, 서책·노비·전결 등을 하사받은 특혜가 있었다. 이후도 때때로 중앙의 서적을 하사받았으며, 물론 지방관서나 다른 서원 간본도 기증받을 수 있었다. 또한 서원 주향자의 서적을 이관해 장서를 증대시키기도 하였고, 구입·교환·송지인책·자체제작 등의 방법으로 장서를 증대시켰다.[6] 서원에서 간행한 책을 서원간본이라 일컫는다.

임진왜란을 지난 후 서원은 급속도로 파급되어 전국 도처에 서원이 없는 지역이 없을 정도가 되었다. 철종 연간에는 무려 900여 서원이 건립되

5 鄭萬祚, 「朝鮮 書院의 成立過程」, 『韓國史論』 8,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80, 42~43쪽.
6 裵賢淑. 「嶺南地方 書院藏書의 淵源과 性格」, 『大東漢文學』 46, 2016, 273~326쪽.

었고, 그 중 265여 서원이 사액되었다. 수많은 서원이 건립되었으므로, 자체적으로 필요한 서적을 많이 간행했으리라 짐작할 수 있다. 그러나 사액된 지 오래되지 않거나 건립된 지 오래되지 않은 서원에서는 손쉽게 서적을 판각하기 어려웠을 것이므로, 900여 서원 가운데서도 84개소 서원에서 184종만 판각한 것으로 나타났다. 경제적인 여유가 있는 서원에서만 서적을 활발하게 간행할 수 있었던 것이다.

서원에 관한 연구는 교육학과 역사학에서는 다각도로 연구가 진행되고 있지만, 서지학 분야에서는 그다지 활발한 편은 아니었다. 특히 서원 판각본에 관해서는 다른 논문에 부분적으로 포함되기는 하였지만,[7] 윤상기[8]는 옥산서원과 경남의 서원 판각본에 대해 집중적으로 연구한바 있다. 이외는 소수서원 판각본[9]과 경주 용산서원 판각본[10]에 대한 논문만 알려지고 있다. 종래 장판본과 판각본에 대한 차이에 대한 고구 없이 최초의 서원판은 中和의 淸凉書院板으로 굳어졌었다. 따라서 서원에서의 서적을 판각한 기원과 판각한 서적에 대한 연구는 이루어진 바 없었다. 본고에서는 淸凉書院에 수장되었던 책판이 최초의 서원 판각본이 아니며, 鄭逑가

7 이병훈, 「경주 옥산서원의 장서 수집 및 관리 실태를 통해본 도서관적 기능」, 『한국민족문화』 58, 2016, 423~480쪽 ; 남권희, 「朝鮮時代 慶州 刊行의 書籍」, 『新羅文化』 33, 2009, 1-57쪽 ; 박장승, 「慶州 소재 書院·祠에서 刊行한 典籍考」, 『新羅文化』 19, 2001, 227~ 268쪽.

8 윤상기, 「慶州 玉山書院版本에 관한 연구」, 『東義論集』 38, 2003, 77~95쪽 : 「密陽 禮林書院 版本考」, 『문화콘텐츠연구(동의대)』 9-2, 2004, 367~402쪽 : 「山淸 德川書院版本考」, 『東義論集』 40, 2004, 423~443쪽 : 「경남 함양군의 서원판본」, 『書誌學硏究』 32, 2005, 237~271쪽 : 「경남 진주의 서원판본」, 『書誌學硏究』 40, 2008, 295~322쪽 : 「경남 함안의 서원판본」, 『書誌學硏究』 44. 2009, 301~ 330쪽 : 「鏤板考에 수록된 경남지역 서원 藏板」, 『書誌學硏究』 50, 2011, 187~ 230쪽 : 「경남 산청의 서원판본」, 『書誌學硏究』 52, 2012, 101~136쪽 : 「조선조 경남지방 서원판본」, 『書誌學硏究』 60, 2014, 5-36쪽.

9 裵賢淑, 「紹修書院 收藏과 刊行 書籍考」, 『書誌學硏究』 31, 2005, 263~296쪽.

10 손계영, 「1784년 경주 용산서원의 崔震立 實紀 간행과정과 간행비용 분석」, 『書誌學硏究』 80, 2019, 141~168쪽.

星州 川谷書院에서 판각한 서적이 최초의 서원 판각본임을 밝히고자 한다.

Ⅲ. 中和 淸凉書院 藏板 書籍

1. 中和 淸凉書院 藏板 書籍 刻板者

조선시대에 가장 빈번하게 서적을 간행한 지방은 영남과 호남이었다. 이 지역에는 문인과 학자들이 많이 배출될 수 있는 여건이 조성되어 있었기 때문이다. 결과로 관북과 관서지방은 서적의 간행이 빈번하지 않았고, 문인과 학자를 배출하는 여건이 좋지 않았다. 그렇다고 이들 지방에서 전혀 서적을 간행하지 않은 것은 아니었다. 간혹 서적의 각판에 관심을 기우린 감사나 수령을 만난 경우는 서적을 간행한 바 있다. 그 중의 한 곳이 명종 말기의 中和郡이다.

중화군은 평양의 남부에 있던 군이다. 평양에서 개성으로 갈 때 점심을 먹을 위치라는 의미로 중화라 하였다고 한다. 고구려에서는 加火押이었고, 신라 헌덕왕이 縣으로 삼고 唐嶽縣이라 고쳤다. 고려 현종 9(1018)년 서경의 屬村으로 唐嶽村이 되었다. 인종 14(1136)년 妙淸의 난을 평정하고, 경기의 道를 나누어 江東·江西·順和·三登·三和·中和의 6현을 만들 때 唐岳·荒谷·松串 등 9村을 합쳐 中和縣을 만들고, 縣令을 두어 西京에 속하게 하였다. 충숙왕 9(1322)년에는 군으로 승격시켰다. 공민왕 20(1371)년에 다시 知郡事로 승격시켰다.[11]

조선 태종 13(1413)년에는 평안도에 편속되었고, 도호부사가 파견되었다. 세조 12(1466)년 진관제를 실시할 때 평양진관 소속이 되었고, 책임자로 군수가 임명되었다. 선조 25(1592)년 임진왜란 때 군의 출신인

11 崔瑆煥·金正浩, 『輿圖備志』, 筆寫本[刊寫年未詳] 卷19, 中和都護府, 張23.
金正浩, 『大東地志』, 影印本[서울: 亞細亞文化社, 1976] 卷21, 中和. 454쪽.

의병장 林仲樑이 楊德祚의 휘하에서 공이 컸다 하여 도호부로 승격되었다.[12] 고종 32(1895)년 지방제도 개편에 따라 중화도호부는 평양부 상원군과 중화군으로 개편되었다. 다음해 고종 33(1896)년 13도제를 실시하면서 평안도를 남북으로 나누었는데, 평안남도에 편속되었다. 1914년 행정구역 폐합할 때는 중화면과 상원면으로 개편되었다. 1963년에 중화군을 평양시에 이관시켜[13] 평양특별시 중화군이 되었다.

이 중화군의 淸凉書院에서 임진왜란 이전에 서적을 각판했다고 하는 바, 청량서원에 대해 『俎豆錄』·『東國文獻院宇錄』·『增補文獻備考』·『東儒書院總錄』을 탐색했으나 찾을 수 없었다. 아마도 이들 서적이 편찬되던 시기에는 이미 서원이 훼철된 이후였을 가능성이 있다.

명종 말년 중화에서 서적을 각판한 인물은 中和郡守였던 安瑞(1511~1571)이었다. 안상의 본관은 順興이며, 晦軒 安珦의 후손으로 명종 때의 명신인 安玹의 아우이다. 문관 출신으로 중앙에서는 경복궁 재건사업에 참여하였고, 掌樂院 僉正(1561)을 지냈다. 지방관리로는 榮川郡守(1555~1560), 中和郡守(1565~1568), 德源府使(1570~?)를 지냈다.

안상은 현재의 영주인 영천군수 재직 중인 명종 13(1558)년 퇴계의 권유를 받고, 伊山書院을 창건하여 선현을 받들고 인재를 양성한 바 있다. 명종 14(1559년 퇴계가 찬한 이산서원원규는 후대 서원 운영의 모범이 되었다. 영주의 첫 서원으로서 선조 5(1572)년 사당을 세워 이황의 위패를 봉안하였으며, 도산서원과 같은 해인 선조 7(1574)년에 '伊山'이라 사액되어 선현배향과 지방교육의 일익을 담당하였었다. 대원군의 서원철폐령으로 고종 5(1868)년에 훼철되어 8칸의 이산서당만 남게 되었다.

당시는 아직 서원이 그다지 보급되지 않은 때였다. 안상은 퇴계의 영향으로 이산서원을 건립한 경력이 있었던바 학문의 불모지라 할 수 있는

12 崔瑆煥, 앞의 책, 中和都護府, 張23 ; 金正浩, 앞의 책, 卷21, 中和, 454쪽.

13 http://www.cybernk.net/infoText/InfoAdminstList.aspx?mc=AD0101&direct=1&ac=A012320(20.06.23.18:00)

중화에서 서원을 창건했을 가능성이 있다. 그러나 이는 증명할 수는 없다. 중화군수로 재직하고 있을 때는 5종의 서적을 각판하였으며, 덕원부사로 재직할 때는 『琴合字譜』를 간행하였다. 이는 향촌에서도 성리학적 사회질서를 정착시키고 풍속교화라는 수령의 의무를 다하고자 한 것이었다.[14]

안상은 선조 때의 음악 이론가이기도 하였다. 명종 16(1561)년 음악행정을 담당하는 掌樂院 僉正으로 있을 때, 악공을 시험하는 譜冊의 단점을 보완하기 위해 악사 洪善終에게 종래의 合字譜를 보충하게 하고, 악공 許億鳳에게 笛譜를, 악공 李無金에게 杖鼓譜를 만들게 하여, 거문고의 악보인 『琴合字譜』(일명 安瑞琴譜)를 편찬했는데, 덕원부사로 재직하던 선조 5(1572)년 간행할 수 있었다. 『금합자보』는 合字譜·肉譜·笛譜·杖鼓譜·鼓譜로 기보된 거문고의 여러 악곡 및 합자보로 기보된 琵琶譜가 수록되어 있다.[15] 선조 5(1572)년에 간행된 목판본이 1945년 발견되었는데, 이는 가장 오래된 거문고 악보이며 유일본이다. 이 거문고 악보는 임진왜란 이전의 여러 가지 악곡이 수록되어 있기 때문에 『時用鄕樂譜』와 함께 가장 기본적인 악보의 하나로서 보물 제283호로 지정되었다. 이는 임진왜란 이전의 음악사 연구에 귀중한 사료이다. 또한 당비파 음악의 옛 모습을 전하는 유일한 악보라는 점에서도 중요시되고 있다. 이 악보는 간송미술관에 수장되어 있다.

2. 中和 淸凉書院 藏板 書籍

종래 우리나라 서원판의 효시는 中和의 淸凉書院板으로 알려져 있었다. 중화에서 서적을 간행한 인물은 중화군수로 재직한 安瑞이었다. 안상

14 최선아, 「安瑞의 가계와 생애 및 琴合字譜 편찬 과정」, 『한국음악사학보』 49, 2012, 559~596쪽.

15 최선아, 앞의 논문, 559~596쪽.

은 부임한 첫 해인 명종 20(1565)년『續文範』, 명종 21(1566)년에는『近思錄』과『漢書傳抄』, 선조 원(1567)년에는『庸學釋義』를 간행하였고, 선조 1(1568)년에는『古史通略』을 간행하였다. 중화에서 전후 5종을 간행한 것이다.『근사록』과『한서전초』의 판목은『攷事撮要』선조 9(1576)년본과 선조 18(1585)년본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고,『속문범』과『고사통략』의 판목은『고사촬요』선조 18(1585)년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다.『용학석의』는 판각 후 곧 소각시켰으므로 책판목록에 수록될 수 없었을 것이다. 그러나『鏤板考』에는 5종 다 수록되지 않았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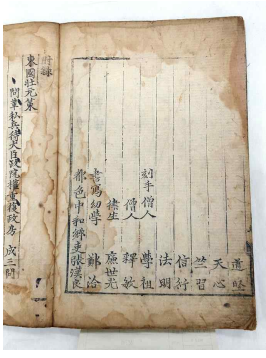
청량서원에서 서원으로서는 처음으로 서책을 간행했다고 보는 견해가 대두된 것은 20세기 중기이다. 명종 21(1566)년에 간행된『근사록』의 권말 간기에는 "嘉靖丙寅郡守安瑋刊藏中和淸凉書院"이라 표현되어 있는데, 서원판의 효시라 기록한 내용에 이기하면서 군수의 이름자 "瑋"이 "瑋"로 바뀌어 있다. 선조 1(1568)년 간행된『고사통략』의 권말 간기가 "隆慶戊辰刊藏於淸凉書院"인데, "刊"이 누락되어 있다.[16] 처음 잘못 이기함으로써 이후의 서적에 그대로 오식되었고, 아울러 최초의 서원간본으로 알려지게 되었다. 이에 청량서원에 수장되었던 판목에서 인출한 서적에 대해 살펴보고자 한다.

①『續文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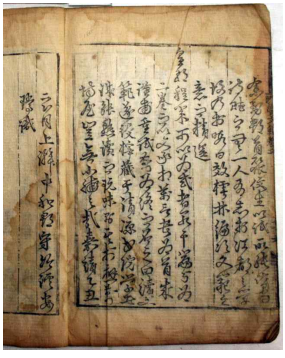
『속문범』은 안상이 편찬한 과거 수험용의 각종 문체별 2권본 학습서이다. 조정에서 신하가 왕에게 정무를 아뢰는 공문인 奏議體 산문의 일종인 對策을 모아 편찬한 책이다. 대책은 왕의 질문인 '制'와 신하의 회답인 '대책'으로 이루어졌다. 대책은 과거 시험과목이 되기도 하였다. 고시관이 경서의 뜻이나 정사와 관련된 문제를 策에 써서 과거 응시자에게 답하게

16『韓國古書年表資料』, 국회도서관, 1969, 20~21쪽 ; 金斗鍾,『韓國古印刷技術史』, 탐구당, 1974, 273쪽 ; 千惠鳳,『韓國典籍印刷史』, 범우사, 1990, 180쪽.

한 것을 策問 혹은 책이라 하고, 답변자가 적어 올리는 의론을 대책이라 하였다. 유생들은 평소 그 작법을 익혀 두고 있어야 했으므로, 조선에서도 대책을 선록한 서적이 선조대에 이르기까지 『殿策精粹』·『東人策選』·『東國壯元策』·『策文』 등이 간행되었다. 『속문범』도 그 일환으로 볼 수 있다.



<그림 1>『속문범』 識文 말미. ⓒ 배현숙



<그림 2>『속문범』 지문. ⓒ 최경훈



<그림 3>『속문범』 권두. ⓒ 최경훈

『속문범』 권말의 명종 20(1565)년 識文에 "遂鋟梓藏于淸凉書院"[17]이란 내용이 있고, 이어 각판에 동원된 인원의 명단이 수록되어 있다. 이 명단에 都色은 중화군의 향리가 동원되었고, 서사는 유학, 율생, 僧人이 동원되었고, 각수는 승인 6명이 동원되어 있다. 서사에 기록된 인물들은 청량서원과의 관련성을 특정하기는 어려울 것으로 보이고, 율생은 오히려 서원보다 군과 관련성이 높아 보인다. 중화판의 판식은 사주단변, 반곽 22.8 x 16.7 cm, 유계, 10행21자, 흑구, 내향흑어미이다. 권2에는 명나라의 책문과 대책 8편이 실려 있는데, 『東國壯元策』 중에서 선정한 成三問의 대책 1편이 부록으로 실려 있다. 개판 사실은 『고사촬요』 선조 18(1585)년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다.[18] 계명대와 단국대에 잔본 권2만 수장

17 安瑞, 『續文範』, 木板本[中和, 明宗 20(1565)] 識文.

되어 있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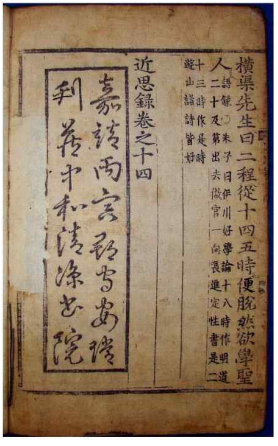
② 『近思錄』

『근사록』의 권말에는 "嘉靖丙寅(1566)郡守安瑋刊藏中和淸凉書院"[19]이란 간기가 있다. 『근사록』은 송나라의 대표적 유학자인 朱熹와 呂祖謙이 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의 글에서 유학의 중심문제들과 일상생활에 요긴한 내용을 뽑아 편집한 성리학 서적이다. 주희의 찬집으로는 경서 다음에 『소학』과 『근사록』이 제일 많이 간행되었는데, 이유는 『소학』으로 사람다운 근간을 세우고, 『근사록』으로 확충시킨 책이라 하여 유자의 필수보전으로서 조선시대 필독서였기 때문이다. 14권의 편명은 道體·爲學·致知·存養·克己·家道·出處·治體·治法·政事·教學·警戒·辨異端·觀聖賢이다. 중화판의 판식은 사주쌍변, 반곽 24.3 x 17.0 cm, 9행18자, 상하하향흑어미이다. 개판 사실은 『고사촬요』 선조 9(1576)년본과 선조 18(1585)년본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다.[20] 제95회 흔옥션에 출품된 바 있다.

18 鄭亨愚·尹炳泰, 『韓國의 冊板目錄 上』[保景文化社 영인, 1995], 115쪽.

19 http://hanauction.com/htm/off_auction_read.htm?ac_num=300&id=54580&off_id=138&page=1(2020.3.23. 16:00 사진을 제공해주신 흔옥션 趙顯濟 사장님께 감사 말씀 드립니다.)

20 鄭亨愚·尹炳泰, 앞의 책, 34·72·115쪽.



<그림 4>『近思錄』 刊記. ⓒ 한옥션



<그림 5>『近思錄』 권두. ⓒ 한옥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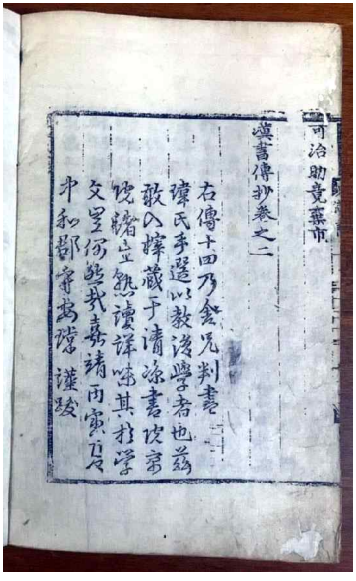
③『漢書傳抄』

『한서전초』에는 안상의 발문에 "玆敢入梓藏于淸凉書院…嘉靖丙寅(1566)夏中和郡守安瑋謹跋"[21]이란 기록이 있다. 안상의 형 安瑋(1491~1563)가『漢書』에서 16인의 열전을 초록한 2권본이다. 안위는 자가 伯珍, 시호는 文簡이다. 順弼의 아들이며, 좌의정을 지낸 安玹의 형이다. 중종16(1521)년 별시문과에서 병과로 동생과 함께 급제하였고, 예문관검열이 되었다. 이후 예조좌랑·사헌부장령을 지내고, 중종 34(1539)년 사헌부집의 때 蘇世讓과 함께 당시 세도가인 尹任을 탄핵하다가 오히려 미움을 사서 중종 37(1542)년에 충주목사로 좌천되었다. 명종 즉위 후 윤임 일파가 몰려나면서 명종 9(1554)년 청홍도관찰사·전라도관찰사·형

21 藤本行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硏究 史部』, 동국대학교출판부, 2018, 398~399쪽. 千惠鳳, 앞의 책, 2003, 88~90쪽.
http://hanauction.com/htm/off_auction_read.htm?id=44172&off_id=113&page=1&ac_num=247(2020.5.05. 15:23)

조참판·호조판서·병조판서를 지낸 후 지중추부사에 이르렀다. 兩界에 대한 국방을 강화하고자 鎭堡의 설치를 장려하였고, 남방왜변에도 유의하여 변방을 지키는데 공이 있었으며, 『經國大典』 주석 사업에도 참여하였다.

『한서전초』에 초록된 인물은 陳勝·項籍·張耳와 陳餘·韓信·吳濞·張良·陳平·王陵·酈食其·陵賈·蒯通·伍被·爰盎·鼂錯·嚴助의 16인이다. 중화판의 판식은 사주단변, 반곽 22 × 16.8 cm, 유계, 10행17자, 상하흑구에 상하내향흑어미이다. 개판 사실은 『고사촬요』 선조 9(1576)년본, 선조 18(1585)년본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다.[22] 일본 蓬左文庫 수장본이 초인본으로 보이는데, 인면이 매우 선명하다.[23] 서울대 수장본과 제95회 한옥션에 출품된 판본은 후쇄본으로 추정된다.



<그림 6> 『漢書傳抄』 跋文 ⓒ 배현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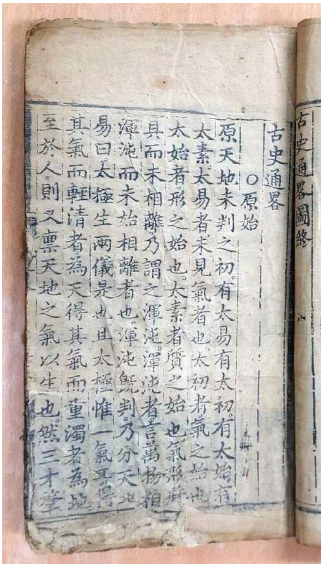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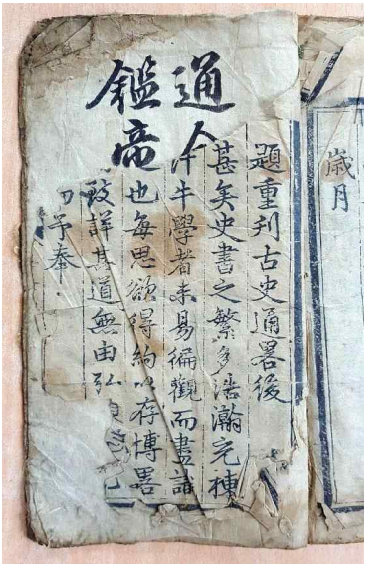
<그림 7> 『漢書傳抄』 卷頭. ⓒ 배현숙

22 鄭亨愚·尹炳泰, 앞의 책, 34·72·115쪽.
23 千惠鳳, 앞의 책, 2003, 343쪽.

④『古史通略』

『고사통략』의 편자는 알지 못하지만 중국의 삼황으로부터 원나라 말까지 약 4,000년간의 역사를 간략하게 기술한 사서이다. 명초에 저술된 것으로 보인다. 義山 陳烓가 浙江에서 감찰어사로 按察하다가 친구에게서 얻어 읽어보니 4,000년간 나라의 興廢·군신의 賢否·정치의 得失을 간략하면서도 자세하여 역사를 알 수 있는 첩경임을 깨달았다. 이에 항주군수 張縉에게 위촉하여 홍치 2(1489)년에 간행하였는데, 그 중간본이 조선에 전래되었다. 개판 사실은『고사촬요』선조 18(1585)년본에 평안도 중화에 수록되어 있다.[24] 확인된 인본은 일본 봉좌문고본과 영남대 수장본이다.





<그림 8>『古史通略』권두.
영남대 장본 ⓒ 배현숙

<그림 9>『古史通略』略後.
영남대 장본 ⓒ 배현숙

24 鄭亨愚·尹炳泰, 앞의 책, 115쪽.

일본 봉좌문고 수장본의 판식은 사주단변, 반곽 22.1 × 15.8cm, 유계, 9행18자, 상하내향흑어미이다. 또 "隆慶戊辰(1568)刊 藏淸凉書院"이란 간기가 있으나 각수명은 없다[25]고 하였다. 이는 『속문범』 지문 말미와 같은 간행 참여자의 명단도 없다고 볼 수 있다. 한편 영남대 수장본은 사주쌍변, 유계, 10행17자, 대흑구, 상하내향흑어미이다. 이음종이에 인쇄된 책장도 있다. 題後는 첫머리만 남고 뒤편은 탈락되어 있어 간기의 유무는 알 수 없다. 봉좌문고본에 수록되지 않은 周經의 성화 22(1486)년의 서문도 수록되어 있다. 따라서 봉좌문고본과는 체제가 상이하여 동일판으로 보기는 어려우며, 영남대 수장본이 더 먼저 간행된 것으로 보인다. 그러므로 중화군 각판의 『고사통략』은 봉좌문고에만 수장된 것으로 추정된다.

⑤『庸學釋義』

『용학석의』는 퇴계의 저술『經書釋義』 가운데『대학』과『중용』 부분이다. 퇴계는 평소 삼경과 사서 중에서 어려운 구절에 대해 선학들의 주석을 종합하고, 제자들과의 토론내용을 글로 정리해두었었다. 퇴계는 사망에 이르기까지 수정해야 한다고 생각하고 간행하려고 하지는 않았다. 이 원고를 제자들이 필사해서 돌려 읽었는데, 그 원고를 안상이 입수했고, 이 가운데『대학』과『중용』 부분을 각판한 것이다. 퇴계는 중화군에서『용학석의』를 간행했다는 소문을 듣고, 奇大升이 원접사의 막료로서 관서를 지나게 되자 이 책판을 거두어 불살라 줄 것을 부탁하였다.[26] 이후 판목을 불살랐다는 답신을 받고 지은 시도 있다.[27] 따라서 판목은 전

25 沈喁俊,『日本訪書志』, 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1988, 503~504쪽.
千惠鳳, 앞의 책, 2003, 101~102·349쪽 ; 藤本行夫, 앞의 책, 2018, 190~191쪽.

26 李滉,『退溪先生文集』, 木板本[刊年未詳] 卷17, 與奇明彦 丁卯. 張32-33.

래될 수 없었고, 인본도 역시 회수해 폐기했을 것이다. 퇴계 사후 琴應壎(1540~1616)이 수정하고 보완하여, 광해군 원(1609)년 윤3월에 간행하였다. 금응훈이 다시 정리하였으므로 『경서석의』는 퇴계의 저작이 아니라, 금응훈의 저작으로 보는 견해[28]도 있다.

중화군 각판본의 성격으로 보아 주제에 있어서는 경사자집 가운데 1종씩 고루고루 각판한 것이다. 경서의 해설서, 중국의 간략한 역사, 성리학 서적, 문체별 학습서이다. 위의 5종은 청량서원 각판본이라기보다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해서 청량서원에 책판을 장치한 것으로 볼 수 있다. 『용학석의』는 인본을 구할 수 없겠지만, 『속문범』, 『근사록』, 『한서전초』, 『고사통략』에는 간기 또는 발문에 간행처는 언급이 없지만 간행해서 청량서원에 장판했다고 하였다. 또한 『속문범』의 경우 지문에 이어 도색·서사·각수의 명단이 실렸는데, 여기에 서원의 임원으로 볼 수 있는 사람은 없다. 더구나 도색은 中和郡의 鄕吏이다. 따라서 이들 4종은 엄밀한 의미의 서원간본이라고 보기는 어렵고,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하고 청량서원에 판목을 수장시킨 판본이라 하겠다.

Ⅳ. 星州 川谷書院 刻板 書籍

1. 星州 川谷書院과 刻板者

성주군은 경상북도 서남부에 있는 군으로 신라시대 경덕왕 16(757)년 本彼縣을 新安縣으로 개명하였고, 신라말 碧珍郡으로 승격시켰다. 고려 태조 23(940)년에는 京山府로 승격되었으며, 충렬왕 34(1308)년 星州牧

27 李滉, 앞의 책, 卷4. 中和郡刊謬文字會囑奇明彦焚毁今得其書已焚去之喜次來韻. 張26.

28 전재동, 「퇴계학파 經傳註釋의 전승과 論語釋義」, 『국학연구』 25, 2014, 177쪽.

으로 승격되었다. 그러나 충선왕 2(1310)년 다시 경산부로 환원되었다. 조선 태종 즉위(1400)년에 성주목으로 승격되었다. 광해군 7(1614)년 왕의 비행과 조정을 비방한 사건으로 인해 성주목이 폐지되고, 高靈縣에 합속되면서 이 지역 사람 전체가 금고형에 처해졌다. 광해군 15(1623)년 인조반정으로 다시 성주목으로 환원되지만, 인조 9(1631)년에는 星山縣으로 강등된다. 고종 32(1895)년 성주군이라 개칭하고, 군수를 두었다. 여기에 川谷書院이 있어 조선의 서원으로서는 최초로 서적을 간행하였다.

『俎豆錄』에는 성주의 서원에 대해 전혀 언급이 없다. 『東國文獻院宇錄』에는 천곡서원은 선조 35(1602)년에 건립되었으며, 伊川 程子·晦庵 朱子·寒暄堂 金宏弼·寒岡 鄭逑·旅軒 張顯光을 모셨다[29]고 기록되어 있다. 『增補文獻備考』에는 중종 23(1528)년에 건립해, 선조 6(1573)년에 사액되었고, 선조 40(1607)년 재차 사액되었으며, 이천과 회암을 배향하고, 김굉필(명종 15년 추배)·이언적(인조 1년 추배)·정구(인조 1년 추배)·장현광(인조 20년 추배)를 배향한 것으로 기록되어 있다.[30] 『東儒書院總錄』에는 명종 13(1558)년에 건립해 선조 6(1573)년에 사액되었고, 주자·이천·한훤당 김굉필(牙山)·한강 정구(木川)·여헌 장현광(善山)을 배향했다고 기록되어 있다.[31]

천곡서원은 명종 13(1558)년 성주목사 盧慶麟이 중심이 되어 星州李氏 문중과 함께 鄕賢인 李兆年, 李仁復, 金宏弼의 학문과 덕행을 추모하기 위해 성주군 벽진면 智藏寺의 옛터에 창건한 서원이었다. 명종 13(1558)년 가을에 공사를 시작하여 이듬해 후임 목사 黃俊良이 완공하였다. 처음에는 뒷산 이름을 따서 延鳳書院이라 하고, 이조년, 이인복, 김굉필을 제향하였다. 그러나 이조년과 이인복의 경우 화상에 염주를 쥐고

29 金性澈, 『東國文獻院宇錄』, 木板本 [刊寫地未詳] 張20.
30 朴容大 等, 『增補文獻備考』, 鉛活字本, 隆熙 2(1908), 卷213, 學校考, 星州, 張3.
31 『東儒書院總錄』, 筆寫本, [刊年未詳] 冊1, 張45.

있다는 이유로 논란이 거듭되어 서원의 옆에 忠賢祠를 짓고 두 분을 따로 배향하였다. 이어 한강 정구가 도학의 연원을 따라 김굉필만을 종향하겠다고 하고, 伊川은 程頤를 의미하고, 雲谷은 주희를 봉안한 땅의 이름과 우연히 같은지라 서원의 이름을 주변을 흐르는 이천과 지명인 운곡을 따서 천곡서원이라 개칭하였다. 선조 6(1573)년 사액되고 선조 40(1607)년 중액되었으며, 인조 1(1623)년 정구, 인조 19(1642)년 장현광을 추가로 배향하였다. 이후 성주를 대표하는 서원으로 기능하던 중 대원군의 서원 철폐령으로 고종 5(1868)년 훼철되었고, 1984년 복원되었다.

천곡서원의 원장으로 있으면서 선조 7(1574)년에 『薛文淸公讀書錄』, 선조 8 (1575)년에 『夙興夜寐箴』과 『朱子書節要』을 간행한 인물은 鄭逑(1543~1620)였다. 자는 道可, 호는 寒岡, 시호는 文穆이다. 6대조 鄭摠과 그 아우인 鄭擢이 개국공신에 책봉되는 등 본래 공신가문으로 한양에서 살았으나, 아버지가 김굉필의 외증손인 충좌위 부사맹 鄭思中이며, 성주 이씨 李煥의 딸과 혼인하면서 성주에 정착하게 되었다. 한강은 13세인 명종 10(1555)년 성주향교 교수인 吳健에게 배웠고, 명종 18(1563)년에 퇴계를 찾아뵙고 『心經』에 대해 질의하였는데, 퇴계가 극히 칭찬하였으며, 이후 왕래하면서 학문과 관련해 여러 차례 질의하였다. 이런 연유로 『陶山及門諸賢錄』에도 수록되어 있다.[32] 명종 21(1566)년에는 曺植을 찾아뵙고 스승으로 삼았다. 과거를 포기하고 학문 연구에 전념하다가 추천으로 선조 13(1580)년 昌寧縣監으로 관직생활을 시작하였다. 성주군수로 있을 때인 선조 26(1593)년 임진왜란으로 잃은 선조의 형인 河陵君의 시체를 찾아 장사를 지낸 공으로 당상관으로 승진한 뒤 우부승지·장례원판결사·강원도관찰사·형조참판 등을 지냈다. 전체적으로 중앙 관직보다는 지방의 수령으로 더 많이 활약하였다.

선조 36(1603)년 『南冥集』을 편찬하는 과정에서 鄭仁弘이 이황과 李

32 權斗經編·李守淵補, 『陶山及門諸賢錄』, 木板本, [刊年未詳] 卷3. 張34.

彦迪을 배척하자 그와 절교하였다. 광해군 5(1613)년 癸丑獄事 때 永昌大君을 구하려 했으며, 광해군 9(1617)년 仁穆大妃를 서민으로 쫓아내지 말 것을 주장하였다. 그러나 만년에 정치적으로 남인으로 처신했지만 徐敬德·曺植 문인들과 관계를 끊지 않았기 때문에, 사상적으로는 영남 남인과 다른 요소들이 많았다. 경상좌도 안동권의 퇴계학을 기반으로 한 학문적 전통과 경상우도 진주권의 남명학이라는 양대 학통을 받아들이기 적합한 성주에 거주했으므로 두 학맥을 나름대로 통합 계승했다. 그의 사상은 近畿南人 실학파의 탈주자학적 사상의 한 부분을 전달해주는 교량 역할을 했다. 문인으로는 徐思遠·宋遠器·孫處訥·韓浚謙·文緯·張興孝·李潤雨·許穆·黃宗海 등이 있다.

경학을 비롯해 산수·의약·풍수·역사·천문에 이르기까지 여러 방면에 정통했으며, 특히 예학에 뛰어났다. 성리설은 이황의 영향을 제일 많이 받은 부분으로 경전 가운데 특히 『心經』을 중시하였다. 『心經發揮』·『改定朱子書節要總目』·『聖賢風範』·『洙泗言仁錄』·『濂洛羹墻錄』 등의 성리서를 저술하였다. 예학에도 조예가 깊어 『家禮輯覽補註』를 저술한 이래 『五先生禮說分類』·『深衣製造法』·『禮記喪禮分類』·『五福沿革圖』 등의 예서를 편찬했으며, 이황의 예에 관한 서신을 모은 『退溪喪祭禮問答』을 간행하였다. 읍지에도 관심이 많아 지방관으로 부임하는 지역마다 읍지를 편찬해 『昌山誌』·『同福志』·『關東志』·『永嘉志』·『平壤志』·『咸州志』 등 7종의 읍지도 간행하였다. 역사서로는 『歷代紀年』·『古今忠謨』·『治亂提要』 등을 저술하였다. 문학서로는 『古今會粹』·『朱子詩分類』를 편찬했으며, 의학서로는 눈병에 대한 처방을 담은 『醫眼集方』과 출산과 육아에 대한 『廣嗣續集』도 편찬하였다.

인조반정 직후인 인조 1(1623)년 이조판서에 추증되었으며, 인조 3(1625)년 文穆이라는 시호가 내려졌다. 성주의 檜淵書院·천곡서원, 칠곡의 泗陽書院, 창녕의 冠山書院, 충주의 雲谷書院, 현풍의 道東書院 등에 제향되었다.

2. 星州 川谷書院 刻板 書籍

성주의 천곡서원에서 서적을 간행한 경위에 대한 구체적인 기록이 거의 없어 개략적인 사실만 파악할 수 있다. 張顯光이 쓴 寒岡의 행장에서 천곡서원본과 관련된 기록을 일부 살펴볼 수 있을 뿐이다. 서원을 건립한 후 원장으로 추대된 한강은 백록동의 규정을 취하여 엄격하게 규정을 정하여 서원을 정비했다. 『寒岡年譜』 선조 6(1573)년조에 "朱子書節要總目을 개정하고 『家禮輯覽補註』를 간행했다"고 기록되어 있으며, 『朱子書節要』를 간행했다고 언급되어 있다.[33] 미루어 서원의 원장인 정구가 천곡서원에서 선조 7(1574)년 『薛文淸公讀書錄(要語)』을 간행했고, 선조 8(1575)년에는 『夙興夜寐箴』과 『朱子書節要』을 간행한 것을 알 수 있다. 이 3종 서적의 각판 사실은 『고사촬요』 선조 18(1585)년본에 저록되어 있다. 그러나 정조연간의 『누판고』에는 3종 다 수록되지 않았다.

① 『薛文淸公讀書錄』

『설문청공독서록』은 명대 薛瑄(1389-1464)이 本錄 10권과 續錄 6권, 모두 16권으로 엮어서 간행한 독서록이다. 설선은 山西의 河津 출생이며, 자는 德溫이고, 호는 敬軒이다. 魏希文과 范汝舟의 문하에서 정주학을 공부하였다. 영락 18(1420)년에 河南 鄕試에 일등을 하여 진사가 되고 禮部右侍郎, 翰林院學士를 지냈다. 정통연간에 山東提學僉事가 되어 백록동학규를 걸어놓고 강론하였으므로, 학자들이 薛夫子라 불렀다. 그의 학단은 河東學派라 불렸는데, 이는 양명의 姚江學派와 더불어 명대의 양대 顯學이 되었다. 시호는 文淸이며, 융경 5(1571)년에 문묘에 배향되었다.

33 『寒岡先生年譜』. 木板本, [刊年未詳] 卷1, 癸酉, 張5.
張顯光, 『旅軒先生文集』, 木板本, [刊年未詳] 卷11, 寒岡鄭先生行狀, 張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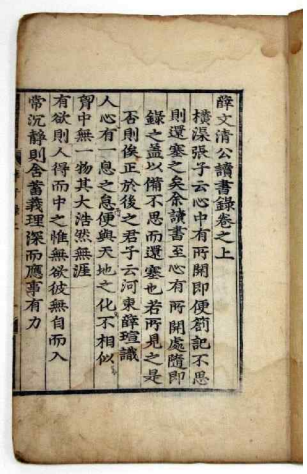
저서는 본서 외에 『薛文淸公集』, 『從政名言』, 『薛子道論』이 있다.

『설문청공독서록』에는 유가의 오경과 『태극도설』, 『통서』, 『서명』을 비롯한 성리서와 노장, 불교 등 다양한 내용이 포함되어 있다. 즉 잠언으로서 간단하면서 精湛하고, 철리가 온축되어 있다. 『독서록』을 읽은 뒤에 『근사록』을 읽고, 다음에 『소학』을 읽고, 그 뒤에 『논어』를 읽으면 학문에 입문할 수 있다고 하여 중시되었다. 편자인 吳廷擧는 梧州 사람으로 자는 獻臣이며, 시호는 淸惠이다. 성화 연간(1465~1487)에 진사를 지냈고, 벼슬은 順德縣知縣使와 右都御使를 지냈다. 오정거가 설선의 『독서록』을 읽으면서 중요한 구절만 발췌하여 時習에 대비하도록 정리한 것이 홍치 14(1501)년 편찬한 『薛文淸公讀書錄要語』 3권본이다.

선조 7(1574)년 천곡서원에서 간행한 『설문청공독서록』은 실은 『설문청공독서록요어』이다. 여기에는 오정거의 序(1501), 胡纘宗의 序(1521), 蘇世賢의 後序와 刻讀書錄跋(1524) 등 명판의 서발문만 수록되어 있고, 조선인의 서발은 보이지 않는다. 판식은 상하단변·좌우쌍변, 반곽 20.6 × 14.9 cm, 유계, 9행17자, 대흑구, 상하내향흑어미이다. 판심서명은 '薛子錄'이다. 이 책에는 "萬曆甲戌(1574)春 川谷書院刊"이란 간기가 있다. 간기에 '刊'이라 밝히고 있으므로 『설문청공독서록』은 선조 7(1574)년 성주에서 간행한 명실상부한 조선 最古의 서원간본으로 볼 수 있겠다. 이 판본은 서울대 규장각과 李時雄(경북 유형문화재534호) 수장본이 알려져 있다. 후에 임진왜란으로 천곡서원의 책판이 소실되자, 안동부사(1607.3-12)가 된 한강은 안동에서 자신의 발문(1607)을 추가하고 續選을 추가해서 다시 각판했다. 이 판본이 "萬曆丁未中夏下澣 安東大都護府開刊"이란 간기가 있는 선조 40(1607)년 永嘉本 즉 안동 간본이다.



<그림 10> 薛文淸公讀書錄.
ⓒ 유문규



<그림 11> 薛文淸公讀書錄.
ⓒ 유문규

② 『夙興夜寐箴』

『숙흥야매잠』의 저자에 대한 분명한 기록은 없었다. 이에 원나라 吳師道의 「吳禮部詩話」에 "魯齋 王先生은 天台 출신 陳 南塘 柏 茂卿의 『夙興夜寐箴』을 서사한 바 있다"라 한 기록을 토대로 저자는 송대의 陳柏이라고 알려졌다. 노재 왕선생은 朱熹의 三傳弟子인 王柏(1197-1274)이다. '숙흥야매'란 『詩經』「大雅」의 "抑", 「小雅」의 "小宛"과 「衛風」의 "氓"의 구절에서 따온 것으로서, 아침에 닭이 울어 일어날 때부터 저녁 잠자리에 들 때까지 부지런히 힘써야 할 일과 마음가짐에 대한 내용이다. 왕백은 上蔡書院의 원장으로 제자들을 가르칠 때 『숙흥야매잠』을 서사하여 좌우에 두고 보게 하였다. 『숙흥야매잠』의 저자인 진백은 절강의 天台 출신이며, 자는 茂卿, 호는 南塘이다. 그의 이력을 알려져 있지 않다.

『夙興夜寐箴註解』는 조선 중기 성리학자인 盧守愼(1515-1590)이 8장으로 나누어 주해한 성리학 수신서이다. 노수신은 자가 寡悔, 호는 穌齋, 伊齋, 暗室, 茹峰老人이고, 시호는 文懿였다가 뒤에 文簡으로 바뀌었다.

중종 26(1531)년 李延慶의 사위로 그 문하에 들어가 수학하였고, 중종 38(1543)년 식년시에 장원으로 급제하여 典籍·修撰·侍講院司書을 거쳐, 賜暇讀書를 하였다. 명종 1(1545)년 尹元衡이 일으킨 을사사화로 이조좌랑 직위에서 파직되고 이듬해 順天에 유배되었고, 良才驛 壁書事件에 연루되어 가중 처벌되어 珍島로 이배된 뒤 19년 동안 귀양살이하였다. 선조 1(1567)년 풀려난 후 대사간·부제학·대사헌·이조판서·대제학·우의정·좌의정에 기용되고, 선조 18(1585)년에는 영의정에 이르렀다. 영의정을 사임한 후 선조 22(1589)년 鄭汝立의 모반 사건으로 기축옥사가 일어나자 과거에 정여립을 천거했던 관계로 탄핵을 받고 파직된 후 곧 사망하였다. 문장과 서예에 능했을 뿐만 아니라 양명학과 불교에도 관심이 많아 정통 성리학자들로부터 한 때 공격을 받기도 하였다. 문집에는『穌齋集』이 있다.



<그림 12> 夙興夜寐箴. 간기.
ⓒ 張仁鎭



<그림 13> 夙興夜寐箴. 권두.
ⓒ 張仁鎭

노수신이 진도 유배시절에『숙흥야매잠』을 깊이 연구하고 여기에 자

신의 주해를 덧붙여 편찬하였다. 그 과정에서 李滉과 金麟厚에게 자문을 구하기도 했다. 그 뒤 선조의 즉위와 함께 유배에서 풀려나 충청도관찰사로 재직하면서, 이를 『夙興夜寐箴注疏』라 명명하여 선조에게 바쳤다. 선조 원(1568)년 왕명으로 교서관에서 간행한 것이 초간본이며, 선조 8(1575)년 천곡서원 간본이 중간본, 임진왜란으로 간본이 거의 망실되자 승려 杜暹이 인조 12(1634)년 玉泉庵에서 간행한 것이 삼간본, 영조 22(1746)년 영조의 어제 서문과 이황의 『聖學十圖』 가운데 제10도인 「夙興夜寐箴圖」를 첨부하여 간행한 것이 사간본이다. 천곡서원 간본에는 "萬曆乙亥(1575)夏川谷書院刊"이란 간기가 있다. 이 판본은 연세대와 경상북도 유형문화재445호 도일회 수장본이 알려져 있다.

③『朱子書節要』

중종 말년부터 주자학에 심취한 퇴계는 『朱子大全』에서 특히 편지글에 주자의 학문과 사상이 모두 함축되어 있음을 보고 감동받았다. 이에 서간 2,365편 가운데 성리학·정치·사상 등 정주학의 핵심이 된다고 인정되는 내용으로 1,234편을 발췌하고, 일록과 주해를 달아 입문서로 『주자서절요』를 편찬하였다. 48권에 달하는 『주자대전』의 서찰 가운데 3분의 2 정도만 추려 문인들을 시켜 초록하게 해 14권으로 만들었으나 직접 간행하지는 않았다.

초간본은 성주목사 黃俊良(1517~1563)이 명종 16(1561)년 목활자로 간행하였는데, 서명은 『晦菴書節要』였고 15권본이었다. 명종 20(1565)년경 해주에서 柳仲郢이 목활자로 간행했고, 명종 21(1566)년경 평양에서 鄭宗榮이 목활자로 간행하였다. 명종 22(1567)년 定州牧使로 부임한 유중영이 난해한 문구를 해설하고, 목록 1권·지기·문인의 성명·사실을 기재하여 목판으로 다시 간행하였다. 이때 『주자서절요』로 서명을 바꾸었다. 퇴계 사후 선조 8(1575)년 정구가 정주본을 저본으로 성주 천곡서원

에서 20권본으로 개편시켜 간행하였다. 후대의 판본이 이 체제를 답습하게 되는 중요한 의미가 있는 판본이다. 선조 19(1586)년 김성일이 나주목에서 간행했고, 광해군 3(1611)년 정경세가 전주부에서 간행했으며, 영조 19(1743)년에 도산서원에서 20권본을 다시 각판하였다.[34] 일본에도 전해져서 몇 차례 간행되어 明曆本, 寬文本, 寶永本, 明治本이 전래되고 있다.



<그림 14> 朱子書節要. 간기.
영남대 장본 ⓒ 배현숙



<그림 15> 朱子書節要. 권두.
영남대 장본 ⓒ 배현숙

천곡서원본에는 권두에 명종 13(1558)년 이황의 서문과 선조 6(1572)년 奇大升의 서문이 수록되어 있고, 명종 16(1561)년 황준량과 명종 22(1567)년 기대승의 정주본 발문이 수록되어 있다. 기대승의 발문에 연이어 "萬曆乙亥(1575)季夏重刊于川谷書院朞年而工畢"이란 간기가 있다. 이 간본은 고려대, 영남대와 李時雄(경북 유형문화재534호)의 수장본이

34 崔彩基,『退溪 李滉의 朱子書節要 編纂과 刊行에 관한 硏究』, 성균관대 박사논문, 2013, 164~192쪽.

확인되어 있다. 퇴계 사후 선조 8(1575)년 간행된 천곡서원본에는 정주본 간행 이후에도 계속된 퇴계의 교정과 주석의 성과가 반영되어 있어서 퇴계의 의도가 가장 완벽하게 반영되어 있다는 점에서 중요하다.

천곡서원에서 연달아 3종을 간행한 것이다. 천곡서원 각판본의 성격으로 보아 주제는 모두 자부 유가류로 볼 수 있다. 『고사촬요』에는 3종 다 성주 간본으로 수록되어 있으나[35], 천곡서원 간본임은 명시되지 않았다. 그러나 성주목 간행의 『주자서절요』 초간본은 목활자본이므로, 『고사촬요』에 수록된 판본은 목판본이므로 천곡서원 간본으로 보아도 무방할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다른 2 서적도 성주에서 중간한 기록이 확인되지 않으므로, 천곡서원 간본으로 볼 수 있겠다. 그러나 『누판고』에는 3종 다 수록되지 않았다.

Ⅴ. 結言

이상으로 서원간본의 효시를 밝히기 위해 명종말부터 선조초에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한 서적과 성주의 천곡서원에서 각판한 서적에 대해 살펴보았다.

종래 중화군의 청량서원에서 각판한 서적이 조선 서원판의 효시로 알려져 왔었다. 명종 20(1565)년부터 선조 1(1568)년까지 중화군수를 지낸 안상이 전후 5종을 간행한 것이다. 당시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한 서적은 명종 20(1565)년 『속문범』, 명종 21(1566)년 『근사록』과 『한서전초』, 선조 원(1567)년 『용학석의』, 선조 1(1568)년에는 『고사통략』이었다.

그 각판 사실을 추정할 수 있는 근거는 『속문범』에는 "遂鋟梓藏于淸凉書院", 『근사록』에는 "嘉靖丙寅(1566)郡守安瑋刊藏中和淸凉書院", 『한서

35 鄭亨愚·尹炳泰, 앞의 책, 108·153.

전초』에는 “玆敢入梓藏于淸凉書院 … 嘉靖丙寅(1566)夏中和郡守安瑋謹跋”, 『고사통략』에는 “隆慶戊辰(1568)刊 藏淸凉書院”이라 수록된 간기와 발문이다. 이는 안상이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하고 그 판목을 청량서원에 수장시켰다는 것이다. 특히 『속문범』의 권말에는 座目이 수록되어 있다. 그 都色은 중화군의 향리이고, 서사는 유학, 율생, 승인이 동원되었고, 각수는 승인 6명이 동원되었다. 서사는 청량서원과의 관련성을 특정하기는 어려울 것으로 보이고, 율생은 오히려 서원보다 군과 관련성이 높아 보인다. 따라서 이들 서적은 청량서원에서 각판한 것이라기보다는 중화군에서 각판한 후 청량서원으로 책판을 옮겨 장치한 것이었다.

한편 성주의 천곡서원에서는 선조 7(1574)년 『설문청공독서록(요어)』를 간행했고, 선조 8(1575)년에는 『숙흥야매잠』과 『주자서절요』를 간행했다. 이들 서적을 간행한 인물은 정구(1543-1620)였다. 당시 천곡서원의 원장으로 있으면서 간행한 것이다.

그 각판 사실을 추정할 수 있는 근거는 『설문청공독서록(요어)』의 “萬曆甲戌(1574)春 川谷書院刊”, 『숙흥야매잠』의 “萬曆乙亥(1575)夏川谷書院刊”, 『주자서절요』의 “萬曆乙亥(1575)季夏重刊于川谷書院朞年而工畢”이란 간기이다. 이들 서적에는 ‘藏板’이란 용어가 아니고, ‘刊’이라 표현되어 있다. 이는 천곡서원에서 각판한 것을 의미한다.

따라서 알려진 바와 달리 서원 각판의 효시는 성주의 천곡서원이라 하겠다. 천곡서원에서 서적을 간행한 후 각지의 서원에서도 속속 서적을 간행하게 된다. 한강 정구는 퇴계와 남명의 문하에 출입하면서 그 학문을 고루 수용하여 심화시켰고, 이를 전수해 발전시킨 인물이었다. 당시 성인이 정리하거나 찬술한 서적은 물론 성현의 언행록과 독서록도 열독해야 할 주요 도서로 인식되고 있었으므로, 한강이 『辟文淸公讀書錄』과 『夙興夜寐箴』을 먼저 간행한 것으로 보인다.

또한 퇴계가 가장 심혈을 기울여 『朱子書節要』를 저술하자, 문인들은 학문에 입문하는 단초를 알게 하는 성리학 연구의 필독서로 인식하게 되

었다. 이후 학문 연구에 있어 편지의 중요성을 인식하게 되었고, 문집 편찬에 있어서도 중요한 요소의 하나로 자리 잡게 되었다. 한강은 퇴계 사후 정주본 이후 계속된 퇴계의 교정과 증보를 반영시켜 20권으로 재편하여 간행하였으므로, 이 체제와 내용은 이후 판본에 그대로 영향을 미치게 되어 이후의 중간본은 대개 천곡서원본 계통이라 하겠다. 이들 서적은 이후 향교와 서원은 물론 經筵에서도 교육하고 논의하는 주요 서적이 되었다.

【참고문헌】

權斗經編·李守淵補,『陶山及門諸賢錄』, 木板本, [刊年未詳] 卷3.

金性澈,『東國文獻院宇錄』, 木板本 [刊寫地未詳]

金正浩,『大東地志』 卷21, 中和(影印本, 亞細亞文化社, 1976).

『東儒書院總錄』, 筆寫本, [刊年未詳] 冊1.

藤本行夫,『日本現存朝鮮本研究 史部』, 동국대학교출판부, 2018.

邓洪波·赵偉,「조선왕조 서원제도 수용에 관한 몇 가지 문제」,『한국서원학보』 9, 2019.

朴容大 等,『增補文獻備考』 卷213 星州(鉛活字本, 隆熙 2(1908)).

裵賢淑,「朝鮮朝 書堂의 書籍 刊行과 收藏에 관한 研究」,『書誌學研究』 35.

裵賢淑,「嶺南地方 書院藏書의 淵源과 性格」,『大東漢文學』 46, 2016.

심경호,『續文範卷之二』, 계명대학교출판부, 2009.

沈喁俊,『日本訪書志』, 한국정신문화연구원, 1988.

安瑮,『續文範』, 木板本[中和, 明宗 20(1565)]

우정훈·송일기,「葉菜의 近思錄 集解本 板本考」,『書誌學報』 36, 2010.

李滉,『退溪先生文集』 卷17, 與奇明彦 丁卯(木板本. [刊年未詳]).

전재동,「퇴계학파 經傳註釋의 전승과 論語釋義」,『국학연구』 25, 2014.

鄭萬祚,「朝鮮 書院의 成立過程」,『韓國史論』 8, 국사편찬위원회, 1980.

鄭亨愚·尹炳泰,『韓國의 冊板目錄』(영인본, 保景文化社, 1995).

千惠鳳,『日本 蓬左文庫 韓國典籍』, 지식산업사, 2003.

최선아,「安瑮의 가계와 생애 및 琴合字譜 편찬 과정」,『한국음악사학보』 49, 2012.

崔瑆煥·金正浩,『輿圖備志』 卷19, 中和都護府(筆寫本. [刊寫年未詳]).

崔彩基,『退溪 李滉의 朱子書節要 編纂과 刊行에 관한 研究』, 성균관대 博士論文, 2013.

Abstract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publishing in Seowon in Chosun dynasty

Pae Hyon-suk*

The Seowon was a private institution that was to hold memorial services to excellent scholars, to lecture and study in the Chosun Dynasty. To lecture and study, each Seowon had a library and published books. 184 kinds of titles engraved by 84 Seowons were included in『The Nupan-go ; List of engraving on wood』compiled in King Jeong-jo.

Up to now the Cheongryang Seowon in Junghwa is known as the first Seowon which published books. I doubted whether the xylographs kept in Cheongryang Seowon were really the first Seowon published books. Hereat I investigated the identity of the xylographs of the Cheongryang Seowon, as well as the beginning of the book publishing in Seowon during the Chosun Dynasty.

The Cheongryang Seowon published 5 kinds of books,『Sog-Munbeom 』was published in 1565,『Keunsarog』and『Hanseo jeoncho』published in 1566,『Yonghak Seok-eui』published in 1567,『Gosa Tongryak』published in 1568. These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An Sang(1511-1571), Junghwa county Governor.

These 5 titles had preface or postscript, an imprint written by An

* Honorary Professor at Keimyung University of Culture / hspae7714@nate.com

Sang. The woodblocks of『Yonghak Seokeui』was burnt out by the order of Yi Hwang, the author of the book. So the woodblocks and the printed books were not transmitted. They are ;『Sog Munbeom』was "Engraved on the wood and housed in the Cheongryang seowon".『Keunsarog』"was published by An Sang, Junghwa county Governor in 1566 and the woodblocks were housed in the Cheongryang seowon",『Hanseo jeoncho』was "engraved on wood and housed in the Cheongryang seowon …",『Gosa Tongryak』was "engraved on wood in 1568 and housed in the Cheongryang seowon". All four titles had records of them engraved on wood and housed in the Cheongryang seowon.

The Cheon-gog Seowon in Seongju published 3 kinds of books,『Seol Muncheong-gong dogseorog』was published in 1574,『Sugheung Yamaejam』and『Jujaseo jeolyo』were published in 1575. These books were published by Jeong Gu (1543-1620), who was in charge of the Cheon-gog Seowon. These 3 titles had imprints written by Jeong Ku.『Seol Muncheong-gong dogseorog』was "engraved on wood in 1574 in the Cheon-gog Seowon",『Sugheung Yamaejam』was "engraved on wood in 1575 in the Cheon-gog Seowon",『Jujaseo jeolyo』was "engraved once again on wood in 1575 in the Cheon-gog Seowon".

Therefore, unlike what is known, the Cheon-gog Seowon in Seongju was really the first seowon which published books.

Key word : Seowon, Cheongryang Seowon, Cheon-gog Seowon, An Sang, Jeong Gu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15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http://dx.doi.org/10.30594/kss.2020.12.11.9 251

白鹿洞书院的建立背景与中国书院的变化*
－宋元明清－

邓洪波** · 赵伟***

Ⅰ. 引言
Ⅱ. 本論: 南宋 - 中国书院发展的新起点
Ⅲ.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及进一步发展
Ⅳ. 繁荣多样与禁制压抑 : 明代书院的两面
Ⅴ. 自省·划一·变革 : 清代书院的轨迹
Ⅵ. 结语

【국문초록】

서원은 唐代 사인의 서재나 관에서 서적을 보관·정리하는 기관에서 기원한 것으로서, 새로운 인쇄술의 발달과 유불도 융합의 문화 배경 하에 중국 고대 선비들이 서적을 둘러싼 藏書, 讀書, 教書, 講書, 修書, 著書, 刻書 등의 활동을 전개함으로써 문화연구, 창조, 누적 및 전파활동을 진행하는 문화교육조직이라고 할 수 있다. 당으로부터 五代十國시기까지 이어진 전란을 겪고 宋代에 와서 새로운 발전 기회를 맞게 되었다.

北宋서원은 교육·교학 기능이 강화되면서 관학의 대체 역할을 하게 되었으며, 그 중 대표적인 것은 "天下四大書院"이 있다. 이어서 南宋 시기에 서원은 하나의 문화교육제도로서 완전히 자리를 잡았다. 남송 초기의 혼란스러운 사회 상황은 지식인들에게 인심수습과 倫常의 재건, 새로운 가치이념을 찾아서 민심을 유지해야 한다는 시대적 요구를 제시하였다. 장식, 주희, 여조겸, 육구연의 "남송사대서원"에서의 강학은 학술의 번영을 일으키면서, 理學과 서원

* 基金项目: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中国书院文献整理与研究"(15ZDB036)
** 제 1저자: 湖南大学教教授/ denghongbo2000@126.com
*** 제 2저자: 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博士研究生/ wwjgst@163.com

의 일체화의 형성에 일조하였다. 이 과정 중에 주희가 가장 중요한 역할을 하였다. 그는 남강군지사 시절 백록동서원을 중수하여 <백록동서원게시>를 제정하고 이학의 입장에 서서 학생들에게 새 교육이념을 전파하였다. 새로운 교육이념의 전파에 따라 서원의 규제가 점차 완비되고, 학문연구, 교학과 전도, 장서, 刻書, 학파종사의 제향, 전답경영 등 이른바 서원의 6대 사업도 형성되었다. 이는 서원이 다양한 기능을 갖고 있는 독립적인 문화조직이 발전되었고, 그리고 중국의 교육 사업이 관학, 서원, 그리고 사학이 병행하는 시대에 진입한다는 사실을 의미했다.

원나라 건립 후 과거제도가 재개됨에 따라 성리학이 다시 정통학설의 자리를 차지하고, 주희도 각 지방에서 널리 모시게 되는 제향인물이 되었다. 元代 서원의 가장 큰 공헌은 遼金시대의 결함을 보충하고, 서원과 성리학을 북방지역에 널리 확산시키면서 남북 문화의 차이를 축소시킨데 있다. 원대 서원의 가장 두드러진 특징은 성리학과 일체화가 된 서원이 관학과 동일시되었다는 것과 건립주체의 다양성 및 교육 규정이 더욱 상세화 되었다는 점이다. 원나라 조정에서 서원의 건립을 적극 장려하면서 蒙古, 色目人도 서원을 건립하였다.

명나라 초기에 程朱學이 또다시 정통학술로 확립되었는데도 불구하고 서원은 주원장의 서원혁파 정책과 관학 지원책으로 인해 백 년간 침체기를 맞았다. 원나라 말기 전란에 의해 훼손된 백록동서원, 악록서원 등도 장기간 동안 복구되지 못하였다. 명 중엽에 들어 관학교육의 폐단이 발생함에 따라 서원의 설립이 하나의 해결책이 되었다. 주희의 백록동서원을 모범으로 서원이 재건되기 시작했다. 당시 胡居仁은 백록동서원 산장으로 부임하여, <속백록동서원학규>를 제정하여 학생들을 교육시켰다. 한편으론 王守仁, 湛若水 등이 정통 철학에 대한 비판의 입장에 서서 전국적으로 파장을 일으킨 心學 전파운동을 전개하였다. 두 사람의 제자 및 후학들은 서원을 설립하고 강회를 여는 등의 활동을 전개하였으며, 남송 이래의 중국 서원과 학술이 또다시 성황을 이루었다. 이런 와중에 주자학 근거지였던 백록동서원은 왕수인 및 그 후학들의 노력과 서원 정비를 통해 양명학의 일대 진영이 되었다. 명 말기에 서원은 지식인들이 이익을 대변하는 정치기구화 되었다. 이로 인해 가정, 만력, 천계연간 세 번의 훼철을 겪으면서 쇠락의 길을 걷게 되었다. 그럼에도 불구하고 명대에 서원 제도가 조선으로 도입되었고, 이와 동시에 백록동서원도 조선 서원의 본보기가 되었다.

청나라 초기 주자를 숭상하는 문교정책에 따라 그의 <백록동규>를 본받아서 서원을 설립하였다. 강학 활동을 통해 양명학을 배척하고, 주자학을 숭상하는 "辟王崇朱"의 풍조가 형성되었다. 청대 초기 하남지역 이학과 서원의 부

흥은 바로 이런 풍조 하에 나타난 결과물이다. 옹정 연간에 각 성에 '省會서원' 설립의 시작과 동시에 관의 세력이 서원설립에 강력하게 간여하여 각급 '官辦書院'들이 전국 각 지역에서 크고 작은 학술교육의 중심지가 되는 현상이 형성되었다. 관과 민의 공동노력에 청대서원은 도시와 향촌에 널리 보급되어 미증유의 전성기를 이루었다. 한편으로 <백록동서원게시>와 <독서분년일정>은 詔令을 통해 공포되어 각 성회서원에서 통용되었다. 다른 한 편으로 張伯行, 王澍 등 일부 관리와 사인들은 송·명 두 시대 유학자들의 학설을 바탕으로 하여 <학규류편>과 <주자백록동조목>을 제정하여 주희와 백록동서원이 지식인에 대한 영향력을 계속적으로 촉진하고 있었다. 그러나 청대서원의 과거화, 관학화 정도가 심화됨에 따라 阮元을 비롯한 건륭·가경대의 한학 중심 학자들은 송학의 상투적인 틀에서 벗어나 詁經精舍와 學海堂을 세워서 經史훈고학에 전념하였으며, 이로써 청대서원은 변혁의 길을 열었다. 道光 이후의 서원은 개항으로 유입되는 서양문화에 적극적으로 대응하여 내용과 형식상의 재편을 통해 서학과 신학을 도입시켜서 신식서원을 구축하였다. 한편으론 청대 서원의 해외 수출도 계속 되면서 전 세계적으로 전파되어 백록동서원 정신을 중심으로 한 세계서원문화 체계가 형성되었다.

주제어 : 백록동서원, 송대서원, 원대서원, 명대서원, 청대서원

Ⅰ. 引言

对于中国书院的起源问题, 历来有不同的看法, 有唐代起源说·五代起源说和宋代起源说等. 究其所歧之由, 不过缘于书院制度自发端以后, 经历了初起而兴·调整变化直至最终成熟的不同阶段, 这本是一个新兴事物自诞生之日起都会经历的正常演变过程. 而后人在追溯书院的起源时, 又难免受到"后见之明"的影响, 以超越时空的评判标准苛求处于初期形态的书院, 往往因对"书院"概念定义的不同而产生聚讼. 如主张书院制度形成于北宋(960~1127)的王夫之(1619~1692)称 : "咸平四年, 诏赐《九经》于聚徒讲习之所, 与州县

学校等，此书院之始也."[1] 王夫之认为，书院制度通过朝廷赐书的行为获得正式承认，取得与州县官学同等的地位后，方能作为书院制度正式的开端. 而清人袁枚(1716-1798)注意到，"书院之名，起唐玄宗时丽正书院·集贤书院，皆建于朝省，为修书之地，非士子肄业之所也".[2] 他指出唐代的丽正·集贤书院拥有的独特功能与其他一般的聚徒讲学书院存在不同. 实际上，越来越多的史料表明，唐代书院拥有多元的形态与多样的特点，后世书院几乎所有的活动都能在这里找到源头，唐代应当属于书院制度发展的初期阶段.[3]

书院正式作为一种区别于一般官学·私学的独特教育制度·组织形式，则是在宋代形成的. 北宋建立之初，朝廷无力恢复各级官学，地方自发建立的书院一时发挥了替代官学培养士子的角色. 此时出现的"天下四大书院"，朝廷"分之官书，命之禄秩，锡之扁榜，所以宠绥之者甚备"[4]，成为北宋书院的代表. 所谓"天下四大书院"，实际上是一个由南宋的书院建设者根据其实际需要而提出的新概念，不仅其所指各不相同，其称呼也有"四书院"与"三书院"·"五书院"的差异.[5] 推究其实，它只是宋初书院影响之广·声势之大的代指，集中体现了宋初书院替代官学的作用，以及由此而被强化的教育教学功能. 然而，仅有教育教学功能并不能使书院区别于其他文化教育机构而占据特殊地位. 书院在历经唐·五代以及北宋的发展·完善后，在南宋理学家的努力下，成为"天理民彝之寄"，而被赋以"讲学明道"的当然责任. 此后，中国书院的发展步入了新的起点.

Ⅱ. 本论：南宋－中国书院发展的新起点

1 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3页.
2 袁枚：『随园随笔』，王英志编纂校点：『袁枚全集新编』第13册，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第275页.
3 相关讨论见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64页.
4 吕祖谦：『白鹿洞书院记』，『东莱集』，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第72页.
5 相关讨论见邓洪波·刘艳伟：『宋代"天下四书院"之士人记忆』，『求索』，2017年第12期.

1. 理学家与南宋的书院建设运动

南宋(1127~1279)是书院发展史上最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 书院作为一种文化教育制度得以完全确立. 统计显示, 可考的南宋书院总数达到442所, 是北宋73所的6倍之多, 显示出书院在南宋步入发展的繁荣期. 不过, 由于两宋之交的战乱, 书院在南宋最初的一二十年间陷入发展的停滞阶段. 并且北宋间陆续恢复的各级官学, 也因战乱影响而遭到冲击. 就连最高等级的太学, 也直到绍兴十二年(1142)方才设立, 士人广泛的文化教育需求难以满足. 另一方面, 北宋覆亡前后, 官学生中不乏有屈膝金朝的寡廉鲜耻之徒, 宣告了北宋官学教育的失败, 同时也为南宋士人提出了收拾人心·重建伦常·以一种新的价值观念维系世道民心的任务. 诞生于北宋的理学就在这样的背景下迎来新的发展机会.

理学, 又称道学, 有广义和狭义之分. 广义的理学即义理之学, 与辞章·考据之学对应, 是北宋周敦颐·二程·张载等人创立, 南宋朱熹·张栻·吕祖谦·陆九渊等人加以完善, 元·明·清占据主流的学术形式. 而狭义的理学专指广义理学中二程·朱熹一朱·陆王等各派学说.

随着理学在南宋的进一步发派的学术, 长期作为正统的统治思想. 本文所称之理学即广义之理学, 涵盖程展, 书院成为其传播的重要载体, 在教育理念与运行制度方面产生了新的变化. 最先将理学和书院结合到一起的是湖湘学者, 而始开其风者为胡安国(1074~1138)·胡宏(1102~1161)父子. 建炎四年(1130), 胡安国从荆门避居湖南, 于衡山之麓(今属湘潭)买山结庐, 称作碧泉书堂, 居以讲学授徒. 其子胡宏"有継述其先人之志", 在上书请求修复岳麓书院而未果后, 决定扩建碧泉书堂为碧泉书院, 以为会文讲习之所. 其时, 张栻(1133~1180)·彪居正·胡大原等一大批学者云集门下, 切磋学术, "卒开湖湘之学统".[6] 三湘学者闻风而动, 纷纷创建书院响应. 据记载, 仅绍

6 黄宗羲原著, 全祖望补修, 陈金生·梁运华点校:『宋元学案』卷42『五峰学案』, 北

兴·隆兴之际的十余年内, 湖南就创建和兴夏了9所书院. 其中最具影响力的是乾道元年(1165)湖南安抚使刘珙(1122~1178)重建的岳麓书院, 刘珙聘请胡氏高足张栻主讲其间.[7] 当时胡宏已经去世, 岳麓书院遂取代碧泉成为湖湘学派的中心.

乾道三年(1167), 理学家朱熹(1130~1200)闻张栻阐胡氏之学于岳麓, 不远千里而来访学, 成就了"朱张会讲"的文化盛事. 朱张会讲, 以岳麓书院为中心, 并往来于善化(今长沙)城南·衡山南轩二书院, 以"中和"为主题, 涉及太极·乾坤·心性·察识持善之序等理学普遍关注的问题, 讲论两月有余, "学徒千余, 舆马之众, 至饮池水立竭, 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8].

继湖南理学家开创书院建设运动之后, 各地学者也开始了创建书院, 讲授其学说的工作. 如浙江有吕祖谦(1137~1181)乾道二年(1166)讲学丽泽书院, 福建有朱熹乾道六年(1170)创建寒泉精舍, 江西有朱熹淳熙六年(1179)兴夏白鹿洞书院·陆九渊(1139-1193)淳熙十四年(1187)讲学象山精舍等等. 不仅如此, 他们还以其学术领袖的地位或到处讲学, 或为书院作记撰序, 或置田置书, 或订立规章, 大力提倡, 带动了当地书院建设. 于是, 在孝宗时期, 尤其是乾道·淳熙年间(1165~189), 书院建设运动在全国范围之内得以展开, 形成理学发展史上的"乾淳之盛"和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据学者统计, 是期创建兴夏书院共63所,[9] 年平均2.52所, 占南宋确知年代书院总数的23.77%, 仅次于南宋后期的理宗·度宗时期(1224~1274).

2. 典范构建：朱熹与白鹿洞书院

京：中华书局, 1986年, 第1366页.

7 岳麓书院的修夏与张栻的主教, 曾被日本学者看作是新儒学书院运动的开始, 见日本寺田刚：『宋代教育史概说』, 东京：博文社, 1965年, 第265-271页.

8 吴道行·赵宁等修纂, 邓洪波·谢丰等点校：『岳麓书院志』, 长沙：岳麓书社, 2012年, 第225页.

9 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 北京：故宫出版社, 2012年, 第13-22页.

南宋理学家开展的书院建设运动，是从兴复北宋原有的著名书院开始的. 在湖湘学派的胡宏试图修复始建于北宋的岳麓书院而未果后，转而开始了自创书院讲学的实践. 这种经历，实际上向张栻等学生辈理学家们揭示了其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即谋求官方和民间两种力量共同推进书院的建设事业. 他们所采取的基本模式是，从兴复宋初的著名书院入手，反复强调先朝对书院的奖励褒扬，以祖宗赐书·赐额·赐田·赐官等举措来夸耀和要求，意在请官方承认书院运动的合法性并出资出力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的建设. 乾道·淳熙间，岳麓书院·石鼓书院就在官方力量的帮助下得以顺利恢复. 白鹿洞书院也在朱熹的主持下得到修复，并成为南宋书院建设运动的典范.

朱熹作为南宋书院建设运动的后来者，却以近乎痴迷的热情加入其中，很快就成为运动的中坚与旗帜. 终其一生，他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了书院建设之中，与至少67所书院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关系，数量之多，远远在同时代其他理学大师之上.

白鹿洞书院的前身为唐人李渤(772~831)的隐居读书处. 升元四年(940)，南唐因白鹿洞创建庐山国学，宋初改为书院. 太平兴国二年(977)，宋太宗颁赐九经给白鹿洞书院，书院由是扬名天下，成为"四大书院"之一. 不过白鹿洞书院并未得到很好的维护，几年后就逐渐废弃.[10] 南宋淳熙六年(1179)，朱熹以知南康军的身份主持修复白鹿洞书院. 当年适逢大旱，但朱熹仍不避艰难，修建院舍的工作很快就交由军学教授和属邑知县办理妥当，其它聚书·置田·聘师·招生·订立学规·设立课程·请陆九渊讲学，甚至假期招举人集训等活动，皆顺利推进. 但朱熹的目标是希望得到皇帝的赐额·朝廷的肯定. 于是，他"昧万死具奏以闻"，在淳熙八年(1181)三月离任前，向中央政府呈送了《乞赐白鹿洞书院敕额》的报告，其称：

10 白鹿洞的历史沿革，可参考李才栋：『白鹿洞书院史略』，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9年.

> 欲望圣明俯赐鉴察, 追述太宗皇帝·真宗皇帝圣神遗意, 特降敕命, 仍旧以白鹿洞书院为额, 仍沼国子监, 仰摹光尧寿圣宪天体道性仁诚德经武纬文太上皇帝御书石经及印板九经注疏·《论语》·《孟子》等书, 给赐本洞奉守看读, 于以褒广前列, 光阐儒风, 非独愚臣学子之幸, 实天下万世之幸.[11]

朝廷久已不涉书院之事, 尽管朱熹搬出了宋太宗(939~997)·真宗(968~1022)两位皇帝相要求, 但并没有起到半点作用, 反而是"朝野喧传以为怪事", 遭到讥笑和讽刺. 面对如此困境, 朱熹并未放弃. 这一年十一月, 孝宗皇帝(1127~ 1194)于延和殿接见朱熹, 朱熹不顾警告, 向皇帝当面提出为白鹿洞书院赐书赐额的请求, 终于获得批准. 有志者事竟成, 朱熹此举打破百余年坚冰, 实现自己的目标, 让朝廷又回到为书院赐书赐额以实际行动支持书院建设的道路. 从此, 书院又获得了中央·地方官府以及民间力量的共同支持, 理学家们实现了书院建设的第一个追求目标, 恢复性地开创了官民两种力量共同推动书院发展的新时期, 迎来了南宋书院发展的第一个高潮.

从批评"学校科举之教"入手, 建立官方书院, 使之成为与州县官学并存而又能修正其沉迷科举弊端的另一种官方教育模式, 这是理学家们追求的第二大目标. 理学家们设计的理想目标是, 书院不以科举为目的, 而以讲学为指归. 关于这一点, 朱熹曾清楚地表述为 : "前人建书院, 本以待四方士友, 相与讲学, 非止为科举计."[12] 理学家将大量的精力倾注于讲学事业, 希望以自己理学的教育理想来化解消融书院生徒的利禄之心, 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 这就构成了书院讲学之"学"的内容与目的.

为此, 南宋理学家多采取为书院制定学规的方式来确立办学宗旨, 宣示书院教育的方针, 指示读书·治学的门径以及规定进德立品·修身养性的程序和方法. 南宋最早的书院学规是吕祖谦的《丽泽书院学规》. 该学规的特

---

11 朱熹 :『乞白鹿洞书状』, 郭齐·尹波点校 :『朱熹集』, 成都 : 四川教育出版社, 1996年, 第647页.

12 黎靖德编, 杨绳其·周娴君校点 :『朱子语类』, 长沙 : 岳麓书社, 1997年, 第2388页.

点是“范其体”，细致规定了书院诸生的日常行为规范. 如其中规定：“凡预此集者，以孝弟忠信为本……既预集而或犯，同志者，规之；规之不可，责之；责之不可，告于众而共勉之；终不悛者，除其籍.”[13] 由此可知，吕祖谦在丽泽书院的做法，手段比较强硬，这是书院集合学人结成学派的一种操作形式. 但这只是南宋书院学规中的一种类型，理学家实际上更为推崇另一种重在“事其心”的书院学规，而这种类型学规的典范即朱熹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白鹿洞书院揭示》又名《白鹿洞书院学规》《白鹿洞书院教条》《朱子教条》，由朱熹制订. 淳熙七年(1180)，白鹿洞书院重建后，朱熹以南康军长官，率僚属及院中师生行开学礼，升堂讲说《中庸》首章，并取圣贤教人为学之大端，揭示于门楣之间，作为院中诸君共同遵守的学规. 这就是著名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全文如下：

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 尧舜使契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 学者学此而已. 而其所以学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列如左：

博学之，审问之，谨思之，明辨之，笃行之.

右为学之序. 学·问·思·辨四者，所以穷理也. 若夫笃行之事，则自修身以至于处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列如左：

言忠信，行笃敬. 惩忿窒欲，迁善改过.

右修身之要.

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

右处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行有不得，反求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窃观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意，莫非使之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 今人之为学者，则既反是

13 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矣. 然圣贤所以教人之法具存于经, 有志之士, 固当熟读深思而问辨之, 苟知其理之当然, 而责其身以必然, 则夫规矩禁防之具, 岂待他人设之而后有所持循哉！近世于学有规, 其待学者为已浅矣；而其为法, 又未必古人之意也. 故今不复以施于此堂, 而特取凡圣贤所以教人为学之大端, 条列如右, 而揭之楣间. 诸君其相与讲明遵守而责之于身焉. 则夫思虑云为之际, 其所以戒谨而恐惧者, 必有严于彼者矣. 其有不然, 而或出于此言之所弃, 则彼所谓规者必将取之, 固不得而略也. 诸君其亦念之哉！[14]

《揭示》首先以儒家的"五伦"立为"五教之目", 并强调"学者学此而已". 非常明显, 将传统的人伦之教作为为学的目标, 是针对"务记览为词章, 以钓声名·取利禄"这一情况提出来的, 具有很强的现实性. 并且明确指出, 尧舜时代之"敬敷五教", 就是做此事情的. 这是用《尚书》标举的施行人伦教化于民众的事迹, 表明书院的教育目标不仅仅在士人个人的道德修养, 还有传道而济斯民的更高诉求, 它是一个由道德·伦理·济世三者组成的共同体, 相对于科举学校之学来说, 体现出一种很特殊的浸透了理学教育理念的书院精神.

指出为学的方向之后, 朱熹又提出了学·问·思·辨·行的"学之之序". 前四者皆为"穷理"之法, 属于学习方法, 行即是践履. 这表明, 理学家已经将实践也看作是"学"的一项内容了. 更有甚者, 《揭示》在学·问·思·辨之后, 从修身·处事·接物三个方面分解"笃行之事", 显示出强烈的道德实践的倾向.

综合所述, 我们可以看到, 《揭示》针对当时务记览取利禄的学风, 回归传统, 将"学"定义于五教五伦, 并提出为学的目标和程序. 经过如此重新定义, "学"就落实到了现实的人伦世界, 而维持人伦世界的秩序就变成了"学"的最终目标. 为达此目标, 必须穷理而笃行. 也就是说, 穷理和笃行构成"为学"的两大部分. 两大部分中, 《揭示》只点到学·问·思·辨, 而详述"笃行", 这表明理学家对蕴含经世之志的道德践履的高度重视. 这是典型的理学家

14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636-637页.

的教育理念，和张栻在岳麓书院提出的"岂将使子群居佚谭，但为决科利禄计乎？抑岂使子习为言语文词之工而已乎？盖欲成就人才，以传斯道而济斯民也"[15]的教育宗旨，以及体察求仁的方法，分辨天理人欲的讲求等等，如出一辙. 其所反映的正是他们所高扬的经世济民·传道济世或传道济民的理学精神.

《白鹿洞书院揭示》后来成为书院精神的象征. 先是，绍熙五年(1194)朱熹任潭州知州重建岳麓书院，将《揭示》移录其中，史称《朱子教条》传于湖湘. 淳祐元年(1241)，宋理宗(1205~1264)视察太学，手书《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示诸生. 其后，或摹写，或刻石，或模仿，遍及全国书院及地方官学. 于是，一院之"揭示"，遂成天下共遵之学规. 而随着中国书院制度之推广，它又东传朝鲜·日本，不仅被奉为学规，至今尚有高揭而作为校训者，[16] 可见其影响既深且远.

经过以"东南三贤"朱熹·张栻·吕祖谦为代表的理学家的努力，书院被赋予理学理想，使得南宋书院在多元的类型与形式中，[17] 产生出新的理学式的讲学书院. 这类书院的教育理念，即是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总结的："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己及人. 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尽管朱熹对以官学为代表的其他教育组织中醉心于科举利禄的现象提出批评，但必须说明的是，这些理学家在南宋科举社会的现实情境中，完全抛弃科举之业并不现实. 因此，朱熹等人在为书院进行制度设计时采取了折衷的办法，将讲学与举业视为本与末的关系. 朱熹称："士人先要分别科举与读书两件，孰轻孰重. 若读书上有七分志，科举上有三分，犹自可. 若科举七分，读书三分，将来必被他胜却，况此志全是科举？"[18] 具体到

15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著，邓洪波点校：『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71-572页.

16 平阪谦二：『被称作书院的日本学校』，『中国书院』，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

17 有关南宋书院的类型，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233-269页

18 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第216页.

书院的课程安排, 就是要放低举业的地位并缩减讲习举业的时间. 如吕祖谦讲学婺州明招山时, 采取了开举业以招致来学, 进而再诱之以义理正学的策略. 待日后学者向学者众, 则"十日一课"举业, 姑存其意而已.[19]

这种教育理念与制度模式对后来产生巨大影响, 如真德秀(1178-1235)在《劝学文》中称："上中二旬, 当课之日, 则于所习之书, 摘为问目, 俾之援引诸儒之说, 而以己意推明之；末旬则仍以时文为课. 如此则本末兼举, 器业日充, 上足以追续先贤之正脉, 此足以为当世之实用."[20] 方逢辰(1221-1291)为横城义塾所定规约, 亦沿用了这项精神："一旬之中, 以九日读书, 讲明义理, 而以一日为科举业."[21] 此后, 理学和书院从形式到内容相互渗透交融, 形成一种互为依托·互为表里的结构形态, 形成了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现象.

3. 书院与理学的一体化

南宋以后, 书院成为理学的基地, 理学为书院的精神, 二者盛衰同时, 荣辱与共, 有着休戚相关的共同命运. 庆元二年(1196)韩侂胄(1152-1207)发起的党禁事件, 书院就因理学被打入"伪学"而受到牵连, 备受冷落, 显示出政治压迫和学术专制可以暂时阻断书院和理学的发展. 不过这种来自外部的压迫和威胁, 又使得理学和书院交融更深, 自我凝聚, 自我认同, 为下一轮发展准备和积聚力量. 在政治的高压下, 理学学派的中坚分子仍旧选择书院作为传薪之地, 延续南宋初年的书院建设运动精神.

嘉泰二年(1202), 即朱熹逝世之后两年, 政治形势发生变化, 庆元党禁令解除, 统治者对理学的态度明显朝好的方向转变. 嘉定二年(1209), 追谥朱熹为文公, 为其平反昭雪. 八年(1215), 谥张栻为宣公. 次年, 谥吕祖谦为成

19 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 『吕东莱文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第48页.
20 真德秀：『劝学文』, 『真西山先生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07页.
21 方逢辰：『义塾纠正序』, 顾燕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教育卷』,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3年, 第635页.

公. 十三年(1220), 谥周敦颐(1017–1073)为元公, 程颢(1032–1085)为纯公, 程颐(1033–1107)为正公, 张载(1020–1077)为明公. 至此, 乾淳时代的理学家们不断宣讲的"学统"终于得到官方的正式承认, 他们自己也被编列到这个学统之中. 此即所谓"嘉定更化", 理学告别黑暗, 迎来了光明.

在经过嘉定间的恢复与调整后, 书院与理学在理宗·度宗时期, 官民二股力量密切配合下走向繁荣. 理宗对理学情有独钟, 他特赠朱熹为太师, 追封信国公, 旋改徽国公. 不久, 又下令将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一起从祀学宫. 这五人史称"宋五子", 实即理学道统谱系. 从此, 程朱理学终成正果, 获得了官方正统思想的地位. 理宗皇帝对书院也是偏爱有加, 受其赐额的书院, 白新良先生共统计出27所.[22]

不仅如此, 淳祐元年(1241), 理宗视察太学时, 还亲笔手书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赐给太学生, 并颁行天下学校, 使其成为全国官学共同遵守的准则. 所有这些都表明, 最高统治者已经不再有前一个时期的动摇, 真正回到了坚定支持书院发展的立场. 而且, 接下来的度宗皇帝(1240–1274)继续保持这种政策不变, 直接推动了当时书院的发展. 诚如当时人所说: "圣天子尊崇道统, 表章正传, 学校之外, 书院几遍天下, 何其盛哉!"[23]

与官方相呼应, 民间对书院的支持更是持续高涨. 这个时期, 虽然集理学之大成的一代大师都已谢世多年, 但他们的学生及学生的学生, 皆以继起先贤·讲求学问·倡大师说为荣耀, 尤其是以魏了翁(1178–1237)·真德秀为代表的杰出理学家, 竭尽全力, 终于使遭受庆元党禁的理学得以平反, 并成为官方哲学, 使建设书院传授理学成为一种时尚, 甚至滋生出一些弊端: "自比岁以来, 不惟诸儒之祠布满郡国, 而诸儒之书, 家藏人诵, 乃有剽窃语言, 袭义理之近似, 以眩流俗, 以欺庸有司, 为规取利禄计. 此又余所惧焉者."[24]

在南宋后期, 建书院传播理学已成为锐不可挡的社会文化主流, 书院和

22 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 第27页.
23 王柏:『上蔡书院讲义』, 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230页.
24 魏了翁:『长宁军六先生祠堂记』, 『鹤山先生大全文集』, 上海: 上海书店, 1989年, 第14页.

理学的一体化也演变成建书院·立祠堂·注《四书》·辑语录这样一种比较固定的行为模式. 据统计, 理·度二宗50年间, 共计建夏书院123所, 占南宋确知具体年代书院总数的49.79%. 可见在当时的文化主流和行为模式的推动下, 书院和理学的一体繁荣也就成了理所当然的事情.

4. 制度确立：从四大基本规制到六大事业

替代官学的宋初四大书院, 可以视为中国书院教育制度基本成立的一个标志. 作为一种比较成熟的教育制度, 书院包含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 作为官学的替代, 书院规章制度的制定自然以官学为参照, 尚未完全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教育模式. 经过南宋理学家主导的书院建设运动, 书院制度得到进一步的建设与完善, 原先的讲学·藏书·祭祀·学田四大基本规制, 发展为学术研究·讲学·藏书·刻书·祭祀·学田六大事业.

研究学问, 集成理学, 是南宋书院建设的头等大事. 研究源出于讲学, 而从逻辑上讲, 它又居于讲学的上游. 使所讲之"学"缜密完善, 形成系统的理论体系, 是其主要任务. 其任务的承担者, 主要是张栻·吕祖谦·陆九渊·朱熹等当年的学术大师及其主要弟子. 因此, 躬与其事的书院从数量上来讲只是少数. 书院的学术研究及其形成的理学理论, 可以保证讲学在高质量高水平状态下连续不断的运行. 现实世界中尽管只有少数书院能够真正担当学术研究的重任, 但在讲学盛行的时代, 它可以产生一种引领作用, 使大多数书院形成对学术研究的景仰与向往, 从而使学术研究本身也变成一种时尚, 或者说至少是一种追求的目标, 并最终演绎成书院的一种基本规制.

讲学主要体现书院的教育教学功能, 属于文化传播的范畴, 它为上游的学术研究服务. 将各个学派的思想·理论传播推广于士人和一般民众之中, 普及文化基础知识, 是它的基本任务. 也就是说, 讲学这一规制又可以分为传授一般文化知识的普通教学和涉及学术传播的传道讲学这两个大的方面. 普通教学是唐五代以来就有的功能, 传道讲学则是南宋理学家赋予书院的责任. "传道"按照其所涉学术程度的深浅, 又可以分为学术原创性·学理传

播性及学术普及性三个层次的讲学.

藏书是书院永恒的事业追求. 继北宋皇帝频赐经史典籍给岳麓·白鹿洞·嵩阳诸书院之后, 南宋理学家朱熹·袁燮(1144—1224)·魏了翁等一大批书院建设者们孜孜不倦的努力, 书院与各学派结合而成的学术需求, 终于使得书院挟其林立各地的藏书楼阁·皇皇数万乃至十万卷院藏之数, 成就其藏书事业. 从此以后, 书院藏书就自立门户, 得以与官府藏书·私人藏书·寺观藏书一起, 并称为中国古代藏书事业的四大支柱. 书院藏书完全服务于院中师生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并由此而形成了公共性·公开性·利用性的三大特征.

图书生产是唐代丽正·集贤书院就有的功能, 但那是手抄笔写, 没有生产规模. 南宋, 随着雕版印刷技术的推广, 有条件的书院皆涉足刻书, 形成了"书院本", 刻书也就成了书院的基本规制之一. 为院中师生教学与学术研究服务, 谋求书院的发展, 是书院刻书的首要任务. 与祭祀相配合, 书院经常刊刻本学派学术大师的著作, 以教授院中诸生. 从书院的内部规制来讲, 刻书服务于学术研究和讲学传道, 既保存展示研究成果, 提高教学水平, 又可以流传院内师生以及院外士人之间, 扩大社会影响, 还可以配合祭祀, 强化学术·学派的认同感, 有着多重文化功能, 成为书院规制建设中的重要一环.

祭祀是书院规制中一个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 北宋书院借用庙学之制, 始行祭祀, 但所祀和官学一样, 并无特色. 南宋开始, 随着书院与学术事业及地方文化的结合, 院中学术大师, 有名的山长, 关心书院建设的乡贤与地方官, 日渐进驻书院的祠堂, 书院祭祀走上了独立发展的道路. 书院设祭的一个主要目的, 是标举自己的学术追求, 借所奉人物确立其学统, 此即所谓"正道脉而定所宗也". 另一个重要目的, 是对院中学生实施教育, 此所谓"尊前贤励后学也".

学田是书院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 在南宋受到理学家们的重视. 学田来源, 虽无北宋时的朝廷赐田, 但地方官府拨田·拨钱·置田, 政府官员个人捐俸市田, 民间家族或个人捐私田以供四方学者, 立学田以教族里子弟, 书

院自筹, 甚至由官府捐帑"抵质库", "月收其息, 以助养士"[25], 凡此种种, 表明书院的田产经营已经多头并进, 钱粮并存, 足以为书院持久生存和发展提供可靠的经济保证.

综上所述, 形成于北宋的书院四大基本规制, 经由南宋理学家的努力, 扩展为六大事业. 应该说, 从"四大"到"六大", 是规制的完善, 是事业的衍生与扩充, 这是发展的一个方面. 而回首审视, 书院的基本规制仍然固守未变, 研究源生于讲学, 藏书和刻书实质还是书的流程中的两个时段. 因此, 书院的六大事业也就可以等视为书院四大基本规制的完善. 还要指出的是, 书院的基本规制外化为建筑, 大致对应为讲堂斋舍·书楼书库·祠堂庙宇·仓廪厨房等几个功能不同的区域空间, 形成极具人文特色的书院建筑群.

Ⅲ.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及进一步发展

1.书院与理学的北移及官学化

1279年, 南宋灭亡, 元朝(1271~1368)正式统一中国. 南宋灭亡之初, 宋遗民建立书院讲学的风气, 最直接的结果是造成了元初书院的兴盛. 有学者认为, "宋儒开创的书院精神, 在注入元儒的退隐理想之后, 継续充满活力, 发展下去. 不仅把理学家的学术和理想加以发扬光大, 也替异族统治下的汉人保存了一份珍贵的遗产".[26] 同时也应注意到, 宋遗民的兴学之举, 影响了元代的书院政策, 而这一政策反过来又促进书院的发展, 是谓良性互动. 统计显示, 元代凡八帝共98年, 共有书院406所, 平均每年创建书院4.142所, 远高于南宋的2.888所. 可见, 元代承南宋蓬勃之势, 仍然处在整个书院史上的上

25 郑瑶等:『景定严州新定续志』卷3『钓台书院』, 台北:成文出版社, 1970年, 第84页.

26 李弘祺:『绛帐遗风－私人讲学的传统』, 刘岱:『中国文化新论·学术篇·浩瀚的学海』, 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981年, 第386页.

升发展阶段.

早在蒙古国时期, 就有蒙古统治者关注南方书院的历史记录. 窝阔台七年(1235), 杨惟中(1205~1259)·姚枢(1203~1280)等儒臣即随军网罗南方学者, 收集理学著作, 十二三年间, 始创建太极书院于燕都(后来元首都大都, 今北京), 供奉理学的开山祖师周敦颐, 以程颢·程颐·张载·杨时·游酢·朱熹六位理学名臣"配祀", 将在江淮一带所收集的理学典籍贮藏于其中, 并刻《太极图》《通书》《西铭》等理学名著于四壁, 聘请江汉名儒赵复等主持讲学, "以为天下标准". 其时, 随从而问学者"将百人, 多达才其间"[27]. 郝经(1223~1275)在《太极书院记》中称:"今建书院以明道, 又伊洛之学传诸北方之始也."[28] 因此太极书院被后世评价为理学在北方的传播中心.[29]

姚枢和赵复的苏门讲学对程朱理学的北传作出了同等重要的贡献. 二人的讲学之地当时似不以书院相称, 至正七年(1347)始立雪斋书院以为纪念. 其称, 姚枢"携家来辉, 垦荒粪田, 诛茅为堂, 置私庙奉祠四世, 中堂龛鲁司寇容, 傍垂周·程·张·邵·司马六君子像, 读书其间, 衣冠庄严, 以道学自鸣, 汲汲以化民成俗为心"[30]. 姚枢还刊布理学典籍, 吸引了许衡·窦默(1196~1280)等元代理学名家负笈问学.

太极·雪斋二书院作为北方理学传播的大本营, 其生徒如许衡(1209~1281)·刘因(1249~1293)等成为薪传之火散布于北方大地, 最终实现了理学的北移. 书院在这一过程中也随之向北方推广. 统计显示, 宋代黄河流域的书院最少, 而且与长江流域相比, 总院数相差约22倍之多, 真可谓微不足道. 到元代, 黄河流域的书院超过珠江流域, 上升为第二位, 与长江流域相比, 总院数也只有约3倍的差距, 进步显著.

---

27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 北京:中华书局, 1985年, 第47页.

28 郝经:『太极书院记』, 郝经撰, 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 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6年, 第373页.

29 陈雯怡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 见氏著:『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 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 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2013年, 第255—261页.

30 许有壬:『雪斋书院记』, 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76页.

元代书院的发展与元廷积极的文教政策密切相关. 早在攻宋战争进行期间的中统二年(1261), 忽必烈(1215~1294)下诏, 对书院等文化教育设施加以保护 : "宣圣庙及管内书院, 有司岁时致祭, 月朔释奠, 禁诸官员使臣军马, 毋得侵扰亵读, 违者加罪."[31]. 全国统一之后, 元统治者重申对书院的保护政策, 并且延续几代而不变. 同时, 随着儒户制度的建立, 元廷对书院采取了一些列措施, 将书院纳入官学的体系之中,[32] 加强了对书院的控制, 引出了元代书院的官学化问题.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是政府采取一些重要措施而逐步实现的. 其一, 是对官方或私人创建的, 试图利用官方资源的书院在制度上统一纳入官学体系, 并严格控制报批手续, 以申报赐额的制度控制书院的创建与兴办. 其二, 通过委派山长, 并将其纳入学官体制, 一体铨选考核升转, 这是元政府控制书院实施官学化最重要的措施. 其三, 则是通过拨置学田, 设官管理钱粮的方式控制书院的经济命脉.

就其利弊而言, 书院的官学化既能使书院获取一种与各种危害书院发展的恶势力作斗争的政治力量, 也能使书院获得一种维持发展的经济力量, 没有官府的支持就没有元代书院得以推广力量. 当然, 其弊端也由此而来. 书院"置官师", "官总其费", 受制于官府, 使得书院的建设者唯官是从, "徒知假宠于有司, 不知为教之大, 徒徇其名, 不求其实然耳"[33]. 因此, 当时又产生了"去官学化"的呼声. 不过, 由于并非所有的书院都被纳入官学, 且著名学者吴澄(1249~1333)·虞集(1272~348)·程文海(1249~1318)等大儒也有意识的通过批判书院的官学化弊病来宣扬南宋的书院精神, 所有这些对书院的官学化会有一种无形的影响与制约. 因此, 官学化终究只是一种趋势, 尽管势头强劲, 但书院与官学还是不能画上等号.

---

31 宋濂等 : 『元史』卷4『世祖本纪一』, 北京 : 中华书局, 1976年, 第71页.

32 陈雯怡 : 『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 邱仲麟主编 : 『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 第214－242页.

33 程文海 : 『东庵书院记』, 见陈谷嘉·邓洪波 : 『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381页.

2. ≪读书分年日程≫：理学教育规程的细致化

相比南宋初年, 书院在元初面临着不同的历史情境. 《白鹿洞书院揭示》由宋理宗颁行天下后, 书院与官学的教育内容·理念逐渐一致, 南宋初期理学家倡导的书院教育模式逐渐失去特殊性, 书院在南宋后期也有了官学化的趋势. 元代书院的官学化是在南宋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而来.[34] 由于科举制度在元仁宗皇庆二年(1313)方才恢复, 改善书院与科举之间对立紧张的关系并非是士人追求的主要目标. 并且当时"天下学者皆知尊朱子所注之经…… 贡举之制又用朱子私议, 明经主程朱说, 兼用古注疏经义, 不拘格律"[35], 这正是南宋理学家所追求的理想, 而其在元代科举制度恢复以后已经部分实现. 此时元代士人首先要解决的, 是"宾兴有制而学校法未立"[36] 的现象, 即科举制度恢复以后, 如何制定学校教法的问题.

在程端礼(1271~1345)看来, 弥补这些弊端的方式, 是通过継承南宋书院建设运动的精神来制定细密的教育规程："方今惟宜以朱子《白鹿洞学规》正其宏纲, 以所订《程董学校》有其节目, 又以辅氏所粹《读书法》六条, 确守而不遗其一焉."[37] 程端礼标举出朱熹所订之《白鹿洞书院揭示》《程董学则》《读书法》, 试图将其作为官学·书院士子共同遵守的准则. 在他四十年的从教生涯中, 陆续编定出一部细密的理学教育规程著作－《读书分年日程》.

《读书分年日程》最终编定于元统三年(1335), 于甬东程氏家塾刊印. 该书在后世流传甚广, 目前所见最早的版本是清代铁琴铜剑楼所藏元刊本, 凡

34 参见陈雯怡：『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 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 第214-242页.

35 程端礼：『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畏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 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7年, 第682页.

36 程端礼：『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畏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 第682页.

37 程端礼：『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 『畏斋集』, 『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 第682页.

三卷. 卷首有余谦·赵世延(1260~1336)·李孝光(1285~-1350)及程端礼之序. 序文之后为纲领, 收录《白鹿洞书院教条》《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朱子读书法》. 《白鹿洞书院教条》即朱子《白鹿洞书院揭示》, 《程董二先生学则》是朱熹门人程端蒙(1143~1191)·董铢(1152~1214)为乡塾子弟所作学则, 规定了日常起居行为仪节. 朱熹再传弟子饶鲁(1193~1264)将二者相互配合施行, "一则举其学问之宏纲大目, 而使人知所用力 ; 一则定为群居日用之常仪, 而使人有所持循, 即大小学之遗法也"[38]. 《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是真德秀所作的家庭教育规章, 分为学礼·学坐·学行·学立·学言·学揖·学诵·学书八项, 简略便行. 《朱子读书法》是从各处辑录而来的朱子读书方法汇编, 首条为辅广所总结朱子教人读书六法 : "居敬持志·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咏·切己体察·着紧用力."程端礼制定日程节目主要就是据此而来. 他还依据朱熹"宽着期限, 紧着课程"的精神, 制定了分年读书细则.

《读书分年日程》卷一为分年日程节目, 分为"八岁未入学之前"·"自八岁入学之后"·"自十五志学之年即当尚志"三部分, 各自规定了三个阶段的学习目标及读书要目. 八岁以前的童蒙阶段, 以阅读程端蒙撰, 程若庸补辑之《性理字训》为主. 八岁入学之后, 以次序阅读《小学》《大学》《论语》《孟子》《中庸》《孝经》《易》《书》《诗》《仪礼》《礼记》《周礼》《春秋》并三传. 其读书之法以看读·倍读(即"背读")为主 : "每细段必看读百遍, 倍读百遍, 又通倍读二三十遍. 后凡读经书仿此."[39] 除此之外还有诵读·说书·习字·演文等课程安排. 性理诸书学毕, "次治道, 次制度", 所列书目仍以宋儒所著之书为主, 如《北溪字义》《通书》《近思录》等. 照此课程, 则十五岁前"小学书·四书·诸经正文, 可以尽毕"[40]. 十五岁后, 应明确为学·为人目标 : "为学以道为志, 为人以圣为志."[41] 生徒依照朱子读书

38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1934年, 第413页.
39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444-445页.
40 程端礼 :『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471页.

法, 习业重点转向四书五经, 此时则须配合钞读之法, 钞读之法毕载于卷一最后.

四书五经既明, 阅读重点转向史书·韩文·《离骚》, 并进入习文阶段. 读史以《资治通鉴》为主, 参看朱熹《资治通鉴纲目》《史记》等. 《通鉴》毕, 读韩愈(768~824)之文, 以识文法. 程端礼视韩文为"一生作文骨子", 要求生徒"熟读一篇或两篇, 亦须百遍成诵".[42] 韩文之后, 应读《楚辞》. 阅读时以朱熹《楚辞集注》为准, 以正音读·训义, 并令成诵, 以为"作古赋骨子".[43] 当然, 在读史书·韩文·《离骚》时, 仍要在五日之内分出二三日"倍温玩索"四书五经, 以不忘本经. 待上述诸书学毕, 约为二十至二十一二岁, "以二三年之工, 专为学文", 可从韩愈·欧阳修(1007–1072)·曾巩(1019–1083)等人之文中学习"展开间架之法".[44] 如欲作史·策·经问·经义·古赋·古体制诰章表·四六表章之文, 亦列有相关书目. 其后, 为作科举文字之法. 程端礼取真德秀遗意, 习作文法于平日读书中. 无论是经问·经义·古赋·制诰表章还是策论, 皆要读看九日之后, 再专以一日作文.[45] 待熟悉文体后, 可增加作文日数. 同时, 仍要倍温四书五经等书. 为避免读书空言之弊, 程端礼鼓励士子择友, 举行蓝田吕氏乡约, 使"德业相劝, 过失相规"[46], 亦可令士习醇厚.

为便于生徒执行学习的阶段计划并稽查勤惰, 程端礼还取日程空眼薄制度配合而行. 空眼簿按照上述规程计划, 依序分日, 刊定印板, 分为《读经日程》《读看史日程》《读看文日程》《读作举业日程》《小学日程》五种. 生徒每人刊印一薄, 每日标注所习起止, 生徒照此习业. 次日早, 再由教师亲验所习, 予以勾销, "庶日有常守, 心力整暇"[47].

以上为分年读书节目大要. 在卷二最后, 还有《批点经书凡例》《续补句

41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472页.
42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498页.
43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503页.
44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510页.
45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523页.
46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527页.
47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第466页.

读凡例》《批点韩文凡例》，属于阅读方法性质. 卷三为《正始之音》，为明辨音义之法. 最后附录有朱熹《学校贡举私议》《调息箴》及程端礼的《集庆路江东书院讲义》，作为生徒学习参考之用. 生徒照此分年读书日程习业，学成不过二十余岁，于参加科举并不相妨，还能不失本末先后之序. 对于世俗专为科举利禄的学风，程端礼始终保持警惕，在制定每一阶段的读书日程时，总会强调四书五经的核心地位，而添加相关的学习内容，其精神来源于朱熹的《读书法》《学校贡举私议》等. 其读史·看文·作文之法，亦以宋儒－尤其是朱熹－之是非为是非. 因此，《读书分年日程》基本是南宋理学教育精神的延续，在元代恢复科举·理学独尊的新社会政治环境下，通过集南宋诸儒之大成，针对当时"学校教法未立"[48] 的状况而制定的详细教育规程. 《读书分年日程》的影响也确乎超出程氏家塾之外，不仅对元代书院教育产生影响，国子监还"颁示群邑校官，为学者式"[49]，成为通行天下并影响后世的理学教育规程.

Ⅳ. 繁荣多样与禁制压抑：明代书院的两面

1. 明初书院的恢复与胡居仁的《续白鹿洞学规》

程朱理学在明代(1368~1644)立国之后拥有了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 到明成祖朱棣(1360~1424)编纂《五经大全》《四书大全》《性理大全》后，明朝的思想文化与政治权力的运行必须在理学的语境当中，国家与社会在形式上依附于理学. "理学之所以会让人觉得它是维护帝国统治的意识形态，主要就是因为明初国家对理学的推崇"[50]. 随着中央强有力政权的建立，一套从中央到地方完善的官学制度应运而生，使得明代取得了"学校之盛，唐·

48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第529页.
49 宋濂等：『元史』卷190『程端礼传』，第4343页.
50 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7页.

宋以来所不及”[51]的成就.

有明一代, 朝廷基本贯彻了自洪武二年(1369)就确立的“治国以教化为先, 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 官学承担起化导士子之责. 在明太祖朱元璋(1328~1398)下令将前朝书院改为官学, 山长转为训导后, 宋元两代以来方兴未艾的书院运动遭到挫折, 书院在明初陷入“百年沉寂”阶段. 据统计, 明代共创建·夏建书院1962所. 其中, 自洪武至天顺年间(1368~1464), 书院处于低朝, 基本是维持状态. 成化·弘治开始(1465~1505), 书院开始发展, 正德年间(1506~1521)超出各朝平均数115.4所大关, 并继续攀升, 到嘉靖年间(1522~ 1566)达到最高峰. 隆庆时(1567~1572)又跌落至各朝平均数以下, 但很快就在万历朝(1573~1620)再度攀高, 形成第二个高峰. 自后, 昌泰·天启·崇祯(1620~1644), 再次下降到平均数以下. 因此, 从总体上看, 明代书院的时间分布是前期很少, 中间大量集中, 在正·嘉·隆·万四朝形成高潮.

明初书院的沉寂只是相对而言, 并不意味着完全消失. 在阳明学兴起以前, 书院建设运动仍在官·民两个层面得到延续. 明代书院建设中官力增加·上升·超过民力, 这是它不同于宋元时期的一种新的发展趋势. 在这些热心文教的官员中, 具有代表性的是专一负责学务的提督学校官. 提学官始设于明英宗正统元年(1436), 是朝廷为整顿官学废弛之弊而设置的专官.[52] 朝廷设立提学官的本意, 是希望提学官发挥监察职能, 整顿官学弊端, 而非直接进行教学活动. 但提学制度并不能挽救官学系统性·制度性的衰败, 因此有的提学官寄希望于创建书院来兴起教化. 于是, 明代书院的建设运动又回到在官学之外别建书院来弥补官学教育之不足的历史循环当中, 这与南宋初期的情况有相似又有不同.

明代提学官大致建立了110所书院. 其高峰期集中在弘治·正德·嘉靖间, 与明代书院建设鼎盛于正德·嘉靖·隆庆间的总体趋势相比显得要早,[53] 展

51 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一』, 北京:中华书局, 1974年, 第1686页.
52 张廷玉等:『明史』卷69『选举一』, 第1687-1688页.
53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 第281-284页.

现出一定的引领之势. 提学官所建书院大致可分为衙署·祭祀·聚徒讲学三大类型. 其中聚徒讲学型是数量最多·影响最大的书院类型, 有基层教育·精英教育和讲会三种性质. 除讲会型书院外, 其他类型的书院基本作为官学的延伸而存在. 其教育理念, 仍然継承了南宋书院建设运动的一贯主张. 如成化十四(1478)至十九年(1483)担任河南提学的吴伯通(1441-1502)认为：“书院之设, 盖将与学者从事古人之学也.”[54] “古人之学”的概念正是継承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中以“古昔圣贤所以教人为学”指代理学的说法. 他在河南督学期间, 提出建立书院网络的计划, 在河南修建了开封府大梁书院, 河南府伊洛书院, 卫辉府百泉书院, 汝宁府汝南·上蔡书院. 书院建成后, 各令有司“礼聘贤哲”. 吴伯通在巡视之余亦会莅临, “亲与讲解经书, 辨正志业, 使其归而传授同学”[55], 这些书院成为明代提学官所建书院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种类型.

在书院讲学层面, 継承并演绎朱熹的书院精神是明中叶王学兴起以前的主流. 无论是官办书院, 还是士人的私立书院, 遵循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往往成为通行的做法. 胡居仁(1434~1484)在景泰间受业于吴与弼(1391~1469)之门, 归乡后创建礼吾书舍·丽泽堂以接来学. 胡居仁在其《丽泽堂学约》中规定：“学中规矩, 一依白鹿洞及程端蒙·西山真先生为准.”[56] 他在成化四年(1468)·十六年(1480)两次入主白鹿洞书院, 仿照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作成《续白鹿洞学规》, 其要目有六：

正趋向以立其志.
主诚敬以存其心.
博穷事理以尽致知之方.
审察几微以为应事之要.

54 吴伯通：『跋甘棠书院堂斋铭后』, 『石谷达意稿』卷29, 国家图书馆藏明正德十一年刻本, 第11a页.
55 吴伯通：『提督河南学校条约』, 『石谷达意稿』卷32, 第7b页.
56 胡居仁：『丽泽堂学约并序』,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上海：中西书局, 2011年, 第724页.

克治力行以尽成己之道.
推己及物以广成物之功.[57]

每一要目之后，胡居仁不避繁琐，引述儒家经典以及先秦诸子·宋代诸儒的相关言论，以引起学者重视并有所持循. 在引经据典之后，胡居仁还自作按语，总结先正诸说，明示学者进学之方.

与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首先标举“五伦”作为为学目的的做法相同，胡居仁同样强调学者首先应当端正为学志向，以学“圣贤之学”为鹄的. 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胡居仁以立志作为学规的开篇，除继承朱熹遗意外，还有更加现实的考虑. 胡居仁提到，当世学者有的不知有圣贤之学，“才气高者，则驰骛于空无玄妙之域；明敏者，类以该博为尚，科名为心；又其下者，不过终于诗句浮词，以媚世取容而已”. 即便知晓，亦认为“圣人之道高远难至，非后学之所敢及”. 因此，胡居仁作《续白鹿洞学规》，重新强调了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提出的“圣贤之学”：“无非讲明义理以修身，然后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务记览，为词章，以钓声名，取利禄而已也.”同时，又告知学者“圣人可学而至”，切勿丧失信心，只需“存养省察，使本心常明，物欲不行”即可. 胡居仁还针对时人认为道学“非世俗所尚，不利行”的观点，指出洒扫应对·事亲接物的日用常行之间“无非此道之流行”，只是由于“教养无方”，人们无法察觉其存在而已. 为此，胡居仁将用力之方逐条开列，是为“主诚敬”“博穷事理”“审察几微”“克治力行”“推己及物”. 作为正统朱学的追随者，胡居仁一生得力处惟在“主敬”，[58] 其格物致知的修养工夫重在即物穷理. 就书院生徒而言，“博穷事理”之法就是“读圣贤之书，反复寻究，以求其理”. 与此同时，日用之间亦得推行致知之功，“事事求其至善，物物寻其当然”. 日用间与外物相接时，亦得遵循“审查几微”之法，即：“于事物初接，本心萌动之际，谨察精辨，孰为天理，孰为人欲，使善恶·是非·公私·义利判然于前，然后从其善而去其恶.”在明晰“致知”之法后，胡居仁又提出“克治力行”“推己及物”两

57 胡居仁：『续白鹿洞学规』，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640–645页.
58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47页.

条, 展现出他对躬行实践的重视. 他说 : "苟或知而不行, 则前所穷之理无所安顿, 徒费讲学之功." 书院所讲之学超乎俗学浅陋之处, 就在于此学必须力行实践, 方得告终. 最后, 胡居仁向学者提出要达到"儒者之学"的要求. 所谓儒者之学, 必至于"推己及物", "参天地, 赞化育", 以超出个人的功名富贵的肤浅层次, 达到"明德新民""正君善俗"的目的.[59]

胡居仁认为, 依照此种进德修业之法, 可以进而"复先王之治", 表露出即便是以布衣讲学闻名的胡居仁亦有着强烈的政治理想. 只是他未直接入仕, 而是将这一愿望寄托在了讲学明道的辙途. 如若将《续白鹿洞学规》与《读书分年日程》稍作比较, 可以发现胡居仁实际上对学者提出了"出而行道"的更高层次的要求. 明代相比元代, 理学的浸润程度更深, 明儒得以継宋儒之后, 継续在"得君行道"与"觉民行道"[60]间作出选择. 胡居仁所标举的《续白鹿洞学规》, 既显示明儒有意识地接续宋儒的思想意识与行为模式, 也预示了明代継南宋以后, 一场伴随新学术思想传播而带来的第二个书院发展高峰即将到来.

2. 明中叶书院的再度辉煌与王学在白鹿洞书院的传播

与南宋初年的情形相似, 明中叶以来, 官学的废弛·教官素质的下降·八股取士带来的浮嚣奔竞之习令官学教育再度出现问题. 程朱理学在成为统治思想后逐渐丧失活力, 走向僵化, 成为士子追逐功名利禄的工具. 这时, 重建新的理论以维系日益涣散和败坏的人心的要求再次出现, 以王守仁(1472~ 1529)·湛若水(1466~1560)为代表的理学大师承担起重建理论·重振纲常·重系人心的任务.

王守仁之学与朱熹最大的不同, 就在于对"格物致知"的理解. 他认为, 朱

59 胡居仁 : 『续白鹿洞学规』, 邓洪波 :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上海 : 中西书局, 2011年, 第640-645页.

60 余英时 : 『士与中国文化』序言,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年.

熹将格物致知理解为即物穷理，“言益详道益晦，析理益精学益支离，无本而事于外者益繁难”，势必造成“章绘句琢”，“诡心色取，相饰以伪”[61]，而至废弃圣人之学的局面. 他认为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因此外物也就无可格，应当把格物理解为“格心”，最终创造了“知行合一”和“致良知”的学说. 湛若水与王守仁一同讲学，以“随处体认天理”为宗旨，所谈之心不仅仅指人之方寸，而且包容万物而不遗. 因有如此区别，当时学者遂分为王学·湛学，是宋明理学中与程朱之学不同的派系.

王守仁·湛若水两位大师，都很重视书院建设，将其视作研究·宣传自己学术思想的阵地，其学几变而定于书院，其教亦传于书院，在书院的讲学过程中，不断完善·发展了自己的学术主张与思想体系. 可以说，他们在正德·嘉靖年间的努力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继南宋以来的第二个书院与学术互为表里·一体发展的趋势：新的理论在书院中崛起，新崛起的理论又一次推动了书院勃兴. 史称：“自武宗朝王新建以良知之学行江浙两广间，而罗念庵·唐荆川诸公継之，于是东南景附，书院頓盛，虽世宗力禁而终不能止.”[62] 是期还出现许多新型书院，如军事书院·社团书院·王府书院与仕学书院等，是当时书院的发展繁荣多样的体现. 明代书院的辉煌局面，是王·湛及其后学在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历时百年，以联讲会·立书院的形式营造出来的. 是期共创夏书院1108所，超过明代1962所书院总数的一半，其勃然兴起·浩然兴盛之势，由此了然可见.

王学作为与朱学相异的学说，在发展过程中不无阻碍. 为使新学术思想得以顺利传播，王守仁采取了相应的策略. 正德十三年(1518)，任南赣巡抚的王守仁镇压当地叛乱，军旅之中不忘讲学著书. 是期刊印的《朱子晚年定论》《传习录》等，皆为解构朱熹之学的重要著作. 他在《朱子晚年定论序》中声称，朱熹之学应当分为中年与晚年两个阶段. 世之所传所教，实为

61 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8–279页.

62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8页.

朱熹"中年未定之说". 而其晚年"大悟旧说之非", 王学实与朱熹"晚岁既悟之论"别无二致.[63] 这种从朱熹的行迹中发掘线索并重新加以解释利用的做法, 延伸到了王守仁的书院实践. 除在赣州建立义泉·正蒙·富安等六所书院外, 王守仁特别重视对朱学大本营白鹿洞书院的占领. 他先是派门人蔡宗兗任白鹿洞书院洞主, 将其手书的《修道说》·《中庸古本》《大学古本序》《大学古本》, "千里而致之"白鹿洞书院, 刻石于明伦堂, "是欲求证于文公也"[64]. 他自己又在正德十五·十六年(1520~1521)两次来到白鹿洞书院, 集门人讲学其中, 留诗题字, 遣金置田. 对于朱熹亲自拟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 王守仁也别有一番理解.

早在正德十年(1515), 朱熹故里徽州在知府熊世芳的主持下重修紫阳书院, 诸生程曾编成《紫阳书院集》, 将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列诸篇首. 书成, 熊世芳请王守仁作序. 王守仁借此公开批评朱子之学, 他称:

> 是故君子之学, 惟求得其心. 虽至于位天地, 育万物, 未有出于吾心之外也. 孟氏所谓"学问之道无他, 求其放心而已矣"者, 一言以蔽之. 故博学者, 学此者也; 审问者, 问此者也; 慎思者, 思此者也; 明辩者, 辩此者也; 笃行者, 行此者也. 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 故心外无学.[65]

王守仁表面同意朱熹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所宣扬的书院精神, 实际上却利用《揭示》文字简要的特点而对其重新加以解释. 他"发明朱子未尽之意"是假, 推广自己致良知的心学是真. 他批评了朱子之学"失之支离琐屑", 大力推销"心外无事", "心外无理", "心外无学"的主张, 其门人也对此加以附和. 王守仁及其弟子对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的重新解读以及对白

63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 王守仁著,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 第291页.

64 郑廷鹄:『白鹿洞志』, 李梦阳等编, 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 北京:中华书局, 1995年, 第212页.

65 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 王守仁著, 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 第289页.

鹿洞书院讲学的占领, 使得白鹿洞书院成为王学传播的一大重镇. 这说明王门师徒已经深谙利用书院传播学术之道. 正是利用书院这块阵地, 王守仁将自己的思想理论迅速推广于东南各地, 及至倾动朝野, 盖过程朱理学而风行数十百年之久.

3. 明末东林讲学运动与书院的禁毁

王学在嘉隆以降取得风动天下的局面, 却也在发展过程中出现诸多问题. 王学末流只论本体而轻视工夫的弊端, 使得当时出现空言心性·束书不观的风气. 甚至还弃儒入佛, 恣意放纵, 谓"酒色财气不碍菩提路", 冲破了个人道德和社会道德的藩篱.[66] 当时, "程朱之书不行于世, 而王·陆则家有其书"[67], 在程朱理学面临危机的情况下, 一些学者从批判王学之弊入手, 开启了明清之际由王返朱的思想运动, 其中坚则以东林学派为代表.

东林学派以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为基地, 其始建于北宋政和元年(1111), 由二程高足杨时(1053~1135)建立. 在理学史上, 杨时是联系二程与朱熹学术传承的重要人物, 故东林书院号为"洛闽中枢". 万历三十二年(1604)二月, 顾宪成(1550~1612)·高攀龙(1562~1626)以系道脉, 树风声为己任, 率顾允成(1554~1607)·安希范(1564~1621)等倡导捐资, 修复东林书院, 得到邻近地方在职官员资助. 九月, 书院落成, 有大门·牌坊·东林精舍·丽泽·依庸二堂及燕居庙·道南祠·藏书楼等建筑, 奉孔子, 祀杨时.

东林书院的讲学以批判王学, 扭转学术为首要任务. 重建后的东林书院没有属于弟子之列的诸生常年在院学习, 是同志诸君子的讲会场所. 每年大会十日, 每月小会三日, 是一所典型的社团性书院. 顾宪成制订《东林会约》, 作为讲学同志共同遵守的章程.[68] 《东林会约》首列孔子·颜子·曾子·

66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太原: 山西古籍出版社, 2004年, 第4页.
67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备忘三』, 北京: 中华书局, 2002年, 第1143页.
68 顾宪成:『东林会约』,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第231-238页.

子思·孟子论学之语, 以明统宗；次列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 以定法程；又申之以饬四要·辨二惑·崇九益·屏九损, 以卫道救时. 这是标明东林书院讲学宗旨·治学之方·学术趋向的纲领性文件, 意在阐明东林书院継承杨时精神, 上承周程, 下接朱熹, 以程朱理学反对王学的学术主张.

顾宪成认为, 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稽古昔, 述生民, 揆典则, 秩彝训, 约而有章, 详而有体", 是圣人与初学者皆不能逾越的"大本·大原·大纲·大纪". 东林之会, 应当据此讲明而服习. 具体如何着手, 顾宪成对《揭示》加以演绎, 开列其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之条, 俾学者相与维持. "四要"是指知本(又作识性)·立志·尊经·审几, 都是为学·治学·讲学最紧要的"关头". "二惑"指世人对讲学的两点疑惑. 一是"讲学迂阔而不切, 又高远而难从", 二是"学顾躬行"即可, "将焉用讲". "九益"既讲讲学的好处, 也讲讲学的方法, 吴桂森(1565~1632)将其概述为："九益者, 国家设学, 本教人为圣为贤, 非止科名, 讲学庶几不负, 一也. 广联同志, 二也. 指视森严, 三也. 整肃习气, 四也. 寻师觅友, 五也. 广见博闻, 六也. 一日之中, 可以按既往, 可以筹将来, 七也. 人之责望我者甚重, 八也. 我之自树立者方真, 九也. 凡此之益, 陶铸生平, 岂系细事, 故欲人知所取". "九损"是指鄙·僻·贼·浮·妄·怙·悻·满·莽九种"致损之道", 必须摒弃.

东林书院的讲学运动很快风动天下, 到万历末年形成了东林·关中·紫阳·江右四大书院群体. 讲学之人, 多为政治斗争中被清洗的正直官员, 尽管他们惩于嘉靖·万历禁毁教训, 有意在书院规章中规定不议时政, 不谈朝廷·郡邑得失, 但一本出为忠臣, 处则风范地方之圣训, 从"事即是学, 学即是事, 无事外之学"的学术原则出发, 书院仍然免不了关心家事国事天下事的关怀, 进而成为清议·公正的化身. 再加上反对派的打压与催生, 书院就由讲学之所, 日渐变成具有社团性·政治性的社会民间组织, 并被人冠以"东林党"之名. 尤其是经过李三才(1552~1632)入阁·京察·挺击·红丸·移宫几大政治事件之后, 东林书院也就成了天下讲学书院的代名词, 并与东林党画上了等号.

天启初年, 宦官魏忠贤(1568~1627)的阉党集团利用特务机关东厂·锦衣

卫, 擅权乱政, 引起东林党人的愤慨. 于是, 两者的对立就不可避免, 终于酿成惨烈的东林党案, 并由东林党而殃及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明代书院遭遇到了继嘉靖·万历以后的第三次禁毁劫难. 天启五年(1625), 从议毁京师首善书院开始, 阉党矫旨毁天下东林讲学书院, "以绝党根"[69]. 东林诸君子亦遭迫害, "生者削籍, 死者追夺, 已经削夺者禁锢"[70], 东林书院和东林党遭到万劫不复的残酷打击. 次年三月, 高攀龙·周起元等"江南七君子"罹难. 四月, 东林书院被勒令拆毁, "不许存留片瓦寸椽"[71], 最终被夷为平地.

在如此严峻的形式下, 地方官民以各种形式反对阉党, 拒不执行禁毁书院禁令, 使得禁令波及的范围得到一定控制, 被拆毁的书院可考的有28所. 但可惜的是, 党争并没有随魏忠贤的失败而告结束, 崇祯朝虽然终有诏复书院之举, 但时当明末王朝哀落之际, 书院历经一毁二毁而后三毁, 遂一蹶不振, 宜乎走向末路.

Ⅴ. 自省·划一·变革：清代书院的轨迹

1. 重回南宋：辟王崇朱思潮下的清初书院建设

清朝(1636-1912)是继元朝以后第二个由少数民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 满清入关伊始, 即仿照明朝建立学校, 开科取士. 清初大体继承了明代"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 书院同样未被纳入国家教育体制之中. 不过清初的书院政策相比明代要显得宽松, 没有发生如明季般的全国性禁毁书院运动. 统计数据表明, 自明末以来民间书院大盛的趋势在入清以后仍然得到保留. 顺治·康熙·雍正三朝(1644~1735)的新建和重建书院数合计1424所, 占

69 张廷玉等：『明史』卷305『魏忠贤传』, 第7820页.

70 『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 北京：中华书局, 2004年, 第802页.

71 『县申拆毁书院缘由』, 『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 第565页.

整个清代书院总数(5836所)的24.4%, 与整个明代的书院总数仅相差538所.[72]

清初书院总体継承了晚明以来的讲学遗风, 只是受到明清易代带来的历史震动, 使得士人在反思明亡教训时, 往往归罪于王学末流带来的高远空疏之弊, 于是开始了梁启超(1873-1929)所称的"理学内部的反动"[73]. 其反动的第一步即是从王学回归朱学, 因此援朱入王·由王返朱的风气在清初"尊朱"的文教政策下蔚然成风.

以河南为例, 清初河南的理学夏兴运动由遗民孙奇逢(1584~1675)肇其端. 孙奇逢之学凡三变, "初守程朱甚笃", 三十岁时同鹿善継读《传习录》, 于"知行合一跃然有得, 自是寝食其中".[74] 晚年则主张合会朱·王, 不主门户. 孙奇逢的讲学活动在北方影响甚广, "北方之学者, 大概出于其门",[75] 形成了以他为核心的夏峰学派. 其门人耿介(1623-1693)在他逝世后修夏了曾为北宋"四大书院"之一的登封嵩阳书院并讲学其中, 建立了后夏峰时代的书院-理学网络.

耿介早年曾受王学影响, 但后来返归程朱, 其讲学以"辟王崇朱"为特征. 耿介的书院活动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为模板, 在他仿照《白鹿洞书院志》而编成的《嵩阳书院志》中, 记录了白鹿洞书院对清初嵩阳书院的诸多影响. 如白鹿洞书院建有礼圣殿·宗儒祠, 以示道统所在, "今嵩阳书院亦仿此制, 别为三贤祠, 祀二程·朱子".[76] 其藏书·学田制度·内容的设计, 亦标举白鹿洞书院为前型. 耿介还将《白鹿洞书院揭示》勒石立碑, "我同人相与寻绎其义而躬行实践之, 则圣贤可学而大道在我矣"[77]. 在进行书院会讲时, 耿

72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年, 第456页.
73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第1-10页.
74 汤斌·耿极:『孙夏峰先生年谱』, 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 郑州: 中州古籍出版社, 2003年, 1383页.
75 黄宗羲:『征君孙钟元先生奇逢』, 『明儒学案』下, 北京: 中华书局, 1985年, 第1371页.
76 耿介:『嵩阳书院志』, 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第72册, 北京: 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 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18年, 第301页.

介与同道窦克勤(1653–1708)将《白鹿洞书院揭示》与《孝经》一同宣讲,体现出夏峰学派注重在日用伦常间体认天理的学术特征.

在清初思想·伦理秩序的重建过程中,《白鹿洞书院揭示》还得到其他学者的重视. 江南学者王澍(1668~1739)认为,“格致之说自王伯安以来病之矣”,而学者又苦于程朱格物致知之论“漫汗不见端绪,终以废弃程朱之书”,因费数年之力,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完成《朱子白鹿洞规条目》,“以窥程朱之大全,更循是以窥圣贤之奥突”[78]. 该书凡二十卷,以白鹿洞揭示为纲,分类条析,证以经史百家之说,是古代对《白鹿洞书院揭示》所作的最为详尽的注解. 清初的理学名臣亦以朱熹的《白鹿洞书院揭示》指导其书院建设. 张伯行(1651~1725)出任福建巡抚,欲振闽学遗绪,创建鳌峰书院,为诸生编纂《学规类编》,首列《白鹿洞书院揭示》,其尾以朱子《学校贡举私议》作结,其中则“采摭昔圣昔贤所以为学之目,与夫从入之途·用功之要,类集成帙”[79]. 前述之《程董二先生学则》《西山真先生教子斋规》《胡文敬续白鹿洞学规》《程端礼读书日程述语》皆有收录,是清初庙堂理学施教思想的集中展现.

清初书院的高速发展与康熙皇帝的鼓励政策密切相关. 应地方大员之请,给书院赐书赐额,是康熙年间朝廷支持书院建设的一大特点,这与南宋时的情形有异曲同工之处. 从康熙十五年(1676)开始,直至六十一年(1722),获得御赐匾额的书院有23所,这又与明代的地方书院罕有皇帝赐额的现象形成对比.[80] 不过,清廷当时并未对书院的发展进行直接的干预,更未将书院纳入国家教育体制. 到雍正年间(1723~1735),清代的书院政策才正式发生转向.

---

77 耿介:『跋〈白鹿洞学规〉』,『敬恕堂文集』,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5年,第128页.

78 王澍:『朱子白鹿洞规条目』,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7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1页.

79 张伯行:『学规类编』,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1册,第3页.

80 陈时龙:『明人对书院的态度–以明代地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明史研究论丛』第十二辑.

2. 书院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雍正间是清代书院政策转为积极支持的时代. 雍正十一年(1733)发布了著名的创建省会书院上谕 : “督抚驻扎之所, 为省会之地, 着该督抚商酌奉行, 各赐帑金一千两. 将来士子群聚读书, 须预为筹划, 资其膏火, 以垂永久. 其不足者, 在于存公银内支用.”[81] 各地总督·巡抚, 奉令动用公帑, 或新建, 或扩建, 或改建, 在乾隆以前确定了保定莲池·济南泺源·太原晋阳·开封大梁·江宁钟山·苏州紫阳·安庆修永(后改敬敷)·杭州敷文·福州鳌峰·南昌豫章·武昌江汉·长沙岳麓·肇庆端溪·广州粤秀·桂林秀峰·成都锦江·昆明五华·贵阳贵山·西安关中·兰州兰山20所省会书院. 省会书院的创建, 使十八行省都有了各自的最高学府, 这为官办书院教育体系的最终确立奠定了基础, 是清代对书院发展所作的创造性贡献.

乾隆年间(1736~1795), 清政府的书院政策不再动摇, 寓控制于支持, 以创建上下一统, 制度完善, 定性明确的官办书院教育体系为主要目标. 乾隆元年(1736)上谕称 :

> 书院之制, 所以导进人材, 广学校所不及. 我世宗宪皇帝命设之省会, 发帑金以资膏火, 恩意至渥也. 古者乡学之秀, 始升于国, 然其时诸侯之国皆有学. 今府·州·县学并建, 而无递升之法, 国子监虽设于京师, 而道里辽远, 四方之士不能胥会, 则书院即古侯国之学也. 居讲席者, 固宜老成宿望, 而从游之士, 亦必立品勤学, 争自濯磨, 俾相观而善. 庶人材成就, 足备朝廷任使, 不负教育之意. 若仅攻举业, 已为儒者末务, 况藉为声气之资, 游扬之具, 内无益于身心, 外无补于民物, 即降而求文章成名, 是希古之立言者, 亦不多得, 宁养士之初旨耶? 该部即行文各省督抚学政, 凡书院之长, 必选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 以礼聘请 ; 负笈生徒, 必择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 肄业其中. 其恃才放诞·佻达不羁之士, 不得滥入书院中. 酌仿朱子《白鹿洞规条》, 立之仪节, 以检束其身心 ; 仿《分年读书法》, 予之程课, 使贯通乎经史. 有不率教者, 则摈斥勿留. 学臣三年任满, 谘访

81 陈谷嘉·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 第855页.

> 考核，如果教术可观，人材兴起，各加奖励．六年之后，著有成效，奏请酌量议叙．诸生中材器尤异者，准令荐举一二，以示鼓励．[82]

这是清代书院建设中最重要的一个政策性官方文件，其内容包括如下几点：第一，上谕认为书院是一种教育机构，“书院之制”定性为“导进人材”，以“广学校所不及”．第二，将省会书院定位于连接中央国子监与地方府州县学的学校，它以“古侯国之学”的身份列入整个国家教育体系之中，使得京师与地方官学之间可以形成“递升之法”．第三，确定书院的办学方针为“立品勤学”，内益身心，外补民物，成就人材，以“备朝廷任使”，指出仅攻举业为末务，藉文章成名也不是教育本意．第四，提出以“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的“老成宿望”之儒为聘请山长的条件．三年考核，六年议叙，“教术可观”者可以奖励．第五，以“乡里秀异·沉潜学问者”为选择生徒的条件，防止放诞不羁之士滥入书院，学业优秀的学生可以荐举入官．第六，以《白鹿洞规条》为学规，仿《读书分年法》为课程，提倡立定仪节，检束身心，重视经史，严肃纪律，对凡不率教者则处以“摈斥勿留”．

其后，乾隆皇帝屡下谕旨，规范书院管理，聘请院长，选择生徒，皆有标准．如山长要改称院长，要“由督抚学臣不分本省邻省·已仕未仕，择经明行修，足为多士模范者，以礼聘请”；“书院生徒，由驻省道员专习稽察，各州县秉公选择，布政使会同该道再加考验，果系材堪造就者，方准留院肄业”．“其余各府州县书院，或绅士捐资倡立，或地方官拨公款经理，俱申报该管官查核，各处书院，不得久虚讲习”，“不得延请”丁忧在籍官员为院长，教官“不得兼充书院师长”等，[83] 都形成了制度．尤其是随着各府州县官方书院的建立，它和原本已有的省会书院构成了上下一统的书院教育体系．

由于教学程度和学术研究水平的高低不同，清代书院形成了一种等级上的差异．就整体而言，最底层的是私立的家族书院和民办的乡村书院，中间层是县立书院，高层则是州·府·道·省·联省各级书院．底层书院数量大·分

82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857页．

83『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卷33，光绪二十五年刊本．

布广, 起着普及文化知识和将儒家学术思想大众化, 从而形成民间价值信仰的作用, 它扎根乡村社会, 是其它较高层书院的起点, 构成中国书院等级之塔的底座. 中间层县级书院, 既拔乎家族·乡村书院之上, 又是官立书院中最低的一等, 一身二任, 承担传播文化知识和将儒家理念政治化, 从而以朝廷意志影响民间价值信仰的任务, 是书院等级之塔的塔身. 高层的各级书院一方面分担指导学术理念政治化的官方责任, 另一方面也兼有研究学术, 更新创造儒家精神, 养育学派之责, 可以视作高居于书院之塔的宝顶部分. 应该指出的是, 那些学术大师主持或创建的书院, 无论是官立还是民办, 皆得视作当然的宝顶部分. 中国书院的等级之塔, 实际上已经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书院教育体系. 而这个体系的建立, 则标志着书院已经进入其普及·成熟的发展阶段.

3. 19世纪下半叶以来书院的近代转型之路

19世纪下半叶以来, 清王朝在平定太平天国战后步入"同光中兴"时代. 同治·光绪年间(1862~1908), 书院以新增1233所的超高速发展, 创造了其近1300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辉煌. 而且, 它追随时代的步伐, 努力适应社会日益增长并激剧变化的文化教育需求, 引入"新学"·"西学"作为研究与教学的内容, 快速改变·改造·改革自身, 开始了由古代走向近代·现代的历程.

同治光绪年间的书院改革, 实际上包含着改造传统的旧书院和创建新型书院两个层次. 总的来讲, 书院的改革既有西方列强瓜分中国而带来的国家·民族危亡的外部压力, 也有积弊太深而不得不变的内在原因. 书院的积弊是多方面的, 论者或谓书院严重官学化, 完全沦为科举的附庸.[84] 或指山长充数, 不问学问 ; 士风浮夸, 动滋事端 ; 多课帖括, 无裨实用 ; 注重膏奖, 志趣卑陋.[85] 书院的改革, 针对书院存在的弊端而来, 究其内容, 主要有二 : 一

84 田正平·朱宗顺 :『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中国书院』第五辑, 长沙 : 湖南教育出版社, 2003年, 第85-87页.

是将无裨实用的科举之业，一变为经世致用之学，二变为新学·西学. 二是重订规章，削减·限制官府权力，引进士绅等民间力量加入管理队伍，从制度上保证所聘山长为学行兼优之人，可以师范诸生.

改造传统旧书院，可追溯到阮元(1764—1849)在嘉庆·道光年间(1795~1820)创立研经治史·博习词章的诂经精舍·学海堂. 它以去科举化为目标，以研究经史实学，通经致用为特点. 道光十一年(1831)，湖南巡抚吴荣光(1773~1843)仿学海堂之制建湘水校经堂于岳麓书院，分经义·治事·词章三科试士，教学汉宋并重. 光绪十六年(1890)，正式建为校经书院，设经义·治事二斋，专课经史大义和当世之务，通经致用的学术主张已经和治世救国的现实政治结合到了一起. 光绪二十年(1894)，甲午战争失败，新任学政江标(1860~1899)以“变风气，开辟新治为己任”，新建书楼，以藏中西学书籍，又改革课程，以经学·史学·掌故·舆地·算学·词章6科课士，添置“天文·舆地·测量诸仪，光化矿电试验各器，伸诸生于考古之外，兼可知今”；别创算学·舆地·方言等学会，制订《校经学会章程》；聘请唐才常为主笔，定期出版《湘学报》，分史学·掌故·交涉·商学·舆地·算学6个栏目，发表师生研究成果，宣传维新变法思想. 湘省风气为之巨变.[86] 这表明，经过几个梯次的递进式改革，主题已经由经世致用·通经致用，转变为西学·西艺等自然科学知识，显示出传统书院存在着向近现代转型的可能.

创建新型书院，主要体现在新书院的研究与教学的内容中出现了前所未有的“西学”成份. 以创建者来分，新型书院有中国有识之士办的，有外国人办的，也有中外人士合办的. 外国传教士创办的百余所教会书院，在同光时期，尤其是光绪年间(1875~1908)，宗教色彩有淡化倾向，声光化电等近现代科学技术知识的内容增加. 传教士林乐知(1836~1907)创建的上海中西书院，设有数学启蒙·代数学·勾股法则·平三角·弧三角·化学·重学·航海测

85 葛飞：『晚清书院制度的兴废』，『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86 刘琪·朱汉民：『湘水校经堂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34页.

量·天文测量·地学·金石类考·琴韵·西语·万国公法等课程. 为了迎合中国学生, 甚至标榜 : "习西学以达时务, 尤宜兼习中学以博科名, 科名既成, 西学因之出色"等等.[87] 中国人创办的新型书院, 其始和旧书院的改革同步. 如上海求志书院在光绪二年(1876)由巡道冯焌光(1830~1878)创建, "分经学·史学·掌故·算学·舆地·词章六斋, 按季命题课士", 士人不分年龄, 不限地域, 皆可备卷应考.[88] 中国人所办的新型书院, 在甲午中日战争之前, 与传统书院的联系较为紧密, 大体上是在旧式书院中添加西学课程, 以中学为主, 西学为辅. 在此之后, 西学成分愈来愈重, 日益成为书院朝向近现代化迈进的大潮流. 中外人士合办的书院如上海格致书院, 是同治十三年(1874)由英国驻上海领事麦华陀(1823~1885)·英国传教士傅兰雅(1839~1928)·中国绅士徐寿(1818~1884)等发起, 禀准北洋大臣李鸿章(1823~1901)后邀集中西绅商仕官捐建的. 格致书院存在前后40余年(1874~1914), 致力于中西文化的友好交流, 成绩卓然.[89]

甲午战争加速了中国书院向近现代改制的进程, 书院的改制实践随着戊戌维新的实施. 在光绪二十二年至二十四年(1896~1898)间形成了一个高潮. 书院改革方案, 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变通章程整顿书院·创建新型实学书院·改书院为学堂三种方案, 交由各省督抚学政参酌办理. 光绪二十四年(1898)五月, 光绪皇帝(1871~1908)采用康有为(1858~1927)的建议, 限令两个月之内, 将全国大小书院改为兼习中学·西学之学校, 但很快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宣告停止.

光绪二十六年(1900), 八国联军入侵北京. 次年, 执掌实权的慈禧太后(1835~ 1908)在"西狩"途中宣布"新政". 湖广总督张之洞(1837~1909)·两江总督刘坤一(1830~1902)联名上奏《江楚会奏变法三折》中的第一折《变

87 林乐知 :『中西书院课程规条』, 邓洪波 :『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第131页.
88 光绪『松江府续志』卷17『学校』, 上海 : 上海书店出版社, 2010年, 第427页.
89 有关格致书院的贡献, 参见王尔敏 :『上海格致书院志略』, 香港 : 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 1980年 ; 熊月之 :『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上海 :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

通政治人才为先遵旨筹议折》，“参酌中外情形，酌以今日设学堂办法”，主张建立包括文武农工商矿各类各级学堂的近代学制体系”。于是，清政府采用二人建议，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下达书院改制上谕，其称：“除京师已设大学堂，应行切实整顿外，着各省所有书院，于省城均改设大学堂，各府及直隶州均改设中学堂，各州县均改设小学堂，并多设蒙养学堂。其教法当以四书五经纲常大义为主，以历代史鉴及中外政治艺学为辅，务使心术纯正，文行交修，博通时务，讲求实学。”[90]

新世纪的书院改制诏令，其前既有名正言顺的借口和台阶，其后又有壬寅学制(1902)·癸卯学制(1903)相配套，因而推行较为顺利。到清末，各省书院基本改制成学堂，步入民国后发展为各级学校，古老而传统的书院跨向近现代，接通中国文化教育发展的血脉，在改制中获得了永生。

Ⅵ. 结语

书院自唐代诞生以后，在宋代形成独具特色的书院教育制度。在这个过程中，以胡宏·朱熹·张栻·吕祖谦为代表的南宋理学家贡献良多，他们积极推进的书院建设运动，奠定了书院的教育理念与运行模式。其中，朱熹苦心经营的白鹿洞书院具有典范意义，成为后世书院建设的取法对象。朱熹亲自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得到后世的高度重视，而被历朝书院加以沿用。《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后世的流传过程，可以揭示出书院在不同时代所面临的不同历史命运，后儒对其进行的解释·演绎·发挥·补充，是把握当时思想·学术世界主要问题以及书院发展特征的关键线索。程端礼《读书分年日程》的出现，反映出元儒在异族统治之下取得恢复科举的阶段性胜利后，试图接续南宋的理学道统及书院精神，来重建当时学校·书院教法的不懈努力。明初书院的艰难维持·缓慢恢复过程，离不开《白鹿洞书院揭示》的精

90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2489页。

神指引作用. 胡居仁的《续白鹿洞学规》, 在单纯的读书学习之外, 提出了"致君泽民"的更高层次要求. 明代中后期, 各派学者围绕《白鹿洞书院揭示》的解释展开竞争. 王守仁从其心学立场出发, 认为朱熹所作的学规与自己的思想不谋而合. 而东林学派站在朱学的立场, 提出饬四要·破二惑·崇九益·屏九损的主张, 成为明清之际由王返朱思想运动的中坚. 清初书院在清廷"尊朱"的文教政策下取得大发展, 《白鹿洞书院揭示》在士人的书院讲学·理学名臣的书院建设过程中再次占据核心地位, 是当时"辟王崇朱"思想潮流的反映. 雍正建设省会书院的诏令正式宣告清代书院政策发生转向, 经过乾隆的完善, 清代省·府·州·县书院体系正式建立, 书院步入高速发展的轨道. 19世纪以来, 书院随中国社会一同面临近代转型的历史任务. 经过戊戌维新·清末新政, 书院在光绪二十七年(1901)正式被改制为学堂, 完成了走向近代的转型之路. 需要说明的是, 书院虽在清末作为一种全国性的教育制度遭到废止, 但民国又接连有新书院创建,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书院再现复兴迹象. 传统老书院得到修复, 民间新书院如雨后春笋, 高等教育界又有所谓"书院制"改革, 各种书院相关的团体·协会相继成立, 以致于有了"书院复兴"的说法,[91] 对当代书院进行的研究已成为学界方兴未艾的新兴领域.

书院诞生于中国, 其数量之庞大, 种类之繁多, 使得国内学者的研究兴趣多被中国一地吸引. 然而书院又从来不仅限于中国, 书院从明代开始移植海外, 第一站是隔黄海·鸭绿江而相邻的"东国"朝鲜, 此后又传入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甚至欧美地区, 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 朱熹以及《白鹿洞书院揭示》又成为这些书院共同的精神旗帜. 如果抛开带有"西方中心论"色彩的近代化历史叙事, 书院这种根植于东方历史文化的独特教育制度, 在没有外力的干预下是否有"另一种"走向近代的可能性? 又在新时代中是否可以继续发挥国际文化交流的纽带与桥梁作用? 这都为当代学者提出了新的研究命题.

91 贾宇:『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书院』,『光明日报』2011年8月22日.

【참고문헌】

朱熹：《白鹿洞书院揭示》，《乞白鹿洞书状》，《朱熹集》
光绪《松江府续志》，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上海格致书院志略》，《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走在复兴路上的中国书院》，《钦定大清会典事例·礼部》
林乐知，《中西书院课程规条》，
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张廷玉等：《明史》
白新良：《明清书院研究》
陈时龙：《明人对书院的态度－以明代地方志的书院记载为考察对象》
王夫之：《宋论》，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3页.
吕祖谦：《丽泽书院学规》，《吕祖谦全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359页.
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
刘其·朱汉民：《湘水校经堂述评》，《岳麓书院一千零一十周年纪念文集》，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6-34页.
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长沙：岳麓书社，1997年，第2388页.
葛飞：《晚清书院制度的兴废》，《史学月刊》，1994年第1期.
田正平·朱宗顺：《传统教育资源的现代转化》，《中国书院》第五辑，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85-87页.
汤斌·耿极：《孙夏峰先生年谱》，张显清主编：《孙奇逢集》中，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3年，1383页.
黄宗羲：《征君孙钟元先生奇逢》，《明儒学案》下，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371页.
耿介：《嵩阳书院志》，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一辑）第72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301页.
王澍：《朱子白鹿洞规条目》，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70册，北京：国家图书馆出版社·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9年，第281页.

张伯行：《学规类编》，邓洪波主编：《中国书院文献丛刊》（第二辑）第1册，第3页.

《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北京：中华书局，2004年，第802页.

《县申拆毁书院缘由》，《东林书院志整理委员会》整理：《东林书院志》，第565页.

邓洪波：《中国书院史(增订版)》，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456页.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太原：山西古籍出版社，2004年，第4页.

张履祥：《杨园先生全集·备忘三》，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143页.

顾宪成：《东林会约》，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231-238页.

王守仁：《朱子晚年定论序》，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第291页.

郑廷鹄：《白鹿洞志》，李梦阳等编，白鹿洞书院古志整理委员会整理：《白鹿洞书院古志五种》，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第212页.

王守仁：《紫阳书院集序》，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第289页.

胡居仁：《续白鹿洞学规》，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640-645页.

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序言，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王守仁：《别湛甘泉序》，王守仁著，王晓昕·赵平略点校：《王文成公全书》，北京：中华书局，2015年，第278-279页.

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北京：中华书局，1959年，第608页.

胡居仁：《丽泽堂学约并序》，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上海：中西书局，2011年，第724页.

胡居仁：《续白鹿洞学规》，邓洪波：《中国书院学规集成》，第640-645页.

陈来：《宋明理学》，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第247页.

吴伯通：《提督河南学校条约》，《石谷达意稿》卷32，第7b页.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

宋濂等：《元史》卷190《程端礼传》，

包弼德著，王昌伟译：《历史上的理学》，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127页.

程端礼：《程氏家塾读书分年日程》，《四部丛刊续编(四九)》，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34年，

程文海：《东庵书院记》，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81页.

参见陈雯怡：《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

分册》，第214–242页.

程端礼：《弋阳县新修蓝山书院记》，《畏斋集》，《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99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82页.

姚燧：《序江汉先生事实》，《牧庵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7页.

郝经：《太极书院记》，郝经撰，秦雪清点校：《郝文忠公陵川文集》，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山西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373页.

陈雯怡对此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见氏著：《元代书院与士人文化》，邱仲麟主编：《中国史新论–生活与文化分册》，台北：中央研究院·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13年，第255–261页.

许有壬：《雪斋书院记》，见陈谷嘉·邓洪波：《中国书院史资料》，第376页.

张栻：《潭州重修岳麓书院记》，张栻著，邓洪波点校：《张栻集》，长沙：岳麓书社，2010年，第571–572页.

平坂谦二：《被称作书院的日本学校》，《中国书院》，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60页.

有关南宋书院的类型，见陈雯怡《由官学到书院：从制度与理念的互动看宋代教育的演变》，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4年，第233–269页

黎靖德编，杨绳其·周娴君校点：《朱子语类》，第216页.

吕祖谦：《与朱侍讲元晦》，《吕东莱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48页.

真德秀：《劝学文》，《真西山先生集》，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07页.

方逢辰：《义塾纠难记序》，顾燕整理：《中国家谱资料选编·教育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第635页.

Abstract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owon in Baekrok-dong and the Change of Seowon in China

Deng Hong-bo*·Zhao Wei**

Seowon(Shuyuan: 書院) was originated from the institute where stored and arranged books in private and governmental libraries in Tang Dynasty, and then, with development in new printing technologies and under the cultural background of convergence in Confucianism, Buddhism, and Taoism, as ancient Chinese scholars conducted activities such as storing, reading, teaching, lecturing, managing, and carving books, it was a cultural organization for them to study, create, accumulate, and spread cultures. From Tang Dynasty to the Era of Five Dynasties and Ten Kingdoms, it had experienced a series of wars and got new chances for development in Song Dynasty.

The Shuyuans in Northern Song Dynasty replaced the governmental school's role with its enhancement in education, and for example, "tiān xià sì dà Shuyan"(天下四大書院). And the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Shuyuan became completely a cultural educational system. The difficult social situations in the early Southern Song Dynasty suggested the time's demands to maintain people's hearts through consulting them, moral recovery, and searching for new values to the

* Professor, Yuelushuyuan at Hunan University / denghongbo2000@126.com
** Ph.D Program, Yuelushuyuan at Hunan University / wwjgst@163.com

intellectuals. Jang Sik, Zhu Xi, Yeo Jo-gyeom, and Yuk Gu-hyeon's teaching in the "Shuyuans in Southern Sung" invoked to flourish academics, contributing to form combination of Lihak(理學) and Shuyuan. In the process, Zhu Xi's role was biggest. He established Bailudong-Shuyuan when he was a provincial for Namgang County, enacted the regulations and spread new educational ideas to the students. According to spreading of new educational ideas, the regulations of Shuyuan was completed, and six projects of study, teaching, library, book carving, sacrifice services for great scholars and managing farms were formed. It meant that Shuyuan was developed as an independent cultural organization with various functions, and that Chinese educational projects entered in the time of co-existence among governmental schools, Shuyuans, and private schools.

In the establishment of Yuan Dynasty,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 was resumed, and Zhu Xi's Neo-Confucianism became the orthodox again. And so Zhu Xi was celebrated in various regions. The greatest contribution of Shuyuans in Yuan Dyansty was to fill lacks in Liao and Jin Eras and spread widely Shuyuans and Neo-Confucianism in northern regions, decreasing gaps between southern and northern cultures. The most remarkable characteristic of Shuyuans in Yuan Dynasty was that the Shuyuans combined with Neo-Confucianism were considered as identical with governmental schools with diversity in establishing subjects and more detailed educational regulations. As Yuan government promoted to establish Shuyuans, Mongolians and Semus also participated in establishing Shuyuans.

In early Ming Dynasty, though Neo-Confucianism became the orthodox, Shuyuans had been declined for a century because Zhu

Yuanzhang's policy to demolish them and to promote governmental schools. Bailudong-Shuyuan and Yuelu-Shuyuan damaged due to the wars in the late Yuan Dynasty were not restored for longtime. In the middle of Ming Dynasty, with problems in governmental education, establishing Shuyuans became a solution. With the model of Zhu Xi's Bailudong-Shuyuan, Shuyuans were restored. At that time, Hu Ju Ren became a head of Bailudong-Shuyuan, enacted the regulations, and educated the students. Wang Shou Ren and Zhan Ruo Shui, criticizing the orthodox philosophy and conducted the study of heart(心學) movement, which became a national-wide controversy. Both the scholars' students and next generations established Shuyuans and have lectures, and as a result, Chinese Shyuans and academics met a kind of renaissance since the era of Southern Song. In the process, the center of Neo-Confucianism, Bailudong-Shuyuan, through efforts and arrangement by Wang Shou Ren and his students, became the center for Wang Ming School. In the late Ming Dynasty, Shuyuans became a kind of political organization for representing the intellectual's interest. Therefore, tey were declined with three times' damages and closing in the eras of Emperors Jiajing, Wanli and Tianqi. However, the Shuyuan System in Ming Dynasty was introduced into Joseon and then, Bailudong-Shuyuan became the model for Seowons in Jose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ccording to the policies of academics and teachings for worshiping Zhu Xi, Shuyuans were established. Through academic activities, there were trends of refusing Wang Ming School and worshiping Zhu Xi("辟王崇朱"). The rise of Lihak(理學) and Shuyuan in Hanam Region 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was the result of these trends. In Emperor Yongzheng's time, Shuyuans were established

by each provincial government and the governmental parties became to intervene to establish them, and then, various grades of governmental Shuyuans became the center of academic and education in the country. With co-efforts between the government and private sectors, Shuyuans in Qing Dynasty were widely spread in cities and rural areas, having the unprecedented boom. However, through ___ and ___ were declared through governmental orders and distributed to each provincial Shuyuans. In addition, some governmental officials such as Zhang Bo Xíng and Wang Shu and private scholars, based on the theories of both great Scholars from Song and Ming Dynasties, enacted _____ and ____ and then, Zhuxi and Bailudong-Shuyuan continued to have influences on the intellectuals. However, with deepening in civil service examinations and governmental studies in Qing Dynasty, the scholars focusing in Classic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Ruan Yuan in the eras of Emperors Qianlong and Jiaqing, beyond the typical framework of Neo-Confucianism, concentrated on the classical studi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books and Shuyuans in Qing Dynasty open the way of reform. Since Daoguang years, Shuyuans responded actively to the western cultures from opening ports, established new systems with rearranging the contents and forms and introducing western and new studies. And then, continuing to export and spread Shuyuan system in Qing Dynasty around the world, the system of the world Shuyuan Culture focusing on the spirit of Bailudong- Shuyuan was formed.

Keywords : Bailudong-Shuyuan(白鹿洞書院), Shuyuan in Song Dynasty, Shuyuan in Yuan Dynasty, Shuyuan in Ming Dynasty, Shuyuan in Qing Dynasty

논문 투고일: 2020. 11. 28 심사 완료일: 2020. 12. 15 게재 확정일: 2020. 12. 26

■ 부록

▣ 상주 花巖書院『敦事錄』자료 소개

▣ 花巖祠敦事錄 影印

상주 花巖書院『敦事錄』자료 소개*

채 광 수**

경상도 상주 낙동리에 존재했던 화암서원『돈사록』은 창건일기와 예식문자 등을 필사한 성책이다. 화암서원은 1692년(숙종 18) 金安節[1564~1632]의 학문과 덕행을 기리기 위해 설립이 되었다. 이후 1719년(숙종 45) 雲溪書院이 철폐가 되자 제향자인 成灠·申碩蕃을 合享했고, 김안절의 삼종제 金濤를 추향한 서인계 서원이다. 1780년(정조 4)과 1867년(고종 4)에 낙동면 분화리와 백원리에 한 차례씩 이건한 바 있고, 1870년(고종 7)에 훼철을 당했다.

주향자 김안절의 본관은 상산. 자는 子亨. 호는 洛厓로 1564년(명종 19) 상주 장천리[1]에서 태어났다. 朴遂一과 成允諧 문하에서 공부한 뒤, 1605년(선조 38) 사마시에 입격하였다. 그는 향촌에서 孤塾[孤鳳書堂]을 세워 학문과 문학에 전심한 선비로 作詩에 상당한 재능을 보였다. 정경세·유형원·성람·신석번 등과 교유했으며, 이괄의 난에 창의한 공으로 정조연간 정려를 하사 받았다. 그의 문집은 1801년(순조 1)에 6세손 金濟默에 의해 초간이 이루어졌다.

추향자 3명은 모두 서인계를 지향한 인물들이다. 창녕성씨 상주 입향조 성람은 화담·우율 문인이며, 그 후손들은 영남을 대표하는 서인가문으로 기호학계승, 서인계 상소 활동, 흥암[享송준길]·西山書院[享 김상용·김상헌] 창건 등

* 서원학보에 소개하는 화암서원『돈사록』은 상산김씨 화암문중 김홍균씨가 소장한 복사본이다.

** 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연구교수

1 현 상주시 낙동면 화산리.

영남에서 가장 두드러진 서인계 활동을 전개한 가문이다. 김도는 서인 핵심 가문 중 하나인 동래정씨 文翼公派[정태화 家]와 척연이 있고, 서인 사류계에서 존경을 받던 趙翼과 골육형제로 불리는 관계였다. 또 김상헌에 대해 남다른 존경심을 가진 인물이었다. 신석번은 17세기 중후반 영남 서인의 영수로 있으며, 친서인계 활동 전반을 선도하였다. 영남의 서인계의 본격적 활동이 그로부터 시작되었다 해도 과언이 아니다.

1책 35면의 『돈사록』에는 서문, 창건일기, 상량문, 봉안문, 後序, 常香祝 순으로 실려 있으며, 1692년(숙종 18)에 성책한 것이다. 『돈사록』에서 사료적 가치가 높은 것은 일기 부분이다. 본 일기는 1691년(숙종 17) 2월 16일 建院 발의부터 다음해 9월 15일까지 설립 전말을 기록하고 있다. 金山의 李珪林과 성주의 都永華가 建院을 발의가 있은 뒤, 함창 사림들의 동조로 공론화가 되자 3월 3일 김안절이 경영했던 고봉서당에서 설립 실무진이 구성이 된다. 고봉서당에 사당을 짓기로 결정하고, 3월 12일부터 본격적인 공사에 착수했다. 그 과정을 일기를 토대로 주요 내용을 간략히 정리하면 아래 표와 같다.

〈화암서원 설립 과정〉

일 자	내 용
1691년 3월 12일~17일	○ 벌목, 서까래·대들보용 나무 확보, 부조 : 12緡, 벼 17石, 무명베 2필
3월 18일	○ 당시 함창을 대표하던 蔡獻徵 방문 격려
3월 19일	○ 189명 역군 동원 나무 운반, 부조 : 5緡·正木 5필
3월 21일~22일	○ 기와 구입 결정, 기와 값 벼 20석·베 10필, 부조 : 16緡·베 6필·백지 5束
3월 23일~29일	○ 나무 손질 및 운반, 도편수가 병이 남
3월 30일 ~4월 3일	○ 기와 운반 및 개봉, 대들보 나무 운반, 상량일 7월 30일 申時로 결정
4월 8일~10일	○ 함창 南極約에게 상량문 부촉 했으나 사양, 기둥과 대들보 작업 진행
4월 15일~24일	○ 蔡河徵에게 상량문 부촉, 부조 : 보리 2석, 주춧돌 세움
4월 27일~30일	○ 3칸 기둥 세움, 향교부조 : 2緡, 채하징이 지은 상량문 수령, 목수 돈 2냥과 쌀 10말 지급
8월 1일~5일	○ 도남서원 부조 : 2냥, 成晩徵 방문, 동서재 공사용 벌목, 立柱일 20일 未時로 선정

8월 10일~14일	○ 土役·蓋瓦 작업, 成虎喆·成虎文 방문, 萬景寺 승려 負役
8월 16일~18일	○ 도청 申必彦 교체, 神門 3칸·동쪽 협문 1칸 세움, 龍興寺 승려 부역, 사당·신문 蓋瓦 완료
9월 1일~12일	○ 土役 마무리, 감문향교 부조 1貫·백지 1束, 사당 沙壁 작업
9월 13일~20일	○ 기둥 주춧돌 놓음, 기둥 세움
9월 26일~29일	○ 李珪林이 지은 재실 상량문 수령, 대들보 올림, 목수 돈 7냥과 흰쌀 5말 보답
10월 7일~19일	○ 사당 계단과 섬돌 축조, 沙壁 거의 완성, 서까래 계시, 본손 金兌輝 기와 부조
10월 25일	○ 還政기로 인해 공사 중단, 목사 돈 7냥·瓦匠 돈 6냥과 베 4필 지급
11월	○ 金烏書院 돈 1냥 부조
1692년 2월 25일 ~3월 1일	○ 성주 軍丁 지원 확약, 공사 재개, 仰壁과 沙壁 작업 거의 완료, 초가 3칸 7냥에 구입
7월 18일 ~8월 1일	○ 재력 부족 발생, 庫直집 초가로 하기로 의론, 재실 계단·담장 완성, 봉안일 9월 15일로 결정 후 통문 발송, 고직집 대들보 올림
8월 10일~20일	○ 草席 20立·3緡 부조, 성만징에게 봉안문 부촉, 草席 23立 구입 후 재실에 깜
8월 22일 ~9월 10일	○ 임원 선발, 원장에 선산의 朴成遠 추대, 고직집 완성, 蔡時鑑이 고직에게 제사 준비 20緡 지출, 사당과 재실 청소, 제기 준비, 채헌징 黃燭 1쌍과 백지 2束 부조
9월 11일~15일	○ 임원 회합, 집사분정, 80명 모인 가운데 봉안식 거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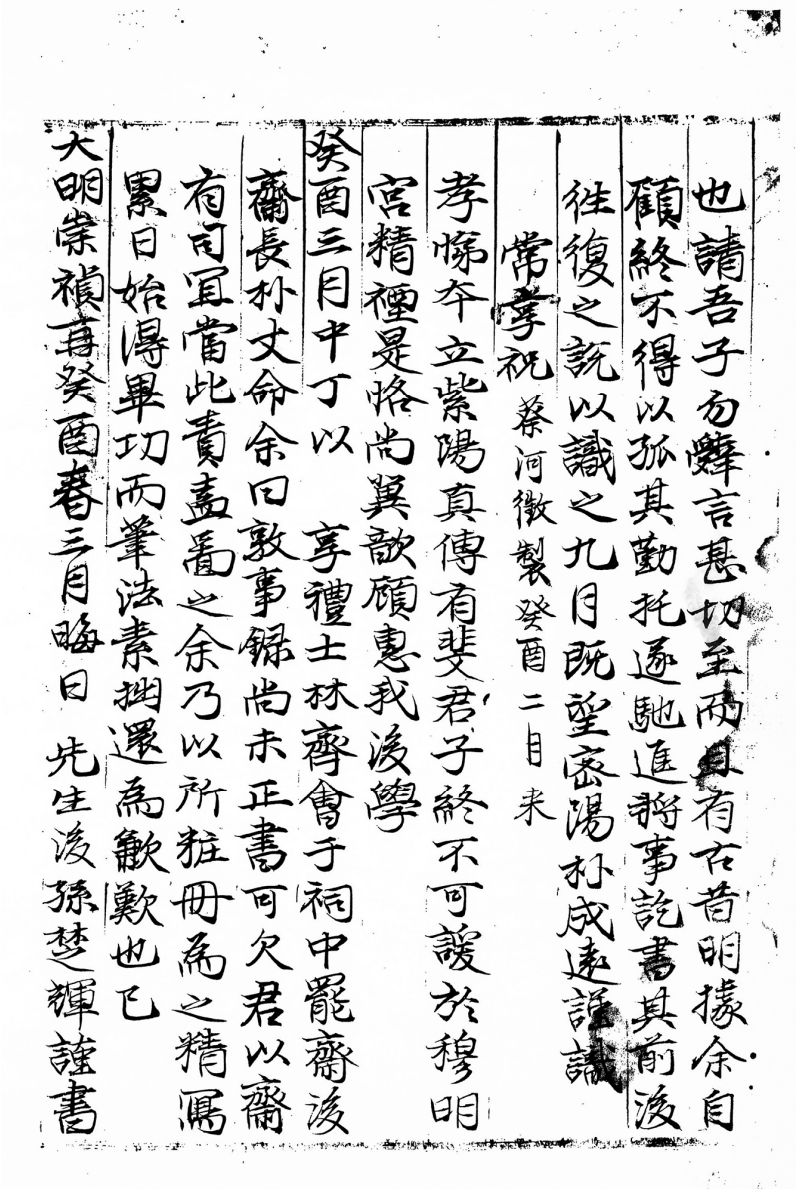
일기 이외 수록되어 있는 서문은 이규림, 상량문과 常香祝은 채하징, 봉안문은 성만징, 後序는 박성원이 지었다. 문자의 필진은 모두 서인계 인물들이다. 일례로 성람의 5대손인 성만징은 송시열과 권상하의 문인으로 권상하 문인을 대표하는 '江門八學士' 중 1명이다. 그는 김창협·김창흡·정호·한원진·이희조·윤봉구·이태좌·李世弼 등 다양한 서인계 인사와 교류한 이 시기 영남 서인을 대표하는 인물이었다. 또 일기에 등장하는 서원 설립 유사와 봉안식 집사들에 대한 인물 분석을 통하여 17세기 후반 경상좌도의 서인계 존재 형태도 조명할 있을 것이다.

본 자료는 영남 서인계 문중서원의 구체적인 설립 과정을 보여주는 자료로서 가치가 있다. 영남의 서인계 서원에 대한 미진한 연구는 일차적으로 자료 부족에 기인한다. 더구나 서인계 문중서원은 더욱 그러하다. 이러한 문제를

어느 정도 보완·해소해 주는 역할을 해 줄 수 있다.

아울러 조선후기 경상좌도에서 서인세력이 강성했던 상주지역의 서인계 형성, 확산, 활동에 대한 심층적 연구를 진척시킬 수 있는 자료가 될 것이다.

花巖祠敦事錄　影印



也請吾子勿辭言甚切至而且有古昔明據余自
顧終不得以孤其勤托遂馳進將事訖書其前後
往復之說以識之九月既望密陽朴成遠謹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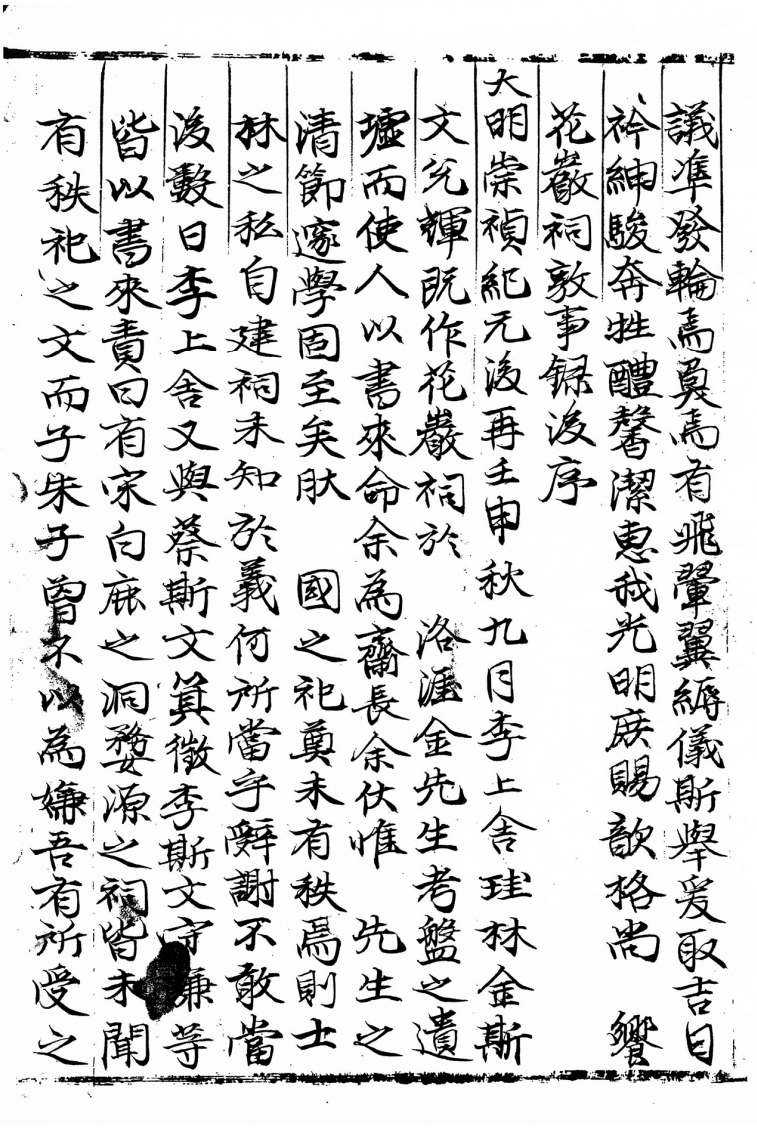
常享祝 蔡河徵製 癸酉二月 来

孝悌本立紫陽真傳有斐君子終不可諼於穆明
宮精禋是恪尚冀歆顧惠我後學

癸酉三月中丁以 享禮士林齊會于祠中罷齋後
齋長朴丈命余曰敦事錄尚未正書可欠君以齋
有司宜當此責盡圖之余乃以所粧冊爲之精寫
累日始得畢功而筆法素拙還爲歉歎也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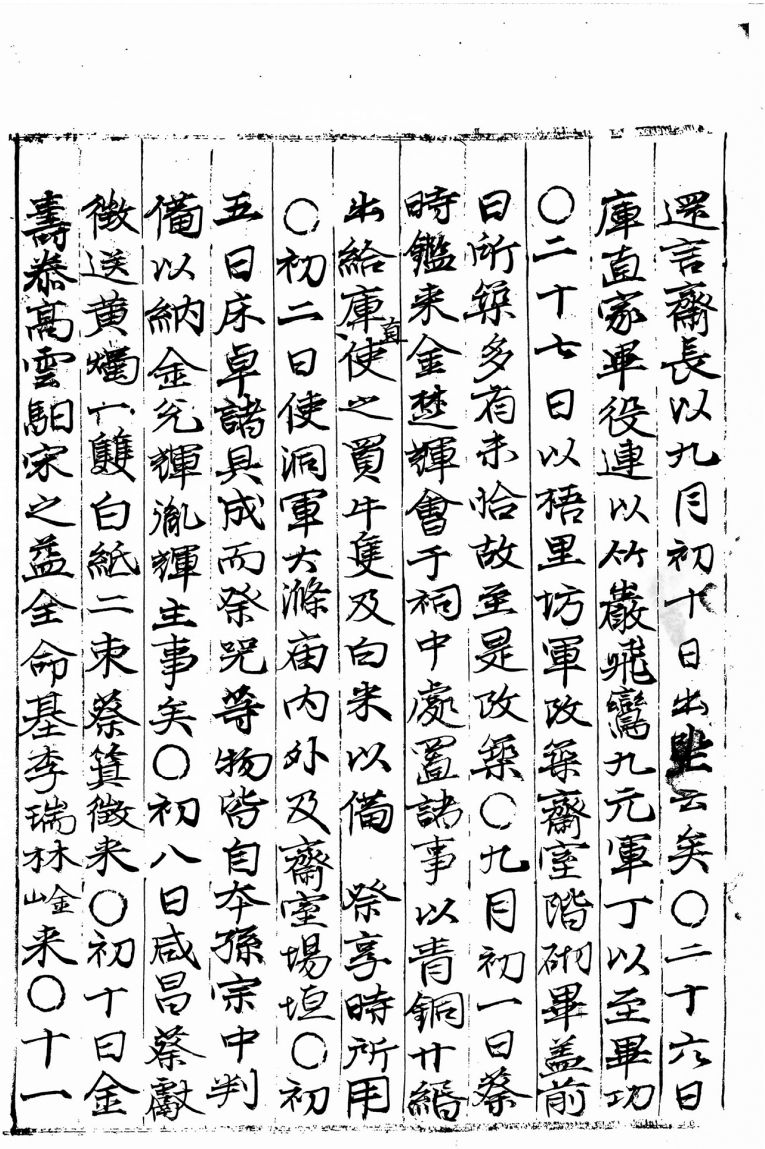
大明崇禎再癸酉春三月晦日 先生後孫楚輝謹書

議準發輪焉奠焉有飛翬翼縟儀斯舉爰取吉日
衿紳駿奔牲醴馨潔惠我光明庶賜歆格尚 饗
花巖祠敦事錄後序
大明崇禎紀元後再壬申秋九月李上舍珪林金斯
文兌輝既作花巖祠於 洛涯金先生考盤之遺
墟而使人以書來命余為齋長余伏惟 先生之
清節邃學固至矣肰 國之祀奠未有秩焉則士
林之私自建祠未知於義何所當乎辭謝不敢當
後數日李上舍又與蔡斯文箕徵李斯文守謙等
皆以書來責曰有宋白鹿之洞婺源之祠皆未聞
有秩祀之文而子朱子曾不以為嫌吾有所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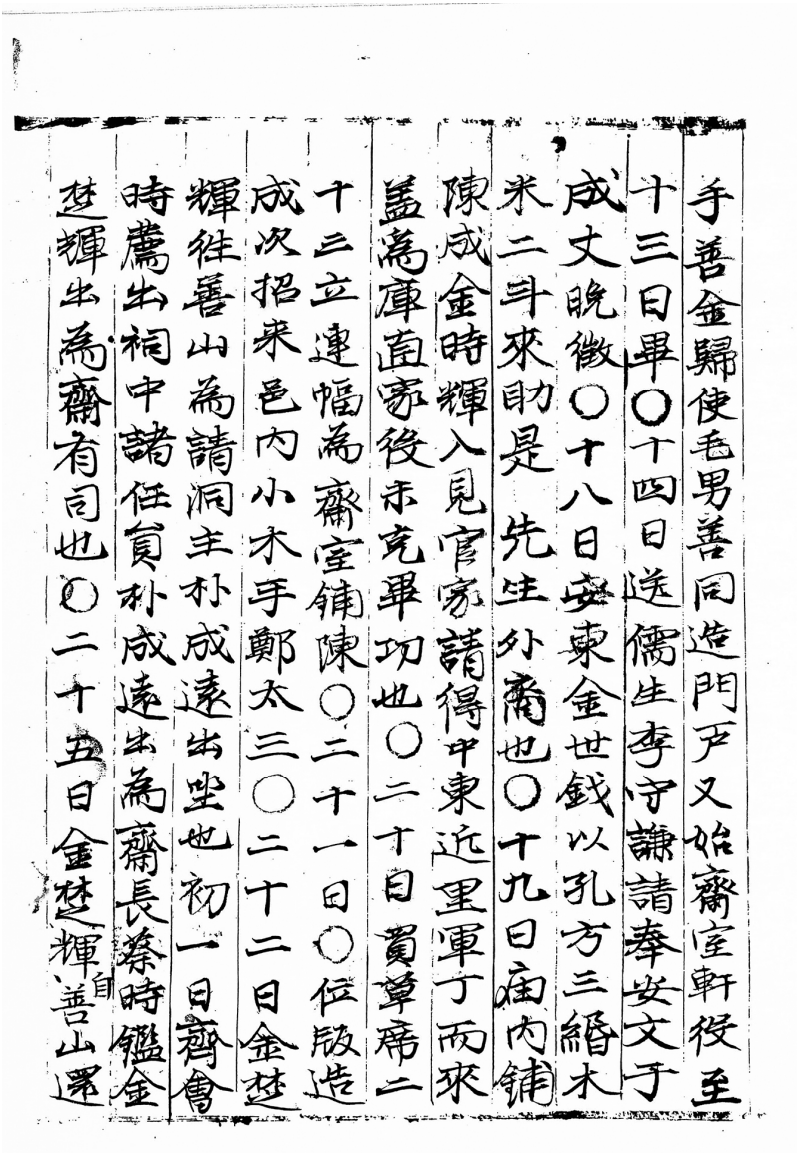


議準發輪焉奠焉有飛翬翼縟儀斯舉爰取吉日
衿紳駿奔牲醴馨潔惠我光明庶賜歆格尚 饗
花巖祠敦事錄後序
大明崇禎紀元後再壬申秋九月李上舍珪林金斯
文兌輝既作花巖祠於 洛涯金先生考盤之遺
墟而使人以書來命余爲齋長余伏惟 先生之
清節邃學固至矣肰 國之祀奠未有秩焉則士
林之私自建祠未知於義何所當乎辭謝不敢當
後數日李上舍又與蔡斯文箕徵李斯文守謙等
皆以書來責曰有宋白鹿之洞婺源之祠皆未聞
有秩祀之文而子朱子曾不以爲嫌吾有所受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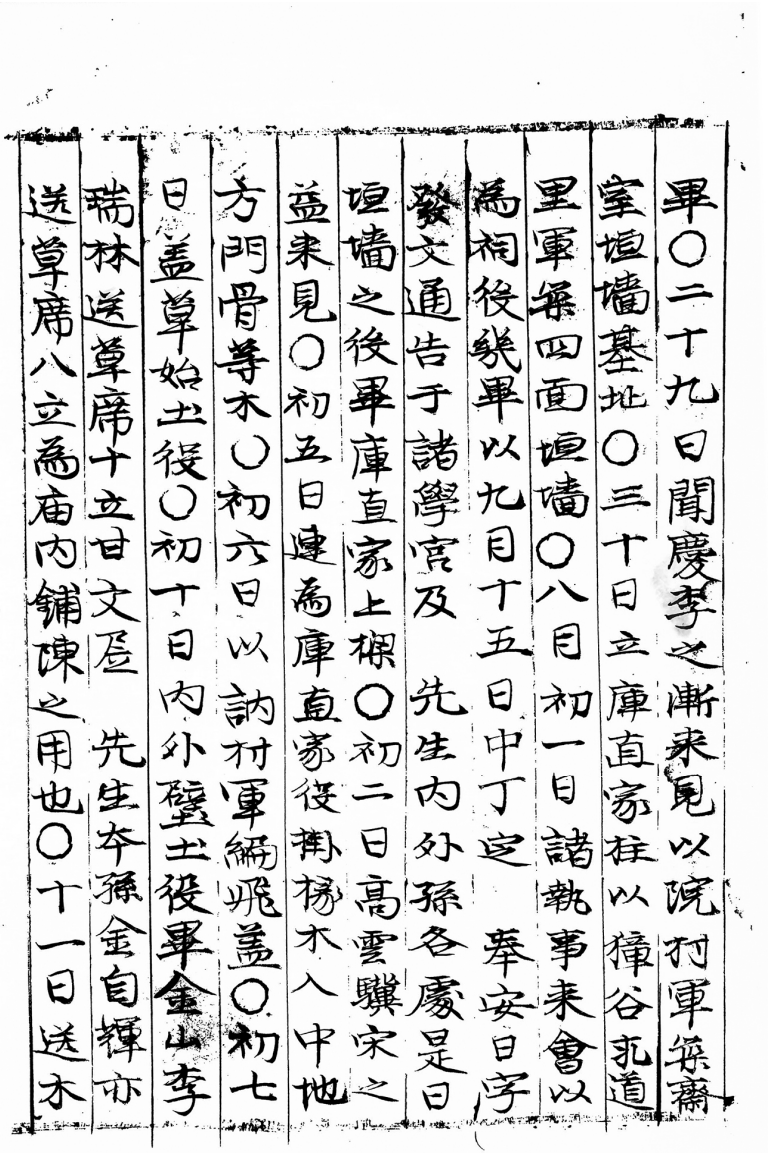
日成虎望自安養持奉安文而来星州都永華仁
同張大有善山朴守章守屹金山李珪林草溪尹
鳴善等入来金碩基金允輝應輝胤輝鎰輝等皆
會○十二日朴承祖趙彥鎮来○十三日齋長朴
成遠及朴成晩来齋長有故今始来云矣○十四
日朝食堂定坐薦出駿奔諸執事初獻朴成遠亞
獻蔡箕徽終獻李珪林祝金時輝執禮高雲馹掌
饌金鎰輝奉爵金壽泰奠爵宋之益奉香尹鳴善
奉爐金應輝司罇朴守章謁者朴守屹贊者金玉
輝酒有司都永華寫版有司金台輝金命基奉版
有司金允輝設位祗行寫版之禮內外孫合會員



還言齋長以九月初十日出坐云矣○二十六日
庫直家畢役連以竹巖飛鸞九元軍丁以至畢功
○二十七日以梧里坊軍改築齋室階砌畢蓋前
日所築多有未恰故至是改築○九月初一日蔡
時鑑來金楚輝會于祠中處置諸事以青銅廿緡
出給庫直使之買牛隻及白米以備 祭享時所用
○初二日使洞軍大滌廟內外及齋室場垣○初
五日床卓諸具成而祭咒等物皆自本孫宗中判
備以納金兌輝瀧輝主事矣○初八日咸昌蔡獻
徵送黃燭一雙白紙二束蔡箕徵來○初十日金
壽恭高雲駉宋之益全命基李瑞林金山來○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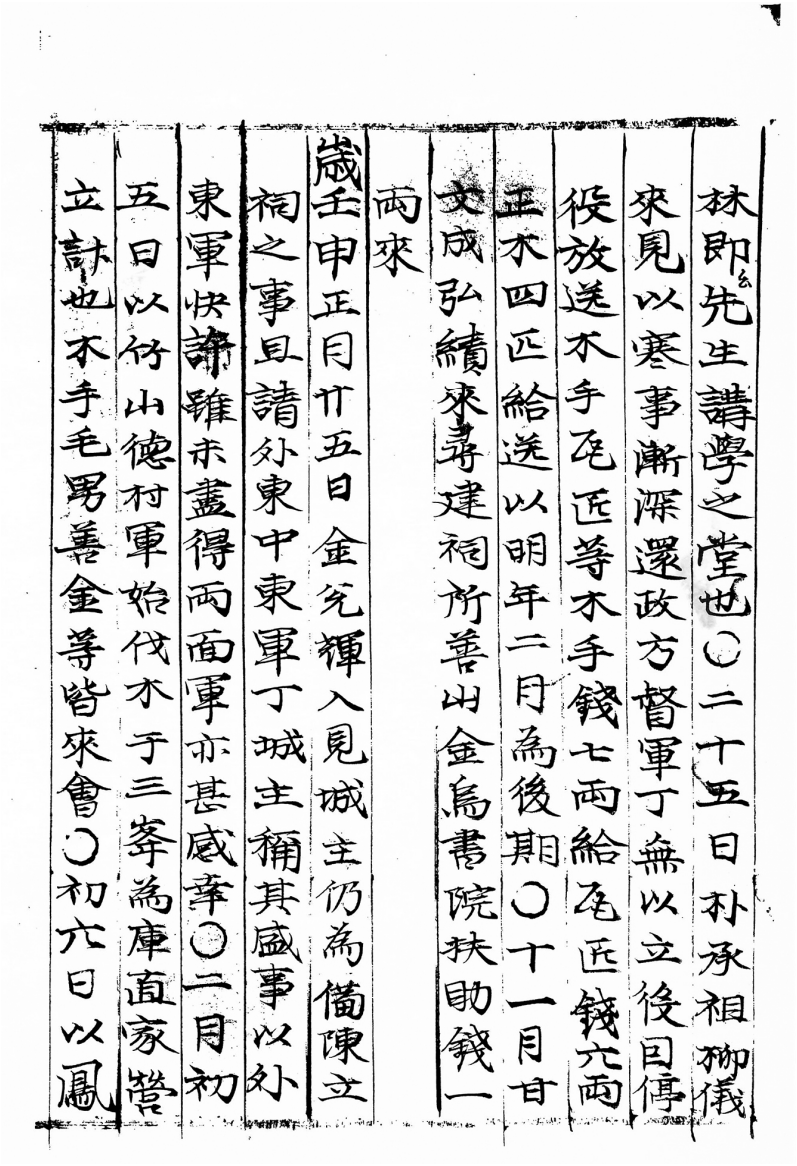


手善金歸使毛男善同造門戶又始齋室軒役至
十三日畢○十四日送儒生李守謙請奉安文于
成丈晚徵○十八日安東金世鉞以孔方三緡木
米二斗來助是 先生外裔也○十九日廟內鋪
陳成金時輝入見官家請得中東近里軍丁而來
蓋爲庫直家役未克畢功也○二十日買草席二
十三立連幅爲齋室鋪陳○二十一日○位版造
成次招來邑內小木手鄭太三○二十二日金楚
輝往善山爲請洞主朴成遠出坐也初一日齊會
時薦出祠中諸任員朴成遠出爲齋長蔡時鑑金
楚輝出爲齋有司也○二十五日金楚輝自善山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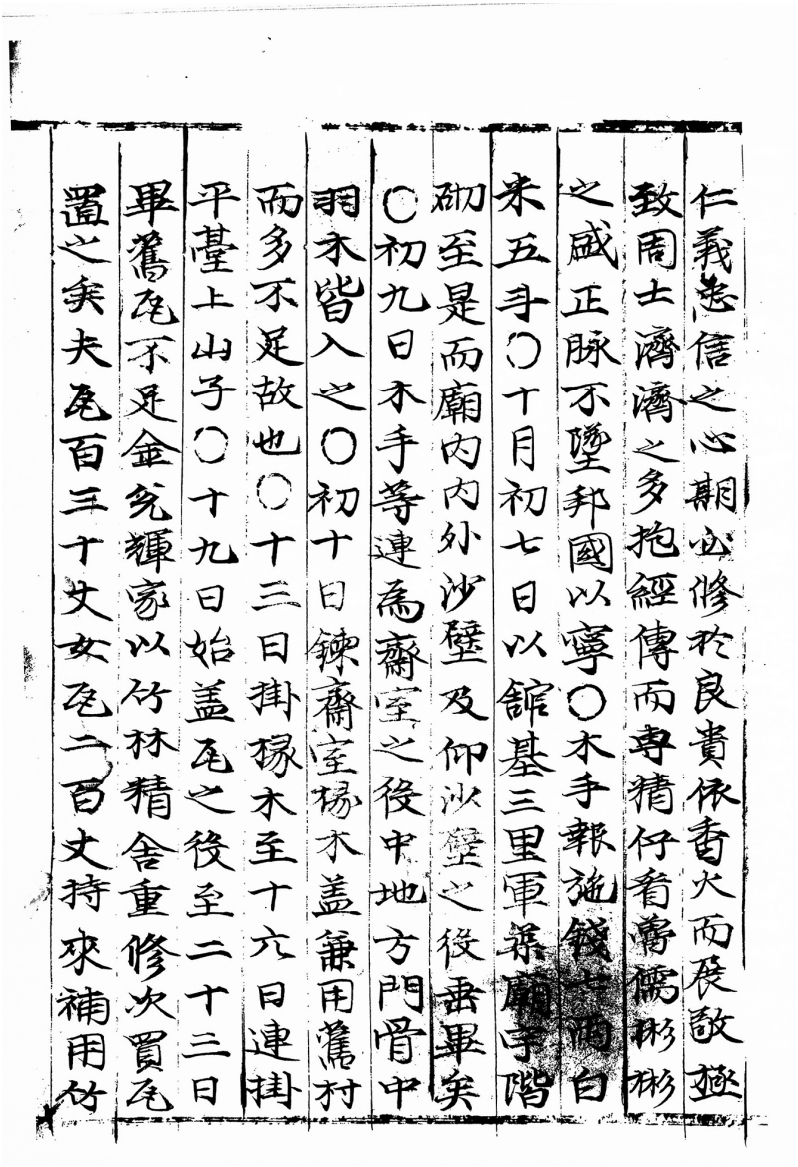


畢○二十九日聞慶李之漸來見以院村軍築齋室垣牆基址○三十日立庫直家柱以獐谷北道里軍築四面垣牆○八月初一日諸執事來會以爲相役幾畢以九月十五日中丁定 奉安日字發文通告于諸學宮及 先生內外孫各處是日垣牆之役畢庫直家上樑○初二日高雲驥宋之益來見○初五日建爲庫直家役掛楊木入中地方門骨等木○初六日以訥村軍編疋盖○初七日盖草始土役○初十日內外壁土役畢金山李瑞林送草席十立甘文昌 先生本孫金自輝亦送草席八立爲廟內鋪陳之用也○十一日送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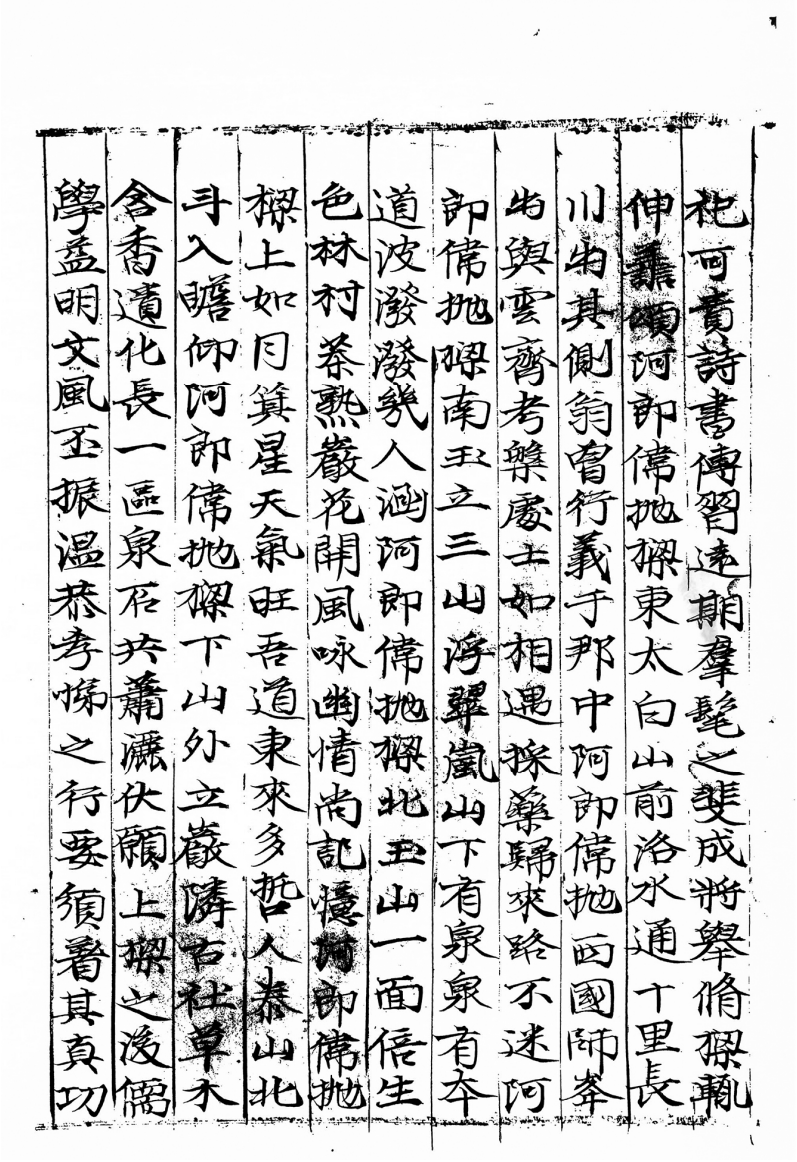
溪軍運階砌石復招瓦匠始土役至十五日內外
壁仰壁及沙壁之役畢○十六日立大門于齋
室之前○十八日蓋瓦大門間村底頗有不淨之
患以都監指教停役○三月初一日金允輝親往
內洞買常漢金甓同草家四間決價七兩○七月
十八日都監來臨作牌招諸木手金允輝時輝胤
輝蔡時鑑李守謙全浩等皆來會相議以為財力
不足地瓦乏絕庫直家以草蓋之定出庫直金位
永即前有力善負石者也○十九日開庫直家基
以龜潛鳳陽軍毀來內洞買家體木少有朽者椽
木多朽可歎○二十日築齋室階砌至二十八日



林即先生講學之堂也○二十五日朴承祖柳儀
來見以寒事漸深還政方督軍丁無以立役因停
役放送木手瓦匠等木手錢七兩給瓦匠錢六兩
正木四匹給送以明年二月爲後期○十一月甘
文成弘績來尋建祠所善山金烏書院扶助錢一
兩來
歲壬申正月廿五日金兌輝入見城主仍爲備陳立
祠之事且請外東中東軍丁城主稱其盛事以外
東軍快許雖未盡得兩面軍亦甚感幸○二月初
五日以竹山德村軍始伐木于三峯爲庫直家營
立計也木手毛男善金等皆來會○初六日以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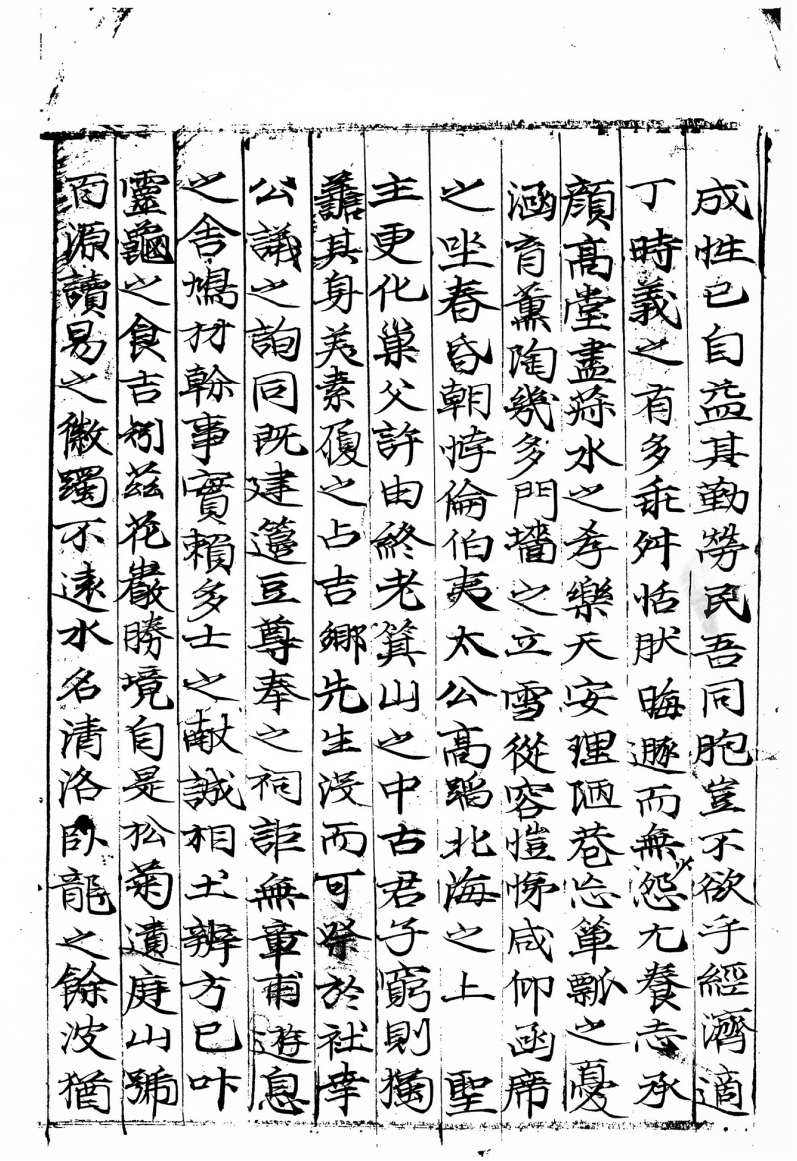
仁義忠信之心期必修於良貴依香火而展敬極
致周士濟濟之多抱經傳而專精仔看膏儒彬彬
之盛正脉不墜邦國以寧○木手報施錢七兩白
米五斗○十月初七日以館基三里軍築廟宇階
砌至是而廟內內外沙壁及仰沙壁之役垂畢矣
○初九日木手等連爲齋室之役中地方門骨中
羽木皆入之○初十日鍊齋室椽木盖兼用舊村
而多不足故也○十三日掛椽木至十六日連掛
平臺上山子○十九日始盖瓦之役至二十三日
畢舊瓦不足金兌輝家以竹林精舍重修次買瓦
置之矣夫瓦百三十丈女瓦二百丈持來補用竹



祀可責詩書傳習遠期羣髦之斐成將舉脩楔輒
伸蕭頌河郎偉拋楔東太白山前洛水通十里長
川出其側翁曾行義于邦中阿郎偉拋西國師峯
出與雲齊考槃處士如相遇採藥歸來路不迷阿
郎偉拋楔南玉立三山浮翠嵐山下有泉泉有本
道波潑潑幾人涵阿郎偉拋楔北玉山一面倍生
色林村茶熟巖花開風咏幽情尚記憶阿郎偉拋
楔上如月箕星天氣旺吾道東來多哲人泰山北
斗入瞻仰阿郎偉拋楔下山外立巖隣古社草木
含香遺化長一區泉石共蕭灑伏願上楔之後儒
學益明文風丕振溫恭孝悌之行要須著其真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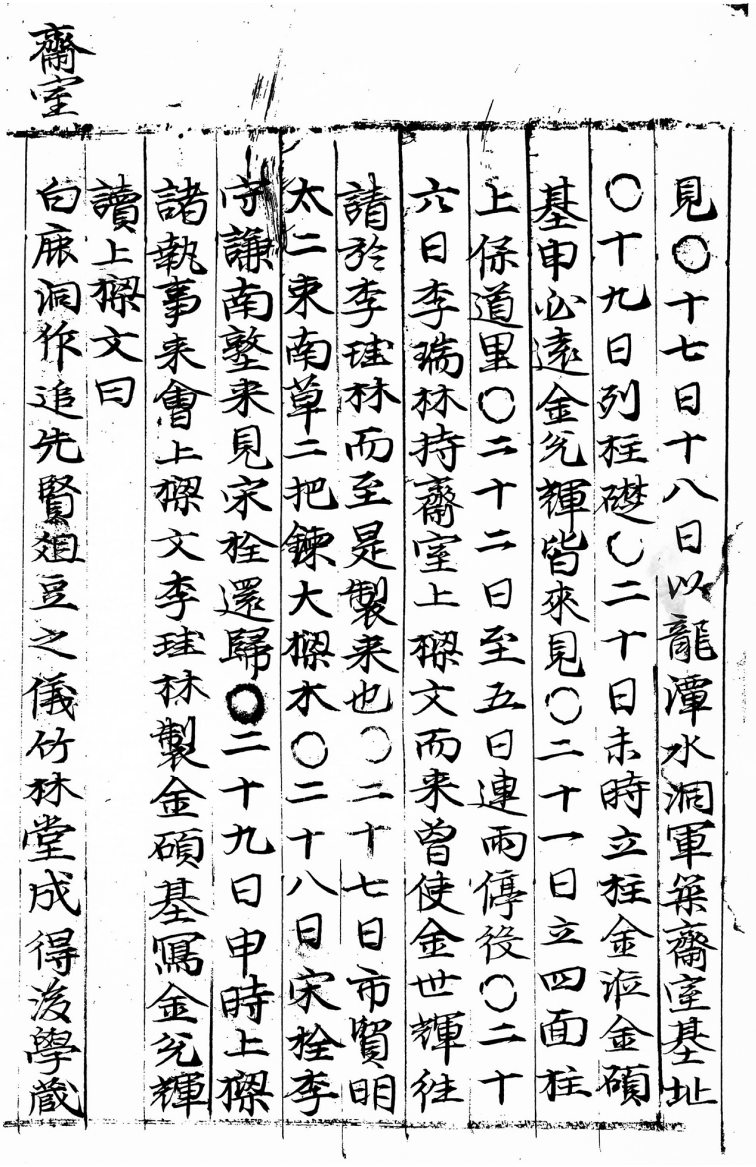
長霽月光風宛接襟期之灑落嫩柳佳花追想冠童之
詠歸爰就廟宇密通之墟聿修家塾制度之美上
棟下宇蓋取諸大壯之儀東夾西齋庶觀夫同人
之會挑之陝陝約之閣閣爭賀磬鼓之不勝于是
處處于是言言允合衿佩之攸暨明倫堂上風清
詠歌之絃入德門前春生講禮之樹神之格思無
射儼乎屋樑整脩學者依歸有所美哉室堂通敞
實為古者黨序之遺法庶寓今日羹墻之深思輪
奐得宜來新詹之鷰賀肅雝盡美聽初筵之庶鳴
遺澤尚存咸囿於蘭薰峨育之域英才可作共遊
於鳶飛魚躍之天所祝牲醴馨香永保兩丁之禋



成性已自益其勤勞民吾同胞豈不欲乎經濟適
丁時義之有多乖舛恬然晦遯而無怨尤養志承
顏高堂盡蒜水之孝樂天安理陋巷忘簞瓢之憂
涵育薰陶幾多門墻之立雪從容愷悌咸仰函席
之坐春昏朝悖倫伯夷太公高蹈北海之上 聖
主更化巢父許由終老箕山之中古君子窮則獨
善其身美素履之占吉鄉先生沒而可祭於社幸
公議之詢同既建籩豆尊奉之祠詎無章甫遊息
之舍鳩材幹事實賴多士之敝誠相土辨方已卟
靈龜之食吉初茲花巖勝境自是松菊遺庭山號
西源讀易之徽躅不遠水名清洛臥龍之餘波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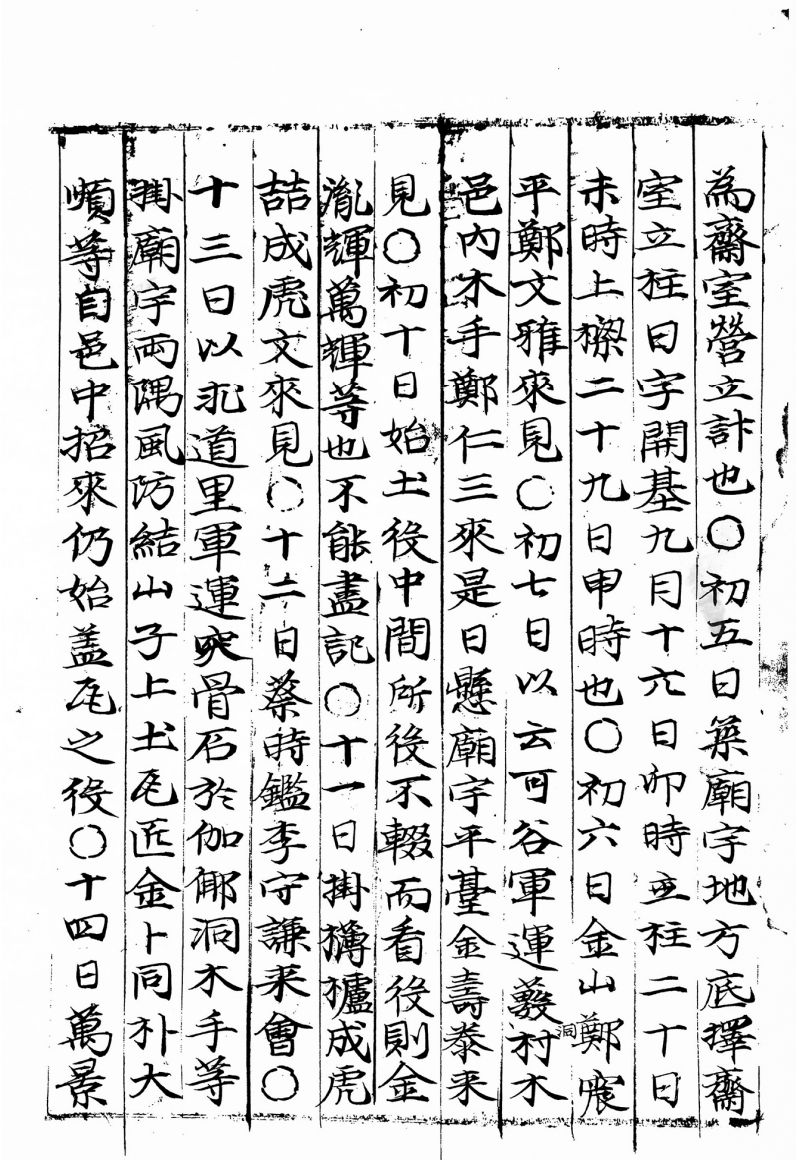
上揆文

修之所林泉增重斯文有光恭惟我　故處士洛
涯金先生詩禮故家金玉美質惟重厚其兕局而
岐嶷其儀容佩一字而為符自六歲已期大丈夫
行事在巖廬而辭肉甫九年能有老成者覘模私
淑諸人傳襲退溪之道講學為己親炙板谷之門
惟其趨向之甚明所以造詣之益邁行誼純厚元
從孝經中定得根基義理森嚴早於朱書上立其
跟脚敬義夾持之語可見其體用相資知行兼進
之詩尤驗夫足目俱到乾乾為學之道孰不欽歎
井井治家之儀世皆模範飫仁悅於芻豢果能做
一等功夫覿德醉於醇醪真可為百代師表玉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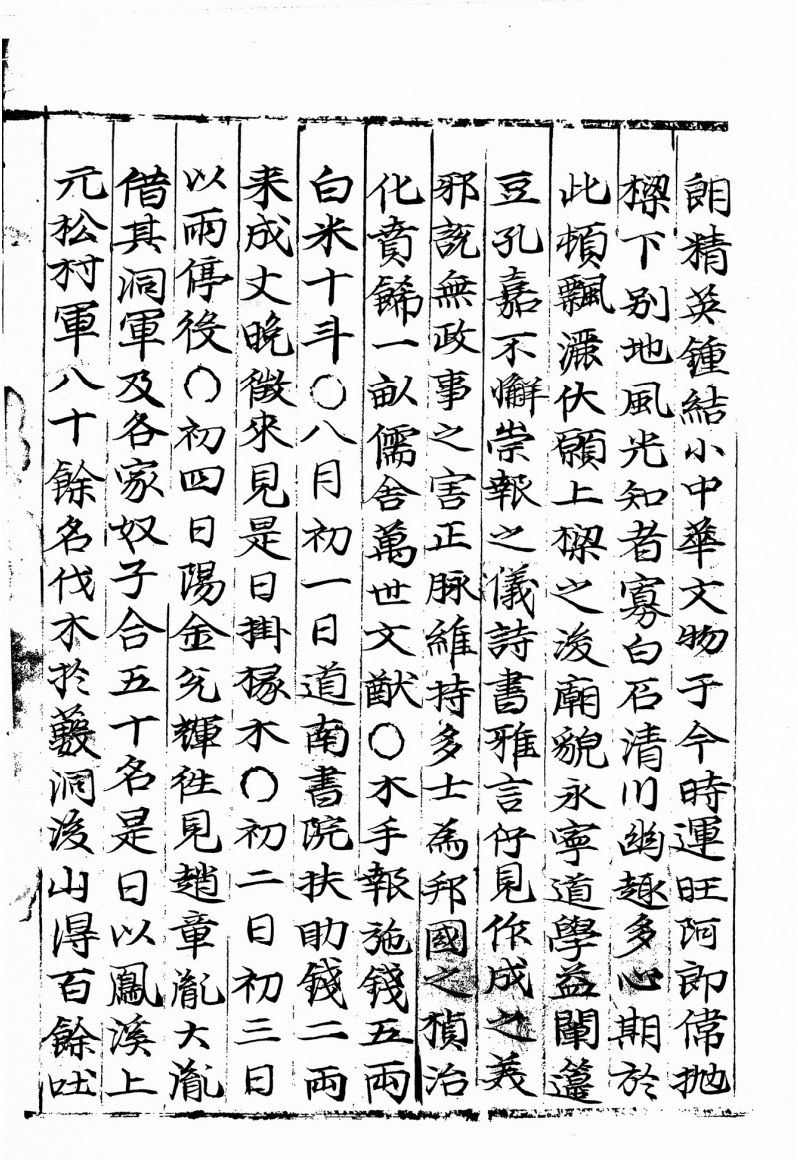


見○十七日十八日以龍潭水洞軍築齋室基址
○十九日列柱礎○二十日未時立柱金淀金碩
基申必遠金允輝皆來見○二十一日立四面柱
上梁道里○二十二日至五日連雨停役○二十
六日李瑞林持齋室上樑文而來曾使金世輝往
請於李珪林而至是製來也○二十七日市貿明
太二束南草二把鍊大樑木○二十八日宋栓李
守謙南整來見宋栓還歸○二十九日申時上樑
諸執事來會上樑文李珪林製金碩基寫金允輝
讀上樑文曰
白麻洞作追先賢俎豆之儀竹林堂成得沒學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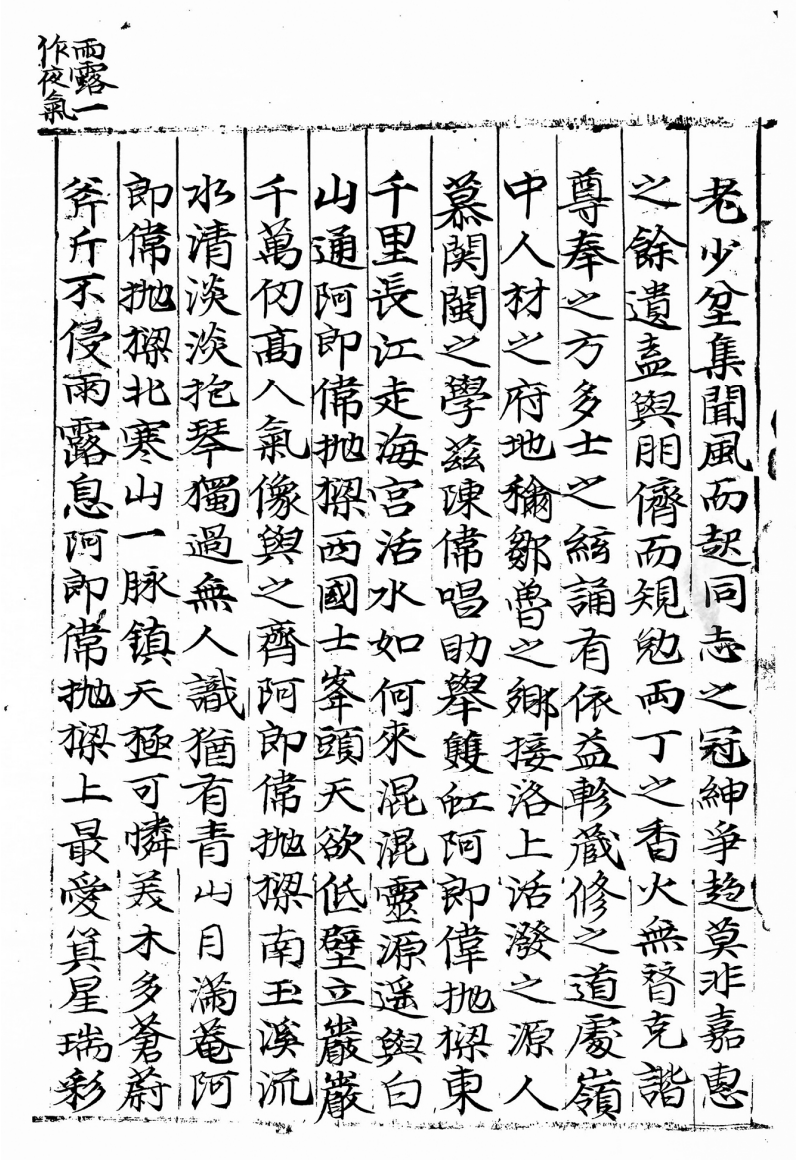
寺僧軍立役○十六日都廳申必彥病遞金涖代
出立神門三間東夾門一間龍興寺僧軍立役廟
宇蓋瓦畢○十八日蓋神門瓦築廟內垣墻○十
九日連築墻以秋務方劇役丁不一可歎○二十
日至晦日木手等連治齋室材木○九月初一日
趙啓胤王三錫三老姜碩經皆來見以洞內未收
軍始土役至初五日幾畢○初六日甘文鄉校扶
助錢一貫白紙一束來○初七日至十一日連爲
內外壁土役莎壁之役○十二日洪陽震來見始
廟宇仰壁○十三日至十五日復使金位永運齋
室柱礎石○十六日開齋舍基金敏積金碩徵來



爲齋室營立計也○初五日築廟宇地方底擇齋
室立柱日字開基九月十六日卯時立柱二十日
未時上樑二十九日申時也○初六日金山鄭寢
平鄭文雅來見○初七日以云可谷軍運藪村木
邑內木手鄭仁三來是日懸廟宇平臺金壽恭來
見○初十日始土役中間所役不輟而看役則金
胤輝萬輝等也不能盡記○十一日掛欂櫨成虎
喆成虎文來見○十二日蔡時鑑李守謙來會○
十三日以北道里軍運突骨石於伽倻洞木手等
掛廟宇兩隅風防結山子上土瓦匠金卜同朴大
頓等自邑中招來仍始蓋瓦之役○十四日萬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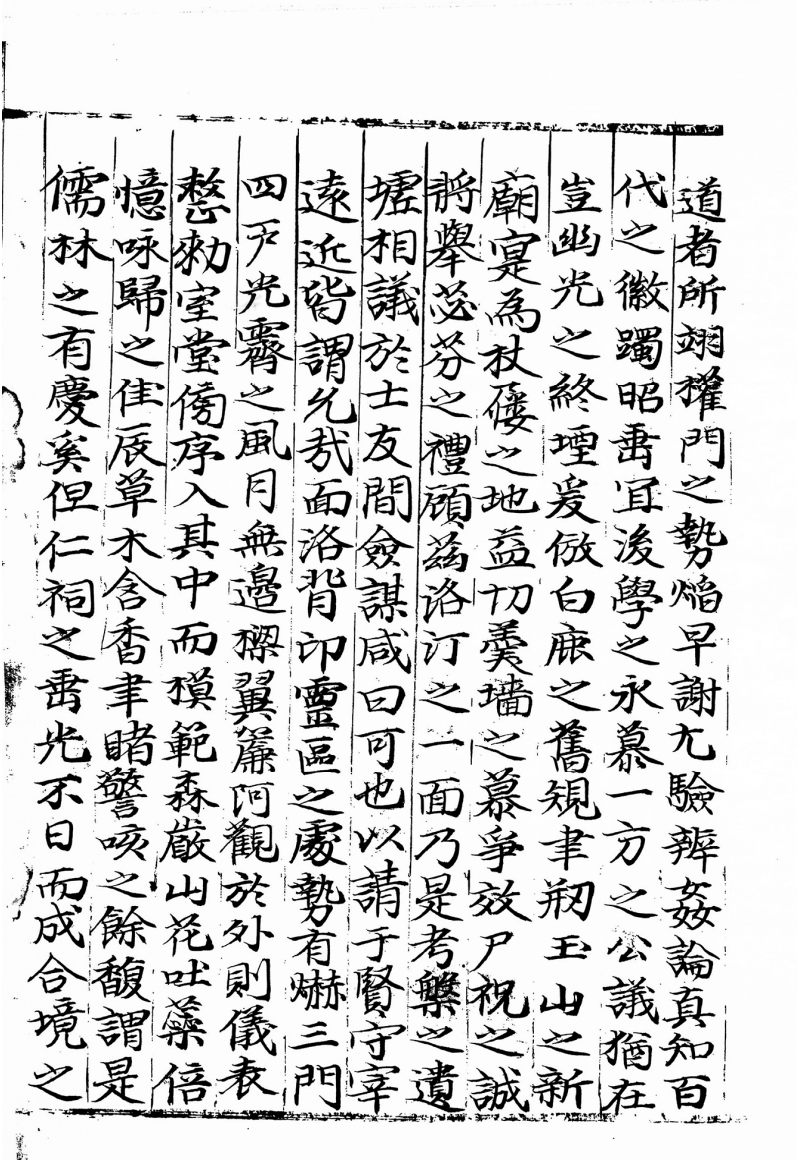


朗精英鍾結小中華文物于今時運旺阿郎偉拋
樑下別地風光知者寡白石清川幽趣多心期於
此頓飄漂伏願上樑之後廟貌永寧道學益闡籩
豆孔嘉不懈崇報之儀詩書雅言仔見作成之義
邪說無政事之害正脉維持多士為邦國之楨治
化賁飾一畝儒舍萬世文猷○木手報施錢五兩
白米十斗○八月初一日道南書院扶助錢二兩
来成丈晚徵來見是日掛椽木○初二日初三日
以兩停役○初四日陽金兌輝往見趙章胤大胤
借其洞軍及各家奴子合五十名是日以鳳溪上
元松村軍八十餘名伐木於藪洞後山得百餘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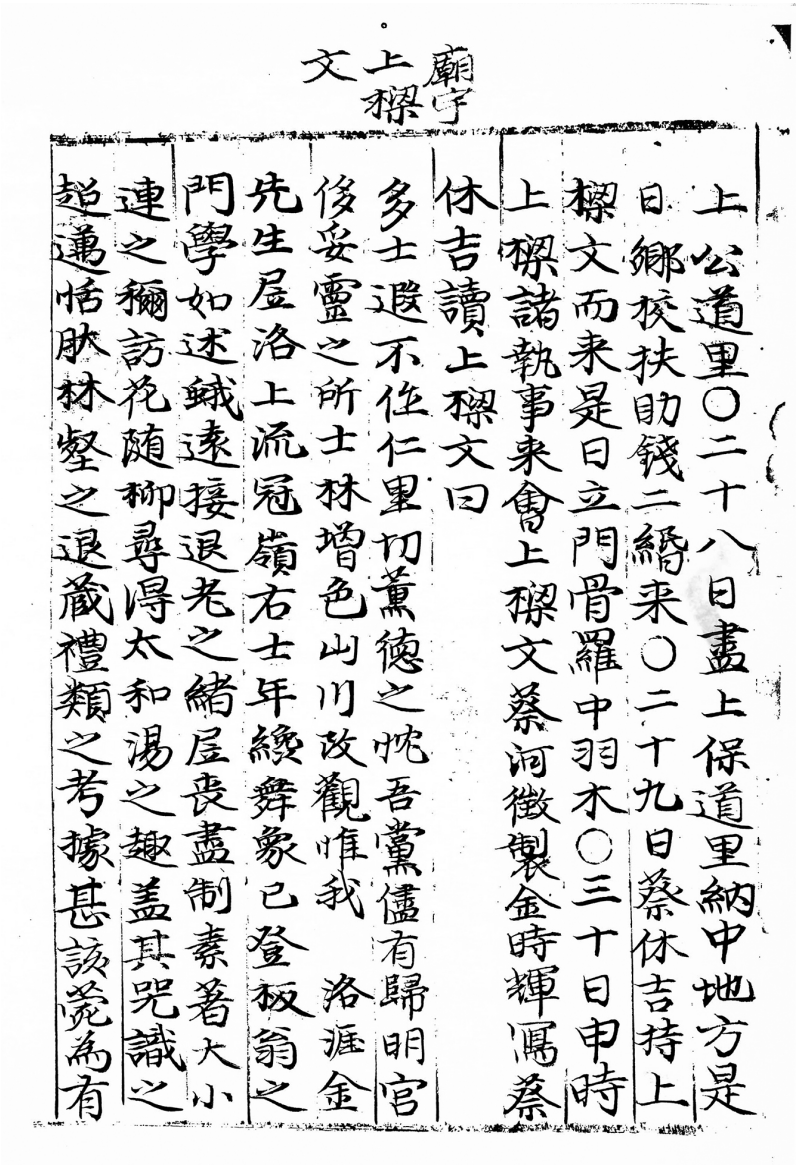


西露一作夜氣

老少坌集聞風而起同志之冠紳爭趍莫非嘉惠之餘遺盍與朋儕而規勉兩丁之香火無替克諧尊奉之方多士之絃誦有依益軫藏修之道處嶺中人材之府地稱鄒魯之鄉接洛上活潑之源入慕閩閩之學茲陳佛唱助舉雙缸阿即偉拋揭東千里長江走海宮活水如何來混混靈源遥與白山通阿即佛拋揭西國士峯頭天欲低壁立巖巖千萬仞高人氣像與之齊阿即佛拋揭南玉溪流水清淡淡抱琴獨過無人識猶有青山月滿菴阿即佛拋揭北寒山一脉鎮天極可憐羨木多參蔚斧斤不侵雨露息阿即佛拋揭上最愛貧星瑞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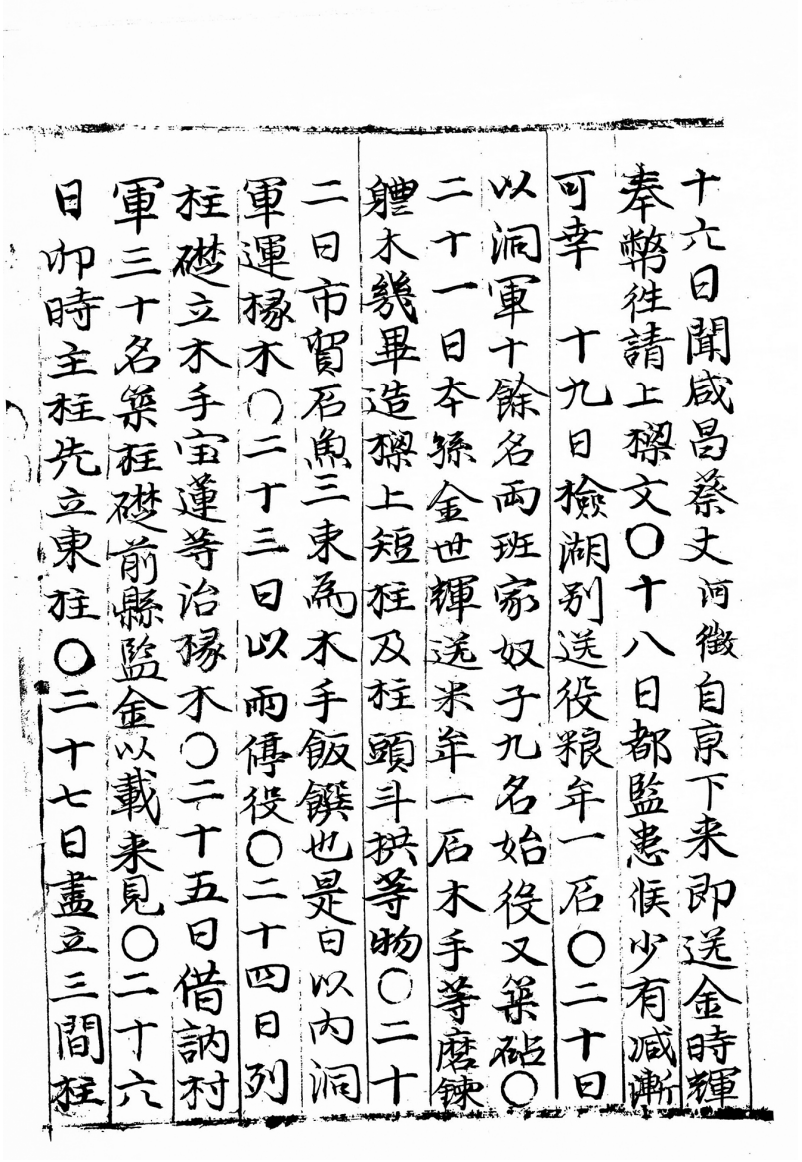
道者所翊權門之勢焰早謝尤驗辨姦論真知百
代之徽躅昭垂宜後學之永慕一方之公議猶在
豈幽光之終堙爰倣白鹿之舊規聿剏玉山之新
廟寔為杖屨之地益切羹墻之慕爭效尸祝之誠
將舉苾芬之禮顧茲洛汀之一面乃是考槃之遺
墟相議於士友間僉謀咸曰可也以請于賢守宰
遠近皆謂允哉面洛背卬靈區之處勢有嚇三門
四戶光霽之風月無邊樑翼簾阿觀於外則儀表
整勑室堂傍序入其中而模範森嚴山花吐蘂倍
憶咏歸之佳辰草木含香聿睹警咳之餘馥謂是
儒林之有慶奚但仁祠之垂光不日而成合境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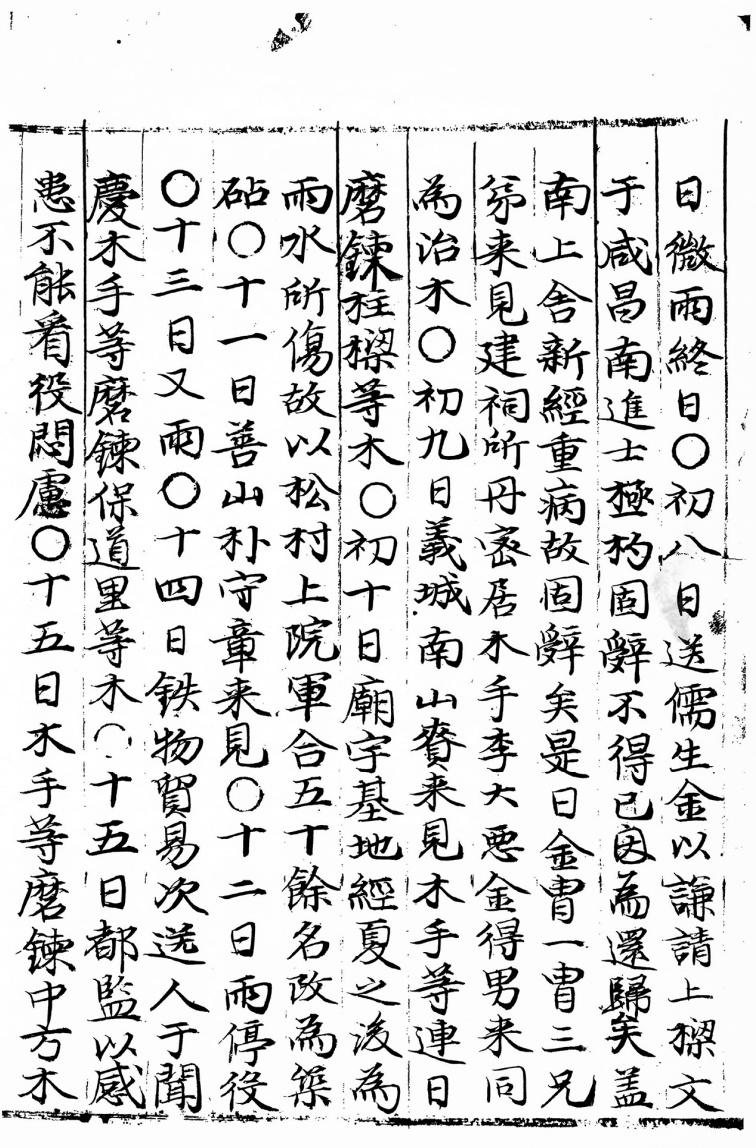
廟宇上樑文

上公道里○二十八日盡上保道里納中地方是日鄉校扶助錢二緡来○二十九日蔡休吉持上樑文而来是日立門骨羅中羽木○三十日申時上樑諸執事来會上樑文蔡河徵製金時輝寫蔡休吉讀上樑文曰

多士遐不作仁里切薰德之忱吾黨儘有歸明宮侈妥靈之所士林增色山川改觀惟我 洛涯金先生屋洛上流冠嶺右士年纔舞象已登板翁之門學如述蛾遠接退老之緒屋喪盡制素著大小連之禰訪花隨柳尋得太和湯之趣盖其咒識之超邁恬肰林壑之退藏禮類之考據甚該菀為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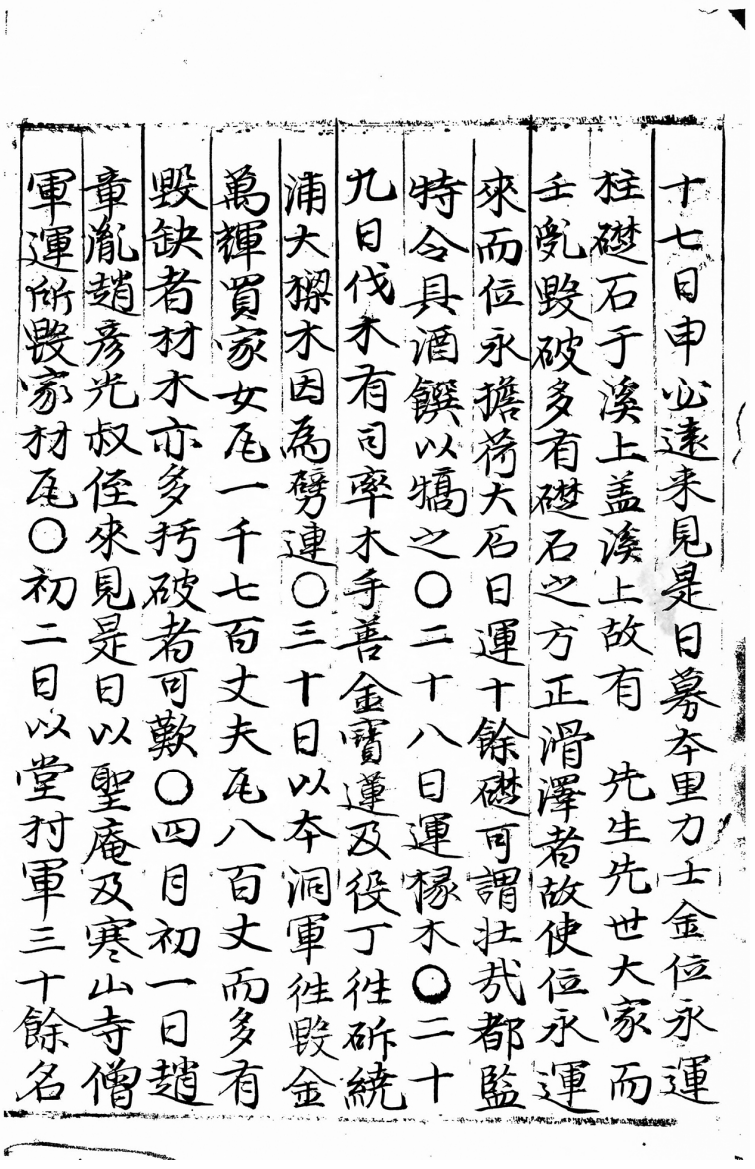


十六日聞咸昌蔡丈河徵自京下来即送金時輝
奉幣往請上樑文○十八日都監患候少有減漸
可幸　十九日撿湖別送役粮牟一石○二十日
以洞軍十餘名両班家奴子九名始役又築砧○
二十一日本孫金世輝送米牟一石木手等磨鍊
軆木幾畢造樑上短柱及柱頭斗拱等物○二十
二日市買石魚三束為木手飯饌也是日以內洞
軍運椽木○二十三日以両傳役○二十四日列
柱礎立木手宝蓮等治椽木○二十五日借納村
軍三十名築柱礎前縣監金以載来見○二十六
日卯時主柱先立東柱○二十七日盡立三間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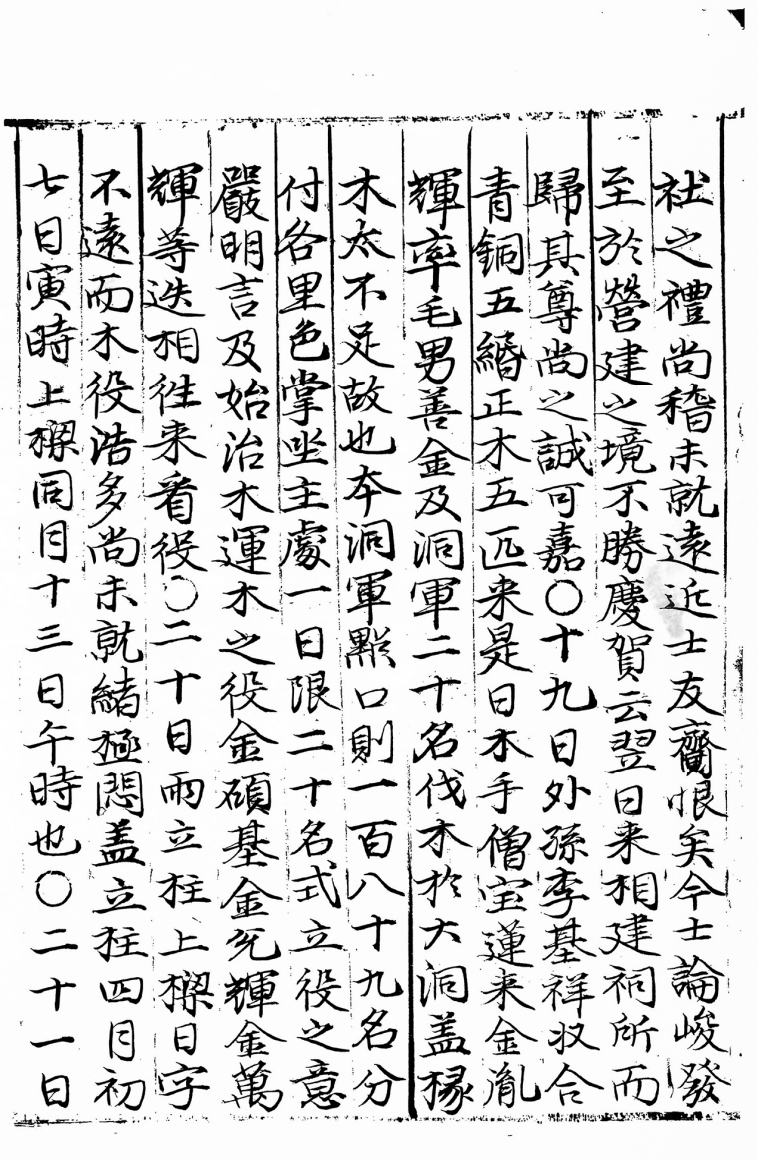
日微雨終日○初八日送儒生金以謙請上樑文于咸昌南進士極杓固辭不得已因為還歸矣蓋南上舍新經重病故固辭矣是日金胄一胄三兄弟来見建祠所丹雘居木手李大悳金得男来同為治木○初九日義城南山賚来見木手等連日磨鍊枉樑等木○初十日廟宇基地經夏之後為雨水所傷故以松村上院軍合五十餘名改為築砧○十一日善山朴守章来見○十二日雨停役○十三日又雨○十四日鉄物貿易次送人于聞慶木手等磨鍊保道里等木○十五日都監以感患不能着役悶慮○十五日木手等磨鍊中方木

運大槨木是日全世長兄弟来見○初三日以雨
停役聞毛男之病危重不得已退立柱日宇改擇
則立柱七月二十六日卯時上槨同月三十日申
時也○初四日募軍十五名往斃宋栓家女屯六
百丈夫屯三百丈而亦多破傷可歎○初五日以
水晶庵及三峯庵僧軍運材屯全世長紀長還歸
○初六日材屯既聚而既退立柱之日且農務方
劇仍爲輟役○七月初三日毛男始来斫精材
木○初四日全世長兄弟別送役粮米弁一石○
初五日趙命胤来見木手善金宝蓮等皆會連日
治柱木○初六日朝雨夕陽金敏積来見○初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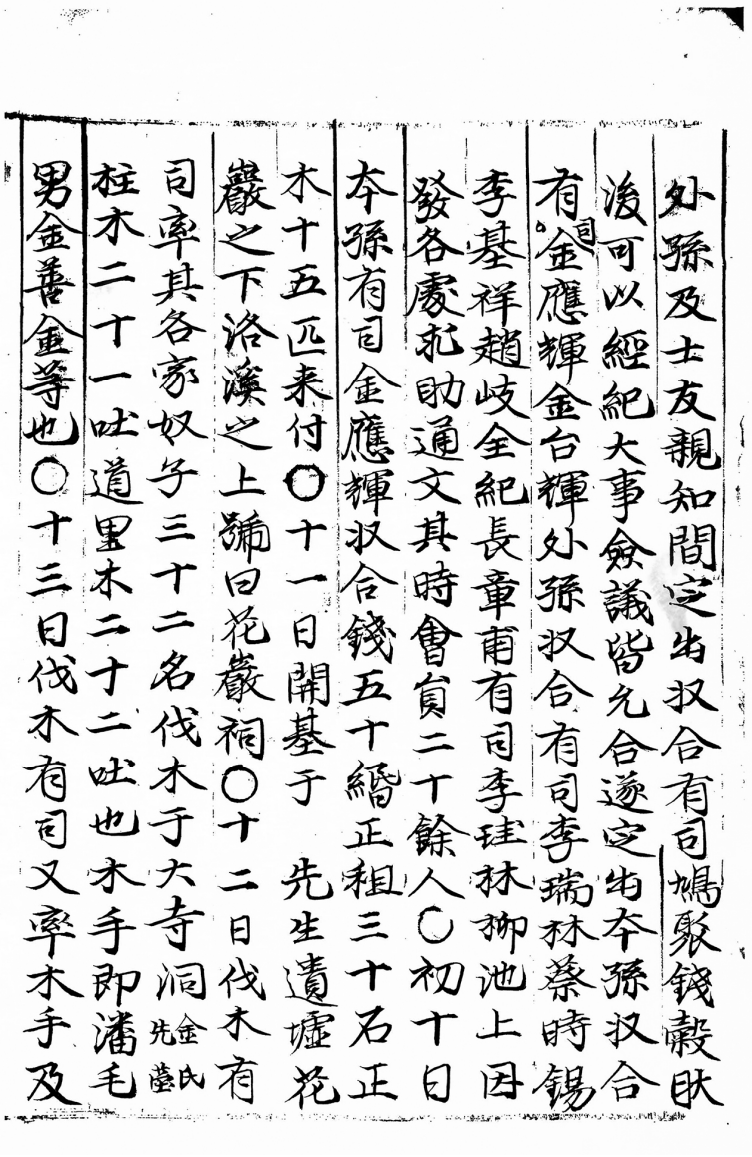
十七日申必遠来見是日募本里力士金位永運
柱礎石于溪上盖溪上故有　先生先世大家而
壬亂毀破多有礎石之方正滑澤者故使位永運
來而位永擔荷大石日運十餘礎可謂壯哉都監
特令具酒饌以犒之○二十八日運椽木○二十
九日伐木有司率木手善金霄運及役丁往斫統
浦大槲木因為勞連○三十日以本洞軍往毀金
萬輝買家女屋一千七百丈夫屋八百丈而多有
毀缺者材木亦多朽破者可歎○四月初一日趙
童潤趙彦光叔侄來見是日以聖庵及寒山寺僧
軍運斫毀家材屋○初二日以堂材軍三十餘名

都監及諸執事齊會建祠所相議燔瓦一節皆以
爲役丁極難議定買瓦而金萬輝願買瓦家七間
故定価正租二十石木十匹○二十二日又買士
人宋栓瓦家三間定價正租十石是日外孫李瑞
林趙岐送収合青銅合十六緡正木六匹白紙五
束○二十三日募軍三十名終日築砧本洞軍則
連爲運木○二十四日運植松亭木以軍少未果
使諸木手及又發本洞善斧軍五名因爲擘連○
二十五日治木不輟○二十六日金胄一来見都
扁手毛男忽寒戰大痛載送渠家立柱日迫近而
都扁手之病出於意外不能磨妍材木可歎○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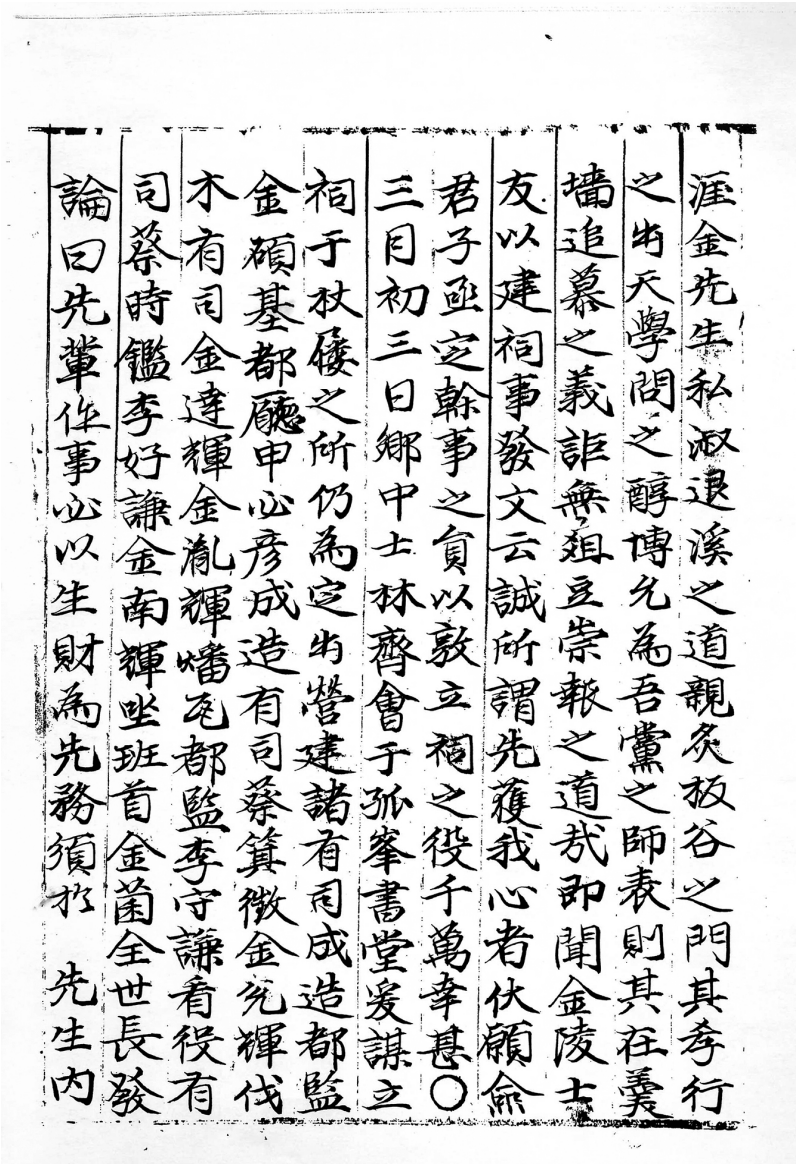


社之禮尚稽未就遠近士友齎恨矣今士論峻發
至於營建之境不勝慶賀云翌日來相建祠所而
歸其尊尚之誠可嘉○十九日外孫李基祥收合
青銅五緡正木五匹來是日木手僧宝蓮來金胤
輝率毛男善金及洞軍二十名伐木於大洞盖椽
木太不足故也本洞軍黔口則一百八十九名分
付各里色掌坐主處一日限二十名式立役之意
嚴明言及始治木運木之役金碩基金允輝金萬
輝等迭相往來看役○二十日雨立柱上樑日字
不遠而木役浩多尚未就緒極悶盖立柱四月初
七日寅時上樑同月十三日午時也○二十一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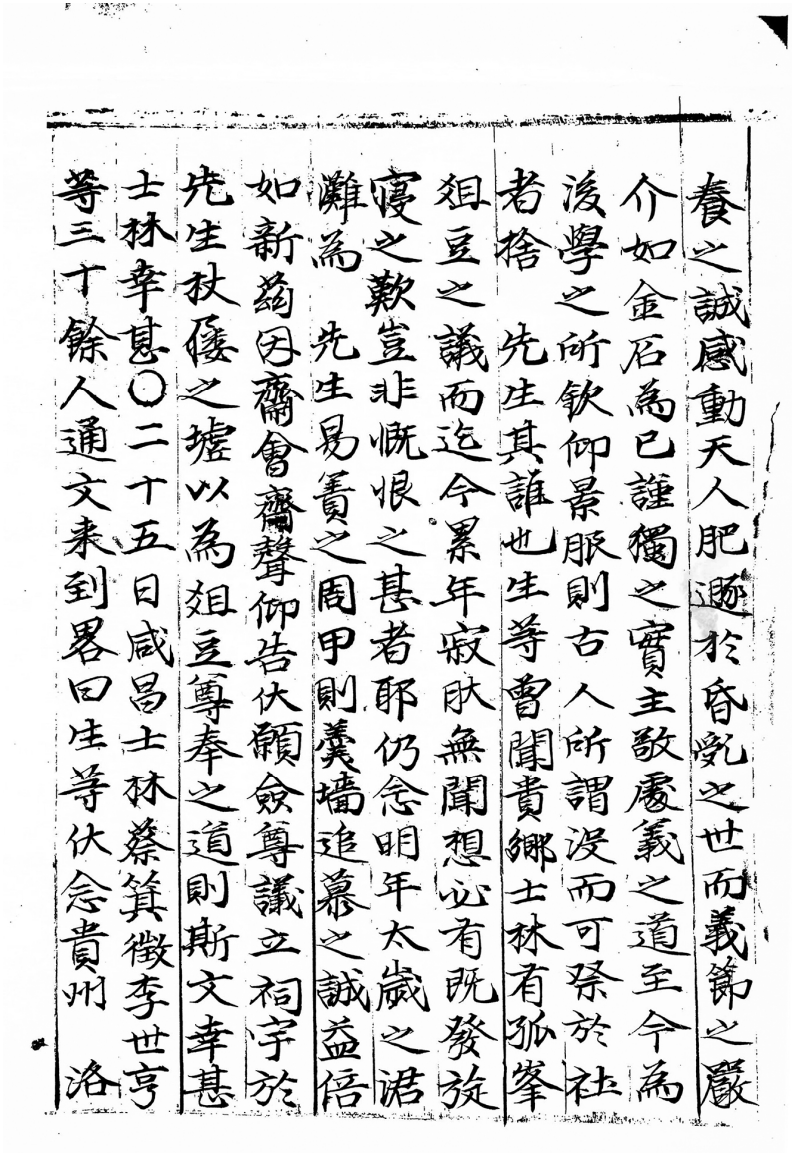
役丁当掾木于新寺洞得六十餘巨里〇十四日
以雨停役〇十五日木手毛男病卧故只率善金
役丁五名承中地方等木于新寺洞合三十餘吐
是日外孫奴合有司蔡時錫送青銅七緡正租三
石全紀長送青銅五緡正租四石正木二匹〇十
六日朝雨夕陽材木中難得者大梁故伐木有司
金胤輝親往統浦得大梁二吐而来〇十七日孤
峯書堂扶助正租十石来可幸是日蔡時鑑李守
謙来與金逢輝率毛男等本里兩班家奴子七名
伐植松木三株盖為大保及作板所用也〇十八
日咸昌蔡獻徵来宿金允輝家申申言 先生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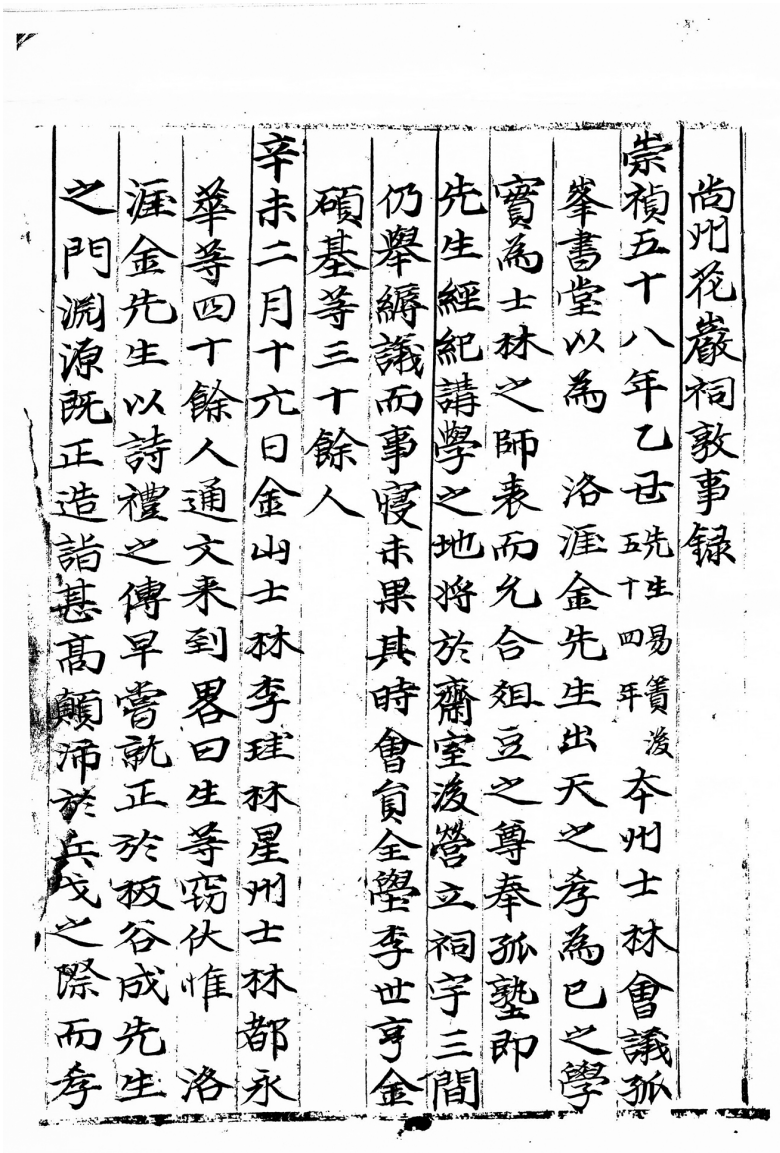
外孫及士友親知間定出扶合有司鳩聚錢穀以
後可以經紀大事僉議皆允合遂定出本孫扶合
有司金應輝金台輝外孫扶合有司李瑞林蔡時錫
李基祥趙岐全紀長童甫有司李珪林柳池上因
發各處赴助通文其時會員二十餘人○初十日
本孫有司金應輝扶合錢五十緡正租三十石正
木十五匹来付○十一日開基于 先生遺墟花
巖之下洛溪之上鋪曰花巖祠○十二日伐木有
司率其各家奴子三十二名伐木于大寺洞金氏先塋
柱木二十一吐道里木二十二吐也木手即潘毛
男金善金等也○十三日伐木有司又率木手及



涯金先生私淑退溪之道親炙枚谷之門其孝行之出天學問之醇博允為吾黨之師表則其在羹墻追慕之義詎無俎豆崇報之道哉即聞金陵士友以建祠事發文云誠所謂先獲我心者伏願僉君子亟定斡事之員以敦立祠之役千萬幸甚○三月初三日鄉中士林齊會于孤峯書堂爰謀立祠于杖優之所仍為定出營建諸有司成造都監金頲基都廳申心彦成造有司蔡箕徵金允輝伐木有司金達輝金亂輝嚫色都監李守謙看役有司蔡時鑑李好謙金南輝坐班首金菌全世長發論曰先輩作事必以生財為先務須於　先生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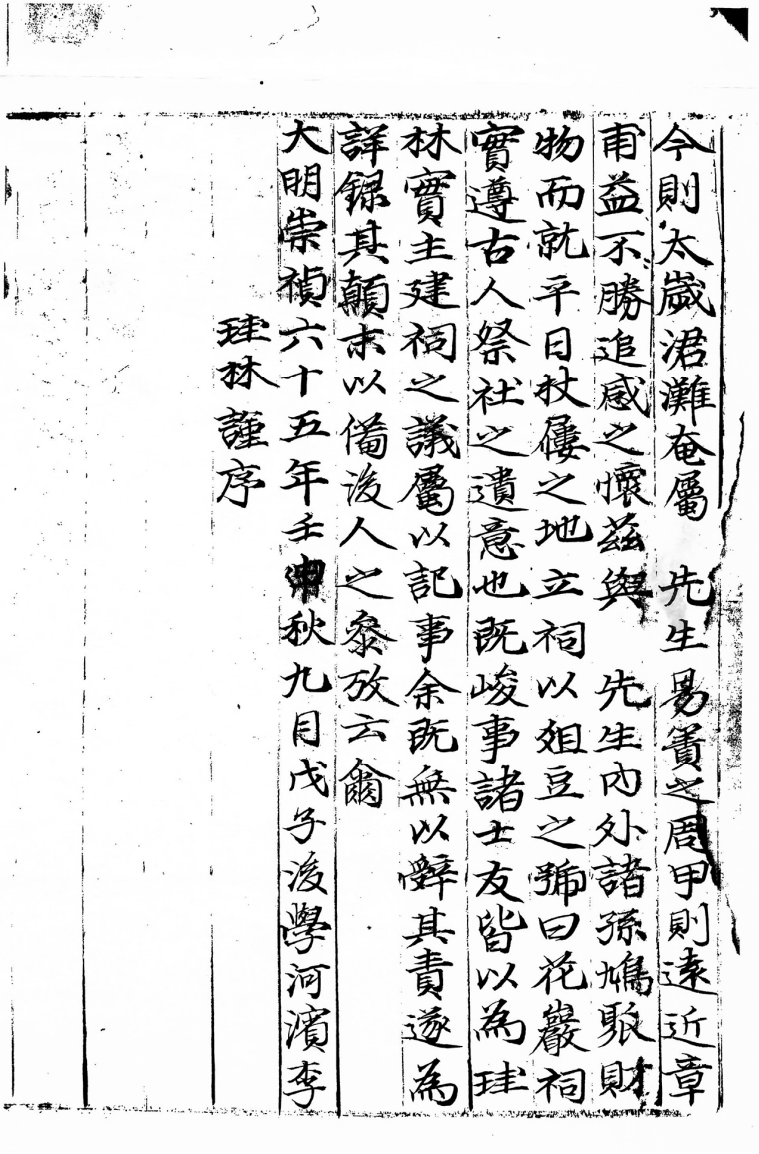
養之誠感動天人肥遯於昏亂之世而義節之嚴
介如金石爲已謹獨之實主敬處義之道至今爲
後學之所欽仰景服則古人所謂沒而可祭於社
者捨 先生其誰也生等曾聞貴鄉士林有孤峯
俎豆之議而迄今累年寂然無聞想必有旣發旋
寢之歎豈非慨恨之甚者耶仍念明年太歲之諱
灘爲 先生易簀之周甲則羹墻追慕之誠益倍
如新爲因齋會齋聲仰告伏願僉尊議立祠宇於
先生杖屨之墟以爲俎豆尊奉之道則斯文幸甚
士林幸甚○二十五日咸昌士林蔡箕徵李世亨
等三十餘人通文來到畧曰生等伏念貴州 洛



尚州花巖祠敦事錄

崇禎五十八年乙丑先生易簀後五十四年本州士林會議孤峯書堂以為 洛涯金先生出天之秀為已之學實為士林之師表而允合俎豆之尊奉孤塾即先生經紀講學之地將於齋室後營立祠宇三間仍舉緇議而事寢未果其時會員全學李世亨金碩基等三十餘人

辛未二月十六日金山士林李珪林星州士林都永舉等四十餘人通文來到畧曰生等窃伏惟 洛涯金先生以詩禮之傳早嘗就正於板谷成先生之門淵源既正造詣甚高顚沛於兵戈之際而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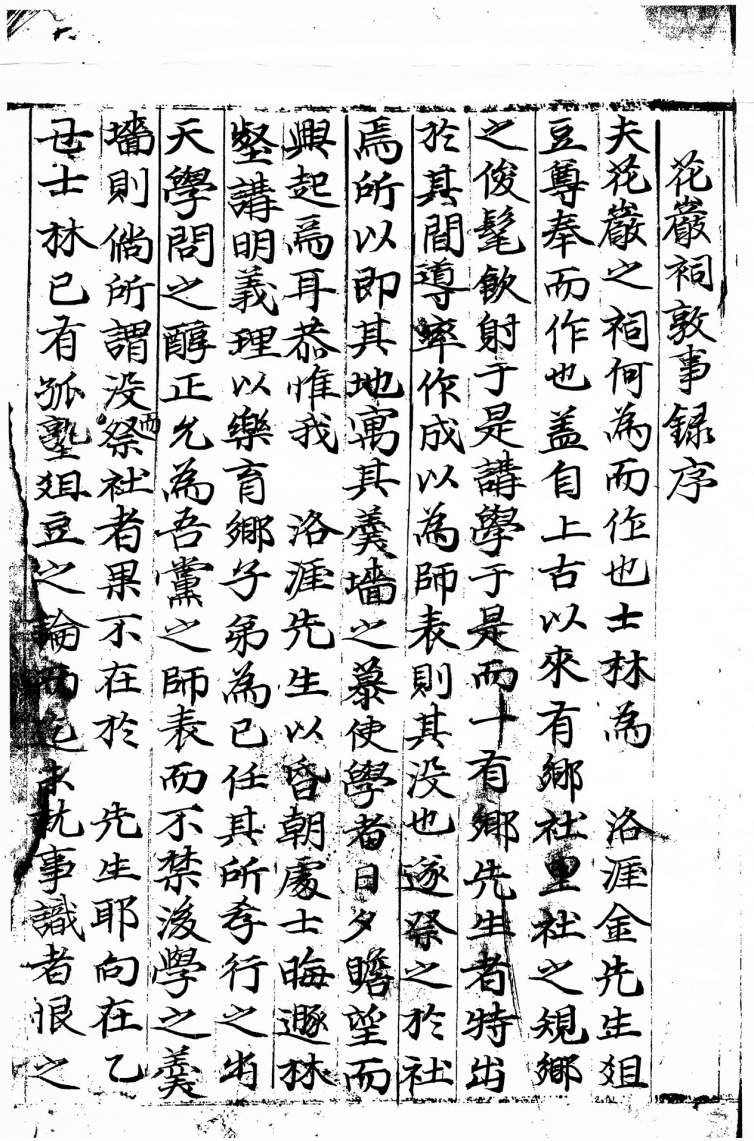


今則太歲涒灘奄屬 先生易簀之周甲則遠近章甫益不勝追感之懷茲與 先生內外諸孫鳩聚財物而就平日杖屨之地立祠以俎豆之薄曰花巖祠實遵古人祭社之遺意也既峻事諸士友皆以為珪林實主建祠之議屬以記事余既無以辭其責遂為詳錄其顛末以備後人之參攷云爾

大明崇禎六十五年壬申秋九月戊子後學河濱李珪林謹序

今則太歲涒灘奄屬 先生易簀之周甲則遠近章甫益不勝追感之懷茲與 先生內外諸孫鳩貲物而就平日杖屨之地立祠以俎豆之焉曰花巖祠實遵古人祭社之遺意也既峻事諸士友皆以為珪林實主建祠之議屬以記事余既無以辭其責遂為詳錄其顛末以備後人之參攷云爾

大明崇禎六十五年壬申秋九月戊子後學河濱李珪林謹序



花巖祠敦事錄序

夫花巖之祠何爲而作也士林爲 洛涯金先生俎豆尊奉而作也盖自上古以來有鄉社里社之規鄉之俊髦飲射于是講學于是而一有鄉先生者特出於其間導率作成以爲師表則其没也遂祭之於社焉所以即其地寓其羹墻之慕使學者日夕瞻望而興起焉耳恭惟我 洛涯先生以昏朝處士晦遯林壑講明義理以樂育鄉子弟爲己任其所孝行之出天學問之醇正允爲吾黨之師表而不禁後學之羹墻則倘所謂没而祭社者果不在於 先生耶向在乙丑士林已有孤塾俎豆之論而乞求執事識者恨之

花嚴祠敦事錄

■ 휘보

1. 주요 연혁

2018. 4. 27 : 제16회 연구발표회(중국 청도대학교)
2018. 10. 13 : 제17회 연구발표회(중국 니산 성원서원)
2018. 12. 15 : 제18회 연구발표회(한중연) 및 《총회》개최
2019. 03. 25 : 국사편찬위원회 한국사 학술회의 지원 대상 선정
2019. 04. 27 : 제19회 연구발표회(한중연)
2019. 10. 13 : 제8회 한·중서원학회 국제학술대회(중국 멱라 굴자서원)
2019. 11. 15 : 국내 공동학술대회(영남대학교)
2020. 02. 14 : 《총회》 잠정 중단(코로나-19), 이수환 회장 연임
2020. 05. 29 : 국내 공동학술대회(영남대학교)

2. 활동

■ 제16회 연구발표회(2018. 4. 27, 중국 청도대학교)
발표 ① 18세기 말 19세기 초 英陽縣 雲谷影堂의 置廢 (채광수, 경일대)
발표 ② 조선전기 교육정책과 16세기 안동지역 서당 건립 활동 (이병훈, 영남대)
발표 ③ 상주 옥동서원의 사액과정 (김순한, 영남대)

■ 제17회 연구발표회(2018. 10. 13, 중국 니산 성원서원)
발표 ① 16세기 안동지역 서당 설립상황과 서원화 과정(정순우, 한중연)
발표 ② 선산 금오서원 건립과 제향인물 선정 논의(이병훈, 영남대)
발표 ③ 도산서원 교육내용의 공부론(김자운, 공주대)
발표 ④ 18세기 말19세기 초 영양현 운곡영당의 치폐(채광수, 영남대)
발표 ⑤ 청액일기를 통해서 본 상주 옥동서원의 사액과정(김순한, 영남대)

■ 제18회 연구발표회(2018. 12. 15,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발표 ① 화양구곡도와 우암학파의 도통의식(정은주, 한중연)

발표 ② 18세기 도동서원의 도서간행과 장서관리(김정운, 경북대)

■ 제19회 연구발표회(2019. 4. 27, 한국학중앙연구원)
발표 ① 공간을 통해 본 서애학의 계승양상 (김학수, 한중연)
발표 ② 향(鄕)에 대한 퇴계의 이해와 실천(한재훈, 연세대)
- 연구윤리 교육 (정수환, 한중연)

■ 제8회 한중서원학회 국제학술대회(2019. 10. 13 중국 멱라시 굴자서원)
기조발표 ① 한국의 서원 유네스코 세계유산 목록 등재 과정과 탁월한 보편적 가치(이상해, 성균관대)
기조발표 ② 한국 서원의 인문성과 현대적 발전(김학수, 한중연)
발표 ③ 17세기 초반 盧守愼의 道南書院 祭享論: 朱子學과 陽明學의 拮抗(김학수, 섹션발표)
발표 ④ 17~18세기 문경 근암서원의 변천으로 본 조선후기 서원 전승의 일사례(이병훈, 영남대)
발표 ⑤ 태주학파 왕간의 강학 활동 연구(이우진, 공주대)
발표 ⑥ 退溪의 '鄕'에 대한 化民易俗: 鄕約과 書院을 中心으로(한재훈, 연세대)
발표 ⑦ 조선 소수서원 운영의 공공성과 집단성(정수환, 한중연)
발표 ⑧ 1禮安 汾江書院의 창건과 請額 활동(채광수, 영남대)
발표 ⑨ 8세기후기 尙州 玉洞书院 請額活動과 賜額의 意味(김순한, 영남대)
발표 ⑩ 서원의 인문성: 강회를 통한 학풍의 형성과 전개(이종록, 한중연)
발표 ⑪ 書院의 社會史: 庶類系 儒賢의 登場과 社會的 外裝(권지은, 한중연)

■ 국내 공동학술대회(2019. 11. 15 영남대학교 천마아트센터)
발표 ① 18~19세기 유교적 상장례의 정치 · 경제적 함의 (김성우, 대구한의대)
발표 ② 노상추 일가의 의례 활동과 친족 관계(김정운, 경북대)
발표 ③ 조선후기 선산지역 원사건립과 금오서원의 위상 변화(이병훈, 영남대)

발표 ④ 노상추의 중앙 관료 생활 -'오위장과 금군장을 중심으로'(정해은, 영남대)
발표 ⑤ 노상추의 매매정보 수집과 토지매매(정수환, 한중연)

■ 국내 공동학술대회(2020. 5. 29 영남대학교 중앙도서관 12층, 18층)
발표 ① 書院의 前史: 고중세 한국 私學의 전통이 서원 설립에 이르기까지(이광우, 영남대)
발표 ② 16세기 한국 서원의 출현과 정비(이병훈, 영남대)
발표 ③ 唐代 書院의 형성에 대한 재검토(류준형, 영남대)
발표 ④ 일본과 베트남의 서원 연구 현황과 제언(이우진, 공주교육대)
발표 ⑤ 白鹿洞书院的建立及其对中国书院的影响(등홍파, 중국 호남대)
발표 ⑥ 한국 서원 의례의 유형과 특징(한재훈, 연세대)
발표 ⑦ 岳麓书院清代学礼考述(란갑운, 중국 호남대)
발표 ⑧ 한국 서원 향사례의 지역적 특징 연구(임근실, 단국대)
발표 ⑨ 서원의 일상 의례와 복원(김자운, 공주대)
발표 ⑩ 서원 특수 의례 종류와 실제(채광수, 영남대)

한국 서원학회 회칙

2011년 11월 01일 제정
2017년 01월 20일 개정
2018년 12월 15일 개정

제 1장 총칙

제 1조(명칭) 본 학회는 한국서원학회(韓國書院學會)라 칭한다.(이하 “학회”라고 약칭한다)

제 2조(소재) 학회의 사무실은 서울에 둔다. 필요한 경우 지역 사무실을 둘 수 있다.

제 3조(목적) 학회는 한국 서원의 제분야에 걸친 학문적 연구와 자료 발굴·정보교환·토론 등의 학술활동을 벌이며, 연구 성과의 사회 환원 차원에서 대중화에 유념함으로써 한국사의 체계화에 기여하고 민족문화 발전에 이바지함을 목적으로 한다.

제 4조(사업) 학회는 아래와 같은 사업을 통하여 학술 활동을 한다.

1. 연구논문 발표회
2. 특별 학술회의 및 세미나
3. 문화 유적 학술 답사
4. 서원지 및 서원자료집 발간
5. 학회지 발간
6. 기타 학문 연구와 회원 친목에 필요한 사업

제 5조(회원) 학회의 회원은 서원을 연구하는 사람으로서 학회의 취지에 찬성하여 입회원서를 제출하고 소정의 회비를 납부한 사람으로 한다. 홈페이지를 통한 회원 가입시에도 회비를 납부해야 정회원으로 인정

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 6조(회원의 권리) 회원은 학회가 개최하는 학술회의나 세미나에서 연구물을 발표할 수 있으며, 또 학회가 발간하는 학회지를 배부 받고 여기에 소정의 절차를 밟아 연구 논문을 게재할 수 있다.

제 7조(회원의 의무) 회원은 학회의 제 규정을 준수하고 소정의 회비를 회기 안에 납부해야 한다.

제 8조(명예회원) 회장은 국내외 인사 중에서 학회의 목적에 부합하는 활동을 하고 학회의 사업이나 재정에 기여한 인사를 명예회원으로 위촉할 수 있다.

제 9조(기록과 문서 보존) 각급 임원은 학회의 모든 활동상황을 소정양식에 의해 기록하고 대내외 업무와 관련하여 생산한 문서는 규정에 따라 보존한다.

제 10조(시행세칙) 학회의 운영은 본 회칙을 기본으로 하고 기타 사업과 활동에 필요한 경우 시행 세칙을 따로 마련할 수 있다.

제2장 조직과 업무

제 11조(기구) 본 학회에는 아래와 같은 기구를 둔다.

1. 총회 2. 삭제 <2017.01.20.> 3. 이사회 4. 편집위원회

제 12조(임원과 직무) 본 학회에는 아래와 같은 임원을 둔다.

1. 회장(1인):학회를 대표하고, 총회의 의장이 되며 각급 회의를 소집하고 주재한다. <개정 2017.01.20.>
2. 부회장(1인):회장을 보좌하고 회장 유고시에 직무를 대행한다.
3. 감사(2인):학회의 재정과 사업을 감독한다.
4. 삭제 <2017.01.20.>
5. 이사(20인 이내):총무, 재무, 연구, 기획, 섭외, 출판, 지역이사로 하고 학회의 실무를 집행한다.
6. 편집위원(10인 내외): 편집위원장을 중심으로 편집위원회를 구성하고 학회에서 발표하는 논문을 심사 하며, 학회지와 기타 출판물

을 기획·편집한다.<개정 2018.12.15.>

7. 자문위원(무정수):학회의 회장과 감사를 역임한 회원은 자문위원으로 위촉하고, 학회의 운영 전반에 대하여 자문한다.
8. 연구윤리위원(15인 이내):학회의 연구물 간행에서 표절 및 중복게재 등 부정한 행위를 심의 처리한다.

제 13조(임원의 임기) 임원의 임기는 2년으로 하되 연임할 수 있다. <개정 2017.01.20.>

제 14조(임원의 선출) 회장과 감사는 총회에서 선출한다. 부회장, 이사, 편집위원장과 편집위원은 회장이 위촉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1절 총회

제 15조(총회의 소집) 총회는 정기총회와 임시총회로 구분하여 소집한다. 정기총회는 매년 12월에 회장이 소집하고, 임시 총회는 필요한 때에 회장 또는 회원 1/3 이상의 요구가 있을 때 소집한다.

제16조(의결) 모든 안건은 출석 회원 과반수의 찬성으로 의결한다.

제17조(중요 안건의 예심) 총회에서 의결할 중요 사안은 이사회에서 사전에 심의한다.<개정 2017.01.20.>

제18조(의결사항) 다음 사항은 총회의 의결로 결정한다.

1. 회장과 감사의 선출
2. 삭제 <2017.01.20.>
2. 예산안 및 결산 승인
3. 회칙의 개정과 조직의 개편
4. 기타 학회의 운영에 필요한 사항

제2절 평의원회

제 19조 삭제 <2017.01.20.>

제 20조 삭제 <2017.01.20.>

제3절 이사회

제 21조(구성과 소집) 회장·부회장·이사로 구성하며, 회장이 필요시 수시로 소집한다.

제 22조(기능)

1. 학회의 사업을 분장하고 추진하는 일과 관련된 사항을 협의 집행한다.
2. 편집위원회 위원을 추천한다.<개정 2018.12.25.>

제 23조(업무분장) 이사의 업무는 아래와 같이 분장하고, 필요에 따라 지역이사와 섭외이사를 둘 수 있다.

1. 총무이사:학회 조직·회원 관리, 재산·도서·문서·장부·기록·자료 관리
2. 연구이사:연구 발표회, 학술회의와 세미나, 유적 답사의 기획과 추진
3. 재무이사:재정·회계·기금의 관리, 예산·결의안 작성
4. 기획이사:사업계획, 연구프로젝트 수주 및 기획, 학회 발전 방안 연구
5. 출판이사:학회지 및 기타 출판물의 간행 실무 담당

제24조(간사) 학회의 연구, 행정, 연락, 도서관리 등의 제반 실무를 위하여 간사를 둘 수 있다.

제4절 편집위원회

학술지와 기타 출판물의 기획, 편집, 심사를 위해 학회 내에 편집위원회를 둔다.

제 25조(구성과 운영) <개정 2018.12.25.>

1. 편집위원은 학회 이사를 포함하여 전공분야에 연구업적이 인정되는 자를 이사회에서 추천하고 회장이 임명한다. 단, 편집위원의 위촉 과정은 공개하지 않는다.

2. 편집위원의 임기는 2년이며, 연임이 가능하다.
3. 편집위원회는 편집위원장과 편집위원으로 구성한다. 편집위원회 실무는 출판이사가 담당하며, 편집간사가 보조한다.
4. 편집위원회는 연 2회 정기적(3월, 9월)으로 개최한다. 단 편집위원장과 학회장은 필요시 수시로 편집위원회를 개최할 수 있다.
5. 편집위원회는 편집위원 1/2 이상의 출석으로 성회하며, 출석위원 2/3 이상의 찬성으로 의결한다.
6. 편집위원회 회의는 반드시 <회의록>을 작성하고, 5년간 보관한다.
7. 편집위원장과 편집위원은 재임 중 연구윤리위원회에 당연직으로 속한다.

제 26조 (편집위원장의 임명과 역할)

1. 편집위원장은 편집위원 가운데 회장이 임명하며, 유고시 회장이 재임명 한다.
2. 편집위원장의 임기는 2년이며, 연임이 가능하다.
3. 편집위원장은 편집위원회 회의를 주관하고, 편집위원회의 제반 업무를 총괄한다.
4. 편집위원장은 재임 중 연구윤리위원회 위원장을 겸임한다.

제 27조(기능)

1. 투고 논문에 대한 심사 및 심사자 선정
2. 심사 확정 논문에 대한 처리
3. 학보 내용과 관련된 기획 등 학보의 편집에 관한 주요 사항
4. 기타 학회 출판물에 대한 기획 및 심사
5. 학회지 등에 게재할 저작물의 심사는 별도의 규정을 제정하여 시행한다.

제 28조(편집자문위원회의 설치와 기능)

편집위원장은 학술지의 수준 제고를 위해 편집자문위원회를 둘 수 있다.

1. 편집자문위원은 필요시 전임 회장을 비롯해 학계의 원로 중진 가운데 편집위원장이 회장의 승인을 받아 위촉한다.

2. 편집자문위원은 10명 내외로 한다.
3. 편집자문위원의 임기는 제한하지 않는다.
4. 학보의 편집과 간행에 대해 자문한다.
5. 기타 학회 출판물에 대한 자문

제5절 연구윤리위원회

제 29조(구성과 소집) 회장, 편집이사 및 연구이사 중에서 선임한 위원으로 구성한다. 회장이 위원장이 되어 회의를 주재하며, 필요시 수시로 소집한다.

제 30조(기능) 학회의 연구물 간행에서 표절 및 중복게재 등 부정한 행위가 있을 경우, 그 처리를 심의 결정한다.

제 31조(연구윤리 문제의 처리) 연구윤리 문제에 관한 사항은 별도의 규정을 제정하여 공정하게 시행한다.

제3장 재정

제 32조(예산 편성) 학회에서 소요되는 예산은 회원의 회비와 기타 수익금 및 각종 보조비와 기부금 등으로 편성한다.

제 33조(수익사업) 학회는 공동 연구비, 공동 저작의 인세나 저작료 기타 학술활동과 관련된 수익 사업을 할 수 있다. 또한 학회의 이름으로 행하여진 사업에서 회원 수익금 중 일부를 헌납 받을 수 있다.

제 34조(회비) 회원의 회비는 이사회에서 정한다. <개정 2017.01.20.>

제 35조(회계년도) 본 학회의 회계 년도는 매년 12월 정기총회 개최일로부터 다음 해 12월 정기 총회 개최 전일까지로 한다.

제 36조(결산보고) 총무이사는 본 학회의 재정운영과 사업추진을 수시로 이사회에 보고하고, 결산 내역과 사업 실적을 12월 정기총회에 보고하여야 한다. <개정 2017.01.20.>

제 37조(기금의 조성과 운영) 학회의 특수 사업 추진이나 장기적 발전을 위하여 특수 목적의 기금을 조성하고 운영할 수 있다. 기금은 일반 회

계와 분리하여 관리 운영한다.

부 칙

이 회칙은 2006년 11월 1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회칙은 2017년 1월 21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회칙은 2018년 12월 15일부터 시행한다.

편집 규정

2011년 11월 01일 제정
2017년 01월 20일 개정
2018년 12월 15일 개정

제1조 이 규정은 한국서원학회의 학회지인 『韓國書院學報』(이하 '학보'라 약칭함)의 편집 및 논문의 투고와 심사에 관한 사항을 규정하는데 목적이 있다.

제2조 학보는 서원 연구와 관련된 다음과 같은 내용을 수록한다.

① 연구논문

② 비평논문(說林, 論壇 등을 포함)

③ 기타 학회의 학술활동에 부합되는 글

제3조(인쇄 및 발행) 학보는 년2회 정기적으로 간행한다.

① 인쇄일은 6월 23일, 12월 23일로 한다.

② 발행일은 6월 30일, 12월 30일로 한다.

제4조(투고 제한) 학보에는 회원만이 투고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단 공동연구의 경우 제1저자가 회원이어야 한다.

제5조(논문 심사)

① 투고된 논문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연구윤리와 원고 작성규정의 준수유무, 학회지 성격에 부합 여부를 우선 심의한 후 이를 통과한 논문에 한하여, 별도의 전문 학자를 위촉하여 심사한다. <개정 2018.12.15.>

② 심사위원은 해당 분야 전문학자 3인을 위촉한다. 단 부득이한 경우 편집위원도 심사위원으로 위촉될 수 있다. 단 투고자와 같은 소속의 심사자는 배제한다.

③ 심사과정은 일체 공개하지 않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단 수정이

필요한 지적사항에 대해서만 공개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④ 심사위원에게는 소정의 심사료를 지급한다.

제6조(논문 심사 절차)

① 심사위원은 논문의 학문성, 독창성 등을 객관적으로 심사하여, 게재(A), 수정후 게재(B), 재심의(C), 게재불가(D)의 4등급으로 판정한다.

② 게재 판정을 제외한 수정후 게재, 수정후 재심사, 게재불가 판정에 대해서는 그 이유를 명시하여야 한다.

③ 심사위원은 일주일 이내에 심사결과를 편집위원회에 통보하여야 한다.

④ 편집위원회는 심사 결과를 토대로 다음과 같이 결정한다.

(A,A,A) (A,A,B):게재

(A,B,B) (B,B,B):수정 후 게재

(A,A,C) (A,A,D) (A,B,C) (A,B,D):편집위원 또는 제3자에게 “수정 후 게재” 또는 “수정 후 재심사” 판정을 의뢰

(A,C,C) (B,B,C) (A,C,D) (B,C,C) (B,B,D) (C,C,C):수정후 재심사

(A,D,D) (B,C,D) (B,D,D) (C,C,D) (C,D,D) (D,D,D):게재불가

⑤ 재심사는 1회로 제한하며, 심사위원 전원 수정 후 게재(B) 이상의 판정을 받아야 게재할 수 있도록 한다.

제7조(원고의 기한) 원고의 투고와 논문게재는 아래와 같이 규정한다.

① 원고의 투고는 발행일로부터 2개월 전까지로 한다. 단, 필요시 편집위원회의 의결을 거쳐 기일을 연장할 수 있다.<개정 2017.01.20.>

② 논문의 게재는 발행일로부터 1개월 전에 심사가 완료된 것에 한해 수록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단, 필요시 편집위원회의 의결을 거쳐 심사 기한을 연장할 수 있지만 인쇄일(6월 23일, 12월 23일)을 넘기지 않도록 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8조(심사료와 게재료 청구) 편집위원회는 <논문투고규정> 제7조에 의거하여 심사료와 게재료를 청구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9조(지적재산권) <저작권 이양동의서>에 의거하여 《한국서원학보》에 수록된 원고에 대한 지적재산권은 학회에 귀속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10조 본 규정에 명시되지 않은 사항은 관례에 준한다.

부 칙

이 편집 규정은 2011년 11월 1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편집 규정은 2017년 1월 20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편집 규정은 2018년 12월 15일부터 시행한다.

논문투고 규정

2017년 01월 20일 개정
2018년 12월 15일 개정

제1조(목적) 이 규정은 한국서원학회 학술지『韓國書院學報』에 게재하는 논문의 투고와 작성에 대하여 명시하는 것을 목적으로 한다.

제2조(논문의 종류) 논문은 기획논문과 일반논문으로 나뉘며, 모두 심사의 대상이 된다. 기획논문은 편집위원회에서 기획하여 특정 연구자에게 집필을 위촉한 논문을 가리킨다. 일반투고논문은 기획과 무관한 개별적 자유투고 논문을 가리킨다.

제3조(원고의 분량) 논문은 편집된 논문집 기준으로 35쪽(200자 원고지 150매 내외)을 초과할 수 없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원고 쪽수는 본문, 각주, 도표, 그림, 참고문헌, 초록, 주제어 등을 모두 포함한다. 35쪽을 넘을 경우에는 초과 게재료(원고지 5매당 10,000원)를 부과한다.

제4조(원고의 조건)

① 논문은 기존에 발표되지 않은 창의적인 것이어야 한다.

② 국문으로 논문 제목, 저자 성명 및 소속과 직위, 목차, 국문초록, 주제어(5개 내외), 본문, 참고문헌, 외국어 초록, 외국어 주제어(5개 내외) 순으로 정리되어야 한다.

③ 우리 학회의 특성상 본문은 외국어(중문, 일문, 영문)로 작성이 가능하다. 단 중문·일문 논문의 경우 초록은 한글과 영문의 2종을 제출해야 한다. 영문 논문의 경우에도 한글과 영문 초록을 제출한다. 한글 논문의 외국어 초록은 英文을 기본으로 하지만 우리 학회의 특성상 中文·日文 투고도 인정한다. 단 중문·일문으로 투

고시에는 영문으로 제목, 필자명, 주제어를 병기해야 한다.

④ <원고작성 규정>을 준수해야 한다.

제5조(투고 기한) 논문집은 매년 6월 30일, 12월 30일 2회 발간한다. 논문의 투고 기한은 발행일로부터 2개월 전까지로 하며, 논문의 게재는 발행일 1개월 전에 심사가 완료된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이들 기한은 편집위원회의 의결을 거쳐 연장될 수 있다.

제6조(원고의 투고 제한)

① 회원만이 투고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단 공동연구의 경우 제1저자가 회원이어야 한다.

② 다른 학술지 등에 이미 발표했거나, 발표된 논문의 일부를 주 내용으로 하는 논문은 투고할 수 없다.

③ 표절이나 중복게재의 경우 향후 투고를 제한한다.

제7조(심사료와 게재료 납부)

① 편집위원회의 심의를 통과한 논문은 위원회에서 투고자에게 심사비를 요청하며, 심사료를 납부한 논문에 한해 심사를 진행한다. <개정 2018.12.15>

② 게재가 확정된 논문은 편집위원회에서 책정한 소정의 게재료를 납부해야 한다.<개정 2018.12.15>

③ 심사료와 게재료는 한국서원학회 개설 계좌로 납부한다.

제8조(논문 작성) 논문은 '한글과컴퓨터 워드프로그램[한글 2002이상, *.HWP]' 또는 그것과 통용 가능한 워드프로그램으로 작성한다.

제9조(원고 투고) 투고하는 논문은 <연구윤리규정>을 준수하고, <원고작성규정>에 따라 작성된 것이어야 하며, 규정을 어길 경우 편집위원회에서 반려할 수 있다.

① 원고는 한국서원학회 홈페이지(www.ksw2007.or.kr)에 회원으로 가입한 후 <온라인논문투고시스템>을 통해 제출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포털에서 '한국서원학회' 검색]

② 전자우편을 이용할 경우에는 위에 정한 원칙대로 작성된 논문을 다음의 주소로 발송한다 (접수 : ksw2007@ksw2007.or.kr).

③ 논문 투고시 홈페이지에서 <논문접수신청서>와 <저작권이용동의서>를 다운받아 작성한 후 제출한다. <개정 2018.12.15>

④ 투고자는 해당 논문을 <KCI문헌유사도 검사 서비스> 내지 기타 표절프로그램에서 검사를 마친 후 결과서를 함께 제출한다. <개정 2018.12.15>

제10조(원고의 저작권 이양 동의) 논문 투고자는 우리 학회에서 정한 '저작권 이양 동의서의 내용 및 단서'를 읽고, 투고자의 논문이 《韓國書院學報》에 게재됨과 동시에 투고 논문에 대한 저자권을 '한국서원학회' 이양함을 동의하는 <저작권 이양 동의서>를 작성하여 제출해야 한다. <저작권 이양 동의서>는 별도의 서명이 없더라도 논문 투고시 동의서의 내용을 작성하여, <논문접수신청서>와 함께 온라인 투고 시스템이나 학회 메일로 제출하는 것으로 서명을 대신한다. 저작권 이양 동의서의 내용 및 단서는 아래와 같다. <개정 2018.12.15>

1) 저작권 이양 후에 저자가 가지는 권리

① 논문의 내용으로 기술된 특허, 등록상표, 독창적인 신기술, 연구법 및 응용에 관한 권리 및 기타 법으로 보장된 권리.

② 저자가 저자의 논문을 교육을 위한 교재로 사용하거나 저자의 취직, 진급, 연구계획서 및 연구보고서의 작성, 연구 결과의 비수익성 광고 등 개인적인 목적으로 사용하기 위한 복사, 복제 및 인쇄를 할 권리.

③ 저자가 소속된 기관 및 단체, 연구비를 지원하고 그 사실이 논문에 표시된 단체, 저자의 개인 WEB SITE에 논문의 전문 혹은 일부를 게재하고 배포할 권리.

④ 저자가 교과서 등 서적과 종설의 기술, 저자에 의한 강의, 연구발표 및 워크숍 등을 위한 교재 제작을 위하여 논문의 전부 혹은 일부를 사용할 권리.

2) 저작권 이양 후에 저자가 가지는 권리를 행사하기 위한 단서

① 위에 허락된 목적으로 논문의 전부 혹은 일부를 사용할 경우에는

반드시 저작권이 한국서원학회에 속함을 표시하여야 한다.

② 논문을 상품화하기 위하여 논문에 대한 권리를 영리단체에 이양할 수 없다. 단, I(1)의 권리를 행사하는 경우에는 그렇지 아니하다.

3) 저작권의 소유 및 서명에 대한 단서

① 저자 중 1인(논문에 대한 책임을 질 수 있는 저자)이 모든 저자를 대표하여 본 저작권이양 동의서에 서명하여야 한다.

② 게재논문의 저작권이 저자가 아닌 저자를 고용하고 있는 학교, 회사, 연구소 혹은 단체에 속한 경우에는 저작권을 행사하는 해당 단체의 저작권 담당자가 저작권이양동의서에 서명하여야 한다.

③ 본 저작권이양동의서에도 불구하고 대한민국 정부 및 연구비를 지원한 기관 혹은 단체가 본 논문에 대한 저작권을 행사하고자 하는 경우에는 그 행사를 제한하지 아니한다.

④ 본 저작권이양동의서에 서명함으로써 저자는 본 논문이 학술대회에서의 초록을 제외한 다른 형태로 발간되지 않았으며, 타인의 저작권을 침해하는 불법적인 내용을 포함하지 않았음을 서약 한다.

⑤ 논문의 전부 혹은 일부가 학회지에 게재되기 전에 어떠한 형태로든 상업적인 목적으로 제작되거나 유포된 경우라도 학회지 게재 이후에는 상업적인 목적을 위하여 학회지에 발간된 내용의 전부 혹은 일부를 포함하는 새로운 내용으로 변경하여 제작하거나 유포할 수 없다.

⑥ 상기인(들)은 저작권 이양동의서에 기재된 모든 사항을 읽고 이해하였으며 위 내용에 동의하는 것을 의미한다.

⑦ 본 저작권이양동의서 파일을 작성하여 한국서원학회 온라인논문투고 시스템에 제출하는 것으로 서명을 대신한다.

부 칙

이 논문투고 규정은 2017년 12월 29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논문투고 규정은 2018년 12월 15일부터 시행한다.

원고작성 규정

2017년 01월 20일 개정
2018년 12월 15일 개정

제1조(기본 원칙) 투고하는 논문은 제목, 성명(소속과 직위), 목차, 국문초록, 주제어, 본문, 참고문헌, 외국어초록(제목, 성명, 소속, 직위의 영문표기 or 병기), keyword(영문 or 영문 병기)의 순서로 작성한다. 투고된 원고가 작성 규정을 따르지 않을 경우 반려할 수 있다. <개정 2018.12.15>

제2조(저자 표기) 투고자의 소속은 성명 다음에 괄호를 하고, 투고자의 소속과 직위를 병기한다. 공동연구의 경우는 제1저자를 명시한다.<개정 2018.12.15>

<예> 단독 : 이수환(영남대학교 역사학과 교수)
공동 : 제1저자 이수환(영남대학교 역사학과 교수), 이병훈(영남대학교 민족문화연구소 연구원)

제3조(장·절 표기) 장과 절의 기호 표기 방식은 Ⅰ. 1. 1) (1) / Ⅱ. 1. 1) (1) / Ⅲ. 1. 1) (1) / Ⅳ. 1. 1) (1)의 순서로 한다.

<예> Ⅳ. 李天封의 한강학 계승과 한강학파에서의 위상
1. 寒岡學의 수용과 師門의 협찬활동
1) 寒岡學의 수용 양상
(2) 川谷書院 중건론

제4조(본문의 작성)

① 본문은 한글로 작성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하며, 외국어[일문, 중문, 영문]로 된 논문도 투고할 수 있다. <개정 2018.12.15>

② 본문 작성시 활자크기는 한글 10포인트, 인용문과 각주는 9포인

트로 한다.

③ 문단 모양은 기본적인 작성방식을 따른다. 왼쪽 여백(0), 오른쪽 여백(0), 들여쓰기(0), 문단 위(0), 문단 아래(0), 낱말 간격(0), 정렬 방식(양쪽 혼합), 줄 간격 160%.

제5조(한자 표기) 본 학술지의 특성상 漢字를 그대로 노출시켜야 되는 경우가 많으나, 한자어의 가독성을 위해 자주 중복되거나 일반적인 단어는 가급적 한글을 사용한다.

제6조(인용문 작성) 본문의 인용문은 한글로 번역하는 것을 원칙으로 한다. 한글로 번역된 인용문의 경우, 인용원문은 각주에 제시한다. 인용문은 두 칸을 띄우고 시작한다.

제7조(인용시 작성) 본문에 인용된 시의 경우는 원시를 먼저 쓰고 풀이를 병립하여 작성한다.

<예> 派者同水 갈래가 져도 근원이 같은 물이면
百川雖異則水 온갖 냇물이 서로 다르지만 같은 물

제8조(문헌 표기) 단행본·문집·학회지 등은 『 』(유니코드 300E, 300F)으로 표기하며, 논문·단행본 속의 작은 제목 등은 「 」(유니코드 300C, 300D)으로 표기한다. 단 학위논문은 『 』으로 표기하며, 같은 해에 여러 편의 논문은 연도 뒤에 알파벳(a, b) 붙여 구분한다. 논문명과 학술지명 사이에 쉼표(,)를 붙여 구분한다.

<예> 정만조,「조선시대 파주 사족과 서원활동」,『한국서원학보』1, 한국서원학회, 2011.

김덕현,「한국서원의 입지와 경관에 대한 독해」,『한국서원학보』1, 한국서원학회, 2011(a).

추제협,『근기 퇴계학의 형성에 관한 연구』, 계명대학교 박사학위논문, 2012.

김인걸,「서원 연구의 현재적 의의와 향후 과제」,『한국서원학보』1, 한국서원학회, 2011, p.214.

제9조(작품 및 인용 표기) 작품명은 < >(유니코드 3008, 3009), 원문인용·대화 등은 “ ”(유니코드 201C, 201D), 간접인용 및 강조는 ‘ ’(유니

코드 2018, 2019) 로 표기함을 원칙으로 한다.

<예> 曺植,『南冥集』卷2,〈遊頭流錄〉,“新雨水肥, 激石潰碎…….”

제10조(표·그림·사진의 구분) 논문에 사용된 표, 그림, 사진 등의 구분은 < >(유니코드 FF1C, FF1E)로 표기한다.

<예> <표 1> <표 2> <그림 1> <그림 2>

제11조(각주 번호) 각주의 번호는 기본적으로 쉼표(,)나 마침표(.) 다음에 붙인다.

<예> 언급이 여러 차례 보이는데,1) 심지어 유생들을 가르치기까지 하였다.2)

제12조(중복 인용) 중복 인용되는 책이나 논문의 경우 ‘앞의 책’ 혹은 ‘앞의 논문’을 사용한다. 같은 저자의 글이 중복되는 경우는 연도와 영문소문자로 구분한다.

<예> 김학수, 앞의 논문(2007), pp.41-42.
정만조, 앞의 책(2012), p.22.
이수환, 앞의 논문(2015), p.17.
정순우, 앞의 논문(2013a), p.213.

제13조(각주와 참고문헌 작성) 각주와 참고문헌은 저자, 제목, 책이름, 편집기관(혹은 출판사), 출판연도, 수록 페이지의 순서로 기록한다. 참고문헌은 원서를 먼저 제시하고, 연구논문과 저서를 가나다순으로 정리한다.

<예> 이해준,「노강서원 자료의 유형과 성격」,『한국서원학보』1, 한국서원학회, 2011, p.17.
정만조,『조선시대 서원연구』, 집문당, 1995, pp.150-153.

제14조(초록 작성) 국문과 외국어로 작성한 초록과 주제어를 제출한다. 국문초록은 200자 원고지 5매 이내로 하며, 영문 초록은 300단어 이내로 한다. 주제어(keyword)는 5개 이하로 한다. 영문 이외의 외국어 초록은 제목과 저자, 소속, 주제어는 英文을 병기한다. <개정 2018.12.15>

제15조(기타) 위에 명시되지 않은 사항은 학계의 일반적인 원칙을 따른다.

<개정 2018.12.15>

부 칙

이 원고작성 규정은 2017년 12월 29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원고작성 규정은 2018년 12월 15일부터 시행한다.

연구윤리 규정

2011년 11월 01일 제정
2017년 01월 20일 개정
2018년 12월 15일 개정

제 1 조(목적) 이 규정은 한국서원학회 관련 연구물을 간행함에 있어 연구윤리를 천명하는 데 그 목적이 있다.

제 2 조(기능) 이 규정은 연구자의 창의적인 학술활동을 보호하고, 표절 및 중복게재 등 부정한 방법의 연구를 제재하는 기능을 갖는다.

제 3 조(연구윤리위원회) 제1조(목적)와 제2조(기능)의 내용을 준수하기 위해 연구윤리위원회를 설치한다.

① 연구윤리위원회는 편집위원과 연구이사 중에서 10명 내외로 편집위원장이 구성한다. 단, 편집위원은 당연직으로 들어간다.<개정 2018.12.15.>

② 연구윤리위원회는 학회의 모든 학술활동에 대하여 심의를 한다.

③ 위원장은 편집위원장이 겸임한다. 임기는 2년이며, 연임이 가능하다. 위원장의 부재시에는 편집위원과 연구이사 중 위원장이 위임한 자가 그 직무를 대리한다.<개정 2018.12.15.>

제 4 조(표절 및 중복게재) 다음의 사항에 해당하는 논문의 경우 표절 및 중복게재로 간주한다.

① 타인의 연구결과를 본문이나 주 등에 명시하지 않고 자신의 것처럼 표현하는 것은 '표절'로 간주한다.

② 이미 타 학술지에 게재된 자신의 연구내용을 첨삭 없이 처음 발표하는 것처럼 표현하는 것은 '중복게재(자기표절)'로 간주한다.

제 5 조(심의 및 판정)

① 학회지에 투고된 논문은 논문표절시스템(KCI 문헌유사도 검사

서비스 등)으로 검증한 후 연구윤리위원회의 심의를 받는다. <개정 2018.12.15.>

② 표절 및 중복게재로 제보된 논문의 심의 및 판정은 연구윤리위원회에서 행한다.

제 6 조(제재조치) 표절 및 중복게재로 판정된 논문에 대해서는 다음의 제재조치를 행한다.

① 해당 논문 투고자에 대해서는 향후 3년간 투고를 금지하며, 회원의 자격을 박탈한다.

② 해당 논문이 이미 학보에 게재된 경우 논문목록에서 삭제한다.

제 7 조(공고) 표절 및 중복게재로 판정된 논문은 한국서원학회 회보에 공지하며, 한국학술진흥재단에 해당 내용에 대한 세부적인 사항을 통보한다.

제 8 조(소명기회) 연구윤리규정 위반으로 제보된 논문 투고자에게는 충분한 소명의 기회를 주도록 한다.

제 9 조(기타) 제4조에 해당하는 표절 및 중복게재 외에도 다음 사항을 준수한다.

① 고의로 자료나 통계를 조작해서는 안 된다. 이 경우 '표절 및 중복게재'에 준하여 제재한다.

② 학회 명의를 도용하여 연구사업이나 출판 등을 해서는 안 된다. 이 경우 '표절 및 중복게재'에 준하여 제재한다.

제10조 본 규정에 명시되지 않은 사항은 관례에 준한다.

부 칙

이 윤리 규정은 2011년 11월 1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윤리 규정은 2017년 1월 21일부터 시행한다.

이 윤리 규정은 2018년 12월 15일부터 시행한다.

한국서원학회 임원명단

고　　문 : 정만조, 이해준, 정순우
회　　장 : 이수환(영남대)
부 회 장 : 김학수(한중연)
감　　사 : 장동표(부산대), 최광만(충남대)
총무이사 : 이병훈(영남대)
재무이사 : 김자운(공주대)
연구이사 : 조영화(교남문화유산원), 김종석(국학진), 옥영정(한중연),
김경옥(목포대), 정우락(경북대), 손숙경(동아대),
김대식(경인교대), 권오영(한중연), 최석기(경상대)
기획이사 : 조준호(실학박물관), 채광수(영남대)
출판이사 : 이우진(공주교대), 이근호(한국체육대)
지역이사 : 경기.강원 이규대(강릉대), 전라.제주 김봉곤(전남대)
경상 정진영(경북독립운동기념관)
간　　사 : 이신예(한중원), 김순한(영남대)

편집위원

편집위원장 : 김학수(정치사회사, 한중연)
편 집 위 원 : 강봉수(윤리교육, 제주대), 등홍파(중국서원, 악록서원),
이우진(교육사, 공주교대), 엄연석(철학, 한림대),
정수환(사회경제사, 한중연), 정우락(국문학, 경북대),
조재모(건축, 경북대), 진성수(철학, 전북대)
편 집 간 사 : 김순한(영남대)

韓國書院學報 제11호 값 15,000원

인쇄일 2020년 12월 28일
발행일 2020년 12월 30일
발행처 한국서원학회
38541 경상북도 경산시 대동 280 영남대학교 인문관 353호
전 화 053-810-3706
팩 스 053-810-4696
이메일 ksw2007@ksw2007.or.kr
홈페이지 www.ksw2007.or.kr
발행인 이수환
학회비 종신회원(60만원), 일반회원(3만원)
기관회원(5만원), 외국회비($50)
회비납부계좌 : 대구은행 508-12-677669-6, 이수환(한국서원학회)

ISSN 2234-8603

The Journal of Korean Seowon Studies

NO. 11 December, 2020

Contents

Articles

Types and Characteristics of Etiquette in Chinese Seowon ····· Lan, gap-un 7

The Types and Significances of Korean Seowon Rituals ····· Han, Jae-hoon 27

The Characteristics and Meaning of Sacrificial rite in Seowon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 A Study on the Seowon of Namin-line and Seoin-line - ····· Lim, Geun-Sil 55

The Culture of Zhu-xi's Seow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orean Seowon ····· jang, pin-dan 91

A Comparative Study on the 'Residential Environment' of Wuyijingshe and Ok-san Seowon in the background of Neo-Confucianism ····· Peng, hong-xu 103

The changes in status of Oksan Seowon in Gyeongju during the Joseon Dynasty ····· Lee, Byoung-hoon 125

A study on the educational practice and its characteristics of Seoksil-Seowon in the late 17th-the early 18th century-Focusing on the educational activities of Kim Chang-hyup- ····· Kim, Ja-woon 185

A study on the origin of publishing in Seowon in Chosun dynasty ····· Pae Hyon-suk 219

The Background of the Seowon in Baekrok-dong and the Change of Seowon in China ····· Deng Hong-bo·Zhao Wei 251

Bulletin ····· 341

Association Notes

KOREAN SEOWON STUDIES ASSOCIATION

http://www.ksw2007.or.kr e-mail : ksw2007@ksw2007.or.kr

ISSN 2234-8603